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中短篇小说精选

杨显惠/著

关于饥饿与死亡的真实叙述

天津古籍出版社

经典书局

关注历史，就等于关注我们自己。

夹边沟，是甘肃酒泉县一关押右派犯人的劳改劳教农场。从1957年10月开始，那里关押了近三千名右派分子。1961年10月，上级纠正了甘肃省委的左倾错误，并开始遣返右派犯人。此时幸存者还不到一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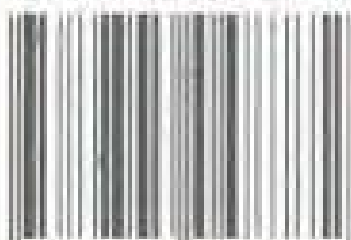
作者杨显惠，历时5年，采访了一百多位当事人，终于使尘封四十多年的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

这些小人物关于饥饿与死亡的回忆，令人惊心动魄。

本书中所选《上海女人》获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短篇小说”第一名。

本书是杨显惠先生的“夹边沟记事”系列及其中短篇小说的精选。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ISBN 7-80504-877-0



9 787805 048772 >

ISBN 7-80504-877-0/1 · 193 定价：19.80元

篇小说精选

关于饥饿与死亡的真实报道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夹边沟记事:杨显惠中短篇小说集/杨显惠著.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2. 5

(蓝色书坊 / 赛妮亚 章德宁 / 主编)

ISBN 7-80504-877-0

I. 夹… II. 杨…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7640 号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著

出 版 人 刘文君
责任编辑 董令生
出版发行 天津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 编 300020
印 刷 河北省固安县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76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ISBN 7-80504-877-0/I·193

定价:19.80 元

历史的补丁(代序)

一个作家不应该回避他每天所生存的这个变化的空间
文学是对人类的希望,同时也是让人更坚信,人是最值得庆幸
的存在。

——大江健三郎

—

2001年年底,中国作协召开第六次作代会,我去看望新疆刘亮程、赵光鸣诸君,邂逅一位评论家。聊及当代中国文坛现状,该先生对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系列小说大加赞赏,说评论界许多人认为“夹边沟”系列乃中国的“古拉格群岛”。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我对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一向情有独钟。索氏深邃的眼睛让人久久难以忘怀。

2002年年初,北京召开春季图书订货会,有一家出版社征订《夹边沟记事》一书,我大为高兴,但封面上的作者署名却不是“杨显惠”。这令我好生奇怪,赶忙向那位著名评论家询问,中国究竟有几个人在研究“夹边沟”问题?杨显惠先生第二天一大早从天津赶到北京,找到了要出版《夹边沟记事》的出版社。经核实,该书一共收录了九篇小说,其中有八篇乃杨先生的小说。又进一步调查,选

编该书的作者乃从夹边沟死里逃生的一名右派所为。杨先生曾经采访过该老先生，杨著“夹边沟”系列中有一两篇小说使用了该编者提供的素材。杨先生出于对该老的感激，在《上海文学》连载“夹边沟”系列后，每期都给该先生寄赠样刊。未曾想，该老经不住商业的诱惑，将杨先生用五年心血采访而成的文章擅自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并辩称，我还未来得及给你打招呼。出于对“夹边沟”右派的敬仰，姑隐其名，不作多论。

历史的轮回常常让人哭笑不得。

二

有人说，历史是一位公正的老人，最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实不然，历史是“秦始皇的兵马俑”，你不挖，它永远不出来。殊不知，有多少埋葬在万丈深渊的历史暗角，我们永不知晓，有多少冰雪背后的哭泣引人深思。解冻、解禁、解密、解构，随着社会环境的逐步改善，历史的真相会渐露峥嵘。

杨显惠，这个不修边幅、笨头笨脑的甘肃大汉，自己搭上路费，历尽千辛万苦，用了五年的时间，终于使中国西北的劳改营——夹边沟这段尘封四十年的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那几千名卑微的小人物的命运，令人悲愤。那上百名右派关于饥饿与死亡的回忆，让人惊叹、呕吐、流泪、失眠！

由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再加之客观人文环境的荒寒和太多的弄虚作假，许多人感受历史和苦难的神经已

经麻木了，即使你用一枚尖针刺他的皮肤，他也没有多大的反应。杨显惠把夹边沟当作锋利的笔，一下一下揭开昔日的伤疤，叫它流血并且暴露出血淋淋的伤口，再撒上一把盐，给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人们来一个激灵。因为，关注历史，就等于关注现实，也等于关注我们自己。

2001年的夏天，《上海文学》已发表了《夹边沟记事》的十二个中短篇，在甘肃省引起很大震动。许多原本不愿接受采访的右派，主动打电话约见杨显惠，讲述自己真实的经历。

一位死难者的家属告诉作家，他们已将《上海文学》上连载的文章如数收集起来，清明节上坟时焚烧，以告慰父亲冤屈的亡灵。

一位死难者的儿子，在一次偶然的的机会里读到了以自己的父亲为背景的小说，一下子哭倒在地。并把报刊供在桌上，长跪着，一页一页地读，一页一页地哭。并对朋友说，父亲去世时他还小，只知道父亲死在夹边沟，但不知父亲死得这样惨……

在甘肃的临洮县，作家访问了从夹边沟死里逃生的八十二岁高龄的裴天宇老人。老人说，他在甘肃师大当教授的学生寄来了四册《上海文学》，他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才读完那四篇文章。他说：每一次拿起来读不上十分钟，就泪流满面……伤心得读不下去呀！

三

我在含着泪审阅完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小说后，

又一口气读完了杨显惠早期的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虽然是作者十多年前的旧作,但其艺术及思想价值同样不同凡响。我终于找到了为什么杨显惠能写出《夹边沟记事》的思想根源。

杨显惠是甘肃知青,曾在河西走廊上山下乡。后调到天津工作。所以,杨显惠的创作分为四大背景:一类是以西北乡村和历史为背景的小说,以《妈妈告诉我》、《野马滩》、《黑戈壁》为代表;一类是以知青生活为背景的小说,以《贵妇人》、《小赤佬》、《洗个不停》和《不知道他是谁》为代表;一类是以大海为背景的小说,以《爷爷、孙子、海》、《海上,远方的雷声》和《这一片大海滩》为代表;另一类就是以右派生活为背景的“夹边沟”系列。由于杨显惠是城市人,所以他对乡村生活的感受就比不上他对知青生活的熟悉,因而导致了他的乡村小说的艺术感染力远逊于他的知青小说;他到天津海边生活的时间更是后来的事,所以他的大海系列也略显平庸。他的“夹边沟”系列和知青小说一脉相承,前者源于他刻骨铭心的体验,后者源于他成熟的文学理念、作家的良知和高贵的心灵。

优秀的小说应该传递四个方面的信息:一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和批判,二是对历史和文化的揭示和扬弃,三是对人本身的存在和人性善恶的多维思考,四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这四个方面是文学的魂魄,语言、叙述、情节、结构等是文学的皮毛和血肉。凡够得着“作家”这一称谓的写作者都应该具备优美的文笔、流畅的叙述、引人的情节和合适的结构,否则不属于文学范畴。像时

下流行的韩寒的《三重门》，只是高级中学生作文，刚刚进入了文学的外围。四流的作家，只是简单或肤浅地图解现实，不过供人消遣和休闲罢了，反腐败小说、美女文学、新写实主义等，大多在这个境界。三流的作家，透过现实已窥视到历史和文化的影子，像莫言、贾平凹、陈忠实、张炜、余华、阿来等作家已超越这一境界，正在向人本身进军。二流作家，直抵丰富、复杂、多维的人性，从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探索。许多小说为什么没有生命力，就因为他们还处在时代和现实的包围中，还没有冲进历史和文化的内核，更遑论人性。一流的作家，是世界级的大作家，不仅穿透现实、历史和人性本身，而且关怀人类存在的意义，像卡夫卡、贝克特、马尔克斯、海明威等人，无不是这种境界。中国文学要想和世界接轨，没有此种要求，绝对是天方夜谭。

杨显惠的《贵妇人》、《小赤佬》、《不知道他是谁》和《洗个不停》，已具备二流作家的全部要素，不仅揭露历史文化的细节，而且对人性尊严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传递了高贵的文学精神。正如他在给我的信中所言：我为什么二十一年不改初衷，旨在张扬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情怀。人道主义的核心是人的尊严，当我们面对成千上万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卑微而弱小的蝼蚁般的生命，作何感想？中国缺少愤怒的作家，这是中国文学的悲哀！大多数的谎言都可以被揭穿，只有艺术的谎言例外。当我们面对那么多精心编织的谎言的纱巾常销不衰时，作何感想？

日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说：“文学应该从人类的暗部去发现光明的一面，给人以力量，让人更信赖人。”当我在压抑中读到了杨显惠《贵妇人》中漂亮的“上海女人”况钟慧宁为玉碎不堪污辱的高贵品格时，禁不住欣喜若狂，这才是真正中国女人的形象、中国知识分子的写照、中国人的精神。《洗个不停》是千古绝唱的奇迹，《夹农》则是黑暗中的光明，给人以力量，让人更信赖人。

四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大体形成了四种格局：一种是以现实感觉、情爱、调侃、休闲、猎奇为内核的市民文学，一种是以武侠、娱乐、复仇为主调的通俗文学，一种是以爱国、救亡、统一、善恶、宣扬政治口号为宗旨的主流文学，一种是以历史、文化、人性、自由为精神的严肃文学。各个时期均有不同的作家各领风骚。就其艺术思想价值来说，自然各有高下，但就多元文化本身来说，各有其存在的理由，也不可一概批判。

问题是，一个民族文学里面一旦市民文学、通俗文学、主流文学大行其道，那是极不正常的。民族精神的传承靠的是严肃文学的血脉，市民文学和通俗文学，充其量是一个个色彩缤纷的泡沫，随着时代的步伐，迟早要烟消云散。人人休闲、麻木、自私，肯定是这个民族堕落的开始。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比昂松认为，我们在文学中追求的是一种有意义的生命，它虽然如露珠，却可以在风雨中

驰骋,有了这点精神,我们会坦然无畏。没有它,我们会觉得迷惘惆怅。我绝不赞成作家逃避责任,因为他是人类灵魂的舵手。这就是“健康而高贵”的文学精神。

当我阅读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和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时,禁不住想起了那个目光炯炯的俄罗斯老头索尔仁尼琴。两书相较,杨显惠侧重于细部描写,即右派在劳改营里经受的磨难,摄人魂魄,催人泪下;而且全部来自于对当事人的深度采访,具有很大的原创性。《中国一九五七》较之更全面更宏观,不仅写了右派在劳改营中的肉体和精神痛苦,还写了反右斗争的全过程。两本书珠连璧合,全面掀翻了那段历史,构成了中国真正的“古拉格群岛”。历史的真实使一切技巧都黯然失色,是无技巧的技巧,堪称伟大的作品,伟大的作家,点燃了一盏中国文学的希望之灯。是一块历史的大补丁。

五

写完本序后,赛妮亚小姐死缠着要放风筝,明媚春光让人激情盎然。擦干了眼泪,舔舐着伤口,开始出发。可是风筝的龙骨让小女不慎弄断,怎么接也接不起来,让人着急。一个断了背梁的风筝何时才能飞起来?

我有这样一个梦想。

赛妮亚

2002年3月8日

于京郊黄村

蓝色书坊

杨康康，甘肃人，已过天命之年，
上山山下多赴西北生产建设兵团
当过农工、售货员、会计、教员、盐场秘书

八十年代初开始创作，多次获全国大奖。

处女作《七月里》，代表作《爷爷、孙子、雨》
成名作《野马滩》，《妈妈告诉我》、《海上，远方的
雷声》

近年来致力于《命运三部曲》的采撷和写作
经过五年的呕心沥血

第一部《夹边沟往事》终于出版

本书曾在《上海文学》连载一年，引起巨大轰动

人民文学出版社、漓江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文汇
出版社、工人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未刊出版即遭审查，天津古籍出版社捷足先登

蒙钱锺书先生对本书无比垂青

谓其书之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



蔡妮亚 董德宇 / 主编

第一辑

- 拉面者 马建刚 / 著
- 绝活 赵光鸣 / 著
- 民间 尤凤伟 / 著
- 年月日 阎连科 / 著
- 民间 刘庆邦 / 著
- 公民凯恩 北一村 / 著

第二辑

-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 著
- 乡村岁月 阎连科 / 著
- 原始卷宗 尤凤伟 / 著
- 少年时代 刘庆邦 / 著
- 不可告人 王 石 / 著
- 楼下楼上 何玉茹 / 著
- 消失的人类 北一村 / 著

责任编辑 / 董余生

总体策划 / 蔡妮亚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Beijing Wenhu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100027 北京·崇文门东大街14号
010-67001622

蓝色书坊

赛托亚 李德宁 / 主编

文学应该从人类的暗部去发现光明的一面，给人以力量，让人更信赖人。

—— 大江健三郎

杨显惠 中短

目 录

历史的补丁(代序) / 赛妮亚

上编 夹边沟记事

上海女人 / 3

夹农 / 38

饱食一顿 / 65

逃亡 / 81

贼骨头 / 108

医生的回忆 / 135

李祥年的爱情故事 / 160

下编 野马滩

贵妇人 / 189

小赤佬 / 211

不知道他是谁 / 219

妈妈告诉我 / 235

洗个不停 / 240

野马滩 / 260

上编

夹边沟记事

她抹下绿色的缎子头巾，想把骨头全包起来，但是头巾太薄，透亮，一眼就能看见里边的骨头。我说她：你就捡点小骨头拿回去吧，大骨头不好拿，也的确没那个必要。就是在火化场，也只是给你一部分骨灰装骨灰盒，你何必大老远全都背回去？再说你这样上火车，列车员会看出来的。她不听，说，我用那件毛衣裹起来。

上海女人

这段故事是一位名叫李文汉的右派讲给我听的。他是湖北省人,高中毕业,1948年参加解放军,解放后曾经加入志愿军入朝作战。在朝鲜战场他负了伤,三根肋骨被美国人的炸弹炸断。回国治疗后留在公安部工作。他说,后来因为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的缘故,组织部门调他到甘肃省公安厅,名义是支援大西北。可是他在省公安厅工作不久,又被下派到酒泉地区劳改分局,在生产科当一名生产干事。1957年他被定为右派,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1960年12月以后,夹边沟农场的右派全部释放回原单位去了,他却无“家”可归,因为他是被开除公职的右派。在劳改分局的招待所里住了两个月以后,领导终于想出办法来了:你到安西县的十工农场去吧,不算干部,也不是劳改犯,去当个工人吧。他到了十工农场,厂领导又作难了:正式招工吧手续又不好办;哪有右派招工的道理?最后只能以刑满就业人员对待,每月发二十四元工资,在劳改队种菜。种菜到1969年,因为战备的原因,十工农场的犯人迁移到甘肃中部的五大坪农场去了,他不是犯人不能去,只好和其他几个就业人员一起移交小宛农场。于是,他就成了我们十四连畜牧班的放牧员,和我同住在羊圈旁的一间房子里。在一起生活得久了。相互有了了解,也信任对方了,他便陆陆续续对我讲了许多夹边沟农场的故事。

今天我再给你讲一段夹边沟的故事,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她是个右派的老婆,上海人。

我跟你说过,1960年国庆节前,夹边沟的右派——包括新添屯作业站的右派——除去死了的和几百名体质太弱什么活也干不了的,全都迁移到了高台县明水乡的一片荒滩上。省劳改局的计划是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调人,在那片荒滩上建一片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要开垦五十万亩土地。因为仓促上马冬季临近,其他农场的领导很贼,没有按计划调人,就夹边沟农场的右派调过去了。大约是一千五百人,分别住在祁连山前的两道山水沟里。千百年来,从祁连山里流出的洪水在那片荒滩上冲出了几道深沟。山水沟蜿蜒两公里多长,南边靠近祁连山的一端很浅,越往北越深,最深处有六七公尺,出了山水沟是一片泥沙沉积的沙土地,再往北是一道接一道的沙梁。

由于没有木材盖房,我们住在自己动手挖的窑洞里。窑洞大小不等,沟浅的地方,靠近南端,因为崖坎矮,挖的窑洞才一米高,人四肢着地才能钻进去,进去后坐着刚能仰起脸来。这样的窑洞住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我们组的窑洞挖在山水沟中端,很大;我们组最早是二十五个人,在夹边沟死掉了三个,还有三个因瘦得走不动路留在夹边沟了,剩下的十九个人加上其他组没住处的两个人,全住在这个窑洞里。我们组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文大业、崔毅、魏长海,还有晁崇文、钟玉良、章……哎呀,叫章什么来的,那是个西北师院历史系的教授,姓章,可名字突然就想不起来了。对了,崔毅,崔毅这时候已经不在明水也不在夹边沟了,他在两个月前就逃跑了。他是四十年代北大的毕业生,英文讲得特好。这人四十年代就参加学潮,是地下党,解放后是省委宣传部的干部。文大业是省卫生学校的副校长,原兰州医学院教授,死在明水了,吃脏东西死掉的。对了,董坚毅也是那几天死掉的,和文大业前后脚死掉的。

文大业的死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八月上旬的一天,他从自己的铺上挪过来凑近我,说,老李,我活不过一个星期了,我喝粉汤

了。我当时吓了一跳，问他真的吗，他说真的。

我可是吓了一跳。他说的粉汤就是用黄茅草籽煮的汤。黄茅草你知道吗？你肯定知道，草滩上到处都长，你就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它长的样子就像骆驼草一样，一蓬一蓬的，茎秆比骆驼草的茎秆还粗还高。它的茎是黄色的，叶片也带点黄色，很好辨认。河西的农民都叫它黄茅草，有的叫黄茅柴，因为农民们都拿他当烧柴，有的把它挖来埋在田埂上做风墙——挡风。黄茅草的草籽是能吃的，这我们原来不知道，是酒泉县和高台县的右派们说的，他们也是听老人们说的：闹饥荒的年头，当地的农民们用它充饥。于是，右派们就跟他们学，拿着床单到草滩上铺开，把黄茅草枝条压下来敲打，把籽打下来；然后用手搓，把皮搓掉，再拉着床单摇晃，叫风把皮儿刮走。不能吹，黄茅草籽太小太轻了，像罌粟籽那么大小，一吹就连籽都吹跑了。籽儿收集回去再用锅炒熟。炒的时候要注意，不能炒焦了，只要爆一下就成了。当然，那么小的籽儿，你是听不见爆声的，要用眼睛看，籽儿在锅里自己动了一下，那就是爆了。炒熟之后装在小布袋里，缝在衣裳里边，藏好。一定要藏好，干部们要检查的，那东西容易吃死人，干部们不叫吃，检查出来就没收了。

黄茅草籽吃起来也麻烦，抓一撮放在饭盒里煮，煮着煮着就成了清白色的粥，真像是淀粉打的粉汤，与淀粉汤的不同之处在于用筷子一挑能拉出丝来。这时候还不能吃，要搅，一边搅一边吹，叫它快点凉下去。凉了的“粉汤”像一团面筋，柔柔的。把它拉成条状，拉长的感觉就像是拉橡胶一样，然后咬着吃。那东西是嚼不烂的，只能咬成一块一块咽下去。这东西根本就没有营养，但是也没毒，吃它就是把空空的肠胃填充一下，克服饥饿感，就像有些地方的人吃观音土一样。这种东西能挺时间，吃上一次能挺三天，因为它是不消化的。既然不消化也就排泄不出来，需要吃别的野菜什么的顶下来。这种东西千万不能在粥状的时候喝下去。在它还没

凝固成块状之前喝下去，它会把肚子里的其他食物——树叶呀，干菜呀，还有别的杂草籽呀——粘在一起，结成硬块堵在肠子里形成梗阻。我估计，在夹边沟和明水至少有几十人因为喝了这种“粉汤”而致死。有些人是出于没有经验，第一次喝了就死去了，但另一些人的想法是嚼着吃太恶心，少喝一点可能没有危险，实际是对“粉汤”的粘性估计不足。

真是吓坏了，我当时就说他：你不知道那东西不能喝吗？他回答：饿得等不及了，还没放凉就喝了几口。我生气地说，几口？就几口吗？他回答，也就半碗。

我说这可怎么办呀？

他说要是有点蓖麻油就好了。

我知道，蓖麻油是泻药，它可以把肠子里的食物变成稀汤子排泄出来。我立即跑出去跑了一趟厂部卫生所，但是医生把我骂了出来：人家都拉肚子拉的要拉出来，你还要泻药，我到哪里给你找泻药去！

医生说的话也对，农场闹病的人大都是因为吃了脏东西拉痢疾。有些人拉得起不了床，几天就死掉。

我沮丧地回到窑洞，跟文大业说，你还想活不想活吧，想活我就给你掏！

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们就互相掏粪蛋蛋了。超常且沉重的劳动把我们的身体榨干了，每天供应的十二两（注1）原粮不能提供沉重劳动所需的热量，为了活命，我们把谷糠呀、树叶和草籽呀，凡是我们认为有营养的东西都填进肚子。这些东西是不易消化的，加之我们的肠胃早就没有了油水，所以排泄就成了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每次要在茅坑上蹲半天，竭尽全力才能排泄出几个粪蛋蛋。有人在骂人的时候说，你打嗝怎么是草腥味的！那意思是说你不是人，你是吃草的牲口。我们那时候排泄出的东西就是和驴粪蛋一样的草团子。经常的我们在茅坑上蹲半天，连个粪蛋蛋

也排泄不出来,必须相互帮助,互相配合:一个人趴在地上撅着屁股,另一个人从后边掏。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一个专用工具,是用质地坚硬的红柳枝条削成的木勺,状如挖耳朵勺但又比挖耳朵勺大出许多倍。没有制备专用工具的人只好用吃饭小勺的把儿掏了。

文大业对我讲的时候,事情已经到了很痛苦的程度:小肚子胀得圆鼓鼓的,但又排泄不出来。我马上和他一起走到窑洞外边去,他趴在一个土坎上,撅着屁股,我跪在后边进行操作。但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我也没掏出一点东西来。文大业的肚肠里吃下去了很多菜叶、草籽之类的代食品,“粉汤”把这些代食品黏结在一起,凝成了一个很坚硬的硬块。硬块的直径超过了肛门的直径许多,堵在肛门上,根本就无法掏出来。我试图把这个硬块捅碎,使之化整为零,但也没有成功。我的专用工具一用力,那硬块就移动,根本用不上力,而文大业又痛苦难忍呻吟不止。最后的结果是我的专用工具把他的粪门搞得鲜血淋淋,一塌糊涂,硬块安然如初。

文大业的肚子胀得越来越大,五六天后就“胀”死了。我们把他的尸体用被子裹起来抬到窑洞外边放着,下午,农场掩埋小组的人把他装上马车,拉到北边的山水沟口埋掉了。

我们窑洞里,惟一不吃脏东西的是董坚毅。董坚毅是省人民医院的泌尿科医生,上海人,印象中似乎是毕业于上海的哪个医学院。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就是没说过话,我和他不在一个队。1959年国庆节前夕,农场组织我们去酒泉看酒泉劳改分局搞的《建国十周年劳改成果展》在一家饭馆吃饭,我们俩坐在了一起。夹边沟的右派分子们大都身上带着一些钱和粮票的。这是他们当初从家里带来的,因为劳教农场不许加餐,就总也花不出去。只要遇到外出,见到饭馆,就决不会放过吃一顿的机会的。可惜那时的饭馆里卖饭也是定量,只卖半斤小米饭或者两个馒头。有的人为了多吃一份,只要时间来得及,吃了一家饭馆再钻进另一家饭馆。

那天在饭馆吃饭,我们正好坐在一起,便跟他说了说话,知道了他是在1956年支援大西北建设的热潮中自己要求来兰州的。他原在上海的一家医院当主治医师,来兰州后在省人民医院做泌尿科主任。他爱人也是上海一家医院的医生,那年正好生孩子,就没跟他来。他还说,他爱人是独生女,岳父岳母坚决反对她离开上海,否则也就来了。

董坚毅三十四五岁的样子。

那次在饭馆吃饭,他的文雅书生的样子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记得从饭馆出来,右派们排队集合回夹边沟的路上,我跟别人说过,董坚毅活不长了,看他吃饭时细嚼慢咽像是吃什么都不香的样子,就活不长。旁边有人说,你可是说对了,那人吃东西讲究得很。

别人挖野菜呀捋草籽呀逮老鼠呀,什么能填肚子就吃什么,他嫌脏,说不卫生,不吃。他就吃食堂供应的那点东西。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没再看见他,便以为他死掉了。谁知到了明水,他又出现了,并和我住在同一个窑洞里。见面时我还问了一句,老董,你没死掉呀?他笑了一下说,你怎么这样说话呀?我说你不是吃东西很讲究吗,好长时间不见,我以为你死掉了。他告诉我,因为肝硬化,他到场部医务所住院三个月。

到了明水,董坚毅还是不吃脏东西。在夹边沟的时候,因为劳动太过沉重,又吃不饱,——人们每月吃十八斤原粮——就有少数人死去了。到了明水,粮食定量进一步降为每天小两七两,月不足十四斤,一天就吃一顿菜团和一顿菜糊糊,营养极度短缺,大批死亡就开始了。为了减轻死亡,农场领导采取了特殊措施:停止右派们的劳动,准许在上班时间去草滩上捋草籽、抓老鼠和逮蚯蚓充饥,或者在窑洞里睡觉。那一段时间我们把山水沟附近的老鼠和蜥蜴都逮绝了,吃光了,把附近柳树和榆树上的树叶都吃光了。可是董坚毅不吃那些东西,每天吃过了食堂配给的菜团子和菜糊糊

以后,就在铺上躺着挨日子。我曾经劝过他,别那么斯文啦,能弄到什么就吃什么吧,活命要紧。他竟然回答:那是人吃的东西吗?

实际上,他之所以没有饿死,完全是他女人的功劳。自从他定为右派到了夹边沟,他女人三两个月就来一次,看望他,并且捎来许多饼干、奶粉、葡萄糖粉之类的食品和营养品。

但是,到了明水才一个多月,他的身体就不可逆转的衰弱了,身上干得一点儿肉都没有了,眼睛凹陷得如同两个黑洞,怪吓人的。他的腿软得走不动路了,每天两次去食堂打饭的路上,他摇摇晃晃地走着,一阵风就能刮倒的样子。在窑洞里要想喝点水,就跪着挪过去。他整天整天地躺在被窝里默默无语,眼睛好久都不睁开。

那是11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正在靠近窑洞门口的地方煮从田野上挖来的辣辣根,——这是一种多年生根类植物,最粗的能长到筷子粗细,煮熟后有一点甜味——董坚毅忽然挪到了我的身旁。我以为他想要吃点辣辣根,便用筷子拣了几根给他。他却推开了,说,老李,我想求你一件事。我问什么事,他说,我认为你是能活着回到兰州去,这是没问题的。我说你怎么认定我能活着回去?你没看见吗,我的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腿也肿得穿不上鞋了。说真的,到了11月,几乎所有的人都衰弱不堪了,除去上次我给你讲过的魏长海。每天晚上入睡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转天早晨还能不能醒来,因为每过两三天就有一个人死去,而且都是睡眠中死去的,没有呻吟,没有呼唤,一点痛苦的挣扎都没有,就静静死去了。

什么,你说人们为什么不逃跑吗?有逃跑的。崔毅不是跑了吗,后来钟毓良和魏长海也跑了。民勤县供销社的主任,哎呀,我叫不出他的名字来了,也跑了。但是逃跑的人总归是个别的,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不跑。不跑的原因,上次我不是说过了吗,主要是对领导抱有幻想,认为自己当右派是整错了,组织会很快给自己纠正,平反。再说,总觉得劳教是组织在考验我们,看我们对党忠

诚不忠诚,如果逃跑不就对党不忠了吗?不就是背叛革命了吗?就怕一失足铸成千古恨,跑的人就很少了。

我说我的身体也不行了,怕熬不出去了,但董坚毅说,老李,你肯定能活着出去,你是个有办法的人。我惊了一下说,我有什么办法?他说,有人给你送吃的,我知道。有过两次了,孔队长夜里叫你出去,你回来后就在被窝里吃东西。我夜里睡不着觉,都听见了。

我不好再说什么了,他的话说得对,他窥探到了我生活中一件极端秘密的事情。还在1959年的时候,夹边沟和新添屯就开始死人了,人们都写信叫家人寄饼干寄炒面,而我也开始考虑如何不被饿死的问题了。考虑来考虑去,我决定讨好孔队长。孔队长是从甘谷砖瓦厂调来的干部,官不大,是夹边沟基建队的副队长,可是他经常跟着马车去酒泉,给农场拉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还从酒泉邮局取回右派们的邮包。我当时想,这个人对我有用,一定要搞好关系,所以有一天我从他那里取省公安厅一位朋友给我寄来的包裹,看包裹里没有吃的,只有一团棉线和一块蓝条绒,我就全都给他了。我对他说,孔队长,这些东西我拿着没用,你拿去给你爱人做件衣裳吧。孔队长是甘谷县人,甘谷县新生砖瓦场撤销后,他调到夹边沟来了,但他女人没调过来,他女人比他小几岁,二十二三岁的样子。女人是农村妇女,从甘谷县来夹边沟看过他,我看见过。他接下了我的东西,像是有点不好意思,跟我说了几句同情的话:这是你家里人寄来的包裹吗?你家里人怎么不给你寄些吃的来,你现在最缺的是吃的东西。我顺着他的话往下说,孔队长,你说得太对了,你真能体谅人。我现在就是缺吃的,可是我是个单身汉,没有对象,父母又年老多病,我不愿叫他们知道我犯了错误在这里劳动改造,这样一来就没有人给我寄吃的了。看起来我的话起了作用,他说,没人寄吃的可是个问题,你的日子不好过呀,可你要有钱也行呀。我听出来一点门道了,又说,有钱能有什么用处,咱们农场里什么也买不上,拿钱拿粮票也不卖馒头,还得饿肚

子。他说，暖暖，哪能一棵树上吊死，场里不卖，不会到酒泉去买吗？酒泉的黑市上什么都有。我说，黑市上有也没用呀，我们这种人出不去……说到这里我就停住了，想看看他的态度再往下说，结果他却直截了当地说，咳，那有啥难嘛，我三天两头去酒泉，你要是买啥东西就说一声，我给你捎回来不就中了吗！他的话正中我的下怀，我立即就对他说，要是这样，就太感谢你了。只是我还有个困难，你要是能帮助我解决就更好了。他说，你说你说，你有啥难事就说。于是我告诉他，我来夹边沟农场第一天，报到登记的时候，身上带着的一千元钱和三百元公债券都交给财务科的人保管了，现在取不出来。你能不能想办法替我取出来。他回答，这有啥难，明天我就去给你取出来。他说话算话，第二天傍晚就把我叫到副业队的办公室，说钱取出来了。问他怎么取的，他说他告诉财务科的人，我家的老人病了，我要给老人寄钱治病，财务科叫我代我签了个字，就把钱和公债券都给他了。我接过钱和公债之后，立即把三百元公债券给了他，我说，我要的是现金，公债券给你吧，到期后你取出来补贴家用吧。他很高兴。他一个月的工资三四十元，三百元对他可是个大数。趁着他高兴，我又抽出二十元钱给他，请他去酒泉时替我捎点吃的回来。两天后的一个夜晚，我已经睡觉了，听见孔队长的声音喊我，叫我出去一下。我走出去，跟他走到山墙那边，他交给我一个纸包。他说是两块烧饼，并嘱咐我不要叫人知道。此后，每过一个星期，我叫孔队长带一次烧饼，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当然，有这两块烧饼和没这两块烧饼是大不一样的。虽然烧饼都不大，每块只有半斤重，但是对于我极端虚弱的身体，是不可缺少的补充，使我苟延残喘至今。只是近来我手头的这笔钱已经所剩无几了，而身体健康状况更加糟糕，我内心里极为恐慌。

见我无语，董坚毅又说，我求你一件事，不知道你答应不答应？我说，你说吧。

他说,我爱人要来看我了,但是,我的情况可能是等不到她来

……

我很是惊骇,说他,你怎么这样想?不是好好的吗!

他摇着头说,你听我说,我把话说完。近来几天,我坐着坐着,大脑就突然变成空白,意识消失了,眼前的东西都没有了。这不是好现象。

我说,你不要胡思乱想。那是你瞌睡了。

他依然摇头:老李,你不要说了,瞌睡和晕眩我还是分得开的。我没有瞌睡,一天到晚睡觉,我都睡不着,坐一会儿就瞌睡到那个样子?晕眩,那是晕眩,已经出现好几次了。这是预兆……

我说,瞌睡了,你是打盹了。

他说,老李,我是认真和你谈这件事的,你听我说。我前几天就接到我爱人的信了,她说最近要来看我,我也给她写了回信,说近日农场要调一部分人到别的地方去,其中有我,她能来就快来吧。我还告诉他,如果她来了明水找不到我,就找你询问我的情况

……

我惊叫起来,老董,你怎么这样?

他苦笑一下:你不要急,不要着急。我原想不告诉你的,想再等几天,可能还能见着她。今天早晨起床,晕眩又出现了,不能等了,我把这事告诉你。

我说,胡思乱想,你这是胡思乱想,你想老婆想疯了,神经错乱。

他仍然苦笑,然后说,你不要打岔。我求你的事很简单,其实很简单,但你一定要办。当然了,如果她来了,我还活着,就不麻烦你了。如果我这两天就死了,我爱人还没来,求你把我卷起来,就用我的被子卷起来,把我放在里边一点的地方,就是那儿。

我们的窑洞本来就挖得很大,近来又抬出去了几个人,所以靠着最里边的黑暗处已经空出了很大的一片空当。他指了指那片空

当又说,你们把我放几天,等我爱人来了,把我的情况告诉她,叫她把我的尸体运回上海去。

他说了求我的事,然后用黑洞洞的眼睛看着我,那意思是问我答应不答应。我没吭声,我的心当时抽紧了,不知说什么好。静了一下,他又说,求求你,求你帮我这次忙。我不愿意把自己埋在这里。老李,当初呀,我爱人,我的父母,还有岳父岳母,都劝我不要来大西北,我没听他们的话,一心要支援大西北建设,来了大西北。我真后悔,后悔没听他们的话。那天董坚毅说了很多话,并且最后还说,在窑洞里放上三几天,如果他爱人还没有来,就把他抬出去埋了。否则会发臭的,太脏。

三天后董坚毅死去。我们窑洞死去的几个人都是在睡梦中死去的,睡着后再也没醒过来。董坚毅不是,他死于白天。那是他委托后事的第四天上午,他围着被子坐在地铺上和我说话,说他女人快到了,看来用不着我为他料理后事了。他正说着话,头往膝盖上一垂就死了。这样的死亡方式我在电影里看到过,我总认为那是艺术的夸张,但自从董坚毅死后,我相信了,艺术是真实的。遵照死者的嘱托,我和晁崇文把他用他的鸭绒被和一条毯子裹起来,塞到窑洞的角落里,等他女人来收尸。

谁知事情就那么怪。往常,各个窑洞死了人,都是堆在门口,由农场组织的掩埋小组拉走埋掉,但董坚毅死去的第二天早晨,却遇上农场的刘场长亲自带着人清理死尸。他大声吆喝着叫人走进窑洞检查,结果把董坚毅搜出来拖出去,拉到山水沟口的崖根处埋掉了。为了对董坚毅的女人有个交待,我跟着掩埋组去看了掩埋的地方。

过了一天,我们就明白刘场长亲自带人清理尸体的原因了。这天中午,山水沟里突然来了几位不速之客,他们大都穿着军大衣,但又不是军人,其中还有两位女同志。他们一间挨一间进了几间窑洞和地窝子,和右派们说话,问他们从那个单位来的,多长时

间了,犯的什么错误,每天吃多少粮食。他们走后不久,就有消息传开来:中央的一个工作组来过了,是由中央监察部的一位副部长挂帅的,调查夹边沟的情况。传闻还说某某右派认识那位副部长,两个人还说了话。副部长是位女同志。

这个消息真是鼓舞人心,人们都以为中央来解决夹边沟的问题了,右派们要离开明水要回家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还是在夹边沟的时候——就有消息说,夹边沟饿死了不少人,中央都知道了,中央要解决夹边沟的问题。过了几天,看不见什么动静,人们的心又凉了下來。

夹边沟的右派们回家,是1961年1月份的事情,还真与那位副部长的到来有关,但是我们还是回到董坚毅的故事上来吧。大约是董坚毅死后五六天的一个下午,他的女人到了明水。她是从高台火车站下火车,东打听西打听来到明水乡的山水沟的。她问董坚毅住在哪儿,有人把她支到了我们的窑洞。

我的铺靠近门口,我首先听见有人喊董坚毅。这声音是陌生的,似乎是个女人。我就问了一声谁找董坚毅。

我,是我找董坚毅。

蓦地一惊,我明白她是谁了。我慌慌地站起,一时间竟然忘了窑洞的高度,头撞在洞顶的硬土上。但我顾不得疼痛,低声对窑洞里的右派们喊了一声老董的爱人来了,然后才对洞口说,哦,哦,你是……进来吧。

窑洞里像是刮起一阵旋风,躺着的人急忙坐起,有的穿衣裳,有的拉被子,一片乱纷纷的窸窣声中,洞口的草帘子被人掀开了,一个女人从台阶上爬上来,进了窑洞。她的头也在顶壁上碰了一下,她扭着脸看我,躬着腰说,我是从上海来的,叫顾晓云。我是来看董坚毅的,他是住这儿吗?

是,是,住这儿,住这儿,可这阵……

说实在话,这些天我就没想过她来了怎么和她说话。我原本

以为董坚毅死去六七天了，她一定是接到农场发出的死亡通知单了，可能不来了。现在她突然闯了来，搞得我一阵慌乱。她似乎看出我的慌张来了，脸上显出诧异的神情说，怎么，他不在呀？

我没回答，只是模棱两可地点了点头，便扭脸看了看我的伙伴们，想从他们那儿得到一点灵感。可他们静悄悄或坐或躺，眼睛都盯着我不说话。我更慌张了，对她说，坐下，你坐下，我跟你谈。你是董坚毅的爱人吗？

她说是是，我是董坚毅的爱人，但她没坐。她的眼睛往四下看了看，似乎感觉到了气氛的异常，便把询问的目光投在我的脸上，说，你是叫李文汉吗？我说对对，我叫李文汉。她又说，哦，你是李大哥，那好，那好。老董在信上说了，他要是不在明水乡的话，叫我找李文汉——就是你呀？我哦哦地应着，她继续说，我接老董的信，说他可能要调个地方，叫我能来就来一趟。我想，前几次来看他都是去夹边沟，明水这边还没来过，我就来一趟吧。要是调到一个新地方，安定下来，我再来，时间就太长了。李大哥，老董是调走了吗？

出去了，老董出去了……我胡里八涂地应着，躲开她的眼光跪在地上拍打我的铺脚，说，坐下坐下，你先坐下呀。我的铺很脏，但我拍打和收拾铺盖不是为了干净，而是想利用这个时间来思考怎么告诉她关于董坚毅的事。

她坐下了。她的手里提着个很大且鼓鼓囊囊的花格子书包，她放下书包，然后抹下头上的绿色绸缎方巾，仰起脸来看我。这是个典型的南方人，有着鼓鼓的前额，凹陷的眼睛，很秀气的脸，尖下巴。董坚毅跟我说过，她已经三十岁了，但我看她也就是二十五六岁的样子。真不忍心告诉她董坚毅的事情，我忙忙地又去洗茶缸，然后给她倒水。我的铺前有个热水瓶，那是我的，但提起来晃晃却是空的。我便说，你先坐一下，我去找点开水。我原想以打开水为借口走出去，这样我就有充分的时间思考怎么和她说话；可是她

说,不要去了,不要去了,李大哥你坐下,咱们说说话。老董干什么去了,几点钟能回来?我只好对其他人说,喂,你们谁有开水,给顾大姐倒一点!右派们大都有各自的热水瓶,放在自己的铺跟前。我从一个右派的热水瓶里倒了开水,把茶缸子放在我铺旁的皮箱上,然后说,顾同志,我叫你大姐对吧?老董跟我说过你三十岁了,比我要大几岁,你就叫我的名字好了。她笑了一下,表示默认,但有点难为情的样子。然后说,小李大哥,这老董去哪儿啦,你知道吗?我说,顾大姐,老董的事我要详细跟你谈谈,可是你听了我的话可不能太伤心。老董走了,走了七八天了。

在接待她的这段时间里,我在心里作出决定,要告诉她实情,瞒是不行的。只是这样的谈话对她来说太残酷了,我于心不忍。为了掩盖内心的不安,我立即扭脸朝着洞里的其他人说,对吗,老董走了七八天了?老鬼,你说是不是?但是谁也没回答我,他们静静地坐着,敛气收声望着那个女人。

我害怕那女人痛哭起来,可是她一动不动地坐着,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是她没听清我的话呢,还是不懂“走了”的意思,我就又说了一遍:顾大姐,你明白我的话吗?——老董去世已经七八天了。

她哇的一声哭起来。其实,她听懂我的话了,她是在抑制突如其来的悲痛。在抑制无效的情况下才哭出声来。

这是那种发自胸腔深处的哭声。她的第一声哭就像是喷出来的,一下就震动了我的心脏。接着她就伏在那个花格子书包上呜呜地哭个不停,泪水从她的指缝里流下来。她的哭声太惨啦,我的心已经硬如石头了——你想呀,看着伙伴们一个一个的死去,我的心已经麻木了,不知什么叫悲伤了——可她的哭声把我的心哭软了,我的眼睛流泪了。确实,她的哭声太感人了。你想呀,一个女人,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每过三两个月来看一趟劳教的丈夫,送吃的送穿的,为的是什么呢?是感情呀,是夫妻间的情分呀,盼着他出去

阖家团圆呀！可是她的期望落空了——丈夫死掉了，她能不悲痛吗？再说，那时候从上海到河西走廊的高台县多不容易呀！你知道的，现在从上海坐去乌鲁木齐的快车两天两夜就到高台！可那时候，铁路才修到哈密，这条线上连个普通快车都没有，只有慢车，像老牛拉破车一样。她从上海出来，还要转几次车，要五六天才能到高台。一个女人，就是这样风尘仆仆数千里奔夫而来，可是丈夫没了，死掉啦，她的心受得了吗，能不哭吗？我落泪了，的确我落泪了。我们窑洞其他的右派我看见他们也都在悄悄地垂泪。我们确实被那个女人的哭声感动了。

我等着那女人哭了一会儿，把最初的悲痛、艰辛和委屈哭出去一些之后，劝她：顾大姐，不要哭了，你要节哀，可不能把身体哭坏了，你还要回上海呀。我这样劝一点儿作用也没有，她还是号啕大哭。后来我说，顾大姐，我想跟你说说老董的情况，老董在去世之前托付过我一些事情，我要告诉你。她这才克制住了号啕大哭，坐起来，打嗝一样地抽泣着，看我。于是，我把董坚毅去世前后的事讲了一遍。我重点突出地讲了董坚毅死亡的过程，告诉她董坚毅死时没有痛苦，他是在和我们说话的时候突然停止了呼吸的。我们把他皮箱里一套新呢子制服给他穿起来，用他的被子和毯子裹好，拉到坟地埋葬了。

董坚毅说的不愿埋在大西北，叫女人把尸体运回去的话，我隐瞒了。我只是告诉她，老董死后，他的遗物被农场管教科拿走了，你要是这次想拿回去，你就到场部去找管教科，要是不拿，他们以后可能把贵重的东西从邮局寄给你，其他的就当破烂扔了。

她又痛哭起来，哭着说，人都见不着了，要那些东西干什么？

她又哭了，很长时间，然后才止住哭，拿过花格子书包打开，掏出好几个纸袋子，打开摊在铺上。然后她说，小李大哥，这两件衬衣是我在上海买的，给老董买的。老董走了，也就没人穿了，你就留着做个纪念。说着话，她又抽抽噎噎地哭了，哭着又说，这里还

有一件毛衣,是我自己织的,一针一针织出来的,我就拿回去了。然后她指着那些食品——饼干呀,肉松呀,蛋糕呀——提高了嗓门:这些吃的东西,你们大家就吃了吧。

要是往常,哪个右派的亲人来探望,身边总是围着一帮人,期望能得到一块饼干,或者一勺炒面和一支香烟,但是这天的情况竟然这样令人难以置信:人们都坐在自己的铺上不动,显出很文明的样子。有人还以高贵文雅的口气说,不吃,我不爱吃甜食。经她再三催促,有人才说了一句:你回上海的路上不吃吗?那女人说,我能吃多少,有几块饼干就行。我在火车上还可以买盒饭,你们可是没地方去买。

你说得对,那我可就不客气了。那个说话的人站起来,弯着腰走过来,拿了两块饼干放进嘴里。不知什么原因,他嚼了几下就咳嗽起来。有人笑了一下,说,小心,小心呛死。他咳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但还是把食物咽下去。他抹着眼泪说,呛死我我也要吃,叫我女人去找顾大姐打官司吧。人们都笑,那女人也咧了一下嘴。笑声中,人们才走过来拿吃的,走不动的人跪着挪过来,把他们脏污的手伸向那些食品袋。我急得大声喊,喂,你们客气点,给顾大姐留下一包饼干路上吃。但最后我的铺上只剩下一些细碎的面包屑。那女人对我说,叫他们吃吧,叫他们吃吧,我在火车上买盒饭吃就行。

我觉得这帮人在老董的女人面前抢吃抢喝,有辱斯文,太不雅观了,抱歉地对她说,顾大姐,你不要见怪,我们这些人真是饿极了,脸都不要了。她叹息着说,不怪大家……

人们吃完食品,坐回到自己的铺上去了,有的人手里还捧着多维葡萄糖的粉末一口一口地舔着。这时那女人又说,诸位大哥和兄弟,你们是老董的朋友,老董活着的时候,你们对他的帮助,我非常感激,只是有一件事还要请你们帮我做一下……她说到这里停住,眼睛看着大家。大家也都静下来看她,等她往下说,有的人还

催促：说吧，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她才又接着说，我这次来看老董，根本就没想到他会不在了，连个面也没见到。所以我想呀，请你们带我到坟上去看看，帮我把他的坟挖开，叫我看他一眼，然后我要把他运回老家去。请你们帮我这个忙。立即就有人说，行呀，这有什么难，埋得又不深，不费事就能挖出来。但我却吓了一跳，忙说，顾大姐，那可不行，老董的坟可是不能动。

她惊讶地说，为什么？

我说，你想想呀，才埋进土里七八天，肉体开始腐败了，但又很完整，那个样子你挖出来怎么运回去，火车上叫你运吗？

她愣住了。

我又说，不行，你可别打这主意。迁坟可不是运个死狗死猪那么简单的事。

她说，那可怎么办？

我说，你要是真想迁坟，就过几年再来，到那时就可以把他的骸骨带走了。

她不说话了，在思考，良久才说，没办法吗，真没别的办法吗？那就只能按你说的办了，我就过两年再来，赶在三周年之际迁坟。

我说三周年也不行，肉体在地下腐败的过程很慢，三周年时间恐怕太短。接着我又以随便但却认真的口气说她：你着什么急呀，反正这一次带不走，你就多过几年再来呗。人都说入土为安，他已经入土了，很安稳了，你就不要急着迁坟了。

她说，好的，好的，我听你的话，过上几年再来。今天就请你带我去他的坟上看看就可以了，然后我就回去。

我的心里格登响了一下。这是我最怕的一件事。我一边思索一边说，顾大姐，老董的坟……你就不要去了吧。

她的眼睛立时显出惊讶的神情，说，为什么？

我躲开她的眼睛支吾着说，不为什么，就是……一个土堆，有什么看的？

她的脸色有点变,说话的口气也有点变:小李大哥,我跑几千里路来大西北就是看他的……

我有点狼狈了,说,是呀,你是来看他的,可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人是不在了,可是上坟扫墓是应该的。

是应该,是应该,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他的坟……可能找……不到了……

怎么会找不到?

我真是不知如何回答她了,因为她的脸上一片狐疑的表情,眼睛似乎要把我看穿。我支支吾吾了:

荒滩上到处都是坟堆,乱七八糟的……怕找不到呀。

她说,小李大哥,你刚才还说过,是你们亲自把他拉到坟地埋葬的。这才几天时间,你就认不出地方了吗?

我心里真是后悔,后悔先前说话欠思考,现在竟然陷于狼狈。为了改变狼狈境地,我厚着脸皮改口说,顾大姐,刚才我说的我们,是指掩埋组的人,而不是我和我们窑洞的人。

她不说话了,眼睛直愣愣看我,显出不信任的眼神。我接着又说,你要是不信就问问他们:他们谁去埋老董了?

她把眼光投向其他的人,其他人都不出声,于是她又对我说,小李大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没去坟地,但我请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我一定要认下老董的坟。我不认下他的坟,以后来迁坟,我到哪儿去找他的骨头?

糟了,她误会了,以为我不愿带她去坟地,这样一点举手之劳的事都不愿意办。这使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又说,顾大姐,你听我说,我们这里,人死了,都是抬到门外放着,专门有掩埋组的人赶着马车来,把尸体拉去掩埋,其他人都不去。你想呀,人们都饿得站不起来,走不动路了,哪还有力量抬死人哪。除了掩埋组的

人,其他人都不去坟地,这是真的。

听了我的解释,她静了片刻,又说:小李大哥,那就这么办吧,你领我到坟地去一趟,我挨个坟堆去找。

我说,到了坟地你也找不到的。坟堆都是一样的,你能认出哪个是老董?

她惊讶地说,没有墓碑呀?

墓碑? 哼哼,你想得好! 你以为是烈士陵园啦?

连墓碑都没有,哪能这样做事呀,这不是伤天害理吗。死者的亲属来上坟,给谁烧纸呀?

我摊开双手:那不是我考虑的事。对啦,我说的也不全对,——幸亏你提醒我——死者的身上还真是拴了个纸片片的,写上名字,编上号码,是毛笔写的。

她说,身上挂个纸牌牌有用吗? 埋在地下的人,家属来了也不能哪个坟都挖开看看呀。

我说,人家可不那样想呀! 人家编号是为了统计数字,好造册,向上级交待,哪管以后家属来了方便不方便。

她又哭了起来,哼哼……这样说来,我是见不着老董了?

我没说话,觉得不好回答。倒是晁崇文叫了起来:怎么找不到? 你到场部去,找管教科,埋人的事是他们管。他们登记造册,他们就该知道埋在哪里。

其他人也说,老晁说的对,就找管教科。

那女人抹着眼泪看我。我说,那你就到场部问问去吧。

我们的住处在山水沟中端。我领着那个女人顺着弯弯曲曲的山水沟走了十几分钟,从南边爬出山水沟,指着东边二三里处的一道山水沟告诉她,场部就在那里。看着她走进那道沟了,我才回到窑洞去。

老李,你他妈的真不是东西! 我刚刚爬进窑洞,就听见晁崇文的吼骂声。晁崇文是山西人,1946年就参加了地下党,那时他才

十七岁，正在上中学。解放后他在甘肃省运输公司当政工科长。这个人脾气很是暴躁，看见不顺眼的事就要说就要骂。据他自己说，他是在当政工科长时因为给书记提意见，被定为右派的。我惊讶地问，老晁，你骂我干什么，我惹着你啦？骂你，骂你还轻咧！你他妈的不是个好熊，我听着就有气。人家老董的媳妇哭哭啼啼地求你，叫你领到坟上去看一看，这也是人之常情嘛，男人死咧，媳妇上个坟，记下男人的坟在哪达哩，以后来上坟哩迁坟哩也方便嘛，你他妈的就几步路的事，你不愿去！你说你找不着！你咋个找不着？那天埋葬董坚毅，不是你跟着去的吗？你说你要看一下埋在什么地方了，他媳妇来了也好有个交待。人家媳妇来了，你又说不知道，你到底安的什么心？你才是这么个熊人！

我耐着性子等晁崇文骂完，然后回骂他：闭上你的臭嘴吧，你他妈的那个嘴怎么那么脏！我不领她去看坟自然有不领的原因，用着你管吗？说实在的，那女人在这儿的时候，我就怕你多嘴惹事！

怕我多嘴？你不要胡扯！你为啥怕我多嘴？不就是怕我揭露你还想要那件毛衣吗？那媳妇把那件毛衣给你，你就领着去了。

你胡说！我真生气了，骂他。你知道个屁！前两天，我往沟口那边去挖辣辣根，看见老董被人抛尸荒野，光溜溜地扔在沙滩上。他的衣裳叫人扒走了，被子和毯子都不见了。

有这回事？晁崇文说，睁大了惊愕的眼睛。

师院历史系的章教授说，肯定是叫人拿去换吃的了！那天我就反对过——我当时说了没有？——不要给他穿呢子衣裳，不要裹鸭绒被，你们不听！

我说，我告诉你们吧，还有更糟的事！老董屁股蛋子上的肉叫人剃走啦！

真的？

不信，不信你们去看呀，我骗你们干什么？小腿肚子那儿还叫

人刮了两刀。

谁干的,谁他妈的干这种缺德事情? 晁崇文大声吼叫说。魏长海,是不是你干的!

魏长海前几天因为刮死尸被队长捆了一绳子还关了禁闭,这两天正在恢复被绳子勒得近乎坏死的胳膊。晁崇文一吼,他惊慌地说,老晁,你可不要冤枉人!

晁崇文说,冤枉你? 你妈个屁,我看就是你干的! 王院长是不是你动的?

魏长海叫起来:老晁,你可是冤枉人。王院长的事我承认做错了,可我再也没干过那种事。

这几天我的胳膊肿得连门都出不去,还能干那事吗?

晁崇文问,你敢说没出过门?

我忙忙地插了一句:老晁,这事我作证,他是没出去过,饭都是我给他打的。

晁崇文说,那是谁干的? 啊呀,这人都他妈的变成畜生了! 虎毒还不食子哩,人吃开人了,这人还叫人吗!

大家都不出声,我又说,你不是问我安的什么心吗? 我告诉你吧,就为了这事。你去看看吧,尸体冻得硬邦邦的,干不拉儿,光溜溜的那样子,我怕那女人见了受不了呀!

晁崇文哑口无言,过一会儿才说,那就不该叫她去场部打听。

我恨恨地说,不是你叫去的吗,你还说我?

晁崇文不言声了,但恨恨地嗨了一声。

已经是黄昏了,从我们窑洞看出去,对面的悬崖边上仅剩下一条窄窄的夕照,山水沟里已是阴影朦朦。我们去食堂打了菜糊糊,吃完就躺下了。

吃了就睡,减少无谓的活动,把热量的消耗降低到最小,是大家的共识。但是,我还没有睡着,就听见草帘子的响声。我问了一声:

谁？

我，小李大哥。我又找你来了。

是那个女人的声音。我坐起来穿衣裳，同时轻轻地喊了一声喂，老董的爱人又来了，怎么办？听见了晁崇文的声音说，那就叫进来呗。我便朝窑洞口说，进来，你进来吧。

天还没黑尽，洞口的草帘子斜了一下，窑洞里透进一片朦胧的亮光，一个人影爬上台阶来，站住。我明白，这是因为窑洞里太黑，她怕碰着什么。我叫她等等，点上了煤油灯，然后问她找到人了吗？

如豆的灯光照在她的脸上，她的脸色苍白，且不清晰。她哀哀地说，李大哥，我还得找你，求你帮助我……

她说不下去了，要哭，泪水盈满了她的眼睛。我忙劝她：不要哭，不要哭。你坐下，坐下说，出什么事了，没找到人吗？

她擦了擦眼睛坐下了，还坐在我的铺角上。我蹲在她的对面。在我们窑洞里站着是很累的，因为窑洞很矮，总要弯着腰。然后她告诉我，在场部的一间茭草席搭的棚子里，管教科的一名干部翻开死亡人员登记册查了查，说董坚毅真是死了，七天了，但不知道埋在什么地方。她要那位干部去问问掩埋组的人，干部叫来了一个叫段云瑞的人。但段云瑞说他只是负责登记姓名和死亡日期，不去坟地。叫她去找那几个人，他说一个吃脏东西死了，另一个病重送回夹边沟卫生所了，剩下的三个人走不动路了，在窑洞躺着。新组建的掩埋组又不知道先前的情况。她在办公室哭泣很久，说找不到董坚毅的尸体就不回上海去，那位管教干部竟然发火了，说，噢，你不回去呀，那好办，我叫人给你找个窑洞住下。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她不说话了，还是哭。那人就又说，真不想回去吗，那你告诉我，你是上海哪个单位的？她说你问我的单位干什么？那人说，给你们单位写信呀，叫保卫科来领你回去。你们这些大城市的小姐太太，男人思想反动，劳动教养，你不跟他划清界线，还跑

到这里来胡闹。你这是立场问题,是向政府示威,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我们要通知你的工作单位,要好好教育你。听那人这样说,她不敢哭了,也不敢说什么,就又来找我。小李大哥,求你帮帮我吧。她哀求我。

听她叙说,我的心放下了。我说,你叫我怎么帮你?她说,明天你就领我到坟地去找找老董的坟。我说怎么找呀,几百座坟,上千座坟,到处乱埋,有些坟还叫风刮平了,连坟也找不到了,你上哪儿去找?她说就是一个坟一个坟地挖,也要找到老董的坟。我说你那样做行吗?不要说你没那力量挖,就是有力量也不能挖呀。为了找一个人,把全部坟都挖开,那样做妥当吗?

她呜呜地哭了,哭着说,小李大哥,那你说还有什么好办法呀?

我说有什么好办法?找不到就找不到吧。你来看望过了,知道他的情况了,也就尽到亲人的心意了,老董也就人土为安放心地走了。这就行了。你要知道,找不到亲人坟墓的不是你一个呀。你今晚上就在这儿凑合着住一夜,明天早晨到火车站去赶火车吧,回上海去。

她呜呜地哭个不停。没理会她的哭泣,我把自己的被子整理好以后对她说,你就在我的铺上睡吧,我找个地方睡去。然后我就拿件大衣,和另一个右派挤在一起睡觉了。在夹边沟农场还有几间用来接待探视者的客房,明水可没有那条件了,除去场部用芨芨草席搭了几间房当办公室,所有的劳教犯和干部都住地窝子和窑洞。亲属来探亲只能挤在劳教犯中间睡觉,或者坐以待旦。

我睡下了。我想,作为老董的朋友,我应该把自己的铺让给她妻子去睡。

许久之后抬头看看,她还坐在地铺上。我想,她可能是嫌我的被褥脏。已经整整三年了,我没拆洗过被子。被子脏得没法看,还长满了虱子。我还听见她轻轻的啜泣声。

不知道夜里她睡觉没有,我早晨醒来的时候,她还是那样坐

着,只是把一条被子披在她的列宁式呢子短大衣外边。冷啊,虽然还没到隆冬季节,但高台的夜间温度已降到零下十七八度;窑洞里又没有炉子取暖,洞口只有一个草帘子挡挡风。唉呀,温暖的火炉呀,我们已经三年没见过它了。

我起床后没有洗脸,——我已经记不清几个月没洗脸了。洗脸水要去东沟大灶旁的水井去抬,我们没有打水抬水的力气了——就去找队长开了个条子,给她买了一份客饭——两个菜团子——端回来叫她吃。我说她:快吃吧,吃完了去赶火车。

她接过了菜团子,但没吃,放在皮箱上。

我说,昨天饿了一天,今天还不吃,你是嫌饭难吃吧?

不想吃,我一点儿也不饿。她一说话就又哭了:小李大哥,求你带我去找老董的坟吧。找不到坟,我一口饭也吃不下去。

我说她:唉,你怎么这样不听话,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不知道坟在哪个地方。你快吃了饭回上海去吧。

她哀哀地哭:小李大哥,老董在信里说,叫我到了农场有什么事就找你。你一定知道他埋在什么地方。

我说,他是讲过这话,他如果等不着你,没了,就叫我给你说说他的情况,可是我真没去埋葬他。

她蓦地大哭起来:呜呜呜!你知道,你就是知道。昨天你说说过,你去埋的他,后来你又否认。你为什么不带我去看他呀……

我无言以对了。我的心里也很难过,也很矛盾。不告诉吧,她呜呜的哭声悲痛欲绝,肝肠寸断,令人心碎,但是告诉她真相,又怕她的精神承受不了。我愈是劝她不要哭了,她愈是大放悲声。真叫人受不了,我扭头走出窑洞,心想,不理睬你了,你就死心了。

我在另一孔窑洞里坐了一天,心想,她一定是走了。夕阳西下时分我回到自己的窝,她却仍然在铺角坐着,嚤嚤地哭泣。有人小声对我说,她整整哭了一天,一会儿放声痛哭,过一会儿又轻轻啜泣。

菜团子还放在皮箱上,已经干巴和萎缩了。不知是谁在她面前放了一茶缸水,水仍然满着。我赶忙又去打了一份客饭——半盆菜糊糊——给她。我劝她:你还是要吃点饭呀,尽管饭不好吃,但不吃饭不行呀,会饿垮的。饿垮了你怎么回上海呀?她没有吃,默默地流泪。

和头天夜晚一样,她又坐了一夜。这天夜里我迟迟才睡,离她远远的在被窝里坐着,看着她。我没想到她是这么固执的人,真怕她想不开出什么事。我想,她对董坚毅如此痴情,什么事都可能做得出来。半夜里油灯灭了,我看不见她了,但是黑暗中时不时传来她低沉的哭泣声。

这是她来到明水乡山水沟的第三天的早晨。我从睡眠中醒来。早晨的太阳已经升起,阳光还没有直射进我们的窑洞,但是从草帘子旁边的缝隙处透进来的亮光投在她的身上。她还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木雕泥塑一般。但是,她脸上挂着泪水,眼睛肿得桃子一样大。

我的神经可是受不了啦。我把晁崇文叫出窑洞:老晁,你看怎么办呀?她已经整整两天没吃没喝了,可别饿死了。晁崇文说,你说的,咱们饿了两年多还没死掉,两天就能把她饿死?我说,可是光哭也不行呀,万一有个好歹……后边的话我没说下去,晁崇文说,那你说怎么办?我说我问你呢,你倒反问我。他不言语了,抬头看天片刻,然后说,有啥好办法?要不你就领她去坟地看看,叫她看一眼老董?我忙说不行不行,昨天前天没答应,今天领去算什么事?再说,见了老董那个样子,真要哭死了怎么办?他说,这样也不行,那样有危险,你是啥意思嘛?我看他着急了,便说,我的意思呀,今天你劝劝她,叫她快点回上海去。她已经怀疑我了,认为我骗她了,我的话她听不进去了;你劝劝她,可能起作用。晁崇文痛快地说,好,我劝就我劝。吃过了早饭,我好好劝劝她。就是这能行不能行,我也没有把握。这媳妇够固执的。

晁崇文说吃过早饭劝那女人,可是我和他从食堂端着饭回到窑洞,出了件事:有个人死了。死者是省商业厅的一位会计。他的身体已经彻底垮了,几天前在厕所解手,他在茅坑上蹲下后竟然没有力气站起来,是我把他拉起来的;站起之后,他又系不上裤带,——身体越差越怕冷,穿的就越厚,毛裤外边套着棉裤,棉裤再套上单裤——他的手已经没有力量把皮带勒紧了。还是我帮着他拉紧了皮带。这天早晨的事情是这样的:起床时他就躺着没动,旁边睡的人还问了他一声:我给你带饭吗?见他没回答,那人就自己去打饭了。打了饭回来,那人见他睡觉的姿势一点也没改变,便觉得情况不妙。拉开蒙着头的被子一看,人已经僵硬了。想必是夜里就断了气。

死就死了罢,这种事大家已经习惯了,所以有人还喊了一声:不要动,吃完饭再说。大家静静地吃饭,然后才有几个身体强健一些的人来处理他。我和晁崇文属于“强健者”之列,我们打开他的箱子,找两件干净的衣裳给他穿上,然后用他的被子把他裹起来。我们还把一根绳子截成三截系了系,一截系在脖子的地方,另一截系在腰部,还有一截扎住腿部,把被子勒紧。然后我们几个人连抬带拉把他拖出窑洞,放在洞外的空地上。

干完这些事,我们已经累得气喘吁吁,坐在窑洞外的太阳地里喘息。这时我看见了那个女人,她站在窑洞里,掀着草帘子从上往下看着我们。她可能是被死人吓坏了,脸色惨白,一脸的恐惧。她已经不哭了。于是,我推了一下晁崇文,叫他看那女人,并说,去,跟她说去,叫她快回上海!

晁崇文进窑洞之后,我在外边坐着,等他劝说的结果。我认为,劝说过程将是很艰难的,晁崇文一劝,她肯定要哭起来,我可不愿看到她痛不欲生的样子。

不料也就三五分钟时间,没听见一声哭泣声,晁崇文就走出窑洞来了,对我说,老李,不行呀,我的话她根本就不听,说咱们是合

起来骗她，不叫她见到老董。她今天要自己找老董去。

我吃了一惊：什么？她要自己找去？

是呀，她不叫你我领她，要自己到坟地去。她说一定要找到老董的坟。啊呀，这个媳妇犟得很……你说怎么办？

我和晁崇文说话，那女人已经走出来了，下了台阶。她的眼睛已经不适应太阳的光线了，尽管冬季早晨的阳光并不强烈，太阳像是黄疸病人的脸一样黄惨惨的，她举起一只手遮挡着光线朝我们看了看，转身往北边走去。

我急忙朝她喊了一声：哎，你干什么去？

她没搭理我，往前走。

看来她真是生我的气了。我急忙追上去拦住她说，顾大姐，你不要去找啦，你找不到的。这里埋了几百个人，到处都是坟堆，连个记号都没有，你到哪里找老董去？

她站住了，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我，一句话也不说，那神情似乎是在责备我：你不要骗我了！然后绕开我又往前走。我有点急了，说她：你这个人怎么不听劝呢……

这时候晁崇文说话了：老李，不要管了，她不听话就叫她找去，她找不到就死心了。我略一踌躇说，你不听劝呀，那你就找去吧，可是你不能到那边去。农场的坟地大部分在这边的沙滩上，就是你前天去场部的那个方向……

她看了我一眼，调转身向着山水沟南边走去了。

她走出一截去，晁崇文小声问我：老董的坟在这边吗？

我说不，在那边。

晁崇文：那你把她支到这边去，你不是害她吗？

我：那你说怎么办？老董就在北边不远的地方，叫她找到了怎么办？哭死怎么办？

晁崇文不说了。我又说，找去吧，不到黄河不死心，叫她白跑一趟她就死心了。

我和晁崇文认为,她到了坟地,很快就会回来的,那儿除了坟堆什么标志都没有。不料到了中午她也没回来,夕阳西下也还没回来。后来吃过了晚饭,暮色已经像潮水一样注满了山水沟,还是不见她的踪影。我有点沉不住气了:莫非她在坟地出了什么事?我走到晁崇文旁边说,咱们去找一下她吧,不要叫狼吃掉了。

我们刚迁到明水的时候没见过狼,但是时间不久,就有狼了,并且很快地这儿就野狼成群了。有时候,天还没黑透,狼就顺着山水沟跑来跑去,根本就不怕人。它们吃死亡右派的尸体,长得肥肥的,身上的毛都油光发亮。

我和晁崇文出了窑洞往南走,刚走到伙房跟前,一个小小的身影走了过来。我喊了声顾大姐,她站住了。

我走过去说她:都啥时间了,还不回来!你不怕叫狼吃了,可我们害怕呀。你叫狼吃掉了,我们要担负责任的呀!

她不说话。

回到窑洞我们问她:你找到了老董的坟了吗?

她还是沉默。

你找不到。到处乱埋的,又没有墓碑,你怎么找?给,把这两个菜团子吃了快睡觉吧,明早回家去,再不要瞎折腾我们了。

我把两个菜团子放在皮箱上。这是吃晚饭时我专门给她要来的两个菜团子,出去找她的时候怕别人偷吃掉,我装在自己的口袋里的。

她没有吃菜团子,她只是喝了一茶缸凉水就躺下了。看起来她累了,疲惫不堪了。

第四天的黎明到来了,我一如往日给她打来了客饭,劝她:吃吧,吃完了回家吧,不要瞎折腾了,但她却说:

小李大哥,你借给我一把铁锨吧。

我惊讶极了:你要铁锨干什么?

她软软的嘶哑的声音说,我昨天都看过了,坟地里只有不多几

个坟头上放着些砖头,砖头上写着死难者的名字。其他的坟上连砖头都没有。我试着用手挖开了两个坟堆,埋得很浅,也就半尺深,有的还露出被褥来。今天我要拿把锹去,我要一个一个地挖。你放心,我挖过的坟我再埋好。

我惊呆了:这个女人,她到底要干什么!我的心咚咚地狂跳起来,眼睛一热,泪水差点儿流出来。我擦了一把眼睛,说,大姐,吃吧,你吃点饭吧,吃完了我领你找老董去。一定领你去找……真的,不骗你。

眼泪索索地流过她的脸颊。

她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从窑洞出去,走下台阶的时候,她的腿一软就栽倒了。站起来再走,她努力地提起精神,但她的身体摇摇晃晃的。

这天我们是往北走的。我们还没走到沟口,就看见死尸了。正式的坟地在沟外的沙窝子里,但是,掩埋组的人偷懒,有时拉到这里就掩埋了。这地方的地势宽阔了,也有一片沙包,埋了一些尸体。因为埋得草率,有些尸体已经暴露了出来。蓝色、黄色、黑色和各种衣裳的破布条以及土苍苍的头发在早晨的寒风掠过的地面上索索抖动着。

我向晁崇文使了个眼色,叫他把那女人引开去假装辨认那些尸体。我径直找到董坚毅的尸体往上擦沙子。我想抓紧时间覆盖一下,以免那女人看见了难以承受。我盖住了他的两条腿,就停下来喘气。我的身体太虚弱了,已经挖不动沙土了。这时候那女人朝我走过来,问,你找到了吗?我马上装出挖土的样子说,你来看看这个是不是,我看着像是老董。

说真心话,我还真怕她认不出来。从前的董坚毅多么英俊呀,三十多岁,白净的面皮,高高的身材穿一套灰制服,洒脱极了。而现在的董坚毅,赤条条躺在地上,整个身体像是剥去了树皮的树干,干干巴巴的。身上瘦得一点肉都没有了,皮肤黑乎乎的,如同

被烟火熏过的牛皮纸贴在骨头架子上。他死去才八九天，倒像是从古墓里挖出的木乃伊。他的屁股蛋儿上少了两块肉，露出带着血丝的骨头。我们和他一起生活了近三年，是眼看着他从一个健壮的人变成这样一个木乃伊的，否则我也不会认定他就是董坚毅。

可是那女人走近后只看了一眼，就咚的一声跪倒，短促地呀了一声，扑在“木乃伊”上。

我的心沉了一下！她扑在“木乃伊”上之后，就一动不动了，没了声息。这种情景持续了足有一分钟。我忽然害怕了，是不是一口气上不来憋死过去了。晁崇文反应比我快，他推我一下说，哎，这是怎么啦，别是没气了。快，快拉起来。我们同时跨前两步要拉她，她的身体却又剧烈地抖动一下，同时她的嗓子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咯吱吱的响声。咯吱吱的声音很费力地转化为一声凄厉的哭喊：哇啊啊啊……

哇啊啊的哭声刚结束，她就使劲儿摇晃起那个木乃伊来，并且抬起脸看着天，嗓子尖利地喊出董坚毅的名字来：

董——坚——毅——

她连着喊了几声董坚毅，山水沟里便连续不断地回荡起一个声音：毅毅毅……毅毅毅……

然后她就伏在尸体上大哭起来。

她呜呜地哭，我和晁崇文在旁边站着，耐心地等着她的哭声结束。可是半个小时过去了，她还哭个没完没了。我们等得不耐烦了，不得不拉她回去。我对她说，顾大姐，不要哭了，咱们该回去了。

我和晁崇文一用力把她拉起来了，但她却抱着木乃伊不撒手，把木乃伊也拉了起来，哇哇地哭，就像他们是一对连体婴儿无法扯开。没有别的办法，我们硬是把她的手从“木乃伊”上掰开，分开他们。我很粗鲁地推开她说，行啦行啦，多脏呀，你抱着他！走开，走开点，我来埋掉他。

但是,她猛然吼了一声:不准你埋!

不埋怎么办?就这样摆着?

我要运走,运回上海去!

我苦笑一下说,你怎么运走,背着她上火车吗?

把他火化了,我把骨灰带回家去。

我一惊,这可是个好主意,但又觉得这主意不可行,没有柴。明水附近的荒滩上只有干枯的骆驼草和芨芨草,用它们是难以把尸体烧成灰的。

她问我,这附近有没有农民?

我说往西北走七八公里有个明水公社。她又要我领她去明水公社,找农民家买柴禾。她说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她如此固执,我只好拖着浮肿的双腿带她去。

我们整整走了两个小时,才在明水公社找到一户农民,买了几捆木柴。同时她对那农民说,愿意多出点钱,请他去火化一个人。那农民不干,说他不干那种晦气的事。但他给我们叫来了两个老头,说他们愿意去干,叫我们和他们讲价钱。讲好了价钱,两个老头替我们雇了一辆牛车,拉着木柴往回走。经过供销社老头叫我们又买了一桶煤油。老头说,尸体很难烧透,所以要准备充足的燃料。

回到山水沟,那两个老头把木柴堆好,再把尸体码在上边,浇上煤油点着了。火势很大,很快就烧塌了木柴,尸体掉下去了。在火焰中,尸体突然坐了起来,吓了我们一跳。后来木柴烧光了,就往火里泼煤油。终于煤油也烧光了,灰烬中剩下了一堆骨头。腿骨很长,像烧黑了的木头棍子。我对她说,再也没办法了,你就捡点碎骨头带回去吧。但她说,不,我要全带回去。

她抹下绿色的缎子头巾,想把骨头全包起来,但是头巾太薄,透亮,一眼就能看见里边的骨头。我说她:你就捡点小骨头拿回去吧,大骨头不好拿,也的确没那个必要。就是在火化场,也只是给

你一部分骨灰装骨灰盒，你何必大老远全都背回去？再说你这样上火车，列车员会看出来的。她不听，说，我用那件毛衣裹起来。

于是，她提了一大包骸骨回到窑洞，拿出花格子书包里的毛衣来包裹它。但是那仅仅是一件背心，太小，她无论如何调度，骨头还是露在外边。后来我从皮箱里拿出一条军毯给她。我告诉她，这是我入朝作战带回来的战利品，美国士兵的军毯。我抖开毯子叫她看，商标上还有 USA 字样。我说，这条毛毯我已经保存八九年了，舍不得用它。来农场劳教，许多衣物都拿去换了粮食，军毯却保留至今，舍不得换吃的，因为它是我的一段光荣历史的标志。

她接过毯子去了，她说，毯子用过之后，她要洗干净寄还给我的，因为它对我很重要。我说你不要寄了吧，你寄来的时候，我可能收不到了。——我能活那么久吗？我笑着说，你就放在你家里吧，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有一天去上海，我上你家去拿。她说，那好，那好，我把我家的地址告诉你。在大家苦涩的笑声中，她拿起我放在皮箱上的一册笔记本写下了她家的地址。

因为时间已是黄昏，这天夜里她又在我们组的窑洞过夜。翌日清晨，我送她出了山水沟，指着南戈壁上的一个叫明水河的小火车站说，你到那里去乘火车吧，比去高台火车站近得多。

我在戈壁滩站了许久，看着她背着背包往前走去。那个背包是我帮她打的，因为骨头多，背包很大，我把它捆成了军人的背包形状，好背。她的身体是瘦小的，而背包又大，背包把她的肩膀都挡住了。那块绿色的头巾，她又裹在头上了。11月下旬的清晨，戈壁滩上刮着凛冽的寒风。头巾的尖角在她的脖子上像个小尾巴一样突突地跳着。

那个女人说要把军毯寄回给我的时候，我不是跟她说了吗，不要寄，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乡，有机会去上海的话，就去她家取毛毯。她当时还真写下了她的住址。可是我哪有去上海的机会呀！你看我现在的样子：羊倌。再说，如果有一天老天睁眼，可怜

我,把我头顶的山揭掉,我也变成像你们一样的自由人,如果真去了上海,——我不是说要去拿那块毛毯,那才值几个钱?主要是那个女人在我的心里印象太深刻了,真想再见到她——我也是没法找到她了。那是1960年12月份,夹边沟的右派们在生死存亡的要紧关头,为了取暖,都把书和笔记本当柴烧,我的那册笔记本也被人扔进火堆转化为卡路里了。

和李文汉在一起放了三年羊,后来我就作为工农兵学员去西北师院读书,毕业后留在兰州的一所中学教书,就再也没见过他。再后来,听回城的知青们讲,他已经平反了,回了省劳改局;具体在哪个部门哪个单位工作,谁也说不清楚。

但是,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1996年的一天,我去看望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刚刚走到兰州二中门口,就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扭脸一看就惊呆了:这不是那个脑门有点秃的李文汉吗!和从前不一样的是他的头顶全秃了,后脑上的头发全白了。其他都没变,高高的身材,黑黑的爽朗的面孔。我热烈地握手,问他怎么在这里站着?他说,我就在这里住呀。他指了一下二中旁边省劳教局的家属院。他立即就拉着我进了家。在他家里我们整整聊了一天,还喝掉了一瓶白酒。他告诉我,平反以后,他在五大坪农场当了十多年生产科长,然后离休,全家就搬到兰州来了。谈话中他突然说起一件事来:喂,你还记得我给你说过的那个上海女人吗?我说记得。他说,我还真有机回去了一次上海,找过她。我说是吗?他说,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1957年,我就是因为写文章被打成右派的。可是平反以后的几年里,我的手痒痒,又写了几片论述劳改工作的文章发表。这一次没打成右派,有一篇竟然被司法部评为优秀论文,颁奖会在上海举行。

那是在上海的最后一天,大家自由活动,我去淮海路购物。淮海路的繁华,在我的眼里是可以和南京路相比美的:商店鳞次栉

比,游人如织,摩肩接踵。我是想给老伴儿买几件衣裳的,——我的老伴儿也是个苦命人,在五大坪工作几十年,把两个孩子带大了,遇上我才成了家。她连一件时髦点的衣裳都没穿过——可是跑了几家服装店,也没买成一件衣裳。原因是时髦的太时髦,不时髦的我又看不上眼。

我继续逛商店,看见一家商店门口的牌匾上镏金大字写着:老字号伊丽莎白西装店。店铺的门面不是很辉煌,但却庄重大方。我的心突然动了一下,伊丽莎白这几个字我好像很熟悉。

我站住想了想,还真想起来了:近三十年前,在明水的山水沟里,一位上海女人去探视丈夫时对我讲过,她家公私合营前有一家西装店,店名叫伊丽莎白。她还说她家就住在店后的一幢小楼房里。那女人拿过我的一条毛毯,用于包裹丈夫的遗骨。

心头突发一阵兴奋,我走进了西装店。我并没有要回毛毯的念头,我是想,既然走到门口了,进去问问,如果能见到那位女人,喝杯水,叙叙旧,不是很好吗?

店铺不是很大,但生意很火,顾客拥挤。我思考了一下,走近一位年纪大一点的营业员,——实际他也就三十几岁不到四十的样子——耐心地等他应付完几个顾客,才说,请问师傅,你们这个服装店最早的老板是不是姓顾? 营业员有点莫名其妙的样子,说,什么老板? 我们店是国营企业,不是个体经营。我说,不,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最早——就是五十年代刚解放的时候,这个西装店的老板是不是姓顾? 他的眼睛显出惊讶的神色,你问这干吗? 公私合营的事我哪里晓得呀? 我说你们这儿有没有岁数大点的人,了解这个西装店历史的人? 他思考一下说,你到楼上去问问我们的会计,他可能知道。

按着他的指点,我从店堂的过道上到二楼,在一间狭小的房子里,找到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同志。当他明白了我的来意之后,明确地告诉我,这个店公私合营时期的老板不姓顾,而是姓朱。我说怎

么会不姓顾呢,老板的女儿告诉我,她家的西装店就叫伊丽莎白,难道上海还有另一家伊丽莎白西装店吗?老同志肯定地说,不会的不会的,上海没有第二家伊丽莎白西装店。我在上海的私营和国营服装店工作了一辈子,有多少家老字号服装店是很清楚的。看他回答得很肯定,我便说,那是我的记忆出差错了吗?老同志,我再问你个问题,你们的店后边是不是有幢小洋楼?那位女同志告诉过我,她家的店后边有一幢二层的小洋楼,她家就住在那栋小洋楼上。老同志摇着头说,没有没有,我们这个店后边从来没有过小洋楼。我说是不是有过,后来拆掉了?他还是摇头:我不是说了吗,从来就没有过。我在这儿工作了二十多年,后边都是大楼房,是解放前盖的,没有过二层的……他说着说着突然停止了摇头,改变腔调说,哎呀,你要找的莫不是南京路上的维多利亚西装店,那儿的老板最早是姓顾来的,公私合营后换了新经理。我说,是吗?他的老板是姓顾吗?你能肯定吗?他说肯定,我一点都没记错。我疑惑了,说,可我的印象里是伊丽莎白西装店呀。他坚定地说,不对,就叫维多利亚,是你记错了。维多利亚后边是有一座小洋楼,现在还有。我迟疑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她亲口对我说的,她家的店名叫伊丽莎白,是英国女王的名字。但老同志又说,没错,我说的没错,你要找姓顾的,就到维多利亚去找吧。是你记错了,维多利亚,伊丽莎白,都是英国女王,你把维多利亚和伊丽莎白搞混了。时间久了,记忆容易出错误。

我被老同志说服了,承认是记忆力出了毛病。老同志热情地把我送出西装店,站在人行道上指给我去什么地方坐几路车可以去维多利亚西装店。我谢过他。

但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走了一截,我就突然决定不去找那位姓顾的女人了。我是这样想的:挺费事地找了去,如果顾家不住那儿了,不是徒劳一场吗?就是顾家还住在那儿,但那女人倘若已经搬走了抑或不在人世了,不也很扫兴吗!

夹 农

夹农是一个人的名字。他妈叫李怀珠,是个右派,1958年的冬季在农场劳教时生下他。你觉得这个名字古怪吗?一点也不古怪。有些人叫延生,说明他是在延安出生的;有些人在北京出生,叫京生;我还遇到个叫津津的姑娘,是天津市人。李怀珠是在夹边沟农场生下那孩子的,就叫他夹农。这些年我老了,七十岁了,我经常回忆起年轻时候的美好的和艰辛的生活,想起在夹边沟生活过的日子,想起夹边沟的姐妹们来。一想起夹边沟的姐妹们就又想起来农,因为那一段时间围绕着夹农发生了许多难忘的事。

我是1958年3月划为右派分子的。我原在省公安厅工作,丈夫也在公安厅。我是张掖人,家庭出身是小土地出租,也就是农村的一个小地主,家里有二十几亩水浇地。1947年我从张掖师范毕业。以我自己的想法,师范毕业了,就在张掖县当个小学教师就可以了,可是我父亲不同意,说我家没有男孩子,就我和姐姐两个姑娘,姐姐已经出嫁了,嫁了一个山西在张掖做买卖的商人,那商人那时已经破产了,我姐的生活已经很悲惨了,我一定要上大学,将来找一个好丈夫,他和我妈的晚年才有依靠。于是我父亲送我到兰州读兰州大学中文系。在兰大读了两年书兰州就解放了。兰州是1949年8月26日解放的。在解放兰州的战役打响之前学校就停课了,——也正好是放暑假的时候——学校里没啥人了,我也不敢住校了,就住到一个远亲家去了。兰州解放的第四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到学校去了一趟,看什么时候开学。我的亲戚家在小西湖住,那几天还没有交通车,我就步行着进城去。我路过萃英门——

也就是西关什字一带的时候战场还没有打扫干净,这里一具尸体,那里一摊晒干了的血迹,血迹黑黑的。我到了学校,学校里空荡荡的看不见人,只有门房有人。我问问门房的人什么时候开学,门房也说不知道,可能还得些日子。于是我心里嘀咕开了:这可怎么办呀,学校开不了学,家里不寄钱来,我又回不了张掖,——那时候河西走廊还没解放——光在亲戚家吃闲饭哪行呀。就在我忧愁之际,遇到了一个名叫章宗昌的同学。他是陕西人,从陕西到兰大来读书的。我问他学校不开学怎么办呀。他说他已经决定不上学了,要去参加解放军。——他认识的同学有人已经参军了,说解放军很欢迎学生参军。他当时还动员我,你的情况和我一样,家里寄不来钱,干脆咱们一起去参军吧。我当时就同意了,参军就参军,我早就想参加革命了。于是我们就到军管会去了。那时的军管会设在后来的兰州饭店跟前,我们去了说要参加解放军,军管会的人问了问我们的家庭情况说好呀,欢迎你们参军。部队就是缺少像你们这样的知识人才。可是临到军管会要写介绍信叫我们去部队报到时我又犹豫了,我说我想参军可是又怕走远了,再见不到父母了。父母没有儿子,今后的生活要我照顾呢。军管会的人态度非常好,说怕走远你们就不要到部队去,革命工作干什么都是光荣的。我们说那还有什么革命工作可干呀。军管会说现在最缺人的就是治安部门,新解放的城市需要大量的警察维护社会治安。起先我还犹豫,因为旧社会人们对警察很反感。军管会的人看出我的心理,说,革命工作干什么都是光荣,人民警察是为人民的,也光荣。我参加革命心切,说那就当警察吧。看我愿意当警察,章宗昌也同意了,军管会写了条子叫我们到隍庙那儿去报到。隍庙那儿原来有一所国民党的警察学校,军管会已经接收过来改成了人民公安学校。

我和章宗昌去了公安学校报了名,填了表,过几天就通知我们被录取了,叫我们来参加学习。这时我们才发现,我们在兰大的同

学比我们高一级的外语系的那秀云和历史系的陈毓明也报名当警察了。他们是夫妻,已经有个孩子了。

按计划我们要在公安学校学习半年,可是兰州市的治安工作极端缺人,才学习两个月,就把我们四个文化水平高的人调到军管会工作。陈毓明去水北门附近的军管会反动党团登记处工作,我们三个人负责经济方面的治安保卫工作。后来省政府成立,我们就都到公安厅了,陈毓明和章宗昌在二处搞外勤——就是侦察员,我和那秀云到了政治部搞内勤,就是抄抄写写,搞宣传,办学习班对基层干部进行理论学习的辅导。

1951年,我和章宗昌结婚。

章宗昌出身大资本家家庭,1954年内部肃反之后就把他调到兰州客车厂管犯人去了。过了一年,河西三专区合并为张掖专区,张掖县要改为省辖市,省公安厅从机关各处室抽调十九个人去张掖县成立了张掖市公安局。领导说我是张掖人,照顾我回老家把我也调过去了。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计划中的张掖市并没有成立,倒是嘉峪关成立了省辖市,于是刚成立的张掖市公安局就撤销了。而在将撤未撤之际反右斗争开始了……

我是个马虎人,在省公安厅工作期间,领导始终也没重用过我,哪儿忙就抽调我去那儿,我自己呢也大大咧咧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说话也随便。所以在公安厅干了五六年也没当过什么官,也没挨过批评。我把自己的这种作风带到了张掖市公安局,结果就划成了右派。真的,我划成右派连我自己都觉得名不副实。像中央的大右派章伯均当右派是有原因的,他和毛主席争高低,说国家主席要轮着做;甘肃的大右派杨子恒,有人攻击他提出甘人治甘的口号是有野心,他还顶人家:你也太小看我了,我是想治理国家来的。这些人能不挨批吗?你跟共产党争权嘛。我没那些大右派的资格,也没那么高的水平说出那么大的话来。我只是在反右斗争中

领导逼着我提意见,我就提了。单位发救济款不发给有困难的人,却发给当官的,穷人越穷,富人越富,这不是和国民党一样了吗?结果局长就抓住了我这句话,说我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要我作检查。我也知道这话说得有些偏激,叫检查就检查。可是检查的时候我说了句我这人毛病多,毛病就像离离原上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希望大家多批评帮我改正。他又逮住我这句话,你是一心和共产党对抗到底。散会后找我个别谈话。我们的局长是坏蛋,是个色鬼,经常和女同志说些不三不四的下流话,经常用很色的眼睛看女人。那次谈话的时候,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叫我坐在他的床上,他搬把椅子离得很近地坐着,色迷迷的眼睛看着我。我本来就对他很反感,他又看得我心里发毛,我就说他:你离我远点。这一下我可是得罪他了,过了一天他就布置人开我的批判会,要把我打成右派。我不服气,跑到专署去找公安处处长黄钲,说我们局长要把我打成右派。那时候我丈夫章宗昌已经划成右派了,从兰州客车厂送到安西县的四工农场监督劳动。黄钲是老公安,认识章宗昌,也知道他已经去四工监督劳动了,我带着两个孩子很难,就去找我们局长说情:戚淑英是个有口没心的人,言论性质也不太严重,她男人已经划成右派了,她还要带几个孩子过日子,就不要把她搞成右派了。黄钲的说情可能起了点作用,局长叫秘书跟我谈话。秘书对我说,局长讲了,只要你揭发另外两个女同志的问题,就不把你划成右派。我当时想不通,心里也委实不忍心把那两位女同志搞成右派,就问秘书:这是局长说的话吗?秘书说是局长说的原话。我说是局长说的不是局长说的空口无凭,你叫局长给我写个条子,写个条子我就揭发别人。秘书回去照实汇报了我的话,局长可是火了,跟秘书说,啊呀呀,这个女人真厉害,她想抓我的把柄。这一来他就怀恨在心了,一定要把我整成右派。可是当时的局党委七个人,听他话的只有三个人,他不能强行通过表决把我打成右派。于是他就把我吊起来拖着。拖着拖

着,偏向我的领导调走了两个,他的人占绝对多数了,1958年3月初就把我划成右派了,而且对我的处理比我丈夫的处理还重: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宣布我为右派分子的第二天,我回了一趟家,把两个孩子放到我姐姐家,和父母说了我的情况。转天我就去地委办手续。地委的李英秘书认识我,一看我是来办去夹边沟的手续的,偷着跟我说,像你这样的右派是可以回家自谋生计的,你就回老家去吧,到夹边沟干什么?我说我没有家可回了。他说你不是张掖县平安堡的人吗?我说我是张掖人,可是土改以后我们家的土地被没收了,留给我父母的几亩土地我父亲也交给农会了,我父母土改后就离开平安堡投奔我姐姐和姐夫去了。父母在人家房檐下过日子就够难肠的了,我再去姐夫的房檐下过日子那日子不好过呀。

李秘书叹息着给我开了介绍信。翌日我就自己坐火车到酒泉县去了夹边沟。那天是三月八日,世界劳动妇女的节日。

在我的记忆中夹边沟农场有三千人劳动教养,大部分是右派,一小部分是在反右斗争中有言论问题的历史反革命和坏分子。人们都叫我们劳教犯,尊称劳教分子。

三千人中有十九名女右派。十九名女右派编成一个女子组,归农业大队的一个分队管。女子组的组长是那秀云。

我到夹边沟的时间还算是早的,只到了五六名女右派。大批男女右派是四、五、六三个月送到夹边沟来的。以后零零碎碎来了些人,那是没完成右派指标的单位补漏补进来的。

李怀珠和毛应星比我来得晚,是六月底来到夹边沟的。毛应星你知吧,就是文革中被枪毙的那个女右派。李怀珠是河北省人。我不记得她是哪个大学毕业的了,反正她是大学毕业生。她和毛应星都在兰州农校当老师,一起划成右派,一起押送到夹边沟来的。李怀珠长长的身材,白皙的皮肤。她的皮肤和毛应星成很

大反差：毛应星是南方人，黑黑的皮肤，典型的南方人。

我们十九个人住在一个小院里。我说的小院实际上就是把一栋平房从中间砌了一道墙接到前边一栋平房的墙上，把我们住的几间房和另几间房隔开，就成了一个小院。那边的几间住着男右派。小院的前后左右都是男右派。女右派的房子里砌了土炕，虽然没有柴草烧炕，但比男右派强多了——男右派住地铺。同样大的房子，男右派十二三人住一间，女右派一间房子住四五个人五六个人。

我和那秀云、李怀珠、豆维柯四个人在一间房睡一张大炕。

那秀云，我前边不是说了吗，1949年我们一起参加工作一起到省公安厅政治部当内勤的。和我丈夫一样，她丈夫陈毓明也是在内部肃反后调出了公安厅，在省劳改局的野外勘测大队工作。陈毓明五七年也划成右派送到夹边沟劳教来了。那秀云是在公安厅划成右派的，也来夹边沟劳动教养。她们两口子已经有四个孩子了，划成右派后把一个送了人，三个托放在亲戚家里。

豆维柯是省交通厅送来的右派，那年二十三岁，是宣传部的干事。她也是撇下两个孩子来接受劳动教养的。初到夹边沟右派们都痛不欲生，近乎活不下去的样子。原因很简单：一是离开了原先工作的岗位，离开了温暖的家庭，在戈壁荒漠上生活，吃不饱，住不暖，落差太大。再就是巨大的思想压力——大部分右派都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人，四九年前后一腔热血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一下子就成了右派成了阶下囚，思想上的确解不开想不通，觉得这一辈子完蛋了，活着没意思了。还有一种巨大的压力来自家庭：配偶离婚，孩子没人养育，老人没人管，真是妻离子散……

我们女右派的院子里，只要收了工休息下来互相一说话，一问对方的历史，就有人哭起来。一个人一哭，其他人也就同病相怜痛哭起来。经常是一个房子的人哭成一片。

我们当中最悲伤、悲痛欲绝的是张启贤和李怀珠。张启贤是

酒泉中级法院的机要员。她划成右派之后原本不该来夹边沟的，因为她只是个一般的右派，不是极右分子，出身好，丈夫还是酒泉中级法院的院长。但就是她丈夫往她的心上扎了一刀：向组织揭发她往省上送文件时坐火车遇到一位熟人，聊天时告诉熟人她是送文件的，文件的内容是一个什么案件。她就又多了一项罪名：泄密。于是两罪并罚把她送到夹边沟。她进夹边沟不久丈夫就与她离婚，并和一位大学生结婚了！她明白了，丈夫是早就看上那位大学生了，蓄意陷害她……

李怀珠痛苦不已的原因是结婚不久夫妻双双划成了右派，且都被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劳教。来夹边沟时她才25岁，大学毕业才两年，还年轻，心理的承受能力不够。她天天以泪洗面。她没有想到，自己一心要为之奋斗的党会把她整成右派，施以如此残酷的打击。在学校里批斗她的时候，有一天夜里睡在床上她突然想不通了，发疯一样赤身裸体跑到草场上去，不想活了……到夹边沟之初，她的情绪坏到了最低点：她是怀着四个月的身孕来接受劳动教养的。她曾经吞食过烟灰和碱面，说是要堕胎，不能把孩子生下来。她说自己是反革命就反革命吧，不能再生个小反革命——不能叫自己的孩子也是反革命，受这种屈辱！

我和那秀云好多次将心比心地劝过她：我们都是有孩子的人，要是像你这样想，难道我们就要把孩子掐死吗？她说我们：你们是劳教之前生的呀，生在家里。我可是要在这里生孩子呀！难道叫孩子在劳教中长大吗？这对他的心灵会造成多大影响呀！我们说，孩子生下了，不管是好长还是赖长总是要长大的！我们的劝说顶不上用，管教干部也怕她出事，就破例地把她在农业队劳教的丈夫毕可成叫来，和她在一起住了几天，叫毕可成做她的思想工作。

毕可成也是农校教师，戴一副近视眼镜，瘦长的身材。

夹边沟有几对这样的夫妻右派，可其他的夫妻没他们这样的福气，不要说同房，想来串个门见个面都是绝对不允许的。在我的

记忆中,我们的组长那秀云和丈夫陈毓明只同房过两夜。那还是因为陈毓明早就认识农场场长,场长特意指示大队长梁敬孝,梁敬孝事先叫李怀珠、豆维柯和我到别的房子去睡觉,叫他们夫妻同房一次。

时间消磨心灵的痛苦,我们慢慢地适应夹边沟的劳动生活了,接受残酷的现实了,精神的压力减轻了,开始努力地改造自己的思想了。

李怀珠也不大哭了。

初到夹边沟农场,女右派的劳动是分散的。我们的组长那秀云带着六七个人在磨坊磨面,毛应星和几个人在蔬菜队种菜,——毛应星是西南农学院毕业,学的林果和蔬菜专业——还有几个人在农业队劳动,豆维柯、李怀珠和我都在农业队。

在田野上劳动,对于男右派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夏收一天要收割一亩小麦,夏收后翻地也是一天要翻一亩,挖排渠的时候一天要挖十五方土,不管干到夜里九点十点,必须完成定额,完不成不给晚饭吃。对于女右派是优待的,只要跟着干就行了。可是,所有的女右派都竭尽全力拼命地劳动。我印象太深了:排渠挖到一公尺五深地下就出水了,那是十月中旬的天气了,天已经冻冰了,站在水里挖渠扎骨的冷,可我们干得浑身出汗,只穿身单衣。尤其是豆维柯,为了显示干活积极劳动卖力,上身穿件背心,下身只穿条红裤衩。引得右派们都往我们这边看。

挖排渠的时候,李怀珠的肚子已经挺得很大了,她弯不下腰来了,根本就不能抡镐和使铁锨了。她的预产期是十一月中旬,可是管教干部不叫她休息。这对她来说很痛苦:干吧,怕累着了导致早产,不干吧,怕管教干部说她不好好改造。她只好挺个大肚子站在二台上往外翻土。后来还是那秀云跟农业大队的大队长梁敬孝说了说,才把她调到磨坊磨面。

磨面也是很累的,要早晨六点起床就去干活,天黑透了才能下

班,一天围着磨转,还要淘洗粮食,晾晒粮食,搬动面口袋,罗面。那时候磨坊就有七盘石磨,七头毛驴拉磨。到晚上下班的时候,她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幸亏姐妹们照顾她,大部分时间叫她光是看看磨,看住驴不要偷吃面粉……

谢天谢地,李怀珠终于平安地熬到了生产的那一天。那是1958年11月中旬的一天,天气格外冷了一下,因为从昨天傍晚就开始下雪。天亮时雪小了,但是刮起了寒冷潮湿的东北风。这天吃早饭的时候我们被告知:今天休息。夹边沟是没有星期日的,刮大风,下雪或者偶尔下雨的日子才是我们的星期日。这天我什么也没干,吃完了饭就关起门来睡觉,因为房子里没有炉子冻手冻脚的。大约是下午三四点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而且敲得很急,那秀云的声音喊,开门,快开门!我跳下去开门,那秀云搀着李怀珠走进来。李怀珠的脸是惨白的。我吓了一跳,问出什么事了。那秀云说怀珠肚子痛。我知道她要生了,急忙把被褥铺好,把李怀珠扶到炕上躺好。我问她疼得厉害吗?她说这阵儿轻点。那秀云说,我说不叫她干活,叫她坐着,她非要扫磨。我想扫磨就扫磨吧,我罗我的面。我正罗着面听见她哎呀了一声,回头一看,她扶着磨盘蹲下了……

我问那秀云:等会儿才能生吧?

那秀云:得到夜里了。你把炕烧上吧。

还在半个月前,梁敬孝在挖排渠的工地上看见了毕可成,说,收工后你抽时间打些柴去,存下,媳妇生娃时把炕烧热。毕可成是个真正的书生,大城市长大的,哪会打柴呀,打了两三天,就背回来两小捆碱蓬放在女右派院子里。我看见了又生气又可怜他,说他:你就是这么打柴的吗?他说那要怎么打?我叫他找工具保管员借了两个耙子,拉了一辆排子车,带他到一片骆驼草草原上,教他如何打柴。河西走廊干旱缺雨,草原上根本就没有树林,没有硬柴可

打。小时候见过父亲打柴：每到冬季，父亲就和邻居家的男人们结伴赶着牛车到远方的骆驼草滩上去。他们在荒原上住两天，用耙子把成片的骆驼草的茎秆贴着地面捣折，再扒成堆，再用杈子叉到牛车上。把车装得高高的，用大绳勒紧，拉回家来。打一车柴要花两天的时间。一个冬季要打十几车，打够一年烧的柴。

那天我教毕可成怎么打柴，并且打了一排子车拉回来。后来他就每天收工后打点柴，拉回来堆在我们的小院里。

此刻我忙忙地从院子里抱柴，把炕烧上，然后把李怀珠先前准备好的婴儿用的小被子和尿布翻出来。她准备的尿布不多，我把自己的几件洗净的旧衣裳撕了，放好。她没准备婴儿枕头。我跑了一趟磨坊要了两碗磨面的豌豆回来，用一块手帕缝了个枕头，里边装上豌豆。这时候那秀云已经向梁队长报告过李怀珠要生孩子了，梁队长打发人把毕可成叫来了。他进来时正遇上李怀珠又一次阵痛发作，呻吟不止。吓得他连声问怎么办？那秀云瞪他说，捏住怀珠的手，安慰安慰她。他还真就坐在炕头上捏住李怀珠的手，连声问还痛吗？李怀珠不说话，轻轻地呻吟着。

炕烧热了，房子里开始有点热气。半夜里李怀珠生了个男孩。

生了孩子之后，农业大队的教导员宋有义来我们房子看过李怀珠一次。原先管我们的是一个人们叫袁干事的管教干部，后来袁干事不见了，宋有义专门管我们。宋有义和梁敬孝同级，可能是科级干部。夹边沟农场原来是科级单位，这时候劳教的右派多了，升为县级农场了。宋有义叫毕可成伺候几天李怀珠。他还和伙房说了一声，给了李怀珠一斤清油^①，二斤鸡蛋和几斤面粉。叫毕可成给李怀珠做饭吃。

李怀珠身体弱，再加上吃不饱，思想压力又大，生下的孩子瘦极了。我的孩子们出生时都在七斤左右，生下来胖墩墩的，圆胳膊

① 胡麻油

圆腿,皮肤红润,哭起来哇哇的声音洪亮有力。李怀珠的孩子才四斤重,那个瘦呀,那个难看呀:身上的皮肤皱皱巴巴的,脸上也有许多褶子。哪里像个初生的婴儿呀,简直就是个衰弱的小老头,像只赖猫。哭的时候嗓门细弱还有点沙哑。胳膊腿软软的没力量。

这个孩子长得很丑,可是我们房子的人都喜欢得不得了。毕可成伺候几天又回农业队去了,我们几个又回来睡,睡觉的时候我就挨着那孩子睡。只要他醒着,我就逗他玩,摸摸他的脚,捏一捏手指头。夜里孩子一哭,我一下子就坐起来,给他换尿布,抱着他摇呀晃呀,晃睡着了我再睡。豆维柯可是个很洋气的人,个子不高吧,但匀称,白白圆圆的脸白中透红,天生丽质,像个洋娃娃。这个人很傲气,她知道自己长得漂亮,瞧不起其他右派。虽然她也是个右派,可是在农场里她穿着列宁式的呢子短大衣,昂着头走路。但是她也喜欢那个孩子,收工回来,一进屋就把孩子抱起来亲呀亲呀,亲够了才去洗脸。这个人还积极得很,打从到了夹边沟就经常写思想汇报写改造思想的心得,向管教干部表现自己的进步。她还经常揭发别人偷粮食了,偷面粉了。她总是受到领导表扬,却把两个磨面的姐妹罚到大田劳动去了。为这些事,我们全组的右派都恨她,和她关系不融洽。可是李怀珠生孩子以后,磨面粉的姐妹们从磨坊偷面粉偷小麦半夜里在煤油炉子上做吃的给李怀珠增加营养,其他人也跟着吃,她却一次也没告发过。有次傍晚收工回来,她竟然从短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堆黄豆来,倒在李怀珠的洗脸盆里说,晚上叫老李煮着吃吧。这东西有营养。我问她从哪儿搞的黄豆,因为磨坊里从来没磨过黄豆。她回答从伙房抓的。

由于孩子的原因,我们和她的心理隔阂消除了。

不光我们宿舍的人喜欢这个孩子,全体女右派都喜欢这个孩子。有个女右派叫由田,原兰州医学院的讲师,也是兰医讲师团的理论教员。讲师团你知道是干什么的?全国解放后,各省各地县不都建立了政府吗?不都发展了很多地方干部吗?可是这些新干

部,包括一些转业到地方来的部队干部,对于马列主义理论都是一窍不通,对中央的一些政策也不理解。于是中央和各省从大专院校和政府机关抽调理论水平高政治可靠的干部到中央或省党校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然后再回到各省市或地县辅导地方干部,对各级干部进行马列主义培训。这个由田,是兰州医学院专讲马列主义的理论教师。这人虽然划成右派了,可是傲气极了。挖排渠休息的时候别人都躺着聊天,她却抱着一块砖头样的书读书。夹边沟的管教干部都是管劳改队的水平,哪见过这样的“犯人”,走过去制止,她竟然嚷了起来:这哪行!怎么连书都不叫读了!读书才能改造思想,劳动只能锻炼筋骨!右派们不知她是哪来的右派什么身份,竟然说这样的傻话,便都笑她。在农场劳动了几个月,她看到农场太穷,饭也吃不饱,劳教分子每月三元钱的津贴也发不下来,便对大队长梁敬孝说,梁队长,你们给我几天假,我到北京找一趟周总理给农场要点钱去。梁队长认为她说疯话,根本就不理她。她又去找场长刘振宇,还是这样说。场长也不理她,并且对人说,不要理她。装神弄鬼的那套把戏我还识不透吗,骗鬼去吧!于是,农场里传开了,由田装精神病。但是我们女右派都不这样认为。由田犯神经不是永远的,当她不犯病的时候,她是个安静温和的人,说话很理智。有一段时间女右派都在猪圈干活,喂猪,空闲时间多,也不很累,聊天的时候她曾说起过她的生活,她的历史。她是东北人,“9·18”日本人占领东北,她不甘做亡国奴流亡到北平,又到大后方的重庆。她是在流亡中上完大学的。他爱人姓宋,也是东北青年,成都大学毕业,后来去美国留学,做了大学教授。她没有出国,在国内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到了大西北。解放后在兰大做讲师。她有三个孩子,1957年定为右派之后,她把孩子托靠给了邻居,自己来农场劳动教养。她的小儿子那年十四岁,调皮,邻居管不了,送到农场来了。儿子叫宋亚杰,在农业大队劳动。管教干部在女右派住的小院里给她们母子一间房子住。

由田经常犯神经说话没有分寸,人们有时候逗她:你不要吹牛了,你找周总理要钱,你和周总理什么关系,周总理能给你批钱?她撇撇嘴,轻蔑的口气说,你们知道什么,我跟周总理的关系能跟你们说吗!

据医学院来的右派讲,由田的精神不正常是反右斗争中受了刺激所致。她已经有几年没见到丈夫了。解放以后中美断交,她丈夫回不来她又出不去。

有一天我们在田野上翻地,有架飞机从头顶飞过,她又犯神经了,说,你们看,周总理派飞机接我来了。右派们都笑她:你又犯神经了,吹牛啦!她竟然发火了,说,我吹牛?你们说我吹牛?我现在就去北京找周总理要钱。我把钱要回来,看你们怎么说。她说着话就气呼呼扔下铁锹走了,朝着酒(泉)金(塔)公路的方向走去。我们追上去拉她劝她回来,可是劝不住她,拉也拉不回来,她还是往前走。没办法,那秀云就跑去找梁队长,说由田要去北京找周总理,我们劝不住,你去劝劝吧。梁敬孝说,不要管,谁也不要拦她,叫她走去。等到由田走出了场部,走过南边的几座沙包,梁敬孝便带了两名管教干部追上去。那几座沙包是警戒线,右派到农场的第一天管教干部就告诉大家,未经管教干部批准而越过沙包者被视为逃跑。梁敬孝带着人追上由田,五花大绑把她捆了起来。捆回来之后绳子都没解开就关进了禁闭室。关了几个小时才放出来,胳膊和脸都肿了。

就是这么一个神神经经的人,也竟然每天晚上跑到我们房子来抱一抱李怀珠的孩子。李怀珠怕她神经把孩子弄疼了,看她一进来就自己抱起孩子来喂奶,不叫她抱,她却硬是把孩子从李怀珠的怀里抢过来抱着,一改日常严肃的面孔,用我们从来没听见过的亲热的音调说,叫阿姨,叫阿姨。然后就把脸贴在孩子的脸上亲着笑着。有一次她亲着孩子的时候竟然流起眼泪来,嘀哩嘟噜说了一串英语。我的英语都忘光了,但她说的这几句话我听懂了。她

说的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心肝呀……

我们都爱这个孩子。有时候吃过了晚饭，不知道为什么，全体女右派就都集中到我们这间房子来了。这个人抱一会儿，那个人抱一会儿，这个人亲一亲，那个人亲一亲，孩子在大家的手上传过来传过去，亲呀，笑呀，说呀。就连没结过婚成天阴着个脸的老姑娘毛应星也抱孩子。当她抱着孩子的时候，脸上也露出兴奋的笑容。

这是李怀珠的孩子，也是我们大家的孩子。我看见，不光是由田抱着孩子流过眼泪，那秀云流过眼泪，张启贤流过眼泪。我也流过眼泪。我抱着她就像是抱着我自己留在母亲那儿的儿子一样，心情非常感动。他像一道阳光射进我们冰冷的房子，照亮了我们的心，温暖了我们孤寂痛苦的灵魂。

这孩子很瘦，那是因为他先天不足，缺少营养。在磨坊磨面的右派们就偷面粉，偷粮食，给李怀珠做饭吃，叫她每天吃得饱饱的，用她的奶水来喂饱孩子。教导员宋有义经常到女右派的小院来，有时候进了房子掀一掀煤油炉子上的锅盖看看里边煮着什么。他看出坐了一个月子的李怀珠比以前胖了，想要查出她是怎么搞到食物的，但谁也不叫他查出来；我们都是半夜里给李怀珠做饭吃。过元旦和过春节的时候，我们一帮女右派去伙房帮了几天厨；我们几次偷羊肉回来，夜里给李怀珠做羊肉面片吃。

毛应星拆了自己的一件毛衣，给孩子织了一件连体的毛衣，作为满月的礼物。由田把自己儿子的一只口琴送给孩子。

满月那天，大家商讨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组长那秀云说，就叫夹农吧。长大了叫他记住他是在夹边沟农场出生的，记住妈妈和阿姨们这一段有意义的生活吧。

九个月过去了。夹农还没出生的时候，李怀珠强烈地担心过孩子生在夹边沟能够生存下去吗？能长大吗？能不能长大我们不

能预测,因为我们是劳教犯,不知未来的年月我们还将经历什么样的磨难,但是,过去了的九个月,他健康地成长着,没有挨饿。九个月,他的原先皱巴的脸胖了起来,白白的脸蛋泛着红润和光泽。他笑的时候脸上还出现两个好看的酒窝。他的身体也充分地伸展开了,他已经长成了一个胖乎乎手脚有力的孩子。他还不能走路,但是当你把手指头伸过去的时候,他能够抓得很紧又很有力量,腾的一下站起来。他扶着你的手双腿有力地一弹一弹地跳动,嘴里喊着妈,妈……他还不会说别的话,只会叫妈。他把所有的女右派都叫妈!

但是,他的好日子很快就结束了:1959年8月,农场的夏收结束之后,场领导突然把我们十九个女右派除了种菜的毛应星等几个人之外全都调到猪圈去干喂猪的工作了,而把原先喂猪的几个男右派换到了磨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叫我们去喂猪,是嫌那几个磨面的人干得不好,还是要照顾在菜地和农业队劳动的右派们去干点轻松活。也可能是为了加强管理吧。我们十九个人虽然独立地住在一个小院里,场里规定不许男右派到我们的院子来,就是夫妻也不允许随便走动,但是毕竟我们的院子处在众多男右派的汪洋大海里,难免要出点事:我和那秀英、豆维柯曾经有一段时间为李怀珠做过安排,每过几天就叫毕可成到我们的房子里来和她相聚一次。他来的时候我们三个人跑到别的房子去挤着睡,天快亮时他再回到农业队去。1959年春节的时候,农场抽了几个女右派和男右派在一起排练节目,欢庆春节。豆维柯和农业队一位年轻的男右派演出了黄梅戏《天仙配》,结果两人产生了感情。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就像给李怀珠和毕可成提供相聚的条件一样,也给豆维柯和那位男右派提供相聚条件。我们是这样想的:夹边沟的生活太艰苦太压抑了,年轻人有胆量有勇气做个露水夫妻使生活变得快乐一些轻松一些有什么不好呢!是他们两个人太不注意了,导致豆维柯怀孕了,事情暴露了。结果豆维柯被送去酒泉

劳改局医院堕胎,那位男右派被弄到严管队劳动。

豆维柯堕胎不久,我们就被调去养猪了。

一调到养猪场,我们就开始挨饿了,因为再也无法偷磨坊的粮食了。

1959年春天开始,劳教分子们每月的口粮就下降到二十六斤了。二十六斤粮食,坐机关的人和家庭妇女们还可以吃个七八成饱,对于一天劳动十几个小时的人来说,就不足以提供身体所需的营养了。五九年春天就开始饿死人。

好在喂猪的活并不重:十四名右派喂不到二百头猪,除了李怀珠和由田每人管三个仔猪猪圈外,其他的人每人管一个猪圈。因此我们虽然饥肠辘辘,但并没有到太累和太饿的程度。再说那时候大跃进的高潮还没过去,猪场为了放卫星养着几只“千斤猪”,“千斤猪”的饲料比我们从伙房打来的饭的质量还好:有时候把整锅煮熟了的土豆给它吃,有时候喂粉碎了的黄豆。而伙房给我们吃的什么呀:糜子面的菜糊糊,玉米面的疙瘩汤,青稞面的窝头,还吃不饱。实在饿得难受,我们就从渣猪食的锅里偷几个土豆吃。

祸事接踵而至。

夹边沟农场的养猪场在场部办公室南边二三百公尺处的一片草滩上,是成马蹄形排列的三栋房子围成的小院。总共八间房:东房四间,这是正房,住人;北房和南房各两间,北房是仓库放着饲料什么的,南房安装了两口大锅渣猪食。西边没房子,应该是围墙的地方挖了一口水井。这口水井挖得很大,敞口的,有一圈台阶供人走下去打水。水井西边是一排一排的猪圈。我们的工作是一天三次渣猪食喂猪,打扫猪圈,抬土填圈。按说一人一个猪圈喂十头八头猪是累不着人的,但教导员宋有义看我们轻松就不舒服,命令我们每天喂一次猪就要刷洗一次猪食槽,洗完后要用抹布擦干净。就是这样,我们每天的工作量仍然比在农业队和蔬菜队小得多,在两顿喂猪的间隙里可以回宿舍休息一个多小时,缝补破衣裳,或者

聚在一起聊天，逗夹农玩。

那是十一月下旬一天的下午三四点钟，喂完了中午那顿猪食，擦洗完了食槽，大家凑到两间房子里取暖和说闲话。那天刮大风，天特别冷，我们擦洗完猪食槽手都冻僵了，衣裳也被风刮透了，一千完活就都往那两间房跑。那两间房里有原先喂猪的人砌下的土炉子，有人从囤猪食的风箱里抱了些柴去把炉子点着了，房子里有点热气。

我们进去不久，李怀珠也抱着夹农跑来了。她进了门还说了句话：咱那房子跟冰窖一样，冷得坐不住。

在磨坊干活的时候，管教干部允许李怀珠两小时回宿舍一趟，给夹农喂奶。到了猪圈就更方便了，听见夹农哭，随时就可以进屋照看一下。每天上班的时候怕夹农醒了乱爬，就在后窗上拴根绳子绑在夹农的腰上，以防掉下炕去。

可能是房子里暖和的原因，李怀珠进来后时间不长，夹农就在她怀里睡着了。这时候我说她：你把夹农放回去吧。你看，睡着了。她看了看怀里的孩子说，咱房子冷，我就这样抱着吧。如果那天那间房子里人少，可能也就不出事了，李怀珠把孩子放炕上就行了，可是那天那间房子里挤了八九个人，炕上坐着人，没处放，她一直抱着孩子站着。于是，过一会儿我又说她：你放回去吧，怕冷你给他盖厚点；你这么抱着不累吗？

李怀珠就去放孩子了。

她出去不一会儿就回来了，但还是抱着孩子。我说她：咳，你这个人，叫你把孩子放下去，怎么又抱回来了？

李怀珠说我还是抱着吧。

这时那秀云说话了：你怎么不放下呢，你觉得抱着舒服呀。

李怀珠说，那你替我放去吧。

那秀云：为什么叫我放去？你放去怎么啦？

李怀珠：你放去嘛，你放去嘛，你替我去放一趟嘛。

李怀珠说话的口气有点可笑的撒娇的样子,那秀云嗔怪地瞪了她一眼,说,好,我放去,我放去。好我的姑奶奶,越伺候越蹬鼻子上脸呀,一步路都不想走了。

那秀云从李怀珠的怀里接过夹农就出去了,可是不到两三分钟也抱着孩子回来了。她一进门就说,好你个李怀珠,你骗我,你这么坏呀!

她说话的口气有点怪,脸色也呈现出异常。

我觉得奇怪,问,出什么事了?

那秀云说,哎呀,丑死啦,丑死啦!

我说,什么事嘛,你说嘛。

那秀云想说又没说,瞟一眼李怀珠才说:你问她,你问她

我看见李怀珠的脸上有一种诡秘的笑容,就问:怀珠,到底有什么事,你说不说?搞得神秘兮兮的干什么?

这时候其他人也都七嘴八舌地问出什么事了。李怀珠被逼不过,说,我也不知道出什么事了,你自己看去,咱房子闹鬼啦!

看她还是不愿说,我就扭身出了门。我想自己去看看吧,我就不信闹什么鬼。我噔噔噔几步就走到门口了,推了一下门,可是门没有推开,像是有人用铁锹把顶上了,顶得还很紧。事情还真有点蹊跷,我就不推了。我们房子的门板上有一个节子掉了以后露出的椭圆形的孔,我从孔上往里看了一眼。

一看就把我惊了一跳,我呀地叫了一声跑了回来。还真是闹鬼了:豆维柯在炕上躺着,全身赤裸,宋有义刚刚从她身上下来,正往她身上拉被子。宋有义也是赤身裸体的。

我进了门就大骂起来:好个不要脸的豆维柯,大白天……

全屋的人都惊了,问出什么事了。我说,宋有义和豆维柯搞破鞋啦,真不要脸……

人们都静了一下,继而嗡的一声像蛤蟆吵坑一样议论起来:

我早说过豆维柯可不是好东西……

宋有义也不是好东西……

这时站在窗前的张香淑喊起来：你们看呀，宋有义出来了！

有的人往窗前挤过去，更多的人拉开门挤着往外看：宋有义正急急地绕过水井，走到小院外边去。有两个人大声地骂起来：流氓！不要脸！宋有义走到第一个猪圈旁边，他似乎听见骂他的声音了，扭脸往这边看了一眼。

他的脸色苍白。

宋有义和豆维柯关系异常，我们早就有所觉察。女右派们搬到猪圈以后，工作地点集中了，离其他人远了，来的少了，就宋有义天天到养猪场来。他一来就扎到我们的宿舍来，有一句没一句地跟豆维柯说话。豆维柯喂猪食，他就围着锅转；豆维柯喂猪，他就围着豆维柯管的猪圈转。有时候上着班他就把豆维柯叫走了，说是叫豆维柯帮他写什么材料。对于这些，我们都没当回事，因为我们知道，豆维柯从初到夹边沟农场就靠拢组织表现积极：写思想汇报，巴结管教干部，在管教干部跟前殷勤极了。这我们是理解的：右派嘛，不就是想早点摘帽吗！可是不久就有这样的话传出来：宋有义叫她都不是去场部的办公室，而是跑到没有人烟的沙窝子里去了。一男一女跑到沙窝子里去干什么，事情不是明摆着的吗！但是谁也不敢公开地议论他们的事。宋有义是教导员，权利大，想批斗谁就批斗谁，谁都害怕。

但是这次不同了，所有的女右派都看见了宋有义和豆维柯私通，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家公开地议论他们，把这事在全农场传播开来……

结果是风波骤起，大祸临头。

四五天后的一天傍晚，我们刚吃过饭，宋有义打发那个管我们

的农业队的带工队长^①来通知那秀云,叫她集合全体女右派到场部去开会。我们排着队走到场部时那个农业队的全体劳教分子已经在第一栋办公室门前的空地上坐好了。我们全组人刚坐下,宋有义就从办公室走出来训起话来。他说,有些右派分子思想反动、反革命立场坚定,从来到农场就不好好接受无产阶级的劳动改造,还到处造谣,惹是生非,搬弄是非,想把劳教农场搞乱!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对这样的人,领导是不能姑息迁就的,必须严厉惩治!说到这里,他突然喊道:李怀珠,张香淑,你们两个人站起来!李怀珠哆嗦了一下站了起来,张香淑的脸刷地变得惨白,也站了起来。宋有义问她们:你们知道犯了什么罪吗?两个人都回答:我们是资产阶级右派。宋有义说,我问的是现在,也就是这两天,你们又犯了什么罪!李怀珠知道,这是要她承认她造谣惑众了,但她不知怎么说好,沉默着没言语;倒是张香淑说话了:宋队长,我不知我犯什么罪了,我老老实实劳动改造……宋有义大吼一声:不老实,你们两个不老实。给我铐起来!

说着话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两副手铐哗的一声扔在地上。农业队上来几个积极分子就把李怀珠和张香淑铐起来了。铐的是背铐。背铐你知道吗?就是一只手在前,从肩膀上拉过来往下拉,另一只手从背后往上拉,用一副手铐在后背上把两只手铐起来。人们把这种铐人的方法叫苏秦背剑,是最厉害最残酷的一种铐人的方法。

两个二十多岁的女人——那一年李怀珠二十六岁,张香淑二十三岁——叫人用背铐铐了起来,铐的时候我就听见她们的胳膊关节和筋咯巴咯巴的响声,她们的喉咙发出凄惨的断了气一般的惨叫声。那几个男人一松手,两人就身不由己地趴在地上了。这

^① 夹边沟农场的劳教分子分为农业大队和基建大队,大队下边设若干分队,分队长由劳教分子担任;此分队长的任务是带领本队劳教分子劳动,故,人称带工队长,也叫拐棍。

时宋有义又问：你们还造谣惑众吗？两个人被铐得连气都喘不上来了，疼得嗷嗷地哭，哪里还说得出话来。宋有义又喊，给我关起来！那几个男人就把她们拖到办公室旁的一间空房里去了。拖她们的时候，她们根本就不能走路，身体蜷成了小小的一团，头不由自主地往后仰着，像是后背上有一根筋抽着她们的头。她们的脸色惨白惨白，泪水从她们脸上流过，豆粒大的汗珠在脖子上滚动。她们的腿可怜地蜷着，悬在空中。

宋有义又训了一阵话，然后宣布散会。

散会后我和那秀云没有立即回宿舍去。我们俩惊呆了！我们在想，为什么要铐起李怀珠和张香淑来呢，要说散布谣言还是我和那秀云散布的多，该把我们两个人铐起来才对。李怀珠和张香淑是两个内向性格平时就不爱说话的人！

站了一会儿，我们就想明白了：宋有义是敲山震虎，杀鸡给猴看，想封住右派们的嘴，但他知道我和那秀云是从公安厅来的右派，顾虑我们有什么社会关系，不敢随意处置我们，就只好拿两个胆小怕事的人开刀！

后来我们俩转身要走了，旁边站着的农业队带工队长走到我们跟前小声说，你们两个人可是要注意呀，明天就轮到你们两个人了。

张香淑和李怀珠第二天早晨才被宋有义放出来。她们像是瘫了一样，躺在地上动不了，是农业队的几个右派把她们抬回猪圈来的，然后就在炕上躺着。她们自己说的，她们的胳膊一铐起来，扯得全身都疼，跪在地上动弹不成。后来就趴在地上了，一直趴到天亮。张香淑那两天正好来月经，铐起来后月经流得特别多，把裤子浸透了，把趴的地方浸湿了。

张香淑是南方人，兰州生物制品厂的技术员。

头天听了农业队带工队长的话，我和那秀云就很紧张，张香淑一说，我们俩的魂都吓掉了，心想千万别再开大会呀，别真把我和

那秀云铐起来。谁知事情很巧,第二天下午我们正在猪圈刷洗猪食槽,看见一辆吉普车开进夹边沟农场来了。过了半个多小时,张掖地区公安处处长黄钲走到猪圈来了。他看见我和那秀云,问,你们的生活情况还好吗?我们俩几乎齐声大哭起来:好什么呀,宋有义要整我们。黄钲很惊讶,问我们出什么事了。我们哭着讲了这几天发生的事。黄钲安慰了我们几句,说不会的,他那是吓唬你们。我们说不是吓唬,是真的,是他的亲信带工队长说的。黄钲青着脸回场部去了。他找到农场的党委书记很严肃地说,真是胡来,对妇女怎么能动铐子?还是背铐!我告诉你们,那秀云和戚淑英不许你们开批斗会。过几天我就把她们调走。真不像话,自己的屁股不干净,还打人家的屁股,真的是胡作非为无法无天了!听人说,农场党委书记原先是陇东一个地区的法院院长。有一天他正和别人下象棋,手下的干部拿来一份文件叫他划圈圈,说省高院已经批准了前些天报上去的关于几个犯人的审判决定,那个人枪毙,那个人劳改。他拿过文件划了圈之后接着下棋,结果一个判了劳改的人被处决了,判了处决的人被送去劳改了。为此免了他的院长职务,后来又调到夹边沟农场当书记来了。

过了几天,我、那秀云和其他六七个人就被夹边沟农场的马车送到酒泉城郊农场去了。城郊农场是个劳改农场,一个右派医生给我们讲了几天医学知识。学习期间我们听说酒泉劳改分局医院要我们去当卫生员,可是学习结束之后,劳改医院把张湘淑、杜可等四五个人要走了,嫌毛应星、李怀珠、那秀云和我岁数大,把我们四个人送到了高台县境内的高台农场。高台农场,是个劳改农场,还有一部分刑满就业人员。

在高台农场,毛应星和李怀珠种菜,我和那秀云当统计员,以刑满就业者对待我们。每月发三十元钱的工资。

真是因祸得福呀!我们离开夹边沟农场不久,夹边沟农场的

口粮就减少到二十斤,每天都有人饿死。更为甚者是到了六零年九月,劳教分子们调往高台县境内离着高台农场仅十多公里的明水乡组建新农场,口粮减到了十四斤,还没有房子住。劳教分子饥寒交迫,死亡过半。在高台农场的一年多,李怀珠也是饿得饥肠辘辘形销骨立;夹农饿得剩下了一把骨头,就像他刚出生时一样弱。原因是1960年的冬天高台农场的劳改犯和就业人员也挨饿了,而李怀珠还要从自己和孩子原本就不够吃的口粮里节约出一部分粮食支援在明水农场的丈夫毕可成。

她每月都给丈夫送一次粮食。

我永远也忘不了1960年12月13日那一天。那天早晨七点半钟,我吃过了早饭正要去办公室上班,李怀珠抱着夹农来到我的宿舍说要去看看毕可成,送几斤粮食去,叫我给她看着夹农。我说你放下吧,放下你走吧。我在上班时候每过一两个小时就跑回来看看夹农。夹农这时刚刚两岁零一个月,但是那孩子很听话,已经习惯了母亲上班后自己玩的日子。你只要给他一张旧报纸,他就翻过来翻过去玩,一会儿折起来一会儿又展平。到最后他再把报纸撕掉。他撕报纸的时候要是没人管,便会把一张报纸撕成一堆指甲大小的碎片,就像是碎纸机粉碎的一样,很专心地撕呀撕呀,不哭也不闹。但是这天不知什么原因,十点多钟,我第二次回房子看他时候,他竟哇哇哭个不止,喊着要找妈妈。没办法,我只好不上班了,就待在宿舍里哄他玩。中午吃过了饭他睡着了,我又去上班。后来一个就业人员跑来喊我,说听见我房子里夹农哭,她进去哄怎么也哄不住。我又跑回去看他,告诉他妈妈去看爸爸了,一会儿就回来,但这会儿我却怎么也哄不乖他。他总是哭,抱着也不行,哭呀哭呀。时间已经是黄昏了,我觉得该是李怀珠回来的时间了,便抱着夹农走到场部外边的路上去迎她。我抱着夹农在通往明水农场的路上站了一个多小时,才看见李怀珠从南华镇方向走过来了。

往常,李怀珠一看见夹农马上就跑过来抱住,亲着叫着:我的儿子想死妈妈了,想死妈妈了。可是这天她看见我抱着夹农站着,仍然慢慢腾腾地走路,像是没听见孩子的哭声。到了跟前,孩子张开双手喊她:妈妈抱,妈妈抱。她竟一声也不应,冷漠地接过孩子往回走。她跟我也不说话。我看见她的脸色不好看,认为她走累了,就什么也没说,跟她并排往回走。走了一截我才问,老毕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她站住了,扭过脸来看我,眼睛有点发红,嘴咧了一下——凄然一笑:

他死掉了。

我吃了一惊,心猛地一沉,眼睛就湿了。但是我没再说话,怕一说话她哭起来。我默默地跟在她身后回到宿舍。走着路我在想,她是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悲痛,一进房子定会号啕大哭起来。可是回到宿舍她一声也没哭,也没流泪。她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很平静地说,和以前一样,今早我去了,直接找到他住的窑洞。我原打算把粮食放下坐一会儿就往回走,可是到了窑洞,人们说他死了,已经死了一个星期了。我问埋在哪儿了,都说不知道,不是他们埋的。后来找到一个掩埋组的人,领我去找坟墓。他把我领到明水北面的沙窝子里,找到了老毕。风把沙子刮走了,人露出来了。那人帮我挖了个深点的坑,又埋上了,做了个记号,我就回来了。

她说她把带去的粮食给了那个掩埋组的人。

她一声也没哭,只是眼圈红红的,干巴巴的嗓门讲完了她去看丈夫的过程。

这个月底我们就回家了。中央工作组和省委的工作组来到了夹边沟农场,抢救人命,叫夹边沟的右派和其他劳教分子都回家去。工作组说不管这些人有多么严重的错误,先把命保住,错误以后再说。

以后的事情我就简单说一下吧。一听说可以回家去,我也没等单位来接,就乘火车去了四工农场把章宗昌接了出来。我半个

月前就接到他的来信说他病了。我们从柳园火车站上火车回到兰州。到兰州我把他送到大沙坪的省劳改局医院以后我就去省公安厅了。张掖市公安局早就不存在了,我只好回公安厅去。公安厅不要我,说我在送夹边沟的时候已经开除公职了。领导叫我们自己找工作去,自谋生计去。但我赖在公安厅不走:我说我本来就不是右派,你们把我整错了,送到夹边沟劳教差点死掉。我没死掉,回来了,现在又不要我,叫我自谋生计去。你们还讲理吗?反正我赖着不走,他们也没办法,后来他们就把我送到省劳改局的医院去当勤杂工,每月发三十元工资,和刑满就业人员一样。1978年平反后我就调到客车厂工作了,在宣传科当了个副科长。夹边沟的那十八个姐妹,我们八九个人调出之后,剩下的人就不喂猪了,又都调回磨坊磨面去了。后来磨面的石磨改成机械化了。有一天何世珍的一根辫子夹到机器里去了,半个头上的头发拔掉了,头皮拔掉了好几块。后来我在兰州见过她,头皮没拔掉的地方又长出头发来了,拔掉头皮的的地方一块一块秃着。何世珍是我们十几个人当中最年轻的一个,那时才二十二岁。她长得也最漂亮。她原是小学教师,释放回兰州后一直没工作。后来和母亲远走他乡——去了新疆——去谋生了。再也没看见过她。豆维柯回交通厅了,文革以后我见过她一次,还是那样洋气,五十多岁的人了,抹口红擦红粉,可是红粉掩不住眼睛上的皱纹。有个叫苗表的女右派原是省话剧团演员,回兰州后干什么我就知道了。我是不看话剧的,不知她还当演员没有。杜可是省建工局宣传部的干部,回兰州后在崔家崖建工局职工医院当干部,也可能是护士。李丽,兰州铁路局干部,很漂亮,她在夹边沟劳教时丈夫就死掉了,回来后是否再嫁人我不知道。我想是嫁人了,她很年轻呀,又很漂亮。敏惠萍是个很活泼的人,张掖人,在夹边沟劳教时演过戏剧节目《拾玉镯》。她后来到省建委当了处长。那秀云也当了处长,在公安厅,她运气好,六二年甄别的时候平反了,不是右派了。她和我同时参

加工作的,文革后算是老干部,升了处长。你说我为什么没升上去吗?就因为我在张掖市公安局得罪了那个局长,六一年甄别时他咬住我不放,我的右派帽子戴到了七八年。毛应星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打三反时枪毙了。她从夹边沟回到兰州后和一个同样是右派的人结婚了,那时都三十六岁了。组织部门认为他们两口子不宜当教师,把他们下放到静宁县的农牧站,男的在一个公社种胡麻,女的在另一个公社种小麦,一年见不上两次面。文革当中两口子都被揪出来了,因为“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被枪毙了。上刑场之前和张志新一样被割断了喉咙:——怕她在公审大会上胡来。由田回到兰州后完全神经了,在马路上捡树枝;人家问她捡树枝干什么,她说烧火煮饭吃。医学院就把她送到清水精神病医院去治疗。住了两年医院,出来后就病休了。她现在住在八里窑附近的老年公寓,她的一个孙子,就是宋亚杰的儿子伺候着。宋亚杰?你是问宋亚杰吗?早在1959年秋季,由田的丈夫从美国回来了,到夹边沟看望由田,把宋亚杰接到宁夏去了。国家把她丈夫安排到宁夏大学当教授,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打死了……廖兆玲,文革中一打三反,她看见许多夹边沟出来的右派又被揪出来批斗,有的判刑劳改,有的枪毙了,她吓坏了,从兰州又跑回酒泉去了。她在酒泉劳改医院当卫生员时认识了一位酒泉新生机械厂的就业人员,她跑到酒泉和这个人结了婚,在劳改厂就业了,逃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那秀云告诉我的,改革开放以后在劳改局见到过廖兆玲,她和丈夫来劳改局办理移居美国的手续。她那个劳改释放犯的丈夫有亲属在美国。对了,我刚才忘了:改革开放之初宋亚杰去美国上学,现在是加州大学的教授。宋亚杰也近六十岁啦。张香淑我再也没见过,也没听到过她的消息。赵经忠是南方人,军阀家庭出身。父亲是国民党军长。她原在地质局工作,反右斗争中她大义灭亲揭发父亲,但总归没能逃脱劫数去了夹边沟。她回到兰州后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张启贤很惨:她男人陷害她当了右派送到夹

边沟；出来后到了兰州，和客车厂的一个劳改就业人员结了婚。那个男人经常打她。我见过她，说她，你怎么和那么个人结婚。她说，我一个右派，没人要，我还能跟谁？李怀珠回到兰州后从兰州农校下放平凉农校，又嫁人了。还有个叫李默的，武威人，不知她到哪里了。其他几个人的名字我都记不起来了。四十年过去了，记忆力不行了。

对了，夹农如果没死掉，今年应该是整四十岁了，应该有家有孩子了。我已经老了，还能活几年？我最近想着去平凉看看李怀珠，看看夹农。李怀珠还活着，肯定能看到，夹农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他要是不和他妈在一起我就看不到呗。

饱食一顿

印象最深的事？你是要我讲在夹边沟经历过的事情当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吗？

对。就我所知，凡是从夹边沟走出来的人，都有许多难忘的事情。就你个人来说，你认为哪件事情叫你至今难忘，刻骨铭心……

这是1999年的初冬，我在兰州市七里河区建兰市场的一角——花卉市场——高吉义先生开设的花卉医院里。这个花卉市场不大，大约有四五十家花店围成个四合院。天气已经很冷了，夜间温度降到了零度之下。这是白天，花店的老板们为了招徕顾客，都把一盆一盆的鲜花摆在门外。许多盆花把四合院装扮得花团锦簇，香气扑人。

高先生的小铺外边一盆花也没有。他开设的是花卉医院，专门向那些养着几盆花但又缺乏养花经验的人讲授栽花知识，如何治疗和预防各类花卉疾病，同时出卖花药和花草肥料。他把对外的橱窗打开，在临窗处摆了一张桌子。桌上摆着许多装有药水的瓶瓶罐罐。他坐在一把常坐的椅子上，脊背倚着桌子。他叫我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只矮椅子上。看来这只小椅是专为客人准备的。小铺也就三四平米的面积，一角上还堆着一堆种花用的腐殖质很多的土壤。土壤是出卖的，顾客要栽一盆花，他就用塑料袋装好一袋，收三五角钱。是个斗室，坐不下第三个人。

他似乎是在用力思考或者回忆，久久不语。他扬着灰白色头发的头颅，他的年龄并不是很大，——才六十四岁——但他的胡子全白了。

我仰视着他,启发他:你想想,在夹边沟三年,你一定经历过很多难忘的事,其中肯定有一两件是你印象最深和难以忘怀的……

我这是第二次拜访高先生了。前两天,一位也是在夹边沟农场劳教过的老先生领着我来见他,我们相识了,且泛泛地谈了谈夹边沟。临别我曾嘱他,花点时间认真回忆一下夹边沟的生活,过两天我将正式采访他。

高先生思索片刻后说话了:难忘的事情是很多,还真有这么一件事叫我忘不掉……它在我的心里藏了几十年,我从没对人说起过,就是我的女人、我的子女也不知道,可是它又时时刻刻咬我的心,折磨我,有时把我从睡梦中惊醒……那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几十年了,但至今我也想不通,搞不明白,那件事我是做错了呢还是没做错……

第一次见高先生,他给我的印象是位性格开朗说话干脆且善于言谈的人,但今天他说话的口气却迟迟疑疑啰里啰嗦,有点欲说还休的样子。我挺了挺腰板,引颈瞩目,耐心地等待他说话。就我的经验来说,听这些老先生谈话是不能着急的,不能催,不能追问。你越是催促急于了解下文,他可能谈得越是简洁,或者干脆就此打住。这些夹边沟农场的幸存者真是怕树叶子掉下来打破了头呀!

那是1960年的春天吧,也就是三四月份的时间……高先生的脸上呈现出努力回忆的神情说。对了,是四月初的日子。一天,领导从全场抽了八九个身体好的人,到酒泉县去拉洋芋^①种子……里边有农业队和基建队的几个人,还有金振柱,——金振柱是基建大队的分队长,是个拐棍^②——我们八个人由他带队。还有一个

^① 土豆,又叫马铃薯。

^② 劳改和劳教农场利用劳改犯和劳教分子管理犯人和劳教分子,此“以工代干”者被称为拐棍。

姓魏的二劳改^①也是管我们的。还有一个理发员也被挑上了，那天早晨天还黑黑的，我们八个人到伙房每人喝了一碗面糊糊，然后就坐上卡车出发了……。

我打断高吉义：高先生，问你个问题，拉种子是农业队的事，怎么叫你去，你不是木工组的人吗？金振柱是基建大队的呀，他怎么领着农业队的人出去干活？

高吉义说，那时间劳教已经两年多了，右派们都已经累垮了，也饿垮了，有些人死了，活着的也都身体虚弱，农业队挑不出几个能装车卸车的人来；遇上这种外出装卸货物的活，就要从全场挑人。我因为到夹边沟不久就到了木工组当木匠，木匠的活轻松，身体虽说比以前虚弱了，但比别人强健得多，就挑上了。再说我是全场最年轻的右派，进夹边沟的时候才二十一岁，身体最好的时候。

金振柱比你大多了。

金振柱是比我大几岁，可他到夹边沟以后就当分队长，管人，不下大田，体能消耗少；再说，领导为嘛叫他管其他劳教分子，伙食上照顾他，每顿饭都多给他些吃的，他的身体也比较健壮。他长着五短身材，矮矮胖胖的，红润的面孔。你看见过他吗？

见过。我采访过他。和你说的一样。

卡车在路上跑了一个小时，到了酒泉，进了一个大院，从一间大房子里装洋芋……

我问，哪个大院？是在酒泉劳改分局的大院里吗？

不是，那不像个机关。除了看大门的，院子里再没有什么人。

为了印证我以前的采访，我又问，大院在什么地方？是在酒泉县城鼓楼的西北角上吗？那里曾经是酒泉劳改分局的服装厂，有大房子——做衣服的车间。

不知道。我只记得院子很空，没啥人，像是仓库。

^① 劳改犯刑满后在劳改农场或劳教农场就业者。

你们进城从哪条路走的？那时的酒泉县城就是个大十字，有东南西北四条街，大致的方位总是知道的。你说的大房子，没啥人，是不是在城郊农场？城郊农场的库房？

不是，就是在城里。在城里什么地方没看下。那是早晨天刚亮的时间，风刮得很冷，我们坐在车槽里根本没往外看。

我不再问了。高先生继续说，那洋芋我判断是从外地调来的种子，因为大房子里堆了半房子，连点麦草都没苦嘛。我们就从大堆上往麻袋里装，往外抬，装车。四个人抬一麻袋，提着麻袋的四个角，第五个人钻到麻袋下头再扛一下，我们才能把麻袋装上车去。

到十点多钟汽车装满了，车要走了，那个二劳改叫我们从装好的麻袋里秤出十六斤洋芋来，说是一人二斤，煮着吃。自从进了夹边沟，近两年了，我就没吃过一顿饱饭。刚到夹边沟的时候伙食最好，也才吃个半饱。看着一汽车洋芋吃不进肚子里，我实在不甘心，就跟姓魏的二劳改说，你~~把~~那多秤出几斤来，叫我们吃饱一顿不行吗？你的肚子不饿吗？二劳改在农场里的地位比我们高，人家是挣工资的，一月二十四元，在吃的问题上比我们办法多，但他们也是吃不了太饱，所以我才大着胆子那么说。可是那个二劳改说不行，不是不叫你们吃，是怕你们吃得太饱下午干不成活。结果我们就一人吃了二斤洋芋。肚子虽然没吃饱，但比起农场伙房的伙食来强多了。

我说，库房里不是堆了半房子洋芋吗，煮着吃不行吗？

高先生：不行，人家有保管员——就是那个看大门的，不叫我们动库房的土豆。装麻袋都是过秤的，人家要记数。

我们装了两天洋芋，一天两车，装了四车。我们只管装不管卸，晚上不回夹边沟，就住在那院子的一间空房里。第二天傍晚，最后一车洋芋装好了，行李都卷起来装上汽车了，二劳改说话了：今晚上叫你们吃一顿饱饭——卸下一麻袋来，煮上，吃。

那院子里有一盘不知什么人砌下的大灶，灶上有一口大锅，我们就把一麻袋洋芋煮上了。还是挑的装得最满的一麻袋洋芋，足有一百六十斤，煮了满满一锅。我们确是饿急了，不等洋芋煮熟半生半熟就吃开了。

洋芋烫得很，一时间吃不进肚里，我们就一边吃一边把洋芋掰开，放在地上晾着，一边晾一边吃。

长期挨下饿的人，可有一顿吃饱的机会了，吃的时候连嚼碎都来不及，人人都是嚼两下就吞下去。那真是狼吞虎咽呀，囫囵吞枣。吃呀吃呀，肚子吃饱了，吃胀了，但还是接着吃。大家都知道，这样饱吃一顿的机会是很难得的，可能就这么一次，今后再也不会有的。结果呢，我们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结果，我们九个人——包括汽车司机——把一锅洋芋吃完了。

吃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想吃得越多越好，不要命地吃，往回走的路上可是受罪了！坏事了！那时候的酒（泉）金（塔）公路不像现在的柏油马路，是土路上铺了点沙子，再加上保养不好，路面就像是搓板子。车一跑快了就嗒嗒嗒地哆嗦，遇到坑一颠老高。我们本来就吃得太胀坐不下也站不成，——装了一车洋芋往哪里站呀——汽车出了城遇上坑一颠就都吐开了，每颠一下都要吐出一口洋芋疙瘩。不光是吐，胃还胀得痛。越颠越痛。我们都怪司机把车开得太快了，就砸车棚，叫他开慢些。开慢了吐得少些，但胃还是疼。没办法，只得忍着：挺着肚子坐在麻袋上，身子仰着，两手在身后撑在麻袋上竭力减缓汽车颠簸带来的振动。

忍着，坚持着，真是痛不欲生呀。终于坚持到夹边沟农场的场部了。司机把车停在场部办公室前边叫我们下车，——从这儿回农业队或基建大队各自都方便——他再把车开到粮食仓库去卸洋

芋,那边有专门卸车的人。可是我们8个人只下去了两个人,金振柱和那个姓魏的二劳改。他们两个人比我们吃得少,痛苦还轻一些;再说他们是坐在驾驶室来的,下车也容易。其他的人包括我,车一停下不颠了,就势躺在麻袋上就动弹不了啦,下不去车了。我们痛苦得死去活来,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瘫痪了一样,有的还呻唤不止。这事叫基建大队的严队长从办公室出来看见了,走过来把那个二劳改骂了个狗血淋头:狗日的叫你领着人装洋芋去,你就叫他们往死里吃吗?你不会叫他们少吃一点吗?你就不怕他们吃得胀死吗?还真是被他言中了,农业队一个姓吴的天水市的右派在汽车上胃就被撑破了,被人扶到宿舍后于半夜时分就断气了。

严队长骂了一通,叫了八九个人来,把我们抬下汽车,扶回宿舍去。

扶进木工组的宿舍放在铺上,我的胃还是疼,而且疼得更厉害了,简直就疼了个七佛出世六佛升天,哎哟哎哟地呻唤,连哭带喊:哎哟我活不成了!哎哟我活不成了!身体在炕上翻过来覆过去——疼得躺不住也坐不住嘛。

那天晚上也碰巧了:夹边沟农场在西边十五六里的地方有个分场叫新添墩作业站,那里有八九百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那边大干渠上的闸门叫水冲坏了,领导叫我们木工组连夜赶过去抢修。我的胃疼得受不了也去不成,还要留下个人照看我,我们的组长石思良就把一个名叫牛天德的岁数最大的右派留下了,叫他照看我,也看着点木工房不要叫人把木头偷了。四月份在兰州已经是麦苗出土的日子,但在河西走廊西端的夹边沟,夜间温度仍然降到零度以下;劳教分子的房子没有煤烧,有些人总是偷木工房的木头取暖。

牛天德是旧社会的大学生,解放前就是东北一家工厂的工程师。五十年代国家大力开发大西北,从上海、天津和东北来了许多人支援大西北的建设。他从东北来到兰州,在省建工局当工程师。

他那时已有五十多岁了,快六十岁了,身体很弱,一副儒雅书生的样子,干不动大田里的农业活。我们木工组的组长石思良是省建工局送到夹边沟来劳动教养的木匠,认识他,也同情他可怜他,就跟领导说牛天德会干木工活,把他要到木工组来了。木工组的活比在大田劳动轻松得多,石思良要他来实际上就是照顾和保护他不要累死。

在木工组我和牛天德的关系非常好。我是夹边沟农场第一个到木工组的右派,是木工组的元老:那是五八年夏季的时候,大批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和被戴上坏分子帽子但实际上是政治犯的人来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那时候劳动工具不够用,——原先的劳改犯留下来的铁锨和洋镐才有几百把——农场新买来的锨头和锨把在院子里堆着,可是没有木工安装起来。我年轻,胆子大,就跟管教干部自告奋勇地要求去安装铁锨把。我说我虽然没当过木工,但小时在农村安装过自己家的锨把锨把,那没有多难。管教干部说那你就试试看吧。于是,我把劳改犯们留下的几件工具斧子刨子锯子收拾了一下,日以继夜地安装铁锨把。铁锨洋镐装完,我就留在木工房当木匠了。后来从白银市的有色金属公司和省建工局送来了几个真正的木匠,——都是有右派言论的工人——手艺好得很,进了木工组。我跟他们学了些手艺,还就成了个好木匠。我们木工组还有两个木匠是兰州建筑公司的工程师,干了两年木匠活,也都成了好木匠。

我和牛天德关系好,是因为我看他学问大,对人又和善:我年轻,衣裳破了也不补;他看见了,就说,小高,把你的衣裳脱下来,我给你补一补。他是个很爱干净的人,看见我的衣裳实在脏得看不过眼去,就逼着我把衣裳脱下来他给我洗。我呢,给管教干部们修修门窗,做个板凳饭桌,总能带回一盒香烟或者人家给一个馍,拿回来我都要分给他一些。他没有手艺,一点额外的吃食都搞不到,饿得瘦成了一把骨头。在木工组他的活还最累,因为他没技术,只

能干拉大锯解板子的活。我和他解板的时候,除了往我这边拉大锯,还往他那边送,——就是往他那边推——叫他省点力气。

由于他是个和善本分的人,再加上我和他关系好,这天夜里他把我伺候得特别好。我一呕,他就把洗脸盆端过来,叫我吐。后来我的胃吐得空了一点,但肚子疼得实在不行,他就叫我靠着被子斜倚着,他给我揉肚子。一开始,他的手一挨我的肚子,肚子就疼得受不了,因为我的肠肚里都塞满了土豆疙瘩,把肚子要胀破了。于是他轻轻地揉,在我能够承受疼痛的情况下轻轻地揉。揉呀揉呀,终于我的肠胃通窍了;我开始拉,也吐,上吐下泻。他呢,一会儿接我吐的,一会儿接我泻的,然后把污秽物端出去倒掉,再回来接。

我吐呀拉呀整整折腾了一夜,他就一整夜忙来忙去伺候我,一刻也没闭眼。

大概是天亮的时候吧,我上吐下泻终于把肠胃都腾空了。胃部虽然还有点疼,但不那么难以忍受了。这时候我又乏又累,睡意上来了,再加上牛天德把一个土炉子里烧上了木柴,把房子烧得暖烘烘的,我便既舒服又昏沉沉地睡着了。

大概是又吐又泻把我搞得太累了,我这一觉睡得特别的深沉,一觉醒来,胃也不痛了,身上又有力气了,我喝了一碗凉水穿好衣服走出了宿舍,看看太阳的位置偏西得厉害,估计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了。我们木工组的人住在农业队大院后边的杂工大院里,挨着我们的住房就是木工房。杂工大院的人们都出工去了,大院里空旷无人。

我从木工房前走过,想到磨坊去。我在农场里最年轻,闲不住,平常就爱到处乱跑。这时候我觉得肚子又饿了,胃空空的,就想到磨坊去,找些吃的什么的。可是我走了几步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情况:木工房门口原先是扔着一个坏耙子来的。耙子你知道吗,一个像短梯子一样的长方形木框子,下面钉了许多大铁钉,是用来压碎土块平整土地的农具。这耙子是农业大队拿来叫我们修

的,因为太破没有修理的价值了,扔在门口很多天了。这天我却发现有人把它搬到木工房的侧面去了,立在墙上。我判断有人拿它当梯子使了,上房了,我便也踩着耙子的横档爬了上去,想看看是谁上了木工房,他想干什么。

我的半截身体超过房顶了,我站在“梯子”上看见有个人在离我几公尺远处趴着,他的屁股和两条长拖拖的腿朝着我,我看不见他的脸。虽然看不见脸,但我认出他就是牛天德。我对他太熟悉了。我觉得奇怪:牛天德可不是个登高爬低的人,他的岁数也大了,身体也虚弱,胆子也小,平时干活很小心,惟恐碰着哪儿磕着哪儿,可今天他竟爬到房顶上来了。他在干什么呢?看他平平趴在房顶上的样子,他是在下一件不愿叫人看见的事情。

我觉得奇怪,便也没有出声,静悄悄地爬上房顶,蹑手蹑足慢慢地悄无声息地接近了他。好奇心驱使着我,我想弄清楚他究竟在干什么?

我站到他的身后了,从他肩头上看过去。他的面前铺着一块方形的蓝色包袱皮,布上均匀地摊晒着一层粘稠的东西。粘稠的东西已经凝固了,凸起着许多白色的和略带黄色的洋芋疙瘩;有些粘稠物我简直没法形容它的颜色,是褐色的、黄色的和略呈绿色的混合色……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天啊,他在自己两年来包裹着几件衣裳当枕头用的蓝地白花的包袱布上晾晒着我昨夜吐出来和排泄出来的污秽物,而他正从那些污秽物里拣着小小的像指头蛋蛋大的洋芋疙瘩往嘴里塞。塞上一两个洋芋蛋蛋之后,他从粘稠物的边缘掰一块已经凝固的粘稠物放进嘴里,如同掰了千层饼的一角……

我的心真揪紧了!一刹那间,像是电流击中了我,我的脑子嗡地响了一声。我木雕泥塑般站着,大脑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自己僵住了多久,几秒钟?十几秒钟?然后就几步上前朝着包袱皮踢了一脚。我原想一脚把那些东西踢下房子的,可是我的脚只是把

包袱布连同那层粘稠物踢得卷了起来。我又连踢两脚，才把那些东西踢飞，踢到房下去了。

可能牛天德一点也没想到会有人爬上房来，没想到有飞来横祸的一只脚踢飞他的吃食，所以我踢第一脚的时候他吓得闪了一下头，嗓子眼里发出了轻轻的哦声。可是当我连踢二三脚把他的吃食踢飞之后，他的嗓子里就发出了一声撕裂心肺的尖厉的啸叫声：啊——

随着这声尖叫，他以从来没有过的矫健动作一跃而起向我扑来。

他的凄厉的叫声，那一声惨叫，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使我的心灵震颤了一下。继而他又向我扑来，我以为他是要打我，要把我推下房去。我惊了一下，我没想到那么老实、善良的老人会像头狮子一样发怒，扑人。我吓得往后退，可是退了两步没处退了，再退就要掉下去了，我只好站住，举起双拳摆出一副反击的样子。从他扑来的气势，从他愤怒的表情看，他一定要打我的，但他冲到我的跟前之后却用双手抓住了我的两只手腕，停顿了一下，剧烈地摇晃着我的两只胳膊说：

小高呀，我把你当成亲兄弟，我以为你是个好人，没想到你竟这么坏！

他没有打我，没有推我，他根本就不是能打人的人，没有险恶之心的人，他只是使劲儿摇动我的双手，用语言发泄他的愤怒：

啊呀，你太坏了，小高啊，你太可恶了……

我说，老牛，那东西能吃吗？

他严厉地大声说，怎么不能吃，那东西怎么就不能吃！

我说，不能吃，那东西就是不能吃！

那一阵，我的心翻腾得很厉害，我想说那东西很脏，不能吃，只有猪狗才吃那样的东西，你是人，你不能吃它。但我又清楚，说这样的话如同骂他是猪狗，这会伤害他的心的。可我又想不出更恰

当的语言来说服他不要生气,也想不出什么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于是我就只是反复地说那东西不能吃。

他说,能吃!

我说,不能吃,就是不能吃!

我们争执了几句,我突然心里一阵悲哀:一个文质彬彬的上了年纪令人尊敬的老工程师,竟然吃起别人的呕吐物和排泄物,人怎么能这样作践自己呀!同时,我也感到委屈:我是为了维护他的尊严,可他竟然认为我是个坏人,夺去了他的口中食……我的眼睛里涌出泪水来了,我哽咽着说,老牛呀,咱们不要吵了。你是大学生,是知识分子,你懂,你心里非常清楚,那东西能吃不能吃……

听我这么说,他怔住了,慢慢松开了双手,但他又猛地将我抱在怀里,哇哇地哭起来:小高呀,小高呀,我的小高呀,哇哇哇……

他的眼睛里滚滚而下的泪水流到我的脸上。我不由自主地也哇哇大哭起来:老牛,老牛,你不要哭……啊啊啊……

我当时劝他不要哭,但我却抱紧了他哭个不止。结果是我们两人站在房顶上,互相搂抱得紧紧的大哭了一场。

这件事情过去近四十年了,再差四五个月就整整四十年了,可是现在说起来却是历历在目,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老牛那声凄惨的喊叫依然在我的耳畔回响,我永远也忘不了。可是,这件事深深地在我的心里藏着,我对谁也没讲过;就是那天傍晚木工组的那五个人从新添墩回来,我也没对他们说。当时我想不通,老牛说我可恶,是坏人,难道我真是坏人吗?现在时间过去了已近四十年,我也还是没想通,没搞明白,那件事我做错了吗?张记者,你现在说一下,那件事我做错了还是做对了?

高吉义先生讲述完了他亲身经历过的故事,把他白发苍苍的脸对着我问。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因为从他的故事里我也得不出结论:这件事他做得正确与否。恰好这时候有个老太太来买杀灭红蜘蛛的药水,他从一个深褐色的瓶子里倒出二毫升药液在

一个洗净并用棉花擦干的小瓶里递给老太太。老太太问价格,他说一元。老太太说八毛钱行吗?他说行。老太太给他八毛钱后拿着药水走了。

在他讲述夹边沟故事的时候,几次有人来买花药,跟他讲价钱:五毛钱行吗?四毛钱卖吗?他都说行,不讨价还价。

老太太走后他又问我:张记者,你跟我说说,那件事我做错了还是做对了。

我还是无法解答。我反问,那个老牛还在世吗?

他回答没有了,在明水农场就作古了。

出了那件事之后,你们的友谊结束了吗?

没有。我们的关系更紧密更亲近了。作为木匠,我不是个合格的木匠,在当时来说,但是我是夹边沟农场木工组的元老,人熟,所以我总是能搞到点吃的:给蔬菜队修农具,我从菜地里拔些胡萝卜来,吃时分给他一些。到磨坊干活我就偷些面来打糊糊,也分给他一点。我在夹边沟有一件特殊的工作:夹边沟农场近两千右派吃饭,有两个大灶,基建队一个大灶,农业队一个大灶。灶房蒸馍馍的笼屉总坏,——里边的木头条折了或者跷了——总是叫我去修理。每次去修屉,我都要从屉上刮下一大捧馍渣子回来,或者正大光明地拿几块发糕,炊事员们都睁一眼闭一眼不管我。不管是刮下来的馍渣渣还是偷回来的发糕,我都要给牛天德分一点。

可是到了夏收季节,他被调到农业队去了。再说,夏收之后,我们的口粮减少到了二十四斤,粮食空前紧张,我也很难搞到吃的东西了。搞到了也不给他送去了,因为我自己也饿得够呛了。于是,好长时间我再也没见到他。

大概是十月下旬的时候吧,那已经是迁移到明水农场以后了,我又见了一次牛天德。我们从夹边沟迁往明水的时候,木工组已经撤销了,木工组就留下了我一个人,其他的人都编到农业队去了。在明水农场的山水沟里,我一个人住在一孔两米深一米二三

十公分宽跪下后头能挨着窑顶的窑洞里。这是领导的安排,说可能还有什么零碎木匠活要干,叫我从夹边沟带了斧刨锯镑几件简单的木匠工具,就放在我的窑洞里。到明水后右派们就再也干不动活了,因为口粮减少到十五斤了,躺着不动也不能够维持生命了。有些人跑到草滩上去捋草籽充饥。我没去,我认为草籽没什么营养,补充不了捋草籽消耗的热量,得不偿失。我从草滩上拾些牛粪,在窑洞里点上一小堆火取暖,窑洞口挂着个破毯子挡风。我一天到晚在窑洞里躺着,挨着日子。那时候我也浮肿了,把单的棉的衣裳都穿在身上用来保暖,人臃肿得像个胖子。

是十月下旬的一天,我躺在被窝里,听见悉悉索索的声音响,扭头看时洞口的挡风毯子掀起了一个角。我吓了一跳,以为是狼来了。那些天人死得多,山水沟附近狼也很多。可能是狼也会传递消息,明水农场有死人吃,远远近近的狼都集中到明水农场来了。天还不黑,狼群就出动了,围着山水沟转来转去的。它们专门吃死后刚刚埋葬但又埋得很草率的尸体,有时还向活人进攻,一只只都吃得肥肥的油光锃亮的。狼的胆子真是大,它们像是知道这山水沟里的人没力量和它们作斗争了,竟然敢顺着山水沟跑过来跑过去,见了人都不躲避。有一天夜里一只狼用嘴挑起我的窑洞的门帘把头探了进来。由于窑洞里烧着一小堆牛粪放着红光,我又拿起斧子挥舞,才把狼吓跑了。这天毯子又被掀起了一角,我惊了一下,心想这狼胆子也太大了,大白天就敢往住人的山水沟里跑,就敢进窑洞。我急忙坐起,抓起放在身旁的斧子。但这时一个人尖细的声音叫了一声:小高,小高,你在这里住吗?我听不出是谁的声音,把门帘拨开往外看,原来是牛天德。他挣扎着找到我住的窑洞来了,在门口坐下就再也爬不进来了,张着大嘴喘息。我赶紧走出去拉他,想把他拉进窑洞来暖和暖和。他不进来,他说看见我就行了。他说他不行了,活不了几天了,住在山水沟南头的一间临时病房里——就是一间大地窝子。他说他是专门来找我的,托

付我一件事。他气喘吁吁地从怀里掏出一把棕刷子和一个针线包,说,如果你能活着回到兰州去,一定要到我家去一趟,把我的情况讲给我女人听。你拿着这把刷子去,不管是我的女人还是我的姑娘,他们能认出这把刷子和针线包来,这是我从家里带来的。我离开家的时候,女人叫我带上这个刷子,叫我刷鞋用;我的姑娘把这个针线包放进书包里面,说是衣裳破了好补。她们见了刷子和针线包,就会相信你讲的都是实话。

我收下了牛天德的刷子和针线包,我再也没说什么安慰呀宽心呀的话,我答应如果我活着回去,就一定把刷子和针线包给他家送去。牛天德的身体情况,以我看再活不过三天了。我从夹边沟到明水,已经看到许多人死去了。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是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和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的。这天牛天德的样子、说话的声音和走路的姿势就是这样子的。

过了四五天,我就逃离了明水农场。我为啥要逃跑,就因为我还想活。我还年轻,我不想死,可我看不到生还的希望。我怕再过几天就会变得和牛天德一样了,想跑也跑不动了,我就趁还能跑得动逃跑了。那是十一月初的一天夜晚,我提了一根棍子防备狼的进攻。我的财产什么也没有带,只是用一个布兜装了几本医学书和老牛的刷子针线包。我是个医生,医学书对我来说是最珍贵的财产,当然要带上。我是从明水河车站上的火车,大约是晚上九点钟,天黑透了。第四天的傍晚我到了兰州,因为没有钱买车票,

也没有介绍信作凭证买火车票,我在路上被乘警撵下去送到铁路派出所的收容站。我从收容站逃跑出来扒车到了兰州。我的工作单位是兰州市中医门诊部,但我不敢回单位去:我估计关于我的通缉令已发到了兰州所有的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我一回去就会把我抓起来。我是等到夜里十点钟才到我姐姐家去的,姐姐是解放前从陕北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解放后在三爱堂的解放军总医院当医生。母亲在我划成右派之前离开了陕北佳县,把家门锁上,投奔姐姐和姐夫在一起生活。我的突然归来令母亲十分惊喜,一连声地问,你回来了,释放你了吗?再不去了吧?我告诉母亲是逃出来的。母亲说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只要不再去劳教就好。可是姐姐吓坏了,一连声地说,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你是逃跑出来的,公安局会到家里来搜你的。我明白,姐姐是担心我连累她和她的家庭,我就说,姐姐,你放心,我不会连累你们的。我就在这里住一夜,明天早晨我就走。姐姐问我去哪儿,难道一辈子在外边逃亡吗?我对姐姐说,我回陕北的老家去,只要公安局不到那里去抓我,我就在那里当农民。姐姐说只有这一条路了。看姐姐同意,我就又说,姐姐,我求你一件事,明早晨你到火车站给我买一张明天去西安的火车票。我没有介绍信买不上火车票,你是解放军,穿上军装去买车票,不要介绍信。

姐姐穿上军装说,我现在就去吧

姐姐走后母亲流着泪和我说话:你不要怪你姐姐,现在社会上抓得紧;你回到老家可怎么过日子呀,没吃的,也没烧的,冰锅冷灶的……

我告诉母亲:不要担心,夹边沟那么严酷的生活我都经历过来了,回到老家还能把我饿死吗?说着话我突然想起牛天德托付的事来,我就拿过自己的布兜,掏出那把棕刷子和针线包递给母亲。我说,妈,你这几天抽个时间到畅家巷去一趟,到一个名叫牛天德的人家里,把这个刷子和针线包交给他们家的人。我在一张纸上

写下牛天德家的门牌号,他的女人和姑娘的名字。我叫母亲把纸张收起来,不要叫姐姐知道。然后我又对母亲讲了牛天德的故事……牛天德的故事还没讲完,姐姐就回来了,她说买了早晨六点钟的火车票……于是,转天早晨天还没亮,我就登上了去西安的列车……

我在陕北佳县农村我家的窑洞里住完了一个冬季,春天到来的时候听到了夹边沟的右派回到原单位的消息。我想打听一下回单位的右派是怎么安置的,六一年的四月我又回了兰州一趟。这次我在姐姐家住了几天,母亲告诉我,她把棕刷子和针线包送到牛天德家去了。牛天德的女人和姑娘看见棕刷子和针线包就哭了,哭得很伤心,眼泪擦不下……

听完牛天德的故事我沉默良久,然后说,你能不能讲一讲你从明水农场逃跑的过程。就我知道的,其他逃跑的人都不敢从明水河车站上火车,因为离农场太近,有人巡逻,有人追捕……

高吉义先生说,要说我的逃跑过程,那可又是一件叫人想不通的事,惊心动魄……我们明天再谈吧,我一辈子都在逃跑,关于这个问题,没个三天两天是说不完的……

我告别高先生离开他的花卉医院。花卉市场的鲜花开得万紫千红。建兰市场人流如水,摩肩接踵。小贩的叫卖声、顾客的喧嚣声和廉价的音响轰然入耳令人头晕。

逃 亡

高先生,咱们接着昨天的话题谈吧。昨天您谈了一段您和牛天德之间的故事,是很动人的,后来您逃跑了,跑回老家去了。今天我想请您谈一谈您是怎么逃跑的——逃跑的过程。我访问过许多在夹边沟劳教过的人,有几个人讲述他们逃跑的历程,也是很动人的。我想,您的逃跑的路上也会有许多曲折、危险和艰辛。

我在高吉义先生花卉医院的斗室里那把小板凳上坐定之后,对高先生说。我这是第三次采访他了。第一次他就概括地谈过他开设花卉医院的经历了:他是1957年在位于中央广场的兰州市中医门诊部定为右派的,——那时还没有兰州市中医医院——1978年落实政策,兰州市卫生局安排他到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医院的领导要他重操旧业当医生,他没有同意。他跟医院领导说,自从定为右派之后,他已经二十几年没当过医生了,在医学迅速发展了这么多年之后再当医生,他只能是个庸医,而庸医是要害人的。医院领导问他,那么安排你干什么好呢,去做个按摩师行吗?他也没同意,他说,我恐怕连个按摩师都当不好;你看看我的手,我这是当农民种地当木工拿锯子的手,能去给病人作按摩吗?你们就随便安排我当个工人吧,烧锅炉呀,扫院子呀,都行。只要给我发工资就行。医院领导面露难色:那哪行呀,你是医生,国家干部,我们要是安排你当工人,市卫生局会批评的,说我们落实政策的工作没做好。他的工作安排问题拖了几天:领导看他真不愿当医生,就想安排他当个行政科科长。领导也是好意,觉得他受了二十年苦,给个官当吧,也算是补偿。可他坚决地拒绝了领导的好意,说,当官的

事我是坚决不干的,你们就叫我当工人吧。他自告奋勇自我推荐说,我给你们养花吧,就当个花工;咱们医院里光秃秃的,一块草坪也没有,一盆花也没有,这哪像个医院呀。当时医院领导的心动了一下,因为市政府绿化委员会已经几次批评过医院了,绿化工作做得不好;医院正想在绿化上花点钱。医院领导问他,你会养花么?他回答,我打成右派从夹边沟跑回陕北的老家之后专门务劳果园,种过花。他看领导有点动心,就又说,你们只要买点木头,什么事就都不要操心了,我自己盖花房,我保证三年之内叫咱们医院评上绿化合格单位。领导看他真的不想当官,愿意去养花,就很痛快地答应了,并说,你还是干部编制,科长待遇。

高占义在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养了十几年花。他叫领导买了几方木头,自己解板子,自己盖花房。他报名参加了一次北京《花卉》杂志举办的培训班。他建起了一个很好的闻名遐迩的花房,把兰州各单位花房的名贵花卉引进了第一人民医院的花房,把市场上最为时尚的品种引了进来。医院各科室办公室摆满了四季花卉。仅一年的时间,市人民医院的门口挂上了市绿化委员会颁发的牌匾……当年整过他把他定为右派而现在是高官的人都来他的花房参观,向他要花……当市场经济的大潮涌来的时候,他又向领导建议把花房推向市场,自负盈亏。

他在五十八岁的时候申请退休,受聘于崔家崖的一家花卉生产基地。后来花卉基地易主,他因看不惯新主人的霸道愤而辞职,自己开设了这个简陋的花卉医院。因为名声远播,几家花卉公司的老板来请他,愿出高薪,但他拒绝了。他告诉我,从夹边沟出来之后,他就立志永世不当干部;离开崔家崖花卉基地之后又下了决心:不受雇于任何人。他说,现在不缺吃不缺穿,不担惊受怕,不逃亡不怕公安机关通缉追拿,开个花卉医院给不会养花的人讲讲养花知识,一天挣个十元二十元或是三十元,真是逍遥自在……

高先生仍然坐在那把铺着棉垫的高背椅子上,他的左手放在

堆满瓶瓶罐罐的桌子边上,把他农民样的脸朝着我。他是50年代的中专毕业生。他还不算很老,才六十四岁,脸上皱纹不多,但一条横贯前额的抬头纹很深,像是刀子刻出来的沟壑。他的面孔总是给人很严肃的感觉,皮肤粗糙,少有笑容。他也笑,但笑容还没在脸上荡漾开来就突然凝固,笑声戛然而止。他的脸上,只有那双眼睛很有特点:很黑,很亮,显出智慧、机灵、严峻和柔和的神情。嗓门干巴但却洪亮。

他久久地用黑亮的目光看我,干巴巴的声音说,逃跑的经过嘛,那确实是惊险、曲折。昨天我不是跟你说了嘛,那是11月初的一个深夜,也就是牛天德到我的窑洞里来托付后事之后的三四天……不,不,我记错了,不是深夜,是七八点钟的时间。我那时没有表,——原来有一块的,是梅花表,到夹边沟不久就叫分队长收走了。初到夹边沟的时候我在劳业队劳动,分队长叫陈风林。陈风林是商业厅的一名科长,积极得很,为了向领导邀功,对下边的人很严厉。是他有一天把我逼住,叫我把表抹下来交给他。我说为啥把我的表收走,他说防止我逃跑——但我从开过晚饭后间隔的时间估计,那时也就八点钟的时间,我提了个棍,穿上一件棉大衣,悄悄地出了窑洞,往明水河车站走去……

说到这儿,高先生停顿了。他似乎是在努力地回忆什么,又像是思考,俄而又说下去:

到了车站列车还没来。我早就打听好了,从那些酒泉、玉门和嘉峪关来探望丈夫的妇女们嘴里我早就打听好了,夜里九点钟左右,有一趟从西边开过来的慢车在明水河车站停车。我就在那儿等了一会儿,等着列车进站……

我打断高先生的话:我听说晚上有人巡逻……

对,你说的对,是有人巡逻,但那天我走的时间早,天黑不久就走了,巡逻的干部和分队长们都是八点半钟才出门巡逻或者追捕逃犯的。从明水的山水沟到火车站才五六里路,半个小时就能走

到。他们去车站截人,或者追捕某某人,都是车快进站的时候才赶到车站去。他们知道,人只要是逃跑,那都是计划好的,在路上很难截住:人家随便往哪个沙堆子后边一藏,他们就找不着。但他们知道,逃跑的人总是要到火车站去买车票的,火车进站前总要从藏身的地方走出来的,总是要上火车嘛。他们就在你临上车时抓住你。抓住了逃跑的人,回来就升级——因为逃跑罪加一等,正式逮捕,五花大绑或者戴上手铐送到饮马农场劳改;最轻的也要关禁闭、开批斗会,然后送到严管队去。因为走得早,我那天运气好,没遇上巡逻的。那时候买火车票是要介绍信的,我没介绍信,就也没进候车室,就在路基下边的黑暗处趴着。等待时机。

你遇到狼没有?我又一次打断高先生的话说,你昨天不是说了吗,明水农场因为死的人多,周围狼也多,成群结伙地跑到坟地吃死人,也扑活人。你没遇到狼吗?

狼,你说狼吗?高先生怔了一下,说话也停顿了一下。狼,我是碰见了两只。那天夜色很黑,伸手不见五指,我专门选的这样的日子。我看见了两只狼的眼睛,眼珠子绿莹莹的,也隐约看见了两只狼的影子,可是它们没有扑我,没有靠近我。可能它们看见我手里的棍子了,怕我。也可能那两只狼吃得太饱了,不想吃我。

你没害怕吗?

也没怎么害怕。那时间我虽然浮肿了,但我到底年轻,手里提个棍,一两只狼我还是能抵挡得住的,它对我还下不了手。

你走过去它们也没追你?

没追。可能狼看见我手里提的棍了。

高先生回答完我的问题又接着说下去:等了一会儿,火车进站了。当火车头上的大灯从候车室和票房前掠过的时候,我看见没有站台的路基上没有几个上车的人,也看不见有追捕者。只有一两个手提信号灯穿蓝制服的铁路工作人员。车停下了。火车车厢的门一个个打开了,车厢里灯火通明,列车员下了车站在门口。这

是上车的好时机,但我趴着没动。我没有车票,怕走到门口列车员不叫上车,也怕像我一样躲藏在黑暗处的追捕者扑上来把我抓住。后来,列车员上车了,车门关上了,有个提信号灯的人往车头车尾摇了几下,火车鸣地鸣了一声笛,就听一阵响,车开动了。这时我才从黑暗里一跃而起,急忙跑上路基,一下子扑在列车门口的台阶上,我的一只手抓住了门旁的铁扶手。我估计车站值班员没有看见我。他要是看见了,给车头发个信号,车就会停下。那是我最害怕的,我就跑不了啦。可是车并没有停,而是加速了,越驶越快,一眨眼的功夫驶过了扳道房。过了扳道房我就放心了。我挣扎着在台阶上站了起来,手紧紧地抓住铁扶手,把身体贴在门上。门是锁着的,也看不见列车员,我就开始用拳头砸门。

在呼啸的从巴丹吉林沙漠刮来的寒风中,在列车卷起的风声中,在列车咣当咣当的响声里,我的拳头砸在门上的声音太微弱了。列车员已经走进车厢去了,或者是到他的乘务员室休息去了,根本就听不见我砸门的声音。——再说,我也不敢胡来,真要是把玻璃砸碎了,我就是进去了,也没钱赔人家,那就麻烦啦。但是,我必须砸门,砸到列车员听见。我不能总在门口站着:我已经冻僵了,我的手抓不住扶手了,时间一长我会坚持不住的,就会掉下车去摔死,或者卷进车轮下边碎尸万段。

我砸呀砸呀,终于,有一位穿越车厢的旅客看见了我。他走到门口看了看我,隔着玻璃喊了声什么,走进车厢去了。不一会儿,他领着列车员走过来了。列车员打开了门。这是名男列车员,他气哼哼地从胸前抓住了我的衣裳,一把将我拉进车里。他关上了门这才开始训我:你怎么趴在门上!你想死呀,不想活啦!训完了又问我有车票吗?我说我买了车票。我装出掏车票的样子来,这个口袋摸摸,那个口袋摸摸。我穿的是一件小棉袄,外边套了一件华达呢的中山装,是我存着没穿过的新制服。我的样子并不像一个逃犯的样子,并且由于逃跑前收拾过头发刮过脸,所以尽管我没

掏出车票来,但他对我的态度还是客气的,他把我叫到了乘务员室,没再说什么就关上门出去了。我在心理上觉得已经离开劳教农场了,有所宽心,再说经过这么一番剧烈的折腾,我虚弱的身体已经累垮了,他一走我就歪在椅子上睡着了。睡了一会儿,突然我的脑门上一疼,我醒了,看见面前站着一名乘警。是因为身体太虚弱太疲惫了,虽然面前站了一位警察,但我的眼皮睁不开,又沉重地合上了。结果是我的脑门又疼了一下,而且比第一次疼得厉害。我再次挣扎着睁开眼睛,看见那警察笑着说,嘿,你还睡得挺香呀!醒一醒,醒一醒!说着话,那警察又在我的前额上弹了个脑崩儿。我赶紧坐起来,接着又站起来。这时我清醒了,知道遇到麻烦了。但我嘴里咕噜着说出一句话来,显示出我不怕他对他毫不在意的意思。

做啥呀,你把我打疼了?

那警察似是一怔,但又笑了说,打疼了?你还觉着疼呀?我还当你没醒呢。喂,车票呢,拿出来看看。

我知道骗不过他的,就说,车票,哪还有钱买车票?我两天没吃饭了,你们要有吃的,先给我点吃的吧。

警察眨巴着眼睛看我片刻,说,你是干什么的。

我回答,我是陕西扶凤县委组织部的秘书,到明水农场搞外调的。

有证件吗?

证件?什么证件?我在来明水的路上连挎包一起叫贼偷了,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饿了两天了。

那警察将信将疑,又停顿了片刻,才又问我叫什么名字,还问扶凤县的县长是谁,县委书记叫什么名字。这一切我都对答如流。当然了,我的姓名是假的,除此之外,县长县委书记都是真的,因为前几天扶凤县的一位干部来看望他的在明水劳教的右派亲戚,说话时我听下了,且都烂记于心。

那位警察问了几句,看问不出什么破绽来,——可能他也不清楚扶凤县在哪里,县长县委书记叫什么——但他对我的疑虑并没消除,说,叫贼偷了你就该给县上发电报嘛,怎么半夜里扒车?

我说,好我的警察同志,你知道明水农场是干啥的吗?那是劳教农场,饭都吃不上了,饿死人,我还能在那里坐着等汇款吗?我跟他说话,口气很随便,叫他觉不出我有什么慌张和胆怯。这一来他不好再说什么了,跟我说话的口气也变了,说,不管怎么说,你不买车票是不行的。你先到车厢里坐着去吧,到了张掖就下车。前边是临泽,小站,你下了车不方便。到张掖下车,你去张掖地委请他们帮你解决一下吧。你总不能饿着肚子回陕西去吧?

我知道,硬赖着坐车不符合我的“身份”,会露出破绽来,便顺水推舟说,那好那好,我计划就是在张掖下车的,到张掖县委去请他们帮助解决一下我的困难……

到目前为止,我的逃跑还是很顺利的,我认为自己骗过了乘警。可是车到张掖火车站,他把十几名无票乘客撵了过来,叫他们和我一起下了车。下了车我想独自走开,再混上车去,但却被他喝住了。他和车站上的一位警察说了几句话,那位警察就很严厉地对我们十几个人吼道,过来过来,到这边来!我还想像在列车上一样对这位警察讲些我早就编好的瞎话,但这位警察连听都不听,大声喝道,走!往前走!这边!

没有办法,我只好跟着那群人走,进了一座黑乎乎的院子。

进了院子我就发现坏事了:院子里黑压压都是人,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有些人叽叽喳喳说话,有四川口音有河南口音,而且我们的身后还有人被赶进来。一间大房子亮着灯,那位警察叫我们往那间房子走,说是叫我们登记。走到门口,我看见房间中央放了两张桌子,坐着两名警察。我在心里立即做出决定不能登记:这是个收容所。1958年的春天,还没有宣布我为极右分子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之前我就听人说,公安局派出所把外地流窜来兰的无业

游民送进收容所,集体押上火车送往河西走廊的赤金农场、蘑菇滩农场强制劳动,每月发二十四元工资。我可是不能脱离虎口又进狼窝。

那位警察把我们领到房门口叫大家排好队就又走了。我正好排在最后边灯光照不到的地方,我找个机会就离开队列混进院子里的人群里。我在人群里走了走,搞清楚这些人都是从河南、山东、四川等省来的农民,盲流,他们想到新疆去谋生,但在张掖被赶下了火车。我看见院墙不高,也就一人高,便对两名站在我身旁的四川姑娘说:你们怎么不跑?一个姑娘说,天亮了管饭,等吃完饭再说。我说我现在就要跑,请你们帮帮忙。我用双手扒住墙头,两个姑娘从下边推我,我翻过墙头跑了,跑到候车室去。

候车室里偶尔有警察走动,但我很镇静地坐在椅子上看书,装成候车的样子。我自信自己的穿着举止不像个盲流,也不像逃犯。

警察还真带出去了几个人,却没来盘问我。我坐到了天亮。天亮后太阳出来了,外边开始暖和一点了,我走出候车室。经过一夜的折腾,我的肚子饿得扁扁的,又饥又乏,我得想办法搞点吃的。离车站很近就是通往张掖县的马路,有几家饭馆,还有烧饼铺,门口的玻璃柜里码着很多烧饼,但是我没有钱也没有粮票买烧饼。我身上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手里提的一个布兜,布兜里装着我心爱的两本书。我从兰州到夹边沟带着它们,从夹边沟迁移明水还保存着它们。在明水很多人把书撕掉烧火取暖了,我没舍得烧。我从草滩上捡牛粪取暖。可现在我决定卖掉它们。我需要食品:我已经饿得双腿发软、眼冒金星了,如果不补充点营养,我就要倒在街头了。

我把两本书从布兜里拿出来,双手托着沿街走动,寻找买主。我寻找在我看来是念过书的人。我认为,那些不识字的人引车卖浆者流是不会买我的书的。当然,卖给搞医的人最好,但我无法辨认出这种人来。遇到像是识字的人,我就走过去问,我这里有两本

好书,你要不要?有的人瞅我一眼就走过去了,看都不看书一眼。有的人站住了,看一眼书,或者接过去翻一下又合上,递给我:没用,我不是搞医的。

一上午我也没有卖出书去。到了下午,我几乎都绝望了:我已经饿得头晕眼花,脚步蹒跚,快要走不动路了。我觉得麻烦了,我非得倒毙在张掖火车站的街口上不可了。我想,与其倒在街上,还不如到候车室坐着去。在候车室倒毙,铁路工作人员可能还要管一管,说不定在我气息奄奄之际给我一点吃的,或者把我送到收容所去。这时候我突然就改变了昨夜的想法,进收容所就进收容所,总是要给口饭吃的,饿不死。我的脑子里突然就想起了昨夜那两个四川姑娘说的话:吃完饭再说。——她们比我有主意呀!

我走近火车站了,快要走完那段马路了,这时我发现两个蓄着长胡子的老人在一间房门口晒太阳。我看得出来,这是两位有文化的老人。他们的穿着和脸色气度表现出他们不是引车卖浆者流。我想再试一次我的运气,便走近他们,以谦恭的口气说,老爷爷,我这里有两本好书,你们买下好不好?两位老人看了看我,接过书去了。他们两人交换着翻了翻书,不说书好书坏,问我,你是哪里来的?我告诉他们,我是陕北人,家庭是中医世家;由于家乡遭了灾,想到新疆去谋生,到张掖没盘缠了,不得不把这两本书卖了。其中一位老人说,陕西也遭灾了吗?另一位老人站起来说,娃娃,你把这两本书留下,我给你买两个烧饼。在火车站的附近转悠了一天,我已经了解到饥饿在张掖地区的惨烈,——街头上卧着饿倒了的人——知道食品在张掖地区同样的金贵,所以我二话没说就同意了。那两本书一本是《针灸大全》,一本是《针灸学》,要是放到现在,就是秤斤卖也能买三四个烧饼。

老人在一家国营饭馆里买了两块半斤的烧饼,还给我要了一碗开水放在桌子上,就走了。我稀哩呼噜就把两块烧饼吃了,开水也喝光了。我自己又要了一碗开水也喝干了。

二碗开水和两块烧饼下肚,我的身体立即就发热了,觉得又有了力气。我又回到候车室,开始想办法上火车。

可是一下午一整夜我也没上了火车。现在回忆起来,兰州往西的这一段铁路上当时总共就跑着两三趟列车,一趟快车,一趟慢车……可能还有开往上海来的一趟快车吧……我也记不清了,反正车不多。每一列往东的列车进站,我都跑到站台上,但是上不了车。车一进站,列车员就站在门口查票,没票的人不叫上车。我亲眼看见没票又想上车的几个背着包袱的河南农民叫站台上的铁路警察带走了。我就没敢靠前。

第二天白天我也没能上了火车。

好在这个白天我从候车室外的台阶上拾到一张废票,等到半夜我曾乘坐过的那趟列车进站又要开动的时候,我手里捏着废票跑到车门口去,嘴里喊着不要关门不要关门,朝着列车员晃了晃票,装出很急的样子上了车。

一进了车厢我就跑到另一节车厢去了。坐在门口的椅子上东张西望一阵子,看没有人注意我就钻进座椅下边去了。肚子是空的,又不用上厕所,我一直在椅子下边蜷缩着到了兰州。在兰州的事我就不说了吧,昨天已经说过了。在姐姐家只待了一夜,好好吃了两顿饭,一顿是我妈做的酸汤疙瘩,一顿是我姐姐擀下的长面,然后就接过我姐给的四十元钱,趁着夜色赶到火车站,用买好的车票上了火车,一帆风顺地到了西安。

临出门姐姐还给了我四盒香烟。我说我不吸烟,姐姐说不吸也拿上吧,回老家的路关口重重,说不定用得上。姐姐说,兰州的职工一月发一张票,可以买四合烟;这是供给姐夫的,再想多要一盒也没有。

从西安去铜川仍是坐火车,买票要介绍信。这一关我过得很容易。因为是持票坐车,在兰州去西安的列车上我和一位去铜川的旅客说话,混熟了;他用他的介绍信替我买了一张车票。只是他

到铜川就不走了,从铜川去延安的汽车票可是成了最难过的一关。这里买车票不光是要介绍信,还要登记发号,轮到你的号才能买票。当时的情况是汽车站人山人海,登记了的已经有七百多人,而每天只发三辆卡车,一卡车只能坐三十几个人。我可是愁死了,怎么才能到延安呀!啥时间才能到延安!我坐在候车室里发愁,苦思冥想,这一关怎么过呀!正在那里发愁,我身旁走过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又像是汽车站职工,又像是公安派出所的便衣,他朝着我身旁坐着的一个小伙子说,把票拿出来,查票。那小伙子把车票拿出来,他又叫小伙子掏证明。小伙子没有证明,他说没有证明你怎么买的票?车票没收!他还把小伙子赶了出去,不叫他在候车室坐着。我当时吓了一跳,心想这个汽车站怎么这样严格,随便没收人家的车票?这要是查着我怎么办?会不会把我当坏人交到派出所去?可是仔细看看之后,我又有有点怀疑那个人是不是汽车站工作人员了。他贼头贼脑地转了一圈,再也没查别人的票,就出了候车室。我突然想,这是不是个歹徒或者本地的地痞流氓,专门欺负老实巴交的乡下人。我灵机一动就站起来跟上了他。他出了候车室进了一家饭馆,我也就进了那家饭馆。他坐在一张饭桌旁边,我也走过去坐在那张桌子旁。为了显得自然,我掏出一颗烟吸起来,并且斜着眼睛看他。我不知道他对于我有什么看法,抱着什么心理,他也斜着眼睛看我。看了一会儿他说,你是哪里来的?我说兰州来的。他又问在哪儿工作?我回答兰州中医门诊部。他停顿了一下又问,兰州的香烟供应紧张不紧张?我回答紧张,一名职工一个月供应四盒。但我又补充了一句:我是医生,比别人多搞两条烟没问题。这时他说话的口气变了,求我的口气说,你的烟让给我一盒好不好?我说那有什么关系,不就是盒烟吗?我掏出一盒烟给他,他要掏钱给我。我把他的手推开了。我说,烟钱就算了,我不要了;我从外边回来,在铜川人生地不熟买不到车票,你帮我买张车票行不行?他问我去哪儿,我说延安。他似乎很小心,四面

环顾了一下，把没收的那张票掏了出来，说，我这里有一张替别人买的车票，就先让给你吧。我大喜过望，接过车票给了他钱，并且把四盒香烟除了我吸的那一颗全都给了他。

意想不到地搞到了一张那么难买的车票，啊呀，我心里那个高兴呀，就没法说了；我尾随他的目的就是搞到那张车票，我竟然如愿以偿啦！第二天早晨我正光明地上了汽车到了延安。又过了一关！

到了延安。可是从延安到绥德的这一关又怎么过呀，汽车站还是挤挤嚷嚷的，又要介绍信，又要登记。没办法，我只好坐在候车室外边的台阶上等机会。真是老天有眼，前世修行得好呀，机会叫我等来了：一个票贩子手里拿着一张车票走到我跟前，偷偷地说，有绥德的票要不要？我说要，多少钱？他说五块。我说绥德的票不是二块五么？他说高价票，五块，五块。我毫不犹豫，一把将车票抢到手了。可我身上这时候只剩下七八块钱了，——那时候到处都卖的是高价饭，我的钱快花光了，到绥德后离家还有一百三十里路，还不通汽车，我没钱怎么办呀——我就对他说，我身上只剩四块钱了，就给你三块钱吧，剩下一块钱我喝碗水。他说不行不行，就是五块。我说就给你三块，你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你要是不卖我就喊了！我看得出来，票贩子倒卖票也是偷偷摸摸地，害怕被人抓住，我就这样威胁他。他还真害怕，小声央求我说，别喊别喊，你给我四块吧。我说就三块，多一块也不行。他只好同意了。哎呀，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啥事都能做出来——我把票贩子坑了一下！

第二天我就到绥德了。到绥德我就更困难了，身上只剩下四元钱了，可是前边还有一百三十里路要走，——不通汽车——要吃饭，要住店。再困难也得走呀，这天夜里我住宿在一家大车店里，花了一元钱，早晨起来连早饭都没敢吃就上了路。

出了绥德走了五六里路，我是又饿又累，有点走不动了。这时

迎面走来了一个老汉。看老汉的样子也是赶了夜路的，头上用一块布包得严严的，只露着两只眼睛，肩上挎着鼓鼓囊囊的毛褡裢，露出糜子面的馍馍。老汉看出我是个走远路的人，就迎上来说，哎呀，你是不是昨天从延安来的汽车上下来的人？我说是的。他说，昨天晚上汽车站给我们乡上打电话，说我的儿子从延安坐车过来，在绥德汽车站饿倒了，你看见没有？我说看见了，有一堆人在汽车站上围着看，有个从青海来的小伙子倒在路走不动了。你的儿子是不是在青海工作？老汉说就是，他还活着吗？我说还活着。听说活着，老汉立即数落起我来了：哎呀，你们这些在外头工作的人，心怎那么狠呀，到家门口了，看见人饿倒了，就给上些吃的嘛，救人一命嘛……我说，老大爷，你不要埋怨我，我的情况还没有你的儿子好。你可以背了甜馍馍去看他，我前边还有一百三十里路要走。从昨天早晨到现在，就没有一颗粮食沾过牙。老汉听说我是饿着肚子赶路，立即就放下褡裢，拿出六七个糜面馍馍往我的怀里塞，那个热情呀！然后就匆匆告别往绥德城里去了。

我就是靠着老汉给的那几个馍馍充饥，走了四天，整整走了四天，回到了我的老家——佳县高钟家洼村。我先在叔叔家住了一个月，调养身体，等身体好一点后才回到自家的家里，打开生了锈的锁子……整整休息了一个冬天，天气热起来了，身体也缓过来一些了，我就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

以后的事明天我们再谈吧，你看天都快黑了。高吉义先生讲完了他逃离夹边沟农场的故事。我说，好吧，明天谈就明天谈吧。我扭头看了看门外，有几家花店的老板正在把一盆盆鲜花抱进房子，似乎是准备收摊了，但是我的采访意犹未尽，我又说，高先生，你的逃跑的故事讲得的确生动、翔实，但我还有个问题想问问你：你那天从明水的山水沟逃跑就没有人发现吗？没有人追你吗？

高先生说，这个……

见他沉吟，我又说：据我了解，大凡从明水逃跑的人都不敢去

明水河车站上火车,因为那儿离场部太近,管教人员很轻易就追捕回来。

他还是沉吟不语。

我又问,你跑回佳县老家之后,你家乡的公安局没来拘捕你吗?我访问过的逃跑成功了的人,大都是流落他乡不敢回家或者回老家,凡是跑回城市和乡下老家的,基本都被当地公安机关拘捕送回去了,因为一旦发现谁逃跑了,夹边沟农场就向他的原工作单位或老家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发函,要求协助捉拿,或者直接派人去他家追捕……

高先生终于说话了:张记者,你问得好,问得好呀!我那天逃离山水沟,农场是派人追了的……

没捉到你,因为你藏得好?

不是,不是这么回事。张记者,这件事我原本是不想告诉你的,因为这又是一件我一辈子也没想通的事,我不知道我是做错了还是没做错。它比牛天德的事更加折磨我的心灵,使我寝食不安,经常在噩梦中惊醒……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他说,好吧,我今天就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你吧:那天晚上的逃跑,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两个人,我们是两个人一起逃跑的。

两个人?我惊讶极了。

他说,是的,两个人……你听我从头说。在夹边沟的木工组,我是元老,但是,这并不是说我的技术最好。技术最好的是我的师傅骆宏远。骆宏远是白银公司的木匠。其实他原本不是木匠,而是土木建筑行业的工程师,三十年代清华大学毕业,解放前就是工程师。解放后他在东北的一家建筑公司工作。因为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五十年代初内部肃反后就不叫他当工程师了,下放当了工人,木匠。五十年代国家建设大西北,把他调到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工作。1958年的秋季,白银公司在反右斗争中老账新算,给他戴

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送到夹边沟劳动教养。作为工程师,他的水平怎么样我不知道,但作为木工,在我们的木工组,他的技术比兰州大庆木器厂的七级木工魏立之的手艺还高。魏立之是真正的工人,因为说反动话戴了个坏分子的帽子送来劳动教养的。魏立之手艺特别好,在我们七八个木工里是第一把手,活做得好,但是不识字,不认识图纸。骆宏远没有七级木工的级别,可是魏立之能干的活他都能干,学问大,能识图纸,还能设计和绘图。那时候的河西走廊,包括夹边沟农场,马拉的大车都是大轱辘车;木头轱辘,轱辘比车帮还高,马套在车辕里,车辕往下倾斜,叫人看着就不舒服,更不要说马拉着不舒服了。骆宏远到木工组之后,他就提出了把大轱辘车改进一下的意见。经过管教人员批准之后,他把车轱辘缩小了。马车轱辘九网十八条,他设计的轱辘小了,但仍然是九网十八条。九网十八条你懂吧?就是九块弯曲的木头盘成一个圆的车轮,十八根木头的辐条支撑,中间是车轴。你可不要小看车轱辘缩小这件事,那可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事,整个车型,各个部件都要变,而且变的系数都不同——真是很复杂的事。但是骆宏远把图纸画出来了,大家按他的图纸做各个部件,安装起来后既漂亮又好用。夹边沟的右派们赶着我们自制的马车去酒泉县拉粪,人们都围着看。

我为什么把骆宏远叫师傅呢?自从进了夹边沟,我就想这辈子完了,就是将来把我释放了,也不可能再叫我当医生了,再说,一个右派帽子把我也搞伤心了,我就下定了决心:将来就是再叫我当干部我也不当,我就当个工人去,凭力气吃饭,凭本事吃饭。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干脆不当医生不当干部了,你再能斗我个右派吗?我下决心要学个木匠,做个手艺人。于是,我在木工组里经过选择,选了骆宏远当我的师傅。我还给他磕了头,正式拜他当师傅。事实说明我当时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我跑回陕北老家不久就跑出去搞副业,给生产队挣钱给自己挣钱,文化大革命中农村要斗

我,我就又一次逃跑,在外边漂泊,揽活,把我的全家——女人和孩子——都接出去……在那动荡、激烈阶级斗争的时代里能生存下来,全都依靠了在夹边沟木工组学下的那点手艺,仰仗了我的师傅教给我的识图绘图的知识。

昨天我跟你讲了,在木工组我和牛天德的关系好,就像他说的像亲兄弟,亲如手足,这是事实,但和我关系最好的,真正好的,还是我的师傅骆宏远。我和骆宏远简直就亲如父子。古人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嘛。他每做一件活都要教给我做活的技术,不做活的时间又教我土木建筑方面的理论知识。我呢,给他洗衣裳,拆洗被褥,搞来什么吃的食物,总要先给他一点吃。他是个木匠,但他有知识分子的高贵的人格,从来不去偷不去要,所以就总是挨饿。还有,他是从东北支援大西北建设,和其他的白银公司的干部工人一样,是只身来到白银市的,家属孩子还都在东北,所以他在夹边沟劳教,生活上没有人接济他;家里人可能不了解劳教生活的艰难,也是因为路途遥远,来看望他或者送点吃的穿的不容易,所以他在夹边沟的处境就最艰难。我就尽可能地帮助他吃上点喝上点。有过这么一件事,有一次养兔场的人来叫我去给他们修篱笆墙。你知道吧,夹边沟农场场部的对面有两座不高的土岗子,不高,北边的那座一二十公尺高,南端的也就七八公尺高。不知为什么,劳教分子们把这两座土岗叫卧龙岗。因为南面的这座岗子小,农场就把它用篱笆围起来养兔子,叫兔子们在土岗上打洞做窝。那天我去修篱笆,也怪了,有几只兔子好像是没见过人,稀罕人,总往我跟前跑,蹲在旁边看我。我看看周围没人,就趁兔子不怕我的机会,用木尺打死了两只兔子。兔子好打得很,只要瞄准它的鼻梁,轻轻一打,它就扑噜一下翻倒了。我就把兔子装在工具箱里神不知鬼不觉背回来了,放在木工房的木头板子下边,想找个机会把它煮着吃了。还真是巧得很,天赐良机,就在我打死兔子的第二天,农场叫各队派一些人去打柴,给伙房烧饭烧水用。我们木工组

要出两个人。打柴是在农场北边的沙漠里，木工组的人都不愿去，每次都是组长派，派年轻人去。那天我不等组长派就主动要求我和我的师傅去打柴。师傅不愿去，那是冬天，沙漠上西北风刮得冷彻肌骨，打柴不如在木工房干活舒服。于是我又是跺脚又是使眼色叫他不要反对我的提议。最终组长派定了，就是他和我去打柴。从场部出来往沙漠里走，他嘟嘟囔囔地说我，为什么要叫他去打柴。他气得要命。等到了没人看见的地方，我从怀里拿出死兔子叫他看，他就不再说我了，还笑了，还嗔怪我为什么不早说。我跟他说明，这种事能说吗？叫人知道了汇报给领导，我就是不“升级”也得叫人捆一绳子呀！

那天呀，到了北边的沙漠，我们两个人避开了其他打柴的人，我从怀里——我穿着一件黄大衣，腰里系了一根麻绳，怀里能装很多东西——拽出兔子来，挖了些柴烧着吃。两只兔子我们一人一只吃得那个美那个香呀！

吃完兔子肉，我们把毛皮和肠肚挖个坑埋掉了。——小心不叫别人发现呀。

昨天我说了，到了1960年的夏收，木工组没啥活干了，木工组就差不多解散了，——四五个人编到农业队去了——剩下两三个木工了。我的师傅骆宏远也分到农业队去了，我们就很少见面了。

但是后来迁场，夹边沟的劳教人员迁移到高台县明水乡建农场，到达的第二天我就意外地见到了他。

来到明水的第一天，我露宿在荒滩上，因为先我们到达的人没有挖好足够的地窝子和窑洞。翌日清晨，喝了一碗糊糊，我就在伙房附近——当时的伙房建在山水沟外的台地上——在山水沟土坎上挖窑洞。领导准许我独自住一个窑洞，因为领导叫我带过来了一部分木匠工具，叫我保管好，以备干点零碎的木匠活。我挖窑洞的地方离场领导的办公室——是建在台地上的几间平房——很近，便于领导叫我。记得是挖窑洞的那天下午，师傅突然找我来

了,他当时的样子糟糕透了,胡子一寸多长,头发像一把乱草,瘦得一把骨头,面色如土。他的衣裳破成了布条条,腿上从大腿往下,用麻绳缠着几块破布和油纸。我吓了一跳,问他,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在木工组的时候,他还经常刮胡子的,衣裳补缀得也比较整齐,保持着—个知识分子的模样。他没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说,我的行李丢了。问他怎么丢了,他说是坐闷罐火车来明水的路上,火车在一片很荒凉的远处有几排平房的地方停了一下,人们都喊明水到了,下车下车。有些人就把行李从车上推了下去。他也把行李推了下去。可是人还没下车,火车又开动了,加速了,往东走。到了明水,农场派马车去拉行李,他的行李和另外几个人的行李找不到了。

他说话的神情沮丧极了。我当时还给他宽心:丢了就丢了吧,发愁有啥用。你就和我住一起,我们用一套被褥,凑合吧。

我跟你说过我的窑洞很小,就—公尺略高—些—公尺二宽,—个直筒子,两公尺多深。这是开始的几天,我和师傅挤在—个被窝里睡。过了几天,我从其他窑洞里偷来—床被子两条褥子,是死掉的人的财物,给他铺给他盖。这时我就在窑洞里边往右手方向挖了—个偏洞,叫他睡在里边,我睡在外边。他岁数大,体质弱,睡在外头受不了,风大。

就这样睡了十几天,冷得实在招架不住,我就到草滩上去拾牛粪,在我的脚底下靠近洞口的地方生上—小堆火。这样还行,能抵挡—下初冬的寒冷。可是后来他病了,肝腹水。在夹边沟木工组的时候他就因为肝硬化腹部积水住过—次农场的卫生所。这次腹水比上次严重,他的腹部胀得圆鼓鼓的,腰粗得像个大胖子。加上全身浮肿,他竟然肥大得连衣裳都穿不上了。我把卫生所的邓大夫叫来看了看,叫他立即住院。卫生所的病房是离我的窑洞不远的—个大地窝子;我抱着被褥把他送到那间地窝子去,在几十个病号中间挤出—条条地方铺好被褥,他就躺下了。过了几天我再去

看他，腹水似乎得到了抑制，腹部瘪了一点，但浮肿照旧，身体更虚弱了。他坐起来和我说话，连说话的力气都不够了，声音软软的，断断续续。

又过了几天，也就是牛天德来我的窑洞托付后事之后，我准备逃跑了，——那时候我的腿已经浮肿了，脸也浮肿了，我的身体感到了明显的虚弱，心想必须跑了，再要是拖上几天，想跑也跑不动了——又去卫生所一次，看望师傅骆宏远。

我原想看看他就离开病房的，是去和他告别一下，因为我知道他将必死无疑，看看他有什么“后事”要嘱咐我。可是到了病房，和他说了几句话，一种临别的伤感之情揪住了我：我在他的身旁坐了许久。当时我心里很是难过，我要走了，而他，我的师傅，一个有学问的好木匠将要在荒凉的明水农场的山水沟里作古，他的尸体将扔在荒滩上。这种伤感之情愈来愈浓，后来我禁不住在他的身旁躺了下去，把嘴对着他的耳朵小声地说，师傅，我要走了，你有什么话要托付吗？

他没有出声，但是我明显地感觉到他的身体颤动了一下。接着，他的手从被子下边伸了出来，捏住了我的手，并且捏得紧紧的。他的朝着房顶的脸朝我转了过来，身体也侧了过来。我知道他要跟我说话，便把耳朵靠近了他的嘴。他说，你真要走吗？

我没说话，点了点头。

他的因为脸部浮肿而显得细细的眼睛看着我：我跟你一起走。

我吓了一跳：像他这种身体衰弱到极点的人，哪能长途跋涉逃出明水农场呢！但是我知道，这也是他强烈的求生的愿望，可能他在“病房”的半个月里已经想过了：早些日子跑掉就好了。现在他的身体不行了，但是听说我要跑了，他立即就决定和我一起跑。我想告诉他：你跑不动了，你还是在这里躺着吧，熬几天，可能上级会放大家回家去的。但是我知道，说这样的话就如同说你在这儿等死吧。我不愿伤他的心，便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也没有说话。看

我没说话，他静了一会儿又说，小高，带上我，我能走。

他的细细的眼睛里流出泪水来了：两滴浑黄的眼泪，一滴眼泪从鼻梁上流过流进另一只眼，和那只眼里渗出的泪水汇合，流过眼角。

我从心里认为他是走不动路的，跑不出明水农场，但此刻我的心咚咚地跳了起来，泪水在眼睛里打转，我把嘴贴到他的耳朵上，竭力控制自己不要哭出声来，小声说：

明天天黑，到我的窑洞来。穿厚些。

然后我起身快步走出“病房”。我怕自己哭出声来。

转天傍晚吃过了伙房供应的一碗糜子面糊糊汤，我就开始准备逃跑。其实也没什么准备的，就是把棉大衣穿好，腰里系了根麻绳，另外把我上午从伙房偷来的两块豆面菜团子吃下去以增加我的体力。然后我就装成睡觉，拉开被子盖在身上，躺着，等着天黑下来，等骆宏远来找我。经常有管教干部或者拐棍们突然闯进窑洞来，查看你是否异常的行为：是否偷杀了农场的羊只煮肉吃？是否逃跑了，或者留下了逃跑的迹象？在等待的时间里，我反复思考，骆宏远会不会变卦不走了？他的身体过于虚弱了！我原计划是要往西跑的，跑到几十里外的元山子火车站去上火车，如果他真的跟我一起逃走，那就不能去元山子车站了，只能就近去明水河火车站。必须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从明水河火车站上车就增加了危险，可能被巡逻拐棍和管教干部抓住，但我又别无选择：他太虚弱了，根本就走不到元山子。我还给自己宽心，他就是走不动了，我背也能把他背到火车站的：我虽然体质也衰弱了，但他一个饿垮了的人能有多重……

我躺在窑洞里胡思乱想，天还没黑下来，骆宏远就来了。我惊了一下，说他：你这么早就来了，看护们不发现吗？

他说，天黑了出来才会引起注意：这么晚了你干什么去？

你出来没叫人看见？

我跟看护说了。到史思良那儿去一下：我觉得活不长了，要跟史思良托付一下后事。

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就叫他坐下休息，等待天黑再动身。

天很快就黑下来了，黑透了，从我的窑洞看出去，对面二十公尺处的岸坎都看不见了，我们就动身了。

我选择了窑洞旁崖坎最低的地方，把他推上去，我再爬上去，从窑洞头顶的荒原往南走。我们不能从山水沟里往南走，任何一个偶然走出窑洞或地窝子的人看见我们都会产生怀疑：大黑天的，这两个人要去哪儿？去干什么？那就要坏事。

从伙房后边几十公尺的地方走过去之后，我的心才放宽了一些：夜里没有人会来这个地方，漆黑的没有月亮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就是有人从伙房和场部办公室走出来也看不见我们。而且，据我的了解，巡逻的干部和积极分子不会这么早就出动，所以我们绕过了伙房之后就走到那条被来明水探视劳改分子的亲人们踩出的荒滩上的小路上来了。沿着人们踩出的路走省力。

为了节省骆宏远的体力，我叫他扶着我的肩膀走。

但是，走了不到二里路，他就走不动了。我把他的一只胳膊拉过来搭在我的脖子上，我的一条胳膊揽住他的腰拖着他走。我们的样子就像电影上演的一个战士搀扶着另一个受伤了的战友。

就是这样，又走了三二百公尺之后他还是走不动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他急剧地喘了几口气之后说，你走吧小高，我真走不动了。

我明白，他已经竭尽全力了，否则，一个有着强烈求生欲望的人是不会说出这样绝望的话来的。他比我大三十多岁，他不是个孩子，不是个意志薄弱者。我说，站起来，你站起来，我背着你。

他说，你走吧，你自己走吧，我的确是走不动了，你自己到车站去吧。

我说，你说的什么话，我能把你丢下不管吗！起来，我背你。

他说,不行,那不行。

我说,行,能行。你快站起来吧!

在我的拉拽之下他站起来了。我背起了他,我说了一声:抱紧我的脖子。

我背上他之后还掂了掂,心里就暗暗叫苦。他并不像我原先估计的那么轻:他虽然饿垮了,体质虚弱,但是因为浮肿,他的腰很粗,腿也浮肿了,他的脸肿得像个南瓜。他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像充了水的水囊,很大很重。

我背着他走了百多公尺,当我走到一片很暄的沙土地上之后,我就累得气喘吁吁,心跳得要从嗓子里跳出来。我的身体真是衰弱了,两腿发软,浑身出汗。我对他说,师傅,你下来一下,我们休息一会儿。

我放下了他。我们站着,我直喘粗气,我对他说,不行了,身体真不行了,才走了几步,你看我就成这样了。要是从前,我一口气能把您背到车站去。

他没说话,站着看我。我也看他,但我看不清他的面孔。天太黑了。黑沉沉的天空,黑沉沉的沙滩,只有密集的星星明明灭灭眨着眼睛,但星星的微弱的光照不亮人的面孔。空旷的沙滩非常寂静,只有强劲的夜风从我们身旁呼啸而过。河西走廊的西端,人说一年刮一场风,从初一刮到冬,但最大的风季是从10月刮到4月……

休息了一会儿,身体被风刮透了,汗水冰凉。我说,来,师傅,我们走。

我转过身来,弯腰背他,但是他躲开了,说,不要背,我不要你背。

我拉他,说,你来吧。

他推开我的手说,小高,你还是自己走吧。你前边走,我后边慢慢走。

我说,你胡说个啥呀!我前边走了,你能走到车站去吗?来,快点,我背着你。快,要快走,要不就赶不上火车了。

我说着话又一次拉他,但他又往后退了一步,说,小高,你听我说,你背不动我,再背就要把你累垮了;不光我走不了,你也就走不了啦。

我一惊,说,你这是说你不走了?

他说,我想走,但我估计错自己了,我走不到火车站了。

我说,那就我背你嘛。

他说,不行,我不能叫你背我。小高,你快走吧,你再要磨蹭,有人追上来,你就走不脱了。

他说得有道理,可能这时候管教干部或者拐棍们已经发现我和他逃跑了,已经来追拿我们了,但是,我哪能丢下师傅叫人捉回去,而我自己逃跑呢。

我说,师傅,这样好不好:你既然不叫我背,那就还是你扶着我的肩膀走。我们慢慢走,我估计,巡逻的人还得一会儿才能出来,说不定他们还没发现我们走了。

他说,发现了,肯定发现了,每天晚上都挨个地窝子、挨个窑洞查人数。

我拉住他的胳膊说,那就快走吧。来,我扶着你走。

我硬是拉着他往前走了几十步,他栽倒了。我又拉起他来,像战士扶着受伤的战友那样又前行了几十步,他又跌倒了。我再拉,就再也拉不起来了。

这时候我有点着急了,说,师傅,你得挣扎着走呀,坐下怎么办?叫人家把我们抓回去吗?再升个级吗?

他已经累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良久,喘息方定,说,我的确走不了啦,我不想连累你,你快跑吧。

我看他实在无力行走,而我呢,也已经喘得不行了,也是两腿发软,软弱无力,没有能力背他或者拖着他走了。我仰脸看了看天

空,看了看满天眨眼的星星,心乱如麻。我说:

师傅,你真走不动了,那我们就回去吧,我送你回去。

他因为喘息而低垂着的头抬起来了,他的嗓子发出惊讶的声音:你送我回去?你不怕升级?我说,升级就升级吧,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撇在这里冻死,或者叫他们抓回去。

他没有立即说话,他静了一下,以非常深情的口气说,小高呀,你怎么这么糊涂,跑掉一个总比把两个人抓回去好吧。反正我已经病成这个样子了,抓回去还能把我怎么样?送到饮马农场去吗?叫我进严管队吗?你可就不一样了,说捆你一绳就捆你一绳,说把你送走就把你送走……

我知道捉回去后的严重性,不是捆绑关禁闭就是正式逮捕送劳改农场,但我还是不忍心扔下我的师傅。

师傅看我不言语,又说,小高呀,你还认不认我是你的师傅?你要真把我当师傅,你就听我的话,你走,你快走!冻不死,你放心我冻不死!等一下就有人追上来了,他们会把我拖回去的……

眼泪突然就涌上了我的眼睛,我哭着说,师傅,回去后你可要保重呀……

师傅在地上坐着,挥了一下手:走吧,你快走吧!

我转身往车站方向走去。我走了几步,站住,脱下自己的大衣又回到师傅跟前:师傅,你躺下,躺下,我给你把大衣盖上。

师傅说,你快穿上,快走,路上冷!

我说,师傅,你就听徒弟一句话,躺下,我给你盖上,暖和些。我年轻,不怕冷。你坐着不动,会冻死的。

师傅说,你回家的路长,天寒地冻……

我说,师傅,你要不听我的话,我就不走了。

师傅立即就躺在沙土地上了。我把大衣盖在他的身上,蒙住他的头颅。他的声音还从大衣下边发出来:

快走……你快走……

我抹掉眼角上的泪水,大步向明水河车站走去……把我的师傅……扔在……扔在……

荒滩……

高吉义先生讲到这里,嗓门哽咽泣不成声,泪水从他粗糙的脸皮上流下来。他用像农民一样粗硬的手掌擦眼睛。我的心也揪紧了,泪水涌上眼睛。良久,我才问:

你的师傅还……在世吗?

高吉义先生原本下巴的嗓门此刻被泪水渍得苦巴巴的,涩涩地说: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1961年的4月,我从老家回到兰州,探听回到各单位的右派是如何安排的?不,我不是为了这事回兰州的,我是不放心师傅才回到兰州的。我根本就没回单位去,因为我早就下了决心,就是给我摘帽叫我回原单位当医生我也不回去了——我再也不当什么干部了,今后我就当农民,或是去当木匠,凭我的劳动吃饭过日子。回到兰州我问了几个右派,都说我师傅跑掉了。对于人们的回答我很吃惊:怎么会呢,他怎么会跑掉呢,他已经衰竭不堪了呀。对于我的提问谁也解答不了,他们说听管教干部讲的,我师傅逃跑了。且逃跑成功了。

就在我从兰州返回老家前的一天,我搞清楚了:我的师傅叫狼吃掉了。

我跟你讲了,我有一块梅花表被我们的分队长陈风林抹走了。离开兰州前的一天,我跑到商业厅陈风林家去要我的梅花表。我打听到他家的住址,敲门,进去的时候,可是把他吓了一跳。不是因为要表,而是因为看见了我:是他给我开的门,但门开了以后,看见我,他吓得尖叫起来:鬼!鬼……鬼来了!他扑通一声跌倒在地,身体筛糠一般哆嗦。他的家人听见他的尖叫跑过来扶他,我也去扶他,他竟不敢握我的手。好半天,他才惊魂稍定,才跟我讲了把他吓成那个样子的原因。

他说,那天夜里八点半钟,他和一个姓侯的小组长巡夜,发现我逃跑了,就向管教干部汇报了。管教干部叫他们两个人往明水火车站追我。追到半路上,他们发现了一件部队发的棉大衣。棉大衣血迹斑斑。他们每人拿着一只手电筒,用手电筒照照衣领里边,写着我的名字。他们在附近找了找,还发现一个被狼啃得只剩下一小块头皮的颅骨。于是他们认定我被狼吃掉了,就用手里提着的打狼棍挑着我的棉大衣回明水向领导汇报去了,没再往车站去追。

那件棉大衣是我在中医门诊部当医生时我的老师给我的。我的老师是名军医,曾经在北京协和医院学习,医术非常高,在中医门诊部我曾拜他为师。我和他都定成了右派,我是极右,他是中右留在兰州降职使用,我送夹边沟劳教。临走,他把自己一件还没穿过的崭新军大衣给了我,说酒泉那边冷。夹边沟的后期偷盗成风,怕大衣丢了找不回来,我在衣领处写上了高吉义三个字。

我当时问了陈风林:你们认为我被狼吃了,那么骆宏远哪去了你们知道吗?陈风林回答:过了两三天我才听严队长说骆宏远不见了。严队长说,这老家伙还真跑掉了,想不到,真想不到。他到底什么时间跑的嘛,怎么就没人知道呢!看来他的病是装出来的,迷惑人的!陈风林还说,严队长向管教股汇报了骆宏远逃跑的事,管教股就向白银市公安局和骆宏远的东北老家的公安局发了公函,请那边的公安局缉拿在逃犯骆宏远,但都没有回复。东北离明水农场也太远,领导就没有派人去追捕。

最后我才问陈风林,我的手表呢?陈风林说手表交给管教干部了。

高吉义先生讲完了当年逃离夹边沟的故事后又说,想不通呀,一辈子也想不通呀,我师傅之死是怪我呢还是不怪我呢。当初我要是不带着他跑就好了。带着他跑,跑不动我把他送回山水沟就对了……

我无言以对。高先生不停地抹眼泪。良久,我说,高先生,收拾摊子回家吧,花市都打烊了。

花市打烊了,但是我们从花市的小院子转出来,建兰市场灯火通明。市场的无数盏灯光和城市的万家灯火把兰州市的夜空照亮了,看不见一颗星星。

我和高先生约定,明天他向我讲述夹边沟农场有关狼的故事。

贼 骨 头

俞兆远先生是1958年春季被组织部门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的。此前他在兰州市西固区人委任工商管理科科长兼劳动工资科科长。他在夹边沟劳动教养几近三年,被送回兰州,继而遭遣送原籍金塔县监督劳动至1979年。有一次,邻居家一位妇女问他:听说夹边沟的右派都饿死了,你怎么没死掉?他回答:我是个贼里头打着不要的贼。

他说,他曾是夹边沟农场最出名的贼,可是他并非一去就偷东西。

右派们到了夹边沟,第二年就饿死了一百多,可那时他一粒粮食都没偷过。他出生在金塔县的农村,从小父母就教育他要做个老实人,要正直,本分。他的父亲是个乡村郎中,有点文化,他很小时就教他读《三字经》、《论语》和《孟子》。父亲还对他讲过“曾子之廉,不饮盗泉”和齐人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他满脑子都是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所以在夹边沟他的腿肿了起来,脚胀得穿不上鞋,头肿成了大南瓜,他也耻于偷窃。在饥肠辘辘人困马乏的日子里,他实在饿得招架不住的时候,就去捋草籽、捋树叶聊以充饥。他小时放过羊种过地,知道什么植物可食什么不可食。夹边沟东草洼生长着很多白刺棵。白刺棵有两种,一种开红花结红果,状如枸杞,能吃;其卵形的叶片捋回来拿开水烫一汤,挤干,捏成团就能吃。另一种开白花,也结红果,果实呈葫芦状,骆驼特爱吃,但毒性大,人不能食。有些城市来的右派不知道,把葫芦形的采来吃了,中毒死了。还有一种碱茅草,长很多枝

杈,开黄花,其状如千头菊。这种草籽炒熟了干嚼都行,咸,涩味重,却没毒性。

但是,到了1960年的春天,他突然就偷起粮食来了。

他眼睁睁地看着同屋的两个右派饿死了!

一个是永登县一中的教师,姓巴,名多学。巴多学解放前毕业于北京大学,永登县人。这是个胆小得掉片树叶怕碰破头的人,老实本分极了。在田野上劳动,别人摘个黄瓜给他,他吓得一把推开,说,你这不是叫我犯错误吗?此人在春天临近时躺倒起不来了,奄奄一息之际对身旁的人说,能不能给我一支烟?我想吸支烟。俞兆远从一位榆中县右派处要来一撮旱烟末,卷了颗烟,点着,放在巴多学嘴上。巴多学用他干枯得树枝一样的手指抖抖索索扶住了烟,吸了几口,闭上了眼睛。沈大文是甘肃农大的教授,留美博士,研究植物分类。他和俞兆远在一间宿舍比邻而眠已近两年。俞兆远来夹边沟之初,农场组织他们学习农业技术,沈大文还讲过课。这个人偷不抢,饿得不行了,就到草滩上捋草籽吃。他比巴多学躺倒还早几天,已经好些天失去行走的能力了,但他不愿麻烦别人替他打饭,每天去伙房的路是跪着走去再跪着回来。他在膝盖上用绳子绑着两只布鞋,以减轻膝盖触地的疼痛。巴多学死后两天的夜里,约11点钟,他把嘴对着俞兆远的耳朵说,老俞,我想吃个糜子面饼饼。俞兆远很惊讶,说,老沈,快到半夜了,我上哪里给你找个饼子去。沈大文说,求你给我找个饼子。实话,我这会儿真是想吃个饼……饼。老沈……俞兆远刚要说话,身旁的右派分子扬乃康捅了他一下:老沈可能不行了……俞兆远的头皮噌地麻了一下,穿上棉衣就跑到伙房管理员的房子去了,说替沈大文要一块糜面饼饼。管理员把他轰了出来:去去去!沈大文要一个饼饼,李大文也要一个饼饼,王大文也说要个饼饼,我哪有那

么多饼饼！无奈的情况下，他又跑到大队长^①梁敬孝的房子去，把梁敬孝从被窝里叫了起来，说了沈大文的情况。他之所以敢在半夜找梁敬孝，是因为他自觉梁敬孝对他不错，说不定会给他这个面子的。去年春播的时候，梁敬孝在地头上问，你们谁会撒胡麻？人们都说不会，就他说了一声我会。梁敬孝问你撒过胡麻？他回答，我十三岁就跟我嫂子种过地，那时我大哥抓了壮丁，家里就我和嫂子再加上我妈种地，我撒过胡麻。梁敬孝不信他十三岁种地，问他怎么撒胡麻？他抱了一个装着胡麻的升子走进田里，然后抓一把胡麻甩到升子上。胡麻撞在升子壁上就散开来，均匀地落在田里。他撒了几把，梁敬孝很满意，说行了行了，我再问你……你会摆耩不会？他又说会，我和嫂子种地的时候，要是犁地，就是我牵牲口，嫂子扶犁，种麦子的话，嫂子牵牲口，我摆耩。我那时力气不够大，就拴根绳子在耩上再套在脖子上，到地头提耩时往后挺脖子，耩就提起来了。梁敬孝又问，摆耩有个口诀，你知道不？他说，进地三摇摇，出地三不摇。梁敬孝说，你还真是个农匠！梁敬孝原想亲自给几个右派演示种胡麻技术的，此刻他说了声你们几个人听俞兆远的，他叫怎么种，你们就怎么种！转身就走了。尔后的日子里，凡是农业上的扶术活梁孝敬都派他去做。

这天梁敬孝果然给他面子，说，去，你跟管理员说，给沈大文两个饼饼。就说我说的。

俞兆远领到了两块糜子面饼子，总共五两^②，高高兴兴拿回去给沈大文吃了。他想，可能沈大文能多活几天了。

但是，翌日清晨起床的时候，沈大文静静地躺着不动。他喊了两声沈大文，也不回答。伸手摸了摸头，已经冰凉。

不到三天的时间里巴多学和沈大文相继命丧黄泉强烈地震撼

^① 夹边沟农场的劳教分子编制为两大部分：农业大队和基建大队；大队辖数个分队，每个分队约一百几十人；分队下边有大组，约30人；大组下边是小组，小组10个人。

^② 旧秤，一斤为十六两。

了俞兆远的心灵。做一个正人君子的信条在他灵魂深处动摇了。他想，沈大文有着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吃过很多草籽都没有中毒，却还是饿死了，我还能熬出夹边沟去吗？

能不能活下去，怎样才能活下去？这个问题他苦苦地思考了几天，终于做出了决定。一天在工地休息，他走到扬乃康身边坐下，试探着说，老扬，饿得走不动了，得想个办法呀？扬乃康无语。他又说，总得想个办法嘛，就这么等死吗？扬乃康叹了一口气说，有啥办法？我有啥办法。你脑子灵，你给我们想个办法嘛。他沉默一会儿，说，办法我倒是想了，就是做起来难度太大，不敢做呀——扬乃康的眼睛盯住了他：什么办法？你说，你想做什么？他没回答，扭过脸去。扬乃康追着说，说嘛，有啥办法你说出来嘛；说出来你要是办不了——还有我嘛。俞兆远觉得是火候了，便说，办法其实也简单，就是怕你不敢干。扬乃康催他：说嘛，你说出来，再说我敢不敢的事嘛！俞兆远说，好，我说我的办法。我的办法呀就是做无本钱的买卖。扬乃康一下子睁大了眼睛：你是说抢人去？劫道去？俞兆远说，看你说的！我能干那种事吗！我不想活啦！扬乃康说：那你的意思是……俞兆远说，我想偷仓库的粮食……你干吗？扬乃康沉默片刻，说，他妈的不就是一个死嘛！

三天后的一个夜晚，半夜时分，他们拿了一根准备好的竹竿，——竹竿的一头被俞兆远用瓷片削出四十五度的尖角——悄悄地来到了农场的粮库旁边。他们的脚步声惊动了粮库旁的一只大黑狗，狗汪汪叫了两声，朝他们扑来，但是他低沉地吼了一声老黑，那狗就不叫了。因为经常从库房拿种子和放回没播完的种子，大黑狗已经和他熟悉了。大黑狗像闻什么气味一样，在他的腿旁转了一圈，摇摇尾巴离去了。不过他和扬乃康没有动弹。——事先商量好的，等狗叫过以后还要看一看有没有其他动静。这是夹边沟农场最大的一个仓库，它的西头挨着磨面房，汽车把从外头调拨来的粮食拉到这儿来囤积，然后每天从库里出粮磨面，供夹边沟

和新添墩作业站的大灶使用。磨面房旁边有一间小屋,住着一个二劳改^① 专职看守仓库和磨面房。

果不其然,看守室的门轻轻地开启,一个黑影走出来,顺着库房走到东边的山墙,绕过去,从库房北边往西走去。那人回到看守室,才低沉地骂了一声,你这个瞎熊,胡吼啥哩!

一切又归于寂静。

走,上! 俞兆远轻轻地对扬乃康说。对这个仓库他们熟悉极了:库房里边砌了一堵墙,把空间隔成了一大一小两间,小间堆放着粮食种子。他还知道,靠着北边的墙壁,一麻袋一麻袋的麦种摞得比窗户还高。他们蹑手蹑脚地走到第一个窗户下边,俞兆远把一条床单展开来铺在地上,然后扶着墙壁蹲下去,叫扬乃康上他的肩膀。扬乃康的一只脚踩上他的肩膀试了一下,说,干脆我给你支架子吧,你不行。俞兆远说你快上吧,我就不信支不住你。扬乃康不再犹豫,两只脚都上了他的肩膀,说声起。俞兆远扶着墙壁往起站了两下,却没有站起来。扬乃康问怎么回事? 他回答真不行了,腿没力气。扬乃康说,蹲好蹲好,我下来。他下来后说俞兆远:我说我支架子,你非要……俞兆远说,好,你支架子,你支架子,我真是不行了。于是,他踩着扬乃康的肩膀被托起来。托起来也不太高,这个仓库很高大,它的透气用的窗户离地面约三公尺,俞兆远站在扬乃康的肩膀上眼睛刚超过窗户台。他一手扶窗户台,一手去推活动窗户,把窗户扇推开个缝隙。他把立在旁边的竹竿举起来探进窗缝,把窗口再推大些,顺势将竹竿捅进去。他看不见里边的东西,所以只能试探着往里捅。因为第一次做贼,神经紧张,心跳得有点喘不上气来了。他只好停顿一下,喘喘气,然后再捅。竹竿和窗棂的磕碰声本来很小,但在他听来如同打雷一般。他是怕狗叫起来,所以每发出一下磕碰声,他都要静一下倾听周围的动

^① 劳改犯刑满留场就业者。

静。

终于,通过手的感觉他知道竹竿触到了麻袋。这时他才握紧竹竿,举起,用力把竹竿插进去。然后他用两只手倒着收回竹竿来,摸了摸前端的竹筒。

竹筒里有几颗麦粒!

他的心突突地跳了几下,把竹竿斜过去,将麦粒倒在地下的床单上。他兴奋地说,插上了!扬乃康也很兴奋,用力挺一下腰板说,插上了吗,好,接着插,接着插!

他接着再用更大的力气把竹竿插进去……

后来扬乃康的腿颤抖起来了,说,不行了,我支撑不住了,下来吧。他小心地把窗户扇用竹竿捅一捅关上,说,好了,你蹲下,我下来。扬乃康是慢慢往下蹲的,但是他的腿一软,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了,俞兆远也摔下来。俞兆远摔得可是不轻。他的头撞在墙角的水泥地上,发出很重的响声,他痛得叫了一声。立即仓库那边的狗吠了起来。他们顾不得疼痛,卷起床单拾起竹竿撒腿就跑。但是跑出没几步远,狗就扑过来了。扬乃康往地下一蹲,做出摸石头打狗的样子,但俞兆远拦住了他说,,不敢打,不敢打,越打越走不脱!他发出很亲切的声音喊狗:黑子,不要吼,过来!那狗还真听话,不叫了,轻步跑到他跟前,围着他转。他摸了一下黑狗的头又说,回去,黑子,回去!那狗围着他转了一圈,跑走了。这时他才说一声跑。

但是事情变得麻烦起来,他们跑出去几十步,那个看守追了上来,拦住狗喊,追,快追,黑子!人和狗又一起追过来。那人还大声地喊,贼偷仓库啦,贼偷仓库啦!

这时他们已经跑到仓库北边的菜地附近,那里有两颗沙枣树,他们急忙躲到沙枣树后边。俞兆远说,跑不了啦,那狗日的身体好,跑多远都能追上,得想个办法。扬乃康紧张得嗓音都变了,说,你说怎么办?俞兆远没回答,朝着追过来的人影改变了说话的噪

音吼了一声：王八蛋，你还要追吗？想活不想活了！

那黑影看不见人，便也不敢贸然追过来，只是大声喊来人呀，贼偷仓库了！

俞兆远就怕他把人喊起来，于是，他加重了威胁的成分吼道：王八蛋你还要喊吗？再喊，我可要不客气了！

黑影说，嘿，你狗日的嘴硬，你有胆量给我出来！

俞兆远说，出来！你个王八蛋，不要给粉不知道往哪里擦！我劝你还是回你的房子去。你要是非跟我过不去，看我今晚上怎么做死你。

那黑影不出声了，狗却汪汪地叫着。俞兆远很明白，仓库附近农业大队的劳教分子们是不会从被窝里爬起来的，只有那些管教干部可能会起床。这是他最担心的，因为他们有枪。他便大声说，爷们，后会有期！我们走啦！

掩在沙枣树后边，俞兆远看那人还不动，就拉了扬乃康一把，两人大大方方走出沙枣树往东北方向的沙包走去。走了几步，看那黑影还站着不动，他们就加快了脚步。

大黑狗一声又一声狺狺叫着。

俞兆远和扬乃康没想到，第一次偷窃就充满了惊险，但又是如此成功：被人发现了而又轻易地逃脱了，还搞到了两斤小麦！他们没回宿舍，而是直接跑到东草洼，搜集些茅草，用饭盆煮熟，吃了。吃着香喷喷的麦粒他俩商量，过两天再搞一次。可是第二天傍晚，他们刚刚从田里劳动回来，梁队长带着几名拐棍^①突然搜查了机耕班的两间宿舍，把所有的铺盖都抖了一遍，把箱子也都打开查看。虽然没有查出什么来，但他俩立即意识到偷麦种的事领导已经判断出是机耕班所为，不能再偷仓库了。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第二天俞兆远借故去了一趟磨坊。他发现看守室门口的大黑狗被

^① 在劳教农场，管教部门任命一些劳教分子当分队长和组长，这些人被称为拐棍。

换掉了,原先干部灶门口的一只花狗被人拴在看守室门口。看见俞兆远,花狗就凶狠地吠叫起来。

尽管仓库是不能再偷了,但这次行动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俞兆远。春节期间的一个夜晚,他又袭击了伙房:在扬乃康的帮助下,他从烧火棚爬上伙房房顶,从天窗里把一根拴着铁丝爪的竹竿捅到面板上,钩出来一块发面团。他和扬乃康又跑到东草洼烧熟吃了一顿。

扬乃康是兰州市西固区委的宣传部长。他和俞兆远在单位上就很熟悉。

过完春节就开始拌种,这时俞兆远就放手偷了。每天收工时,他都抓把麦子装在鞋壳里,或者顶在头上再戴上帽子。他曾经给铁锹换了个竹竿掀把,把竹节打通,往里边装粮食,收工时带回宿舍。这样带了几次粮食之后,他的计谋被一位管教干部识破了。管教干部还跑到宿舍把他的书箱打开,发现他已经存了半箱子小麦。结果扣了他一顿晚饭,还拉出来开了一次批斗会。

拌完种开始春播,他又和其他人在地头偷麦种吃。按照当时的粮食供应量,一天一斤,粮食不应该那样紧张,可实际情况是劳改分子每天要劳动十到十六个小时,超重超常的劳动把人们的身体轧干了,一斤粮食不能提供身体所需要的热量,人员大批倒毙!

吃麦种不能在干活时吃,管教干部看见了会骂的,还要扣一顿饭。只能是休息时候,干部们到一边体息去了,机耕班的人们就围着麻袋躺着,一人抓一把麦种塞进嘴里。他们使劲儿搅动舌头,使得嘴里生出唾液来,把种子上的六六粉洗下来;再像鲸鱼吃鱼虾一样,把唾液从牙缝里挤出去;然后嚼碎麦粒咽下去。每天收工回到宿舍,吃晚饭的时候,灶上给的那一碗末糊汤^①谁都吃不出它是咸的淡的还是酸的。他们的嘴都被农药杀得麻木了。

^① 甘肃河西走廊地区,人们把面糊糊叫末糊汤。

第一次吃拌了农药的麦种,他的胃痛,痛得他在地头上打滚;全身出汗,汗水把衣裳浸透了。他认为自己活不成了。可是过两个钟头肚子不痛了,肠子咕噜噜响,拉起肚子来。拉了好几天,拉得连路都走不动了。过了几天再吃种子,胃痛就减轻了,也不拉肚子了。

三月、四月和五月不断地播种,种小麦,种胡麻,种苞谷,种高粱。种什么他们就偷什么吃。

六月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小麦开始扬花灌浆。这时在地里他们就揪麦穗,嚼,碾面水。到下旬麦粒还是绿色,但却有仁了,他们就放在手掌上揉搓,吹去麦衣子,吃绿麦仁。

七月,收获的季节,只要躲开管教干部的眼睛,人们就把衣裳铺在地上,提个麦个子过来,跺几脚,麦粒就掉下来了,就可以大嚼一通。

几乎是所有的人都在地头上偷吃麦子,但就俞兆远偷得凶。他不光偷着吃,还储存,把偷的粮食埋在草滩上或者田埂的某个地方,做上记号。他的第六感官告诉他粮食将更加紧缺。

他这种见吃的就偷,不管不顾地偷,还真是卓有成效:他身上的浮肿奇迹般地消失了,挽起裤管摞腿,摞不出坑了。而这时夹边沟农场已经饿死上百人了,还有几百人饿得走不动路了。

有一件事情是俞兆远的智慧所没有预料到的。1960年9月下旬,农场领导突然传达上级指示:夹边沟农场和新添墩的劳教分子,除去体弱多病者,全部转移到高台县的明水乡去。酒泉劳改分局决定在那里组建明水农场。指示下达的第二天,生产股的罗股长和两名干事亲自带领从基建大队和农业大队挑选出来的一百五十名年轻强壮的右派先行出发。俞兆远是其中之一。酒泉劳改局派来了几辆卡车把他们拉到酒泉去乘火车。俞兆远的心痛苦极了,藏在草滩上的粮食只能喂地鼠了!

好多年以后,俞兆远一提起那次转移明水的事就说,那是雪上

加霜。火车于第二天上午十点把他们拉到高台县的明水河车站。他们以为到明水农场了,可是罗股长告诉他们,他们一百多人的任务是往东走,去挖大干渠。他们扛着行李走到天黑时分,走到林泽县的新华农场附近的戈壁滩上。罗股长指着几间又破又矮的泥房说,就是这个地方。走近了才看清,戈壁滩上有一条与铁路平行的断断续续没挖成的渠道。罗股长说,这条渠要和张掖的黑河连起来,要引来黑河水浇灌将要开垦的五十万亩土地。

还在兰州当科长的时候俞兆远就听说过,省委计划要在林泽县和高台县建设一片全省最大的谷物场,但他不了解眼前这条开挖后又停工的干渠是什么人挖的——是征集的民工呢?还是劳改队?大干渠往东,每隔二华里就有一片破败的泥房,可见这里曾集中过很多人。

他们把几间破泥房清理清理住了下来,然后就开始挖渠。挖渠的工地离着住处还有几公里,他们每天早上吃过饭就扛着铁锨往东去挖渠,傍晚返回。

挖了四五天,就突然停工了。一名炊事员抬笼屉时掉进开水锅里,人们慌乱中将他打捞出来,身上的皮都酥了。别人想帮他,一扶胳膊胳膊上的皮掉了,摸哪儿哪儿掉皮。罗股长急忙组织人抬到新华农场医院去,医生们也手足无措,找车往县医院送,走到半路就命丧黄泉。这件事带来些许混乱,停了两天工。后来出工了,又挖渠,挖了七八天就又停了。原因是上边来了指示,口粮大幅度减少,从每人每日一斤减到半斤!右派们惊了:一天一斤尚且饿死人,吃半斤焉能劳动?人们议论纷纷,人心惶惶,天要塌下来的样子。罗股长也觉得问题严峻,怕继续挖渠会造成大批倒毙,便挨屋通知:先休息两天,看上级领导有什么新安排……

等了几天,什么新安排也没有。这时天也冷了,罗股长也不催着出工,右派们每天喝完了两顿末糊汤就都蜷缩在房子里睡觉,尽

量减少热量的消耗……

一停工俞兆远便忙了起来。他记着前几天在工地挖渠,看见东北方向很远的地方有一片绿色,像是庄稼地,估计种的不是苞谷就是高粱。他想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几个苞谷棒子或者高粱穗子。停工的第二天夜间,大家都睡觉了,他把一条用毛巾缝下的口袋塞进怀里,对睡在门口的段组长说了一声:老段,我去搞点吃的。段组长说去吧。小心点儿。他还把自己的长毛绒帽子给他,说,把我的帽子戴上,风大,夜里冷。

俞兆远戴的是棉布帽,还是来夹边沟的第一个冬季发的,太薄。

出了房子,俞兆远先顺着上工的路往东走,再朝东北方向拐过去。天还真冷,西北风刮得脸很痛。他把长毛绒帽子的帽翅放下来护住脸。这是个没有月亮的夜,四周漆黑,看不清任何标志,只能凭着感觉走。走了一会儿遇到个塄坎,朦胧的天光下他认出是一条水渠。顺着水渠走了很长一段,就进了苞谷地。一棵包谷一棵包谷摸过去。在他的想象中,农民收得不论多么彻底,总会丢下几个苞谷棒子的,但是,他摸过来摸过去好几趟也没摸着个棒子,连个秕穗穗都没有。

就在他觉得白来一趟很沮丧的时候,突然看见不远处有一块亮亮的黄楠楠,像是灯光投在地上的那种黄色,在夜幕中很显眼。朝着黄楠楠摸过去,近了,见是一间小泥房,黄楠楠是映着灯光的窗户纸。他悄悄摸到窗户跟前,听到有人说话,再用手指沾上唾沫戳破窗户纸,看见房子里坐着两个穿黑棉衣的人。他从服装上判定这是两个新华农场的二劳改。既然这样深的夜晚这两个人还没睡觉,那就是说他们在值班,在看守什么重要的东西。他这样想想,就离开窗户从西边绕到房前去。这是个瓜棚样的泥房,房前没有窗户,只有一扇门,门缝里透出窄窄的一束光线根本照不亮院子。但是他的眼睛敏锐地看见了一堆黑糊糊的什么东西。他挪过

去一摸，心就突突地跳了起来。天哪，竟然是一堆苞谷棒子！他忙忙跪倒，从怀里掏出口袋。

他装起苞谷来了。装了几个，他又停住，把长毛绒帽子的帽翅挽起来。他想到了要保持高度的警觉，要有敏锐的听觉，一旦有细微的动静就要作出反应。然后才又接着装苞谷。

他真是个惯偷了。他的装苞谷的动作很快，但又很沉稳。为了在袋子里装更多的苞谷棒子，他把每一根棒子都横着摆到袋子里，横上两层之后又从旁边竖着插上几个，把袋子的所有空间都利用起来。他装了五分钟，或者比五分钟还长的时间，袋子装满了。可是他还不满足，还在往里插，用力塞几个进去。然而，就在这时，吱呀一声响，泥房的门开了。一道煤油灯的亮光照在苞谷堆的那一面。他吓了一跳，身体本能地往下一伏，就再也不敢动了，只是抬着脸往门口看。他的心跳得像是要从嗓子里蹦出来，身体却是像掉进冰窖冷嗖嗖的。

门口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身影走出来了，站在苞谷堆那边撒尿。他希望那人撒完尿就进房去，但是那人撒完了尿却又转过身面朝着苞谷堆站着，往他这边看，连裤子都没系。他的心更是紧了一下：那人听见声音了？还是闻到气味了？还是感觉到了什么异常？他眼睛盯着那人，身体伏在地上，心突突地跳动。

他不理解，为什么那人不走，反而弯下了腰往他这边看，还往左边歪了歪头，后来又向右歪头，继续朝这边看。他想要坏事了，那人一定是看见他了，正在想着如何捉他。——虽然灯光没投在他的身上，但时间一长，那人的眼睛习惯黑暗了……一刹间他开始思考逃跑的问题：是扔下袋子跑？还是背着跑？扔下能跑掉，但他不甘心；背着跑是无论如何跑不掉的，这一段时间自己的身体变得虚弱了……

但是他没料到的事情发生了：他还没决定出怎么逃跑，那人却猛地扭转身体，几步跨进房去，嘭的一声关上了门。他听见房子里

一个人惊讶地问，怎么啦，出啥事了？另一个人慌慌张张回答：狼，外头有个狼！前一个声音问，你看真了？后一个声音回答，清清楚楚的，两只耳朵直愣愣立着。吃苞谷啦，狼吃苞谷啦！前一个声音又说，抄铁锨，快抄铁锨！走，看看去！

听到这里，俞兆远抱起袋子朝西就跑。奔跑中他听见门开了，凶狠的咒骂声传来：什么狼吃苞谷了，是贼偷苞谷了！追，快追！然后是咚咚的脚步声。

俞兆远的运气真好！他一口气跑了三四百公尺，越过了几条田埂，一道渠，摔了两跤。眼看着那两个人就要追上他了，谁知黑咕隆咚的看不清路，他扑通一声掉下一个土坎去了。掉下去他的大胯摔伤了，站不起来。心想这下非叫人家抓住不可了，就往崖根里挪了挪，一动不动地坐着。岂知这个土坎很高，那两个人追过来在土坎上站了几分钟，骂骂咧咧折回去了。那两个人走了好久，他也没动弹，他怕那两个人从旁边绕到土坎下边来抓他。他静静地坐了半小时，除了呜呜的夜风，再也听不见什么异常的声音，他才长长地松了口气，站起来。他的大胯很痛，走一步就剧烈地疼一下，但他忍着痛往回走。他心里很高兴。

但是，他从山水沟里走出来，在荒滩上走了一截，内心的高兴就很快消失了。他迷路了！由于乱跑了一阵，他搞不清自己现在的方位了，是应该往西走？还是往南走？还是往西南方向走？他很清楚，在10月中旬的荒滩上乱走一夜，会有什么下场！还有，他听见了凄厉的狼嚎。他犹豫了一会儿，又开始走。他想，应该往西走，住处在西边。他看了看天空的三星，判断出哪边是西。他是农村长大的，他知道这个季节三星的方向朝南，他朝着与三星垂直的方向走是正确的。

他很快地走了一截，思想却又被另一种思考所困惑：住处大致是在西边，但如果自己和住处擦肩而过呢？这是可能的，因为夜太黑了，看不见周围的景物。可是很快的他的心又被更紧迫的危险

攥紧了：狼的嚎叫声更近了，更清晰了！不是一只狼，而是两只。如果是一只狼，还可以周旋，而两只狼同时发起攻击的话，自己赤手空拳就无法抵抗了。

两害相权取其轻，他认为目前最大的威胁是狼，他必须首先躲开狼。他想了想，就加快脚步朝南走。小时候听父亲讲过，狼在一里之外就能够闻到食物的气味。现在狼是从西边走过来的，他必须往南走出一里远才能躲开狼。

他加快速度往南走，越走越快。他的心跳得厉害，神经绷得越来越紧。他已经忘记大胯的疼痛了。

后来，他几乎是跑着前进了。他清楚地听见狼的恐怖的嚎叫声更近了，似乎是狼已经闻到了他的气味，正在向他逼近！近在咫尺！他已经累了，身体发热，胸腔被大口吸进的冷空气刺激得像是撒进了辣椒末，肺又辣又痛，腿软得几乎要跪下来。脖子上的汗水向后背流下去，把衣裳浸湿了。不行了，再也跑不动了，再跑就要累死了！干脆停下吧，休息休息吧，听天由命吧！最后，这样绝望的念头在他的脑子里产生了，双脚放慢了速度。可就在这时，他突然听到狼的嚎叫声已经转移到他的身后去了。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他的心一下子松弛下来，瘫了。他明白，狼已经往东去了，西北风再也不能把他的气味刮到狼那儿去了！

他很高兴自己没被狼吃掉，坐了一会儿，叫心跳得匀称一些，然后就爬起来往西走。不能坐得太久，因为湿了汗的衣裳冰凉，冷得他受不了啦。快乐是双重的：走了没几步，他发现身旁不远的地方有几个土堆，走过去辨认一下，他差点快乐得叫出声来——天呀，他的身旁就是那条大干渠！顺着大干渠走下去不就是那片破泥房吗？真应该感谢那两只狼，他想。要不是狼逼得跑这一段路，今晚可能还要在荒滩上瞎走多少冤枉路。

但是，顺着大渠走了好长一段路，却仍然看不见住处。他糊涂了：莫不是已经错过了住处？跑了半夜，以他的判断该是走到住处

了！回头往东走吧，他又下不了决心——要是住处还在西边的话，不就背道而驰了吗？后来他还是接着往西走，他想再走一截试试，若是还找不到就往回折。结果还没走上半里路，就被一个什么东西绊了一跤。坐起来观察，是个小小的土堆。他更糊涂了：这是怎么回事，谁会在这种地方垒起个土堆来？在土堆旁转来转去，察看，思考。良久，他猛地恍然大悟：这不是那个烫死的右派墓吗？

又走了几分钟就到了住处进了泥房。段组长醒着，问了一声：回来啦？怎么这么长时间？他回答：迷路了，在野地里转了半夜。段组长问，搞到什么没有？他没说话，掏了六个苞谷棒子塞进段组长的被窝，然后摸到墙角上自己的铺位，摸着黑开了木箱，把苞谷一个个放进去。锁好。总共是四十二个棒子，段组长六个，锁起来三十二个，留下四个在外头，他钻进被窝，盖住头，慢慢地享用。苞谷的湿润的奶汁在他的咀嚼下渗了出来，甜丝丝的，那个香呀！

翌日晨起床，吃完了半盆末糊汤，俞兆远想好好睡一天，他大胯处的骨头昨晚上扭了一下，疼得厉害。可是罗股长吹哨子把人都集合起来训话，说，供应的粮食就是那几嘴，就是啥活也不干，也搪不住俄呀。你们躺下不动能行吗？今天都进山去，都跟我进山去，找吃的！我跟这里的老百姓打问过，他们说山沟里有一种黄药子是能当饭吃的。今天我们挖黄药子去。听说进山，俞兆远飞快地进屋，从木箱里拿出四个苞谷棒子塞进怀里，然后提着铁锹上路。他走得飞快，翻过铁路走进山谷的时候，已经把其他人甩开了二里多路。他是有意走这么快的，他想跑到大家前头，挤出时间，躲开人们的眼睛，烧几个苞谷吃。他一路走一路拾柴，进了山谷就拐进一道山沟点着火烧苞谷。他用大火烧，把苞谷皮烧焦了，然后剥掉皮啃苞谷。烧熟了的苞谷更香，啃完一个又啃一个，不一会儿就把四个苞谷吃完了。吃完了苞谷他又想苞谷芯子怎么办，——可不能叫罗股长看见，那是个严厉的家伙，知道了他偷苞谷，非扇他嘴巴不可——想来想去，就在离火堆不远处挖了个坑，把芯子埋

了,并在上边撒了泡尿。这时后边的人走过来了,蹲在火堆旁烤火。有的人也在他埋苞谷芯子的地方撒尿,还问,你挖着黄药子了吗?他回答,挖着个球!

不过,后来他专心挖黄药子还真挖到了两个。点上火烧熟,掰开,里面是黄面子,像烧熟了的红薯。大家掰着尝了尝,有点苦味。

过两天他又去了一次小泥房,且是白天去的。他的目的是踏勘一下,看还有什么可偷的东西。可是去了一看,苞谷不见了,那两个二劳改也不见了,房门上了锁。他扒着窗户往里看看,空荡荡只有一面上炕。这一趟也没白来,找到了一块没有成熟的落花生。他没见过落花生,但他看见了小小的秧子,挖出来又看见根上带着几个白蛋蛋,放进嘴里一咬,是甜丝丝的水泡泡。他读过一位作家写落花生的文章,因此他断定,这是二劳改们试种的落花生,没有成熟。他大嚼了一通水泡泡。回住处时还抱了一捆花生秧子,煮着吃叶子。有人问他吃的什么,他回答菜叶子。

经过侦察,他知道这附近的确没什么吃食可偷,于是就很节约地吃那些偷来的苞谷,一天吃一个棒子,细水长流。实在饿得招架不住了,就去那块地挖些落花生秧子回来煮着吃。

他们这些人在林泽的荒滩上又住了一个多月,时值十一月中旬,祁连山下的这片荒滩已是滴水成冰的季节,并且饿死了十几个人。再住下去也没什么意义,场领导就派拖拉机拉他们回农场去了。

在挖渠工地他们听到消息,夹边沟的人差不多都挪到明水来了,他们也都急着想回去,心想场部的条件会好一些。不料回到明水下了拖车,他们的心刷的一下就掉进了冰窟窿。

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相差甚远!

夹边沟农场虽然地处巴丹吉林沙漠,但是有农业大队的大杂院,有基建大队的四合院,还有场部的办公室和机关干部们的宿舍

房,还有农田还有水渠!这里却是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穴居在山洪冲出的两道山水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站在沟沿上往下看,地窝子大小不一,窑洞口挂着草帘子或是破棉絮遮挡风寒,景致如同50万年前黄河流域一处猿人部落的聚居地。惟一体现代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东边一条山水沟南端的高地上有几块长着糜谷的庄稼地,两间附近农民种撞田^①住的土屋,三四间新搭的茆茆草房。有人告知,那是场部和伙房。伙房旁有一口新挖的井。

此处被称为明水农场,是因为在东边二三里处有一条百多公尺宽的明水河。明水河徒有虚名:河道干涸了,只有下游的河坝里积蓄了一些雨季流下来的洪水。

更叫人心寒的是迁来这里的人们十之二三已经饿死,山水沟两边的荒滩和北边的河坝里到处是新起的坟墓。活着的人们也都苟延残喘,奄奄一息。半数人已经躺倒,能活动的人们在中午时分挪出洞穴在阳洼地上或坐或卧晒太阳。人们去伙房打饭的力量都没有了,开饭时炊事员提着桶往地窝子和窑洞送饭,给每个人抖抖索索举起的饭盒里舀上半马勺末糊汤。每天的定量是半斤豆面。

从工地上下来的一百多人被安置在西沟的十几孔窑洞里。西沟比东沟深,窑洞也大一些,一窑住四五个人,大的几孔能住十几二十人。据人们讲,在他们到来之前,领导把这些窑洞的人合并到减员较多的其他窑洞去了。那些窑洞的不少人此时在沟外的荒滩上长眠不醒。

右派分子们静静地生活着。他们平静地等候着最后时刻的到来。只有极少数不安宁分子采取了特殊的生存之道:逃跑。

俞兆远没有逃跑。父母在他的少年时代就把全家赖以生存的土地典出去,送他去上学,指望他给家庭带来荣耀。他跑回去父亲

^① 河西走廊干旱少雨,耕地均为水田,在没有水源的地方开垦的土地叫撞田,因为天下雨才有收获,无雨则无收成,有撞大运的意味。

一定会背过气去。至于回兰州的家,他想都没敢想:五尺汉子,如何藏身?他想,不逃跑,但要活下去!

于是,当大家躺在窑洞里喝末糊汤时,他拖着疲惫的双腿把明水农场的沟沟坎坎丈量了一遍。他的“丈量”是卓有成效的。东西两条沟之间有一块收获过的萝卜地,地边上有间类似瓜棚的小屋,门口堆着许多萝卜缨子。这是伙房的财产,——可能是农场花钱把全部萝卜买下来了——有时候劳教分子吃的末糊汤里放一些萝卜缨子。瓜棚里住着一个姓周的二劳改,负责看守这堆萝卜缨子。白天偷萝卜缨子是不可能的,瓜棚的门开着,那个二劳改就坐在门口晒太阳,打盹。夜里,有一盏风灯放在窗台上,窗子没有窗户扇,灯光正好投在萝卜缨子上。二劳改穿着厚厚的衣裳在炕上坐着,眼睛从窗户往外看,过上十分八分钟还走出来转一圈,手里拿个木棍。经过多次的侦察,俞兆远决定夜里去偷。他从很远的地方绕过去,贴山墙站着。等二劳改巡逻完进屋,他就四肢着地爬到窗户跟前。窗台把灯光挡住了一部分,窗外有一片短短的黑影;有一截黑影正好落在萝卜缨子上。他借着影子的掩护,很快地装了一袋子萝卜缨子。就三两分钟的时间,他已从黑影子下边退了出来,抱着口袋跑回窑洞去。他们窑洞住四个人,四个人搜集些茅草点火,煮着吃了三天。

三天后他又去偷,刚刚装了半袋子,姓周的二劳改从他身旁的田埂后边扑上来,狠狠打了他两棍子。二劳改说,狗日的,我等你三天喽!

他拖着一条被打瘸了的腿回到窑洞。他再也不去偷萝卜缨子了。他知道,二劳改谋到一个好差事也不容易,他们对工作尽心尽力是很正常的。等腿好点了,他就把目标转向了糜子地。在他们住的山水沟南端,也就是场部的南边,有一大片糜子地。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已近十一月下旬,那片糜子还长在地里,是种地的农民被征集去搞水利了?还是种撞田的生产队不看重这片糜子?但奇

怪的是有几个妇女看守着庄稼地,住在一间“瓜棚”里,时不时出来巡视。俞兆远和扬乃康合伙来偷糜子,到了糜子地附近,在田野上趴着。由俞兆远学狼嚎,一声扯一声的“狼”嚎声中,巡逻的妇女们都回到“瓜棚”去了。这时,他和扬乃康钻进糜子地,把糜子捋进口袋。俞兆远捋上几把糜子,停下来学两声狼嚎,然后再捋。捋满了口袋,两个人仍然学着狼嚎跑走了。糜子可是好东西,他们舍不得给别人吃,回去后把糜子埋在窑洞附近的崖坎下边。但是,第二天夜晚他们去吃糜子,发现埋下的糜子不翼而飞了。他们判断糜子被人偷了。——有些右派专门在窑洞附近或者崖坎下边寻找别人埋藏的食品。于是,他们第二次偷来糜子以后就向北走,走到山水沟北边的河坝里,埋在死者的坟头上,做好记号。每天夜里,他和扬乃康来这儿炒着糜子吃,或者生吃。生糜子嚼起来也很香,还有一股甜丝丝的味道。只是嚼碎了的糜子皮爱粘舌头,粘在嗓子里很不易吐出来,容易带来剧烈的咳嗽。

好景不长,十一月底,来了一群农民,风卷残云把那片糜子割走了。然而就在此时,俞兆远发现了一件奇特的事情,离他们窑洞不远的地方,山水沟的一个拐弯处,有一个弯。弯子三面是崖坎,另一边插着篱笆。这是农场的—一个羊圈,里边圈着七八十只绵羊。羊圈里头有个窑洞,住着两个牧羊人——兰州市的两个右派。这两个右派和其他右派不一样:他们的身体很健康,面孔红润,红得都有点发紫了。俞兆远不明白他俩为什么有着那样健康的面孔,问人。有人告诉他:每过两三天,放牧归来,两个右派就背回一只半死不活的绵羊来。人们都看见过,那只羊的屁股成了个血窟窿,肠子还往外耷拉着。牧羊人向队长汇报:羊群在野外遇到了豺狗子^①,豺狗子把羊屁股掏去吃了。讲故事的人说到这里很生气,说,这样的事出了很多次了,队长们不追究他们,只是叫他们把死

^① 豺。

羊交上去,照旧还叫他们放羊。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他们两个人吃肥肠,管教干部吃肉,把骨头给灶上熬汤,还说是给我们宰羊改善伙食了……

俞兆远听了故事一点儿也不生气,还开导那人:这事你生啥气呀,现在是啥时局嘛,——饿死人的时局,八仙过海各现其能的时局——你有本事你也吃肥肠去,吃不上不要妒忌人。接着他又问,那羊皮哪去了?那人回答,在梁队长的房顶上。

听说是在梁队长的房顶上,俞兆远立即就跑到农业大队办公室去了。看看梁敬孝不在,他便很敏捷的从房顶拽下两张羊皮,跑到河坝里去,点上火燎羊毛。羊毛是烧不干净的,燎得狠了羊皮就烤焦,燎得轻了,皮上剩下两毫米长的一层毛根。他干这种活很有耐心:慢慢地燎了一整天,将羊皮烤得硬夸夸黄澄澄如同马粪纸一样,然后撕成小块放嘴里嚼,美美吃了一顿烤羊皮。吃剩的羊皮拿回窑洞,给其他人一人分一块吃。扬乃康嚼着又脆又香的羊皮说,老俞,要是能回到兰州,就凭你给我的这块羊皮,我请你到悦宾楼吃一顿烤鸭。悦宾楼的烤鸭比不上你的烤羊皮的一半香呀!俞兆远的好日子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因为在明水农场的确没什么东西可偷了。

但是俞兆远的确不愿坐以待毙,又跑到草滩上去捋草籽。一天,他过了铁路进山谷挖黄药子,回来的路上看见了几根骨头棒子,就把它们拣了回来。山谷里有许多这样的骨头,他估计不是人骨,是兽骨。骨头经风吹雨淋变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说那东西没法吃也没营养,但他说,没啥营养是对的,可它总归没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这就行!他研究怎么吃骨头,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便放在火上烤着看看。谁知这一烤竟然出现了奇迹:白生生的骨头棒子被烤黄了,表面爆起了一层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来,拿舌头舔一舔刮下的粉末,无异味,尚有淡淡的咸味。于是,他把几根骨头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单上集中起来,居然

凑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面一样把它放进嘴里嚼，咽进肚子。后来，他们全窑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滩上搜集兽骨……

吃了两天骨头棒子，十二月上旬，队长就把他调到西沟的病号房当看护去了。

十一月中旬，死人到了高峰期，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党委书记蒋洪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蒋洪：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蒋洪灰溜溜回到农场，想来想去决定成立病房，想办法少死几个人。于是，管教干部们亲自动手，把全场饿得爬不起来的几百人集中在山水沟南端的十几间大地窝子里。每个地窝子盘个炉子取暖，并且派两个身体好点的人做看护。看护人的任务是开饭时炊事员送来了饭，他俩把每个人的饭盒收集起来叫炊事员打饭，然后送到每个人的手里；还要给病号们端屎端尿，叫病号躺着别动，减少热量消耗。病号们每天夜里十点钟有一顿加餐——场长指示，每天宰两只羊剁碎了熬汤，再加点胡萝卜、菜叶子，给病号增加点营养。

看护人还有一个任务：把死了的病号用被子卷起来，捆好，拉到门外放着，再把新病号安置在空出的位置上。俞兆远是个聪明人，他发现夜半时分病号死亡的多，——他们人睡后再也醒不过来——于是，每到半夜，他就把所有的病号叫醒，叫他们坐着说说话，少睡点觉。有些病号烦他这一着，骂他：滚开，烦死人了，连觉都不叫睡！但他不生气，笑嘻嘻把病号拉起来坐着。他笑着说，你狗日的要是不起来坐一会儿，死了可不要怪我。

由于他奇特的护理方法，他的病房里死亡率最低。

当看护期间他没偷过什么东西，因为一间病房有三四十个病号，忙，顾不上偷。结果，仅仅半个月的时间，他的身体迅速地跨下来，他的脸和腿肿了起来。

也真是巧得不能再巧了，就在他非常悲观地认为离死不远了，

将步那些死难者的后尘走进酆都之时，西北局兰州会议的精神传达下来；纠正省委的左倾路线，抢救人命。十二月中旬，明水农场来了一辆大轿车，把“病情”最严重的人拉到新华劳改农场去休养。作为护理员，他忙里忙外搀扶病号上车。一辆轿子车，座位和过道都塞满也只坐了五十个人。车要开了，梁队长叫他也上车，说是到了新华劳改农场还要他伺候病人。他忙忙地回自己的窑洞去拿行李，看见扬乃康在窑洞门口晒太阳。他又急急地跑去找梁队长，说扬乃康不行了，也叫他挤上去把。梁队长同意了，他走回去搀扶着扬乃康上了大轿车。

这五十一个人到了新华劳改农场，住在两间学校的教室里，地下铺了许多麦草。在这里他失业了，因为有一批从上海“收容”来的无业市民、妓女、舞女和旧政权的一些职员正在这里劳动教养，领导从他们当中抽了十几名姑娘伺候这些病号，端屎倒尿。

在新华镇农场，俞兆远又接着偷。虽然他也享受病号的待遇，一顿一碗很稠的加了肉末的大米粥，但是他总觉得饥饿难挨，每天吃过了饭，就到处溜达。一天，他进了一间办公室，看见墙根上立着两麻袋大米。他就盯上了，坐在办公室门口装成晒太阳的样子，等待时机。后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出去了一下，他立即溜进去把大衣的口袋装满了大米。还在明水当护理员的时候，他拣了一位死亡者的灰棉布大衣穿在身上取暖。然后很快地走出来又倚着墙晒太阳，嗓子里还发出哼哼唧唧的呻吟。这时工作人员回来了，并且发现大米被盗了，嘴里喊着米叫人偷了米叫人偷了，跑了出来。工作人员看见了晒太阳的俞兆远，问他，你看见有人进来过吗？他回答，是有个人进来过，是个穿黄大衣的。问那人往哪边去了？答，往西走了。那人匆匆往西追了过去。他从容地站起来，大大方方走向病号房去。他把扬乃康叫起来，扶着他走到外边去，找个没人的地方，两个人嚼生大米。

也不知道何种原因，过了三四天，一辆大轿车开到新华农场把

他们又拉到了明水农场西边十五公里处的碱泉子农场，住进一间库房一样的大房子。在他们到来之前，明水农场的另外几十名体力衰竭者已先期到达了碱泉子农场。

在这里，他们被告知，休养几天，身体好点后就送回兰州去，可是情况却进一步恶化：没有肉粥了，粮食供应又回到每天半斤豆面。死亡继续蔓延！

碱泉子农场也是个劳教农场，这里也在饿死人。

糟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俞兆远也走不动路了。碱泉子农场也有很多从上海“收容”来的妇女，领导叫她们伺候这些右派，端屎端尿，但俞兆远不习惯这种服侍还是坚持自己上厕所。谁知有一天去了厕所，蹲在茅坑上他居然站不起来了。他用双手触地想先撅起屁股再抬起上身，不料手一软一个跟头栽倒了。他在地面上坐了一会儿，有人进来解手才把他扶起来。这件事把他吓了一大跳：他想可不能躺着等死了，必须搞到吃的。

人只要不放弃生的追求，就总能绝处逢生。俞兆远多年后讲到夹边沟的时候这样对我说。他说在厕所摔倒的第二天傍晚，吃完了糊糊汤，他慢慢地在碱泉子农场的角角落落溜达，想找点能吃的东西。突然几挂马车驶了进来停在粮仓门口。碱泉子农场的管教人员叫来一帮劳教分子卸车。车上是一麻袋一麻袋的蚕豆。有的麻袋破了，卸车时蚕豆洒在地上。他想上前捡几颗蚕豆，被管教干部喝退了。他想，可不能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就围着马车转呀转呀，琢磨怎么搞到蚕豆。突然他发现这天的月亮很亮，月亮把库房的暗影投在院子里，其中一挂马车的拉套马正好有半截身躯站在暗影里。办法马上就有了：他从很远的地方绕过去，潜入库房的暗影里，慢慢地接近了拉套的马匹。他跪倒，四肢着地从马的两条腿之间钻过去，在马肚子的掩护下又进到辕马身下，然后钻到车下边去。劳教分子们正在卸粮食，管教干部站在一旁监视，但谁也没看到俞兆远已经爬到车槽下边了，一下一下地划拉地上的蚕豆。

他把大衣的两只口袋都装满了蚕豆，然后又小心地从马腿之间爬了出来。可惜的是刚刚爬到库房的暗影里，他以为安全了，往起一站，突然一阵头晕目眩，眼前迸发出一片耀眼的白光，猝然摔倒了。他摔倒的声响惊动了一位管教干部。

这个管教干部叫人把他拖到梁敬孝住的房子，说，你看你们的人干的好事！他把俞兆远口袋里的蚕豆掏出来叫梁敬孝看。梁敬孝看着他的手说，啊呀呀，人都晕过去了，你还做啥嘛！那位管教干部愣了一下，转身走了出去。

俞兆远回到大房子之后，把偷来的蚕豆分给身旁的人吃，一人几颗。他自己多留了一些，躺在被窝里蒙上头嚼上几颗，再嚼上几颗。生蚕豆的粮食味竟然香醇无比。

明水农场的右派们在碱泉子农场“休养”身体的时候，省委派往夹边沟的工作组正忙着联系车皮。1960年1月1日，右派们接到通知：今天要走一批人。为了保证右派们平安回到兰州，从张掖地区医院抽来了几个医生，挑选病号中的“健康者”先走。检查到俞兆远了，一位医生叫他站着，用手捏了一下大腿。俞兆远干瘦的大腿哪经得他的一捏——扑腾一下倒在地上。他就说，不行，这个人不能上火车。

过了几天又送一批走，梁敬孝事先通知他：你想走不想走？想走就精神些。于是，俞兆远把身上的劳教服脱掉换上从家里带来的三年来一直当枕芯的棉袄，并且洗了洗脸，从梁队长那儿借个剃须刀刮了脸。当医生检查到他捏大腿的时候，他咬着牙挺住没有摔倒，连哼都没哼一声。这时候梁敬孝很默契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看这小伙子，多精神！医生看了梁敬孝一眼说，叫他上车吧。

这天是张掖地区派来的大轿车把他们拉到高台火车站的。黄昏时分火车进站，人们蜂拥上车。火车在高台站就停五分钟，人们都着急，使劲挤，竟把俞兆远挤下站台去了。他从车下边站起来想爬上站台，但是爬了几次，用尽全身力量也上不了站台。这时人都

上了车,要发车了,兰州市公安局来接他们的张科长吼他:快上来,火车要开了!他说,我是想上来,但我上不来!就叫火车轧死算了!张科长说,你想死呀,我还不能叫你死!他一把将他拉了上来,推上车去。

车到兰州,几辆大卡车把他们拉到省委组织部招待所。进了招待所,他立即到处巡视,看有什么东西可偷。他看见招待所餐厅外的墙上挂了许多一把一把扎好晾干的芹菜,当天夜里就偷了一把。吃完了招待所供给的大米粥,他和同房的人又煮芹菜吃。招待所的大米粥很好吃,煮得很软,还加了许多肉丁。只是一顿只给一碗,吃了饭就跟没吃一样,胃空荡荡的很难受。第二天晚上他又去偷芹菜,却发现已经被人收起来了。但是他看见了厨房门口的泔水桶,把手伸进去捞了两把,桶底有许多煮米饭煮糊了的锅巴。他回客房拿个洗脸盆来捞了半盆,拿到水管子上冲洗了一下,又拿回客房煮了煮,几个人分着吃了。过两天他又侦察什么有东西可偷,竟然在张科长住的房子里发现后窗户台上放着几摞烧饼。他认出来了,这是返回兰州时坐火车,餐车供给大家的烧饼,张科长全买下了,一人只分了一块,剩下的现在全摆在房里的窗台上。他绕着房子转,看到后窗户上有一块玻璃碎了,掉了一半,可以伸进手去,但却没法下手,因为房子里总是有人。看见那么好的烧饼摆着却吃不到口,他心里急得要命,就总是围着那间房子转来转去,寻找机会。恰好一天的上午,他从餐厅出来,看见张科长和几个警察去会议室开会去了,他认为机会来了,就急忙跑到张科长房间的后窗户去。到了窗户跟前,却又发现房子里还留了个被人们叫做小李的青年警察,他还是下不了手。这可怎么办呀,不能失去这个机会!他略一思考后就跑到前门口去,捏着鼻子学服务员的声音,娇声娇气地喊,小李呀,张科长叫你到会议室去一趟。听见小李应了一声,他转身就跑到山墙处躲起来。他原想把小李支开,然后从前门里进去,但是小李走后他过去看看,门被小李锁上了,进不去。

他又绕到房后去，从碎玻璃处伸进手去。

小李进了会议室，问张科长，你叫我有啥事？张科长一怔说，我什么时候叫你了？小李说，噢，一个女的在门口喊，说你叫我。张科长说哪有的事……但他立即就反应过来，说，快，快回去，调虎离山计，有人偷东西了。

俞兆远的手是伸进去了，但是没想到那几摞烧饼正放在耷拉在窗台的窗帘上，无论手怎么伸过去，都拿不到烧饼。他正在琢磨如何拿到烧饼，房门就突然开了，小李跑了进来。眼看着煮熟的鸭子要飞了，他一着急就用力伸长手臂去拿烧饼，扯动了一下窗帘，结果烧饼全掉到地下去了。他看偷窃无望，抽出手来就跑。他跑到东边，正好两个警察从山墙后边迎过来，就又掉头往西跑。没跑上几步，又见张科长提着手枪堵住了去路。他只好站住。

张科长走到他跟前，手枪指着他的肚皮说，啊呀俞兆远，你就偷疯了，在碱泉子农场偷，到了兰州还偷！你怎么是这么个贼骨头？你再偷，你再偷我把你一枪崩了！

因为偷窃失败，俞兆远非常沮丧。此刻听了张科长的话，他把大衣敞开了怀，用一只手指着自己的肚皮说，你朝这儿打，你朝这儿打。你把我一枪打死算球喽！

张科长摇了摇头，无奈地说，你不偷就不行吗？

他说，那有什么不行呀，我不偷当然行呀，你给我几个烧饼吃，我不就不偷了吗？

张科长说，俞兆远，我先把话说明白，那烧饼我一个也不吃，可是我也不能叫你吃。我要是把烧饼给你，你早就没命了！你知道不知道，你们的肠子现在比纸还薄，不能一下子吃多了。吃多了肠子就挣断了。俞兆远说，这你就说错了。我的肠子是薄，可那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炼出来的，啥都扎不破。夹边沟的树叶子扎不破，芹菜秆秆扎不破，烧饼能扎破吗？张科长瞠目结舌半晌，说，这是大夫说的！

俞兆远在招待所休养了一星期,他女人接到通知来接他回家,书包里提着花卷。临走时,张科长嘱咐女人:你可不要乱给他吃的呀,出了这个大门,要是胀死了,我可不负责任。

出了门两口子坐公共汽车到自由路火车站去乘开往西固区的市郊列车。在站台等火车,俞兆远对女人说,给我个馍吃。女人不给他。女人说,张科长说了,你们刚吃过午饭,不叫我给你馍。俞兆远突然就哭了:

在夹边沟饿了三年,没吃的,差点把命送掉;回家来了,你还不给馍吃……哎咳咳咳……

女人怔住了,良久才明白原委,掰了半个花卷给他。看着他的吃相,女人也哭了:我哪里知道你吃不饱呀,你来信就没说过吃不饱的话,一次也没说过……嗯嗯嗯嗯……

后记:在金塔县城建局家属楼的一间住宅里,俞兆远先生讲述完了夹边沟的故事,又补充说,哎,说起我做贼的事,丢人得说不成:回到西固的家中,三个月过去了,我的腿已经有力气走路了,可是肚子还是饿得受不了。一天到晚心里就想着吃的,还特别是想吃生粮食。做熟了的饭菜不管吃多少,心里总是空荡荡的。有一天女人上班去了,我偷着把面柜柜上的锁子捅开了,用一个大茶缸子挖了一缸子苞谷面,放在我的书箱箱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用小勺勺舀着吃上几口。生粮食吃着那个香那个甜呀……要是不吃那么几口就上床,就半夜半夜的都睡不着觉,肚子咕噜噜咕噜噜地响,那个难受呀……我吃生粮食的习惯,直到1962年冬天才克服掉,因为那一年女人要和我离婚。在法庭上,她提出的离婚原因之一是我偷面柜柜里的苞谷面吃,还非要生吃不可!她说她忍受不了这种侮辱:邻居们都知道了,她克扣丈夫,不叫丈夫吃饱,逼得丈夫偷家里的粮食……

医生的回忆

A 何希金

我原在甘肃省第二劳改管教支队当医生,给劳改犯们治病,当然也为劳改支队的管教干部们治病。1957年11月,我被宣布为右派,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当时,第二劳改管教支队正在修建兰州到白银市的铁路,支队的干部和近二万名劳改犯在黄河北岸干旱山区的崇山峻岭里风餐露宿,劈山开路,遇水造桥。

甘肃省第二劳改管教支队的前身是陕西省的一支劳改队,解放初修建西安到宝鸡的铁路。铁路往西延伸进入甘肃境内,就改为甘肃省第二劳改管教支队了。

五十年代的劳改队,都是在野外作业,生活异常艰苦。支队的干部和卫生所的医生们数九隆冬或者酷暑三伏住宿在帐篷或者山洞里,穿着和吃食跟劳改犯差不了多少,所以听说叫我到河西走廊劳动教养,我的胆子差点吓破了,心想这一去就没命了。

没想到我竟然有这么好的运气:到了夹边沟农场就遇到了原二支队的一位大队长申有义。我和申有义还有点交情,他是甘肃省临洮县人,科级干部,在第二支队管一个两千多劳改犯的大队。我们在一起开过会,也给他看过病;我作为支队的医生到他那个大队去给犯人看病,就住在大队的办公室里,和他住一顶帐篷。1956年,二支队有一帮劳改犯刑满释放后根据当时中央政策——户口为东南沿海一带和户口为城镇居民的劳改释放人员不准回原籍

——由他押送到夹边沟农场就业,同时他也调到夹边沟农场工作。夹边沟农场始建于1954年,最初是劳改农场;1956年改为就业农场,科级建制。1957年我到夹边沟的时候,它又改为劳教农场,场长叫刘振宇。申有义念旧日之情把我安排到农场医务所当医生。申有义那时候任夹边沟的教导员,权力大得很,和刘震宇平起平坐?

医务所只有一个正式干部赵杰任所长,其他的医生都由右派充任。我记得名字的有兰州医学院的教授刘逢举,有解放前当过军医的邓立之,有古浪县医院的医生王某某,——时间长了,当时人员换得又勤,叫王什么我记不清了——还有个韩某某……

所长赵杰是起义人员,原国民党少校军医,医术高明。我到夹边沟不久,他就调酒泉劳改局医院去了。后来刘逢举也调走了,可能是到马鬃山煤矿去了。

赵杰走了,医务所没所长了,总不能任命个右派当所长吧,领导就把新添墩作业站的医务室负责人陈天堂调到场部来当所长了。陈天堂狗屁不懂呀,不会写处方,不懂医学术语,可人家抗美援朝当过卫生员,共产党员,正式的管教干部,领导也信任。

陈天堂调场部医务所之后,新添墩的医务室又没人当领导了,可能是申有义说话了,把我调去充任临时负责人。筷子里拔旗杆呗。

我去新添墩不到两个月,就遇上了一件事。

新添墩有个右派叫何希金。此人原本不该来夹边沟的:他也是转业了的志愿军下级军官,可能和陈天堂是同一批转业的,——五十年代中期,酒泉地区转业了一批从朝鲜归国的志愿军干部——原在敦煌县气象站工作。这是个年轻人呢,二十几岁,福建省人。此人已经结婚,爱人是五五年支援边疆建设的天津青年,有个不到一岁的孩子。何希金身体不好,在朝鲜战场上受过伤,切掉一个肺叶。他经常来医务室看病,我给他开过几次病假条,后来干脆

给领导建议,给他安排了个轻省工作。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天上午,右派们出工去挖排碱渠,他提着铁锹排着队从我身旁走过,我正好到右派们住的房子去看病号,和他迎面相遇。他对我说,赵大夫,我有病了。我说你有啥病了?他说拉肚子了。他不是找我开病假条的,我们只是偶然相遇,他也就那么说了一句话,同时拉起裤腿叫我看了一下,我看见了他的腿上有排泄物淌过后留下的痕迹。他说完这句话就下地去了,可我心里挺难受,——一个大小伙子,稀汤子控制不住流得满腿都是,真是遭罪呀——这天晚上吃过饭以后,我就到他宿舍去了一趟,给他写了个休息三天的病假条。我就有这么一点点权利,最多只能开三天病假。不过事情真是凑巧。他休息的第二天,夏收开始了,新添墩的站长赵家生到医务室来找我,说统计工作忙,叫我帮着作一下统计工作;我也是要送医到地头,忙不过来,就说何希金病了,在宿舍休息,叫他给统计员帮帮忙去吧。这件事我还真做对了,何希金一帮忙做统计工作,整个夏收就没再下过大田。夏收结束,换了一个流落红军袁明才做站长,新来的站长以为他是前任领导安排的统计员,就一直叫他在办公室里当起统计员来。

由于我对何希金做过这么点好事,何希金就经常到我的医务室来,没事的时候在一起说说话。他对我说过,他找的对象是个很漂亮的天津姑娘,还说结婚时他曾去天津看望过岳父岳母。岳父岳母对女儿能在遥远的敦煌找到他这样一个转业军人很满意,说对女儿未来的生活放心了。他还对我讲了他当右派的过程。他说他原来定的不是右派,是坏分子。原因是有一天夜里在气象站值班,填写气象观测的纪录,应该走出房子去观测仪表之类的设施,可是他偷了懒,嫌外边冷,——那正是五七年初冬季节——就随便按着往常的观测数据填上了。其实,那天从新疆电报传过来的数据,已经说明寒流东渐,他却没注意就把自己瞎编的纪录传到酒泉去了。结果那天夜里寒流袭击了敦煌、安西、玉门和酒泉。为此,

上级给他定了个坏分子,决定下放他到敦煌县的棉花试验农场劳动锻炼。但是他们单位反右派的数额没凑够,就把他又戴了一顶右派分子帽子,送到夹边沟来了。

夏收结束了,种过小麦的土地也都翻了一遍,晒地。以河西走廊的气候条件来讲,夹边沟一年只能种一季庄稼,可是,这年八月底酒泉地区气象站发出的预报说,今年的秋季雨水将比往年多。正是大跃进的年代,夹边沟的领导们便突发奇想,要再种一茬秋田——小糜子——增加收获。于是紧急从外地运进了生长期六十天就能成熟的小糜子,全场紧急动员起来播种。

种糜子的第一天,吃早饭之前,大车组的几辆马车就提前把一麻袋一麻袋的种子拉到北滩上去了。——新添墩作业站的耕地和新开垦的处女地都在北边的草滩上。开过了饭,右派们便端着洗脸盆提着铁锹浩浩荡荡地开到田野上去。端脸盆的人撒糜子,拿铁锹的人把晒干了的土块打碎就行了。

播种也就进行了两个多钟头,这时候场长刘振宇和教导员申有义骑着马到新添墩来了。我是医生,虽说在医务室当个临时的负责人,但还是右派,是没有资格参加干部们的会议的,所以那天刘振宇把几个干部召集起来开会,会上研究了什么,是没法知道的。我只是知道那天刘振宇召集干部们开会,做出决定那天不播种了,把北滩上播种的干部和劳教人员叫回来,要开个全体劳教人员的大会。正好何希金因为当统计没下地,站长就叫他去北滩通知播种的人们回来开会。

新添墩作业站有七八百名劳教分子,除去一个副业队和其他的勤杂人员,那天下地劳动的大概也有五六百人,散布在北滩几千亩的土地上,要把这些人都叫回来需要跑很多路。叫人就叫人吧,可是他犯了个错误:由于是播种,每个分队和每个组的地头上都堆着几麻袋种子。他跑到每块地头叫人,都抓两把糜子吃。结果,人叫回来了,他吃糜子也吃多了。回来后口渴,又舀着喝了两碗水,

水就把胃里的糜子泡胀了,胃疼得厉害。胃疼了你就赶快来医务室呀,把情况说明我们采取个办法给你处理一下呀,可是他没来医务室,跑到操场上开大会去了。

开会的时候他的胃就胀得受不了啦,他又不敢说,硬是坚持着,在地上坐着。等到开完了大会,他就站不起来了,胃胀得痛呀。硬站起来往医务室走,走几步就蹲下,忍一会儿疼,站起来再走几步,再抱着肚子蹲下。他来到医务室的时候,胃疼得他已经站不住了,也坐不下。他一进门,就靠墙根蹲下,强忍着剧烈的疼痛,他的眼睛里眼泪哗哗的。

我问明了情况,知道问题严重,立即就采取措施,把一块胰子叫人搓碎了,泡成胰子水叫他喝下去,想刺激他的胃,叫他恶心,叫他呕吐出来。但是我失败了。糜子吃得太多了,把胃撑大了,他的胃已经失去了收缩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惟一可采取的办法就是手术了,切开他的胃,洗胃,可是新添墩根本就不具备这条件:没有手术室,连把手术刀都没有,消毒用具呀,缝合线呀也都没有。当然,场部医务所也没有这样的条件,应该送他去酒泉劳改医院。于是我立即给场部医务所的陈天堂挂电话,要求把何希金送到医务所去。可是陈天堂问清了什么病和发病的原因之后说了一句:不要送来。我听了有点着急,说,你不叫送去,我这里又没办法处理,人死了怎么办?他说,你那里不能处理,我这里就能处理吗?我说,我知道你那里也不能处理,可是你有权力往外送呀,送到劳改医院去手术呀。他说话的口气变了,变得很严厉:谁给你的权利?你还指挥起我来啦——往外送!要你来指示我?听他说话的口气,我立即就哑口无言了。他是所长,我是囚犯,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我怎么敢对他表示不敬呢!但是放下电话后我还是不甘心,一种人道主义的责任感逼迫着我:不送出去手术,何希金就没命了,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我鼓足勇气找申有义去了,我说申教导员,有个病号的胃就要穿孔了,要没命了,你叫人派个车送到劳改

局医院去吧。申有义说,这事你跟陈天堂去说就行了,找我干什么?我说我请示了陈所长,陈所长不叫送。申有义说,陈所长不叫送吗?啥病,这个人到底啥病?我本想打个马虎眼把病人送出去就行了,但他仔细地问起病情来了。我不敢编瞎话,把实情讲了。申有义听完立即就改变了态度:是偷着吃下糜子的吗?不要管,就按陈天堂的话办。我说不行呀,申教导员,要是不送出去手术,这个人必死无疑,啥办法都没有呀。申有义一直是给我面子的,但这时他面孔一板严厉地说,叫你不要管你就不要管了,说这么多话做啥?我喏诺而退。

陈天堂不叫管,申有义也不叫管,但是我不忍心呀。那是一条命呀,他跟我说过,他有个漂亮的女人,还有个不到一岁的孩子,他一死,女人靠谁去?孩子靠谁去?整个下午,我和医务室的两个医生都在想法子抢救何希金的生命。我们采取了灌肠的办法,把胰子水管进肛门。粪便是冲出来了一点儿,但那仅仅是肠子里的,他的胃却胀得满满的纹丝不动。我们把凡是医务室有的,能刺激他的胃的针都打过了,把泻药给他吃了。时间已经到了黄昏,他的胃依然没有动静。胃胀得鼓鼓的,叫人看着都害怕。他睡在治疗室的床上,但根本就躺不住,一个劲儿地哼哼,翻过来翻过去。胃疼呀!

明摆着这个人做一个简单的手术就能活下来,但我们不能做这样的手术,没条件,我们三个人的心难受呀。我们甚至把不该想的办法都想了:从厕所里舀来半碗粪汤子叫他喝,想刺激他的神经,叫他呕吐。他自己含着眼泪真喝了几口,但仍然没起作用。结果弄得他嘴里臭烘烘的。只好又端水给他洗嘴。

这里有个小插曲要跟你讲一下。这天傍晚,就在我们想尽办法抢救何希金的时候,敦煌县法院来了个人。原来是何希金的爱人向县法院起诉,要与何希金离婚。法院已经判了他们夫妻离婚,来人是来找何希金谈话,要他在判决书上签字的。法院的人找了

新添墩的领导,领导把我叫去,说明了情况,叫我领法院的人去见何希金,叫他签字。我告诉法院的人:何希金病重,正在抢救,现在谈不了话,也签不了字;你先住下,等抢救过来之后再谈话吧。当时作业站的领导也对那人说,何希金真病了,你就明天再谈吧。是我把法院的人领到客房去的。新添墩有几间空房子,里边盘着土炕,是专门为探视的亲属们设置的。但是那人进了房子看看,那肮脏的土炕和齷齪的被褥令他直皱眉头,他不想住,说是一定要现在就何希金谈话,然后他连夜就要返回酒泉去。没办法,我只好领着他去见何希金。他进了治疗室,看了看情况,对何希金说了几句话,但何希金哪里有精力跟他说话呀,正在床上蜷着腿唉呀连天地呻唤,他这才回到客房里去了。

我也不知道这位法院的工作人员这天晚上睡觉了没有,翌日清晨,天还没亮,他就来敲我的门了。他说现在立即就要见到何希金,办完了事他要早早动身回酒泉去。我告诉他:你没必要去见何希金,你的目的不就是要他在判决书上签个字么?叫他同意离婚吗?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你可以回敦煌了。那人似乎没明白我的意思,睁大眼睛瞪我,说,你一定要叫我立即见到他一下。我只好再说明白点:

何希金于凌晨一点钟死亡。

那人还不相信,说一定要看一眼何希金。我只好打开了治疗室的门,点上灯照亮已经安静下来的何希金叫他看了一眼。何希金嘴张着,满嘴的糜渣子。

何希金的尸体在治疗室放了半天,刘振宇不叫埋。等到这天中午,右派分子们吃了午饭,午体过了,排队去工地时候,他叫人把何希金的尸体抬到院子里摆着。他叫分队长们把队伍领到尸体旁参观,并且大声地说:

这就是偷粮食吃的下场。看你们还偷不偷粮食!

何希金是我在新添墩遇到的第一例死者。他是胀死的,不是

饿死的。

B 医务所所长

你要了解陈天堂的事呀,说不全,这个人的情况我说不完全。我和人家不是一类人:我是个右派,阶下囚,到夹边沟劳动教养的,受人管制的,不敢说不敢动,啥事也不敢打听;人家是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共产党员,又是正式的农场管教干部,管我的。我跟人家坐不到一条板凳上……

不过,毕竟我在夹边沟农场当了三年半大夫,跟他在一个办公室办过公,所以还是知道一些他的事,他的为人。

他是河北省正定县人,抗美援朝回国时三十多岁了。有两个姑娘,一个儿子。

这个人医疗水平差,拉丁字母写的药名都不认识。我还记得这么一件事:调到新添墩作业站不久的一天,我到场部医务所去拿点药,古浪县的右派王大夫告诉我:你去了新添墩,陈所长来了,把药房里你贴好的标签都改了一下:把拉丁文药名下边标上了中文名字。王大夫还告诉我:陈天堂开处方只是开成药,中药药丸或者西药的药片,那些配合着用的原料药不会用。至于水剂他就更不会用了,连浓度都不会算。但是人家政治觉悟高,——这是后来邓立之大夫告诉我的——有一次有个右派去看病,他在处方上这样写的:此人把上衣左边的口袋撕掉了,留着右边的口袋,这表明他仍然坚持顽固的资产阶级右派立场……

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0年10月的事情,夹边沟和新添墩的右派除了老弱病残者之外都调到明水农场去了,新添墩作业站就撤销了,我又回到夹边沟场部医务所去工作,和他在一间房办公,给病人看病。有一天他到病房转了一圈回来,在办公室对我说,有个武威来的右派,思想反动得很,这事要向管教科汇报一

下。我问出什么事了,他回答,那个家伙唱歌,把歌词“跟着毛泽东走”唱成“赶着毛泽东走”,你说他反动不反动!我当时心里惊了一下,这样的事真要是汇报上去,这个右派可就倒大霉了,可是我又不相信他说的话,这个右派就这么蠢吗?在公共场合竟然敢唱歌骂毛主席?于是我偷偷地跑到病房里去问那个右派:你是不是当着陈所长的面唱歌了?右派说唱了。我说你唱的哪支歌,你再唱一下。那右派说唱的《跟着毛泽东走》,并且又对我唱了一遍。这个右派唱完,我心里才踏实些了。这支歌里有这样的歌词:走,跟着毛泽东走。由于武威人鼻音重,唱出来的“走”字像是“周”的音,“跟”字像是“赶”的音,政治嗅觉敏感的陈天堂就认为这个右派是在骂毛泽东了。我回到医务所之后就对陈天堂讲了,不是人家故意那样唱的,是武威人鼻音重,发音不准所致。他不信,叫我举例证明,我就学着武威人的口音把“中国共产党万岁”说了一遍:共共共产党万岁。他这才半信半疑不去追究那个武威右派的立场问题了。

陈天堂自认为参加过抗美援朝,又是共产党员,狂傲极了。有一次一个病号来看病,他突然大喊起来:坐好,坐直了!你就是这样跟党员干部说话的吗!他把那个病号委实给吓了一跳。

前边我跟你说的都是些小事,其他人都知道,但是有几件事,是其他人都不知道的,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今天跟你讲一讲。

新添墩作业站有个叫贺秉灵的右派,是个上海人,解放前两年跑到台湾去工作的。那人是搞成本核算的会计,在台湾的一家公司工作。大陆解放了,他就和上海的家人失去了联系。可是他特别想家,——上海有他的父母,有女人和孩子——思念之情特别强烈,想回大陆来。五十年代中期他从台湾跑到香港去了。在香港,他和国内的朋友联系上了,在朋友的帮助下到了广州。他原本跟帮助他的朋友说好的,回到大陆之后要回上海去,跟家人团聚。可是到了广州就由不得他了,安排他回国的有关部门告诉他:你的工

作我们给你安排到玉门油矿了,你去玉门油矿工作吧。结果就连家人都没见着,就被人送到玉门市来了。在玉门油矿工作了才一年多,就定为右派了,送到夹边沟劳动教养。

这个人的肠胃不好,从到夹边沟以后,一直水土不服,常年大便不成型,所以常来卫生所看病。时间长了,跟我熟悉了,就把他的历史讲给我了。

夹边沟农场一年四季就没有星期天,只有下雨下雪的日子才能休息。右派们有这样的顺口溜:祁连山戴帽(下雪),右派们睡觉。再就是重大的节日休息——像“五一”呀,“十一”呀,春节呀。遇到重大的节日,提前一天要搞卫生。在劳教农场,对于搞卫生是非常重要的,要搞个人卫生,还要搞集体卫生,完了还要检查。这种检查,阵容是非常强大的,场长和教导员参加,管教科的科长和干事参加,还有大队长带工队长以及拐棍们都要参加。当然医务所长和我这个医务室的临时负责人也要参加。为什么要组织这么庞大的阵容检查卫生呢?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是检查安全问题:看是不是有人私藏武器和凶器了,是否偷了粮食了。每个人的箱子枕头都要打开,褥子都要卷起来看看铺下边。哪怕是一颗钉子也要收走。

可能以前的几次检查陈天堂都没太注意吧,1960年春节的一次检查结束后,他在新添墩的医务室里说,啊呀呀,你注意贺秉灵了吗,从台湾来的人和其他人就是不一样。我问怎么不一样了?他说你没看见吗,他那个铁皮箱子里有那么多贵重东西,金项链,玉石镯子,国债券那么一沓子……还带着金表,穿着西装!我记得我当时说了一句:那有啥奇怪的?那是他在台湾八九年的积蓄,给家里人带的……

就是这个贺秉灵,这年夏季的时候突然肠胃病又犯了,可能是吃了什么不洁净或者不适的食品,一连几天泻肚,用什么药都止不住。原本就虚弱的身体哪禁得住这样折腾,他立即就躺倒了。

1960年的春天开始,经过两年劳累和饥饿折磨的右派们开始了不可遏止的死亡,什么药对他都已经无济于事。像贺秉灵这样得了急症的人是必死无疑的。但我可怜他,仍然想尽点人道主义,便打电话给陈天堂,要求把他送到场部去住院。陈天堂在电话里问什么病,我说可能是中毒性痢疾,很重,一定要住院。他说送来吧。

那天贺秉灵去场部,是新添墩医务室的中医大夫武威县人杨万仓去送的,马车拉去的。马车走的时候已经下午三四点钟了。是我和杨万仓把他从宿舍里抬出来放上马车的。考虑到他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我们把他的行李和箱子都装上车去了,心想叫场部医务所去料理他的后事吧。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怕他去住院了,这些东西放在新添墩被人偷掉。1960年的劳教农场,人们的思想境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偷盗成风。

马车拉着贺秉灵走了,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马车和杨万仓还没回来,陈天堂就打过电话来了。他第一句话就说你们怎么把一个死人送来了?我当时愣了一下,诧异地说,没有呀,贺秉灵活着呀,上车的时候还能说话呀。他在电话里呵斥我:胡说,明明是个死人嘛!人死了没有我还看不出来吗!

听他在电话中如此严厉地训斥我,我不敢再辩解了。我想这是怎么回事呀,莫不是路途上的颠簸迅速地加重了病情,造成了死亡?于是我支吾着回答:人从这里走的时候还能说话来的,可能是路上突然……突然死亡了吧。他便又说,送的是病危病号,为什么不带急救药?他严厉的口气真是把我镇住了,我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便只好检讨:哎呀,是我疏忽了,是我疏忽了,怪我,怪我,我没想到病情发展会那么快。听我做检讨他才改变了口气说,以后要注意呀,注意再不要出这样的事情。我唯唯诺诺回答,我注意,我以后注意……

放下电话,我的身上出了一层汗。我是个右派,由于我的疏忽致使病人死在路上,这种事领导不问便罢,一旦要问,要追究,我可

是负不起责任呀！

我的心忐忑不安。我等着杨万仓一回来，就立即去问他贺秉灵为什么那么快就死了？可杨万仓告诉我：我们的马车还没进场部，刚走到炼钢厂那儿，陈所长就迎上来了。他在路口上等着我们哩。他看了看病人，就骂开了：你们怎么把个死人送来了！我说怎么是死人呀，明明还有气嘛，还呻唤着哩。可他不叫我说话，一顿臭骂，叫把马车赶进炼钢厂。病人直哼哼，不断地摇头，不愿意下车，但他硬是叫人把病人抬进大房子里，把我们打发回来了。

我和杨万仓在一起议论了很长时间：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呢，是不是陈所长觉得那人反正是活不了啦，干脆就放在炼钢厂去等死吧。

夹边沟农场在五八年大跃进的年代里曾在场部西北角，从新添墩进场部的路旁建过两座高炉，炼钢，还盖了两间大房子。到了五九年的冬季，那儿就改为医务所的太平间了。死了人先抬到那儿放着，然后由场部安排人去掩埋。

但是，这件事在我的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翳，叫人迷惑不解：怎么能在人还活着的时候送进太平间呢！

这个谜后来我自己一步一步解开了。

时间过得很快，到了1960年的9月，也就是贺秉灵死去两个多月，夹边沟农场开始迁场了：劳教人员凡是能走路的都调到高台县开辟明水农场去了，包括新添墩的人。夹边沟场部和新添墩作业站只留下二三百病号和老弱病残。这时候场领导做出决定，干脆放弃新添墩，把老弱病残都转移到场部来。我就又到了场部医务所当医生，和陈天堂在一间办公室给病号看病。

在场部我又遇到一件怪事。我有个亲戚叫鲁昌林，解放初是省教育厅的办公室主任，是个文化名人。后来省博物馆建成，就把他调到博物馆当馆长去了。反右的时候，上级的指示是博物馆要他完成四个右派的任务，可他只揪出来了三个。上级就一而再再

而三地催他还要搞出一个来。有一次把他催急了,他就跟上级说,我这里再也抓不出右派来了,你们看着办吧,实在凑不够数字就把我算上一个把。好,抵触反右运动,反动言论!就给他也戴上了右派帽子,送夹边沟劳动教养。鲁昌林岁数大,身体弱,六零年九月没有去明水农场,这时就住在场部的病房里。——这是夹边沟农场最艰苦的几个月,农业大队的宿舍有一半改成了病房。有一天他听说我有时候去酒泉医药公司给医务所买药,就拿出存折来叫我去替他取点钱,从县城的黑市上买些烧饼。夹边沟农场是设有储蓄所的,还有邮局和商店。当初右派们来夹边沟劳教,都是带着一些钱的。最早的时候,右派们的钱是由财务科登记保管的。后来,右派大批涌来,这笔钱的数目很大了,财务科长姚文华是个小心谨慎之人,怕以后出什么问题他担责任,每当右派来场报道的时候就把储蓄所的工作人员叫来,现场办理储蓄业务。存款折就拿在右派们手里,用钱时自己到储蓄所去取。

那天我拿了鲁昌林的存折去储蓄所取钱,填写了取款单,可是工作人员不给我钱,要我去找陈天堂,开个取钱的条子来。我当时很惊讶,问为什么要陈天堂开条子?工作人员说,是陈天堂和他说过的,凡是住院的病号取钱,一定要他开条子,目的是防止住院的病号取了钱逃跑,还为了防止病号偷窃存款折盗取他人的存款。我对储蓄所的这种做法很是不以为然,说,你们银行的工作要受医务所的制约吗?你们的上级有这种规定吗?工作人员回答上级没这规定,可是这是你们的所长说的,我就这么办。你不去开条子就不能取钱。

我那时三十岁,既年轻气盛,又有一定的生活阅历,我想我虽是右派,但你银行还管不着我,也不能把我怎么的,我就强硬地说,好,你把你说的话给我写个条子,就说取钱必须要医务所长开条子。我找你们的上级去,问一问是不是右派取钱就一定要劳教农场的某个领导开条子。

听我要去找他的上级,年轻人再也不吭声了,如数给我取了钱。

这件事我原本没当回事,取了钱也就作罢了。可是,当天晚上,在医务室陈天堂却问起我来了:你今天去储蓄所取钱了?我说是,他非要叫我找你开条子,我和他干了一仗。这不合理嘛!陈天堂立即就开始给我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劳教人员逃跑或者盗取现金,他和年轻人商量的办法。他还说他已经给储蓄所讲过了,以后我再去取钱就不要他的批条了。他还说我:你不要到县上银行去反映这问题了,银行那年轻人是配合咱们做工作,也是好心。

这件事他不解释倒也罢了,他一解释,我的心里倒是起了疑云:在银行取款的问题上,他和银行工作人员是不是有什么默契?比如某个病号死了,存款折上还有钱,他去取出来两个人私分……我之所以这样怀疑,是因为病房里每死一个病号,都是他亲自去料理病号遗物的,包括存折、国库券、手表和其他细软。

但是,我也仅仅是怀疑而已,因为我不知道他拿到死者的存折或者国债券之后,是否登记造册了,是否上缴组织了。我又不敢到领导那儿去询问或是反映这个问题。——一旦知道我跟他做对,他整我可是再简单不过了:轻者下放我去大田劳动,不用几个月我就会累垮饿垮;重则编造个什么罪名就可以把我送进劳改队。

天下的事情真是再巧也没有了,事情真相终于被我无意中发现了。

那是这年十一月初的一天上午,上班不久,我和他在办公室坐着,农场的书记张洪走进来了,说老陈你来一下,我们研究些事。张书记像是很急,有点紧张,陈天堂立即站起来跟出去了。过了不一会儿,我就听见外边有人喊开会,医务所窗外的空地上集中了农场的干部和凡是能走动的右派。原来是张书记接到酒泉劳改局的电话了,说是中央的一个什么工作组住在张掖县,今天早晨出发来

夹边沟了。张书记紧急召集夹边沟的干部和劳教分子们开会，布置搞卫生，做准备，以应付工作组的检查。那时候，夹边沟已经死掉几百名劳教分子了，农场领导和干部们怕工作组来了挨批评，大祸临头。

那天我没出去开会，因为来了个病号，我正在给病号看病呢。就在病号走后我写病历的时候，突然有人敲了一下玻璃窗。我的桌子靠着窗户，我扭头一看是陈天堂正站在窗外向我招手，他的脸贴在玻璃上。我凑近窗户问他什么事？他说，看看，看看我的抽屉锁上了没有？那个年代的办公桌还没有暗销，是在抽屉旁的木框上装个铁鼻，再挂上一块圆形的铁皮，外边上个挂锁。一个挂锁能锁两个抽屉。听了陈天堂的话，我应了一声：哦，我给你看看。我的桌子和他的桌子并在一起，我懒得站起来走到他那边去，就趴在桌子上伸过胳膊去拉了一下抽屉。他的抽屉没锁，我一拉就开了。抽屉拉开后我惊了一下，因为我看见他抽屉里装了满满一抽屉国债券。我当时一愣，立即就告诉他：没锁，我给你锁上吧。抽屉拉开容易，关上就很费事，胳膊用不上力，我就走过去把抽屉推上了，再把那块圆铁片挂上，再把锁子锁上。就在我推抽屉的时候，我还发现里边还装着一摞一摞的人民币。

这件事叫我明白了很多事：为什么每个病号死亡的时候，陈天堂一定要亲自守在病号身旁？为什么死亡后他要亲自处理善后？为什么储蓄所取钱要他开条子？为什么贺秉灵还没断气就被他送进了太平间？

夹边沟的右派们释放回家之后，我还被留在夹边沟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一千五百名死者编写病例。夹边沟的领导们心里很清楚，这些人的死亡不是他们某一个人造成的，不会追究哪个人的责任。但是他们清楚，这些人都不是正常死亡，这终归不是好事，他们必须掩盖一下死亡的非正常原因。当然了，作为一名劳教的右派，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否接到了上边哪个部门的指示。

我给没有病历的死者编造了病历,给病历不全的人补全了病例。假如将来有人翻阅这些病历,——如果病历不给人毁掉的话——他将会发现这些人死亡的原因是很正当的,无可怀疑的。我编造了很多死亡的病因:心力衰竭,心脏病复发,肝硬化,肝腹水,肠胃不适,中毒性痢疾……这几年人们都说市场上的假冒伪劣产品太多,有人感叹那些厂家和商人造假的能力鬼斧神工。还有制造假学历的,出卖假职称的……其实,他们的造假比起我来只能是小巫见大巫,自叹不如。如果给造假的人评职称,我应该评大师,应该颁发巨奖,享受国家级专家的待遇……

我在造病历的时候还注意过一个问题。我造病历,是按照农场提供给我的死亡者花名册上的名字造病历的。死亡者花名册上还有其他栏目:遗物。我发现,所有人的遗物栏里都是写着床单呀,褥子,棉袄裤两件……没有一个人的栏目里填写存款折、国债券、现金和手表。我为什么注意这个问题?因为我把贺秉灵送上马车的时候,把他的箱子也装上车了。为了防止箱子被偷,我们征得他的同意把金项链、国债券和现金都装进他穿的西装的口袋里了。还因为我知道有些病号在死亡前并没有把存款折上的钱取完,因为陈天堂不给他开条子,或者他已经无力去储蓄所取钱了。五十年代,许多年轻干部在定为右派走进夹边沟的时候,身上有几百上千元的国债券,因为他们是外地人,还没成家,他们的国债券都是随身携带的,而国债券是不能当钱花的,银行也不储蓄国债券。为什么很多人有许多国债券?你年轻,你不知道:五十年代国家还很穷,为了筹备资金,国家大量发行公债。你是干部,你是工人,你进步不进步,你热爱党不热爱,就看你买了多少公债。许多人为了表示热爱共产党,为了表现自己进步,勒紧腰带买公债。

说到哪儿了?我还接着说陈天堂的抽屉吧。我不是拉开陈天堂的抽屉了吗?陈天堂站在窗外也看见我拉开了他的抽屉,他也就明白我发现他抽屉里的秘密了!当然,他也是害怕我把这件事

给他抖落出去,于是他想了个办法:第二天早晨上班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办公桌抽屉里出现了一块大罗马。看见了大罗马,我立即就明白了,他是在贿赂我,拉拢我,想用大罗马堵住我的嘴。

我没有动那块大罗马。不知道那块大罗马他是从哪位死者的手腕上捋下来的,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贪此不义之财。我也没有声张这件事。他是共产党员,我是阶下囚,一旦张扬开了去他一恼之下反打我一耙,我就是浑身長嘴也辩不清呀。

那块大罗马在我的抽屉里静静地躺了几天,后来又不见了。我估计,他是观察了我几天,见我既不上他的钩又不告发他,对他没什么损害和威胁,就又把大罗马拿走了。毕竟一块大罗马那时要卖二百多元,而他一个月的薪水才是六十多元。

我在夹边沟工作到1961年的7月,把全部死者的病历伪造好之后,农场领导就叫我回原单位了,但是原单位以已经开除公职的理由拒绝接受我。后来我就回到老家当农民去了,直到1978年落实政策。

陈天堂的女人是1959年从河北老家迁到夹边沟来的。他的大女儿十八岁了,嫁给了夹边沟的一名管教干部。1960年冬季的时候,这个出嫁了的女儿得了肺结核。女儿病情很重,应该使用链霉素治疗,可他不懂,竟然给女儿打吗啡。他觉得吗啡的效果比链霉素好。——女儿不再咳嗽,不再呻吟。我当时说过他,你不要总给姑娘打吗啡。医药公司一年就给咱们农场十几支吗啡,你可要控制点使用。你把它用完了,一旦有个特殊病例就没办法了。他听了我的话十分震怒,训斥我:怎么,你不叫我的女儿用吗啡?要把它留给劳教分子!我只好住嘴了。过了一个月,吗啡使用殆尽,他女儿的病越发严重了,只好送到劳改医院去治疗。

夹边沟农场1967年撤销,我听人说他和女婿都调到下河清农场去了。女儿在下河清死子空洞性结核病。

我又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在新添墩的时候,有个天津青年,是

敦煌县文化局的干部，右派。他的工作是演员，取了个敦煌的姑娘。他在新添墩劳动不到一年就病了，是肝炎。我把他送到场部医务所住院去了。住了半年医院又回来了。他的肝炎转化为肝硬化了，回来后也干不了活，我就叫他在宿舍休息，不下大田。后来他的病情严重了，我给陈天堂打电话要送过去住院，陈天堂不叫送。就是这个不叫送的天津青年有一次跟我说，陈所长什么时候来新添墩，你一定要叫他到我的房子来一趟。过了一段时间，他的病愈加严重了，已经垂危了，——他的眼神已经散了——他又对我说，你打个电话给陈所长，叫他现在就来一趟，我要见他，有话跟他说。我说你口气还大得很！你想见陈所长陈所长就来吗？是打个电话就能叫来的吗？天津青年说，你打去，你打电话去，他肯定来。他不敢不来。听他话说得斩钉截铁的，我就去打电话了，结果陈天堂还真来了，骑个自行车来的。于是我把他领到那青年的房子去。那青年躺在炕上，陈天堂进屋后叫了那人的名字，说，我是陈天堂……那青年听见他的声音了，招手叫他过去。他过去了，爬上炕坐在那青年身旁。那青年就摸他的手，摸他的胳膊。摸着摸着，手摸到陈天堂的脸上，然后就狠狠地抓了他的脸一把。他惊了一下，哎哟叫了一声，从炕上跳了下来。那青年过了半小时就咽气了。

我也不知道那个青年人为什么抓陈天堂一把。从那以后，不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不去病号身旁了。

C 马大哥

我再给你讲个文化名人的故事。

夹边沟农场劳教的右派当中文化名人是不少的，像师大外语系的章仲子，那是国民党政府编译局的权威，大翻译家。中国几个著名的翻译家都是他的学生。改革开放以后名噪一时的美学家高尔泰，“六四”以后逃跑到国外去了，那时候就在新添墩劳教，原是

兰州十中的美术教师，南方人。

我要讲的是天水市政协的王鹤鸣。这个人我印象太深。我在兰州上师范的时候，就知道他出生于诗书之家：曾祖父是道光年间的举人，曾任皋兰县儒学教谕、兰州府教授，咸丰四年截取知县，造封通议大夫，官至三品；祖父初为禀生，咸丰年间举人……他的父祖更是惊人，清朝末年进士及第，任翰林院编修。到了他这一代，虽无什么功名，——清王朝已经消亡了嘛——却被父亲送到美国威廉斯大学学习土木水利工程专业。归国后又一再拒绝出仕，就在水办私学……教育救国，名闻遐迩。

由于家世渊源显赫，本人历史清白，所以解放后当了天水市政协的副主席。

他是甘肃省著名的书法家。

我是怎么知道他的家世的，就因为我在兰州上师范的时候，班里有个他的老家的同学，多次给我讲过他的家族史；在夹边沟，有个天水政协的右派也对我讲过。我对他很敬重，他来看病时专门问过。

后来我调到新添墩去了，但是他的情况我还是不断听到。

从1959年元月开始，右派们的口粮减少到了三十斤，继而又减到二十四斤，于是偷窃之风日盛：种苞谷的时候偷苞谷，种洋芋偷洋芋。夏收的时候，只要管教干部和分队长看不见，人们就把腰里缠的床单解下来铺在地上，把麦捆子放上去踩几脚，把掉下来的麦粒收集起来偷偷地煮着吃，或者埋到地下，放到没什么东西可偷的冬季挖出来充饥。

可是他从来不偷，别人把偷来的粮食给他，他也不吃。

王鹤鸣瘦瘦的脸，瘦长条身材，干不动重活，——那年他就五十多岁了——领导照顾他到副业队割芨芨草，编筐子。开荒和平田整地的活很重，筐子损坏太快，农场自己编省钱。

有一次，那还是1959年秋天，我从新添墩到场部去，正好从场

部的麦场边走过，看见王鹤鸣和几个老弱病残在麦场边编草席，就走过去问了一声：哎，王老汉，你们怎么编起草席来了？

在夹边沟农场，人们是不能叫同志的，也不敢叫先生，互相之间都叫老李老张，或是直呼姓名。由于他和我不是同代人，不便称他老王，我就学着本地人的称谓叫他王老汉。

王鹤鸣抬起头看我，说，哦，是赵大夫呀，你来了？

他招呼完了我，但没回答我的问题，又垂下头编席，我就又问了一声：喂，问你了，为啥不编筐了，编起席子来了？

他二番扬起脸看我，怪异地笑了一下：赵大夫，你做啥就做去，问这做什么？

我越是奇怪：哎，还怪得很，就不能问吗？

他还是不回答。倒是旁边一位老人对我说，我告诉你，你可不要对别人讲呀！我们编的是棺材。

我怔了一下。那老人仰视着我，说，今年夹边沟已经死去五六十个人了。开头的十几个人是板子做的棺材。后来没木头做棺材了，队长就叫我们编芨芨草席。一张席卷一个人。这事你这个当大夫的不知道吗？

我怔了一会儿，回他：我怎么知道呀，我们那边的病人都是送到场部来，死了不接回去。我怎么知道是用席子卷的！

王鹤鸣胆怯地说，今天你知道了，可不要说出去呀。梁队长不叫我们说。

我看着他谨慎小心的神情很好笑，便说，我偏要说出去！

他害怕地说，不能说，不能说，可不能说呀……你要是说出去，梁队长可就要找我们的麻烦了。

我说，好吧，不说，不说，你放心吧，我不说出去。看把你吓的！

他窘窘地笑了一下。他的身体很虚弱了，脸色黄黄的。我心里突然涌出这么个念头：这个老人，他在给别人编织着棺材，但他能活多久呢？据我知道的，过去了的一年多，死去的大都是老人。

他们的身体太弱了，偶染风寒便撒手人寰。他们衰老的身体抵抗疾病的力量不足了。

出于怜悯之心，我问了一句：王老汉，你家里来信没有？老家的情况怎么样？

他说，来信了，家里情况还好。

我问，说啥了？你没跟家里要些吃的吗？叫他们寄些饼干、炒面啥的嘛。

他说，寄了，寄来了二斤炒面，还说以后每个月寄两次，一次寄二斤。我父亲还说……我说，什么什么？父亲？你父亲还活着？

他的脸勃然变色：什么话，说的什么话！怎么盼人死呢！

我忙赔不是：对不起，真对不起。这不能怪我呀，你也没说过你父亲还活着呀。

他说，我又何曾告诉过你我的父亲已经作古？

我说，没有没有，你没说过。就因为你从没提起过老人，我才当是没有了呢。你父亲多少岁了？

他：九十岁了。

我：九十岁了！

他：啊，九十岁。

我真不能想象，人活到九十岁是个啥样子。我又问，你父亲哪一年考上进士的？

清朝末年。

听到我和王鹤鸣的对话，有个右派叫了起来：啊呀，老王，你父亲是进士呀，你可是没说过呀。

王鹤鸣说，那有什么可说的！

但人们说，那是你们家的光荣呀。

王鹤鸣忙说，别说了，别说了，叫管教人员听见又批判我，说我宣扬封建主义，坚持反动立场。

但有人还问，你父亲做过啥官？

王鹤鸣说,不说了,叫你们不说了!

我看他作色,便转移话题:王老汉,你父亲来信说啥了?

王鹤鸣扬脸对我说,他信上说,受点苦没啥,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乏其体肤……

我哈哈大笑:还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斯人编棺材了——要进棺材了,哈哈……

右派们也都嘿嘿笑了。

1960年10月,我又回到场部医务所了,就又经常见到王鹤鸣了。他因为年纪大身体弱没去明水农场,住在农业队迁走后改为病房的房子里。

王鹤鸣的身体彻底垮了。他的眼睛凹陷成了两个黑窟窿,身体瘦得剩下了一把骨头,走路摇摇晃晃的。看见他我很心酸:这个瘦骨嶙峋的老人能熬出去吗?我是尊重他的,尊重他显赫的家族,也尊重他的名气,我就想办法帮助这个老人。经常给他推两针葡萄糖,或者给他几粒康复丸——一种用麦麸皮、枣泥和豆面团成的丸子,小核桃那么大。

我的情况比其他右派都好。自从到了夹边沟,我没有下过大田,没有挖过排碱渠,逃避了重体力劳动,身体没有累垮。平时去伙房打饭,也能比别的右派多打半勺面糊糊。

右派们生活中最可怕的经历要算是十月到十二月了。十月,口粮突然减少到十五斤,死亡立即就加剧了,每天早晨要从病房里抬出去几具尸体,多的时候十几具。

但是王鹤鸣坚持住了,有两次去病房,我竟然看见他在帮助其他病号打饭打水,端屎端尿。

对于这种特殊的精力旺盛的现象我感到惊奇,我说过他:你近来身体好些了。

……王鹤鸣终于活到了这一天——1960年12月31日。这天傍晚,来到夹边沟农场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日开始遣返所

有在夹边沟的劳教人员,分期分批……

场领导用有线广播宣布了这个决定。

根据病号们的身体状况,医务所决定,第一批送到酒泉火车站乘坐火车的是二十六名健康状况较好的病号,而那些重病号则需加强营养再治疗几天。至于那些病危病号,则要送酒泉劳改医院治疗后才能送走,否则可能死在路途上。

陈天堂叫我拿着名单去通知这二十六个人。

王鹤鸣是其中之一,但是,我在逐屋通知时故意没通知他。而在所有的人都被告知之后,我又回到他住的病房。

他们病房已被通知的三个人正在做准备,没有被通知的病号们也都兴高采烈地议论着自己什么时候能走。看见我二番进来,王鹤鸣有点着急,拉住了我的手:赵大夫,这第一批为什么没我呀,我的身体还行嘛。

我故意说他:你着什么急呀。你的身体坐两天火车行吗?领导怕你出事呀。

他说行呀,我的身体行呀,坐两天车没问题,你跟领导反映一下,我明天就走。

看他着急,我说,行吗?你能走吗?能走你就明天和他们一起走吧。

他说,行吗?

我说,行呀。

他说,不跟领导请示吗?

我说,不用请示,你愿走就走。

他以为我在和他开玩笑,反复问我,并叫我去请示所长。我最后说这就是所长决定的,不信你看,这是名单。

他看完名单兴奋极了,把我的一只耳朵揪了一下,说,啊,你这个赵大夫,怎么开这样的玩笑。我还真以为不叫我走了,急出一身汗来。

和他说几句话,我就要回医务所了,他却又拦住我说,赵大夫,不要走,你先不要走,麻烦你陪我去看一下马大哥。

他把我搞糊涂了,我说,哪个马大哥?

他说,不要问,跟我走你就知道了。

农业大队是个封闭的大院,有十几栋房子,就只有东南角和东北角有两个大门。他领着我绕过两栋房子走出东南角的大门,走过供销社,走过农场的大库房,一直往南到了场部办公室跟前,又往西走,来到杂工大院的门口。他先拉着我在大门西边修理组的山墙下站了一下,说了句记下这个地方,然后进了杂工大院。杂工大院也很大,有木工房、磨坊、打铁房、农具房、马厩。这个院子里从前要停十几辆马车,两辆汽车,马厩里要拴六七十头大牲畜。还要住近百名干各种工作的杂工。可是自从大队人马去了明水农场之后,这个大院就空空如也了。马厩里的牲口也大都转移到明水去了,留下的几头大牲口和毛驴之类的也都死光了。只有七八月份的时候调来的酒泉公安团的一个骑兵排的战马拴在马厩里。

这支骑兵部队调来夹边沟农场,领导也没有宣布过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就悄悄住进来了。我估计是看到右派们饿急了,纪律也松懈了,偷盗、打架斗殴之风日盛,上级怕右派们暴动吧,是来发挥震慑作用的。1960年的时候,饮马农场和双塔水库都发生过劳改犯暴动的事件。这一排士兵起初一个班驻扎新添墩作业站,两个班驻扎夹边沟场部。新添墩撤销后就都合并到夹边沟场部来了。这些挎着战刀背着步枪穿着蓝制服的士兵住到场部招待所里,白天不出来,也不设哨兵,只是晚上有流动哨从农业大院和基建大院门口不时走过。马队经常在夜间出动,去追捕逃跑的劳教分子,但从来也没抓回来一个。原因是他们调来的时间短,对周围的环境不熟悉。

王鹤鸣偏偏把我领到马厩门口,说,进去。

马厩里有三十几匹马,墙上挂着两盏风灯,光线昏暗。

你把我领到这里来干什么呀？

看着空旷的马厩里几十匹战马，我疑疑惑惑地说。王鹤鸣却不回答我，往前走，走到马槽旁站着的第一匹战马前头。他双手合一深深地向嚼草料的战马作了个揖，开口道：

谢谢马大哥。在下王某对不起你了，叫你受委屈了。

他顺着马槽走过去，在每一匹战马前都要作个揖，说一声谢谢马大哥，王某向你赔礼了。然后领着我从另一个门口走到院里，站住，把他蓬头垢面的脸和一脸大胡子对着我说：

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要来看看马大哥了吗？

我心里已经很清楚，但我没说。他也静了片刻，又拉着我走出杂工院，站在大门口修理组房子的山墙下，说：

三个月了，我每天夜里在这房子后边藏着，等喂料的战士从招待所走过来，进了院子，从小仓库把马料用桶提上，走进马厩，上完了料又出来；我就很快地跑进马厩去，把牲畜没来得及吃掉的马料一把一把抓进这个袖口里。一定要快，迟了，马料和麦草就混到一起了。我仍然没出声。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五八年初春夏之交的一天，我从菜地边走过，拔了几个水萝卜，扔给在旁边地里干活的王鹤鸣。他竟然不敢拾，他说，不行不行，这不是又要犯错误吗？

他又说，你光是看见我这两个月有精神，可是你不知道我为什么有精神。

我和他一起往回走。我就说了一句话：

你的胆子真大呀，你敢偷部队的马料；夹边沟农场就你这么一一个贼大胆吧？

他没回答我，拉着我走向病房。他把自己的皮箱从铺脚拽出来说，这里还有半箱子我存下的马料，都是好麦子，你提过去吃去吧。我过两天就到家了，你暂时可能还回不去。

我没要他的麦子。我说了句你给其他人吃去吧，就走了出来。

李祥年的爱情故事

去年在甘肃省靖远县采访的时候,我就听人说,有个名叫李祥年的夹边沟右派住在县城里。他是天津人,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曾在兰州市体委工作,五七年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劳教期间,他又升了一级,被正式判刑送劳改农场。劳改期满后留场就业,几经周折落户在靖远县城,在县委工作。

听到这个残缺不全的故事,我立即去他家拜访,却未能谋面。他家的门上挂着锁。邻居告诉我,十多年前他就在兰州市红山根体育场附近开设了一间字画社,他和家人常年居住在那儿。

李祥年的故事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作为天津市的作家,我终于听到了一名天津人在夹边沟的故事;他是怎么由劳教升级为劳改的?“升级”这两个字我已经听到多次了,但还没有见到过一个“升级”的人;他原先在兰州市体委工作,落实政策应该回到原单位去,却又怎么到了黄河北岸的干旱山区靖远县?

我立即返回了兰州,并且去红山根体育场附近寻找李祥年,却未能觅到。

无巧不成书,今年秋季又一次来兰州采访,与一位名叫关启兴的画家朋友聊天时谈到这件事,他说,李祥年,你要找李祥年吗?我领你去。关启兴告诉我,十多年前,李祥年在兰州市举办书法展览,他们就认识且熟悉了。

难怪我找不到李祥年的字画店,原来它就在兰州铁路局旁边的街道上,我却在红山根附近铁路新村的地段上转来转去。

掀开软塑料门帘进了门,我的画家朋友就和一位高个子年近

七旬的人说话。我立即就意识到他是李祥年。他的白净的脸上岁月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鼻翼两旁的八字纹刀刻斧凿般深刻。

略事寒暄之后我就说明了来意。他毫不推辞，爽快地说，你要问我在夹边沟为什么“升级”、怎么升的级、最后怎么又流落到了靖远县的，这可是一言难尽呀，我得慢慢道来：

我是1958年9月被兰州体委送到夹边沟去的。是体委办公室副主任和国防体育科的射击教练送我去的。为什么叫个射击教练送我？怕我逃跑呀。——6月份就宣布我去夹边沟劳动教养，我已经跑过一回了，我是被抓回兰州来之后送夹边沟的。这次送夹边沟，怕我逃跑，专门派了个射击教练提个小口径步枪押着。

我在夹边沟的境遇还算是好的。我是河北师范大学体育系毕业生，体魄好，身手灵活；我从小就跟着父亲进戏院子，懂京剧，能唱能表演。到了夹边沟，在大田劳动了几天，就被抽出来参加演出队，排练庆祝国庆十周年的节目，演戏。我还能画能写。我的爷爷是清代举人，开家馆，写得一手好字。父亲母亲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父亲做过开滦煤矿的财务主任，也是写一手好字。我的胞兄李鹤年后来成为全国著名的书法家，天津市书法家协会的主席……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我当然也是能写能画。国庆节演出全本京剧《失·空·斩》我饰诸葛亮，一炮打响了，引起管教干部的注意，演出结束后叫我去写黑板报……我在大田里就没有干过几天——有时候，领导看我一块黑板写三天，就发怒，知道我是偷懒耍滑，叫我下大田去劳动。可是下大田没几天，就又把把我调出来搞黑板报。我是偷懒耍滑了，可是，不偷懒耍滑的时候我一天能写十块黑板报，其他人根本就做不到。不光是又写又画，连稿子都是我自编自写，用不着管教干部操心。夹边沟的能人多得很，有画家，有诗人，有专业演员，但他们不如我多面手什么都能干。

由于能写能画能演能导能画布景，经常做零工做杂活，所以我到夹边沟一年的时间里没受太大的苦，身体没有累垮，也没太挨

饿。我经常在黑板报上表扬食堂的炊事员。——这很重要。农场制定出的奖惩制度里有这样的条文：立三次大功就可以摘帽，可以解除劳动教养。我表扬谁谁就在管教干部心里留下好印象，有利于他立功和摘帽。所以我和炊事员们的关系好，去食堂打饭就打得多。我表扬了卫生所，医生就给我开病假条，我就可以休息，可以躲避重体力劳动，保存体力。

初进夹边沟的时候我也曾有过想法：不就是劳教三年吗？按照我当时的处境，的确还是可以的，比其他右派强多了，所以我就下决心熬下去，熬出这三年去。可是熬了仅仅一年零几个月，我就觉得熬不下去了：想女朋友了。我对女朋友的思念把我折磨得很苦，什么也不想干了，觉得活着没意思了，就想逃跑了。想去看一看女朋友，见一面，和她叙一叙思念之情。也想告诉她我已经是右派分子了，正在劳动教养，你还爱我吗？如果她说还爱我，愿意等着我，我就回来再接着熬。她要是变心了，我就再也不回来了，我宁愿到处流浪，漂泊……我的女朋友名叫俞淑敏，那时正在北师大读书。她是石家庄人。1955年春季河北省师范大学——那时校址在天津市——搞毕业实习，我在石家庄第二中学代课认识了她。那时我23岁，风华正茂的时候，又是外向型性格，在二中实习期间正遇上河北省的运动会在石家庄举行，我担任篮球比赛的裁判，——那是我的长项——出足了风头。踢足球也是我的特长，我们体育系的足球队和河北省足球队比赛了三场球，我也出了风头。结果，就在我们实习结束的时候，我发现俞淑敏看上了我。

俞淑敏那年上高二，年龄还小，也就17岁。可那是个早熟的姑娘，不光身体发育早，——大个子，胸脯挺饱满——思想也成熟早。她常常用非常热烈的目光看我。咱们都是过来人，不用我说你们就明白，一个姑娘看上了你，那目光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另外，就在我们离开石家庄第二中学的前几天，我代表在这个学校实习的十几名各系的同学写感谢信，俞淑敏就围着我转，很殷勤。她

一会儿去找墨汁，一会儿又去找毛笔。感谢信的稿子是中文系写的，我捉笔抄在红虎皮宣纸上。我的楷书是写得很好的，小学五年级，我的作品就获天津市小学生书法大赛第一名；初中时天津市搞中学生书画展，我的字画占了整个展厅的三分之一，楷篆魏行洋洋大观，斗大的楷书——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共公财务——大横幅是我写的，在天津市文化馆展出。

感谢信写完，俞淑敏满心欢喜地在旁边说，李老师，你的字写得真好，写得真好！

她真是从心底里钦佩我，看上了我。当然，我也喜欢上了她。这是个很漂亮的姑娘，她虽然年龄还小，但的确是个美人，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美人，窈窕的身材，妩媚的脸蛋，真是漂亮极了。

我确切地认识到她爱上了我是在我离开石家庄前的最后两三天，她叫我去她家。从她家出来，她又叫我去公园。她说，李老师咱们去公园吧，你急着回学校干什么？过两天你就回天津了，还不在于石家庄好好玩玩吗？在公园里她跟我说，李老师，实习完了，回到天津还能记得我吗？我说怎能忘了呢，你可能很快就会把我忘了。她说我不会忘记你的，只要你不忘记我。

回到学校后就毕业了，等待分配工作，这时她又请假到天津来看我了。她有个姨妈在天津，她住在姨妈家里，但每天往我们学校跑，或者约我出去逛公园。这次相见，我把自己的相册和几幅字给了她。她回到石家庄不久就寄信来，说她父亲看了我写的字，夸奖我说，这小子这两笔字确是精彩。

我在兰州工作以后，我们之间书信不断。那时候最快的信是航空信，我们都寄航空信。航空信寄出的时候邮票上边要贴一枚蓝色的标签，印有“航空”两个字。五六年春节第一次回家探亲，路过石家庄我去她家看她，她父亲就对我说这样的话：淑敏年龄还小，你要爱护她，不要耽误她的学习。我的家原来是在天津，由于姐姐天津大学毕业后分到北京国家建工部，在北京成了家，姐夫是

五三年的留苏学生,是建工部设计院的总工程师,我的父母都已赋闲在家,就都搬到北京去了,我回家探亲是到我姐家去。这次我把淑敏也带去了。淑敏在我家住了几天,我父母很喜欢她,说她有眼色,勤快,嘴也甜。她见了我母亲叫娘,对我父亲称爸,俨然是我们家庭的成员了,乐得我母亲合不拢嘴。她在我家和我姐住一间房。她性格活泼,爱唱歌,还拉小提琴。我姐也很喜欢她。

这里有个小插曲应该说一下。1956年的全国篮球比赛在武汉举行,我身兼甘肃省男篮和女篮两支队伍的教练去武汉打比赛。那时甘肃省没有专业球队,都是从各厂矿企业抽来的运动员,可是那次我们的男篮打了个第三名,是迄今为止甘肃省篮球史上最好的成绩,以后的几十年也没超过这个记录。集训一个月就去打比赛,我在比赛中指挥得当,出了风头,结果女篮的一个运动员竟看上我了,频送秋波。最后的冠亚军决赛之后又搞了个表演赛,建工部队对福建队,赛委会叫我当裁判,这时候那位女队员给我拿衣裳端水;返回兰州的火车上,她也是一会儿给我倒茶水,一会儿削苹果给我,其他队员都看出来她爱上我了。回到兰州后她每个周末都约我去看戏,星期天去逛公园,都是她花钱。这个姑娘是上海同济大学的学生,比我早毕业两年,是省建工局的技术员,工资比我还高一级,月薪84元。她元旦回家探亲,——她的家也在北京——临走问我带什么东西不?我买了点哈密瓜干和葡萄干叫她捎去。碰巧她父亲也在建工部工作,她回去一打听就把这些东西送到我家走了,与我的亲人见了面。她回家探亲还没回到兰州,我父亲就来了信,说,你托杨某带的瓜干收到了。杨某对你的评价很好。我们全家人都看出来她对你有好感。她的学历和收入都不低,可是我们认为还是淑敏优点多。我们不希望淑敏小小的心灵受到打击和伤害。你可不要喜新厌旧顾此失彼。过了几天,我姐也来了信,说,祥年,我和你姐夫都有预感,看起来你和淑敏的婚事成不了啦。你是不是觉得远水不解近渴——淑敏到今年夏天才能

高中毕业,还要上大学,你等不住,怕她将来有什么变化,把你的婚事耽误了?我和你姐夫的意见,还是杨某对你更合适也更现实。

其实,我从心眼里是喜欢淑敏的——我以貌取人:那位姓杨的姑娘就是个子高一些,长得白,可长了个单眼皮,是个胖丫头,身材长相都比不上淑敏,我比不上她。不过我觉得姐姐说的话也有道理:淑敏要上四年大学。四年,可不是四天四个月呀,她真要是上完大学变了心,可真就把我闪下了!于是我把姐姐的话写信告诉了淑敏。我的意思是告诉她,我等着你,你可不能变心呀。她很快就复信了,信中说,我是真爱你的,你不要不放心。你要是不放心,我今年寒假就到兰州去和你同居,以表心迹。就是我父母亲拦我,我也不听他们的。

不是在兰州,而是在北京,——五七年的春节,我回家探亲——我先到石家庄看她,然后一起去我家。在北京下了火车,去我家之前,我们在广武门的旅社里同居了一天。只是我运气不好,我回家就一个星期的假期,而那几天她正好来例假。我们虽然在一间房子里住了一夜却未能尝到禁果。这次探亲后回到兰州,再写信的时候,我称呼她爱妻。她呢,也在信中写:祥年,我的夫。她还在信中说,将来我们有了孩子,要把他培养成一名出色的画家,或者是运动健将。我和她还没有成为夫妻,但从感情上却胜似夫妻。我们鱼雁传书,频繁地表达着自己的感情和对于爱情生活的渴望,设计着未来生活的美景。可是,反右斗争开始了……我成了右派!

从1957年底开始,我就再也没给她写信,因为这时已经宣布我为右派了。我觉得我不配她了,不能再和她恋爱了。再要是给她写信,再恋着她,那我就是在害她。

我原以为,不再给她写信了,就可以切断我们的恋情了,可是我错了。到了夹边沟的艰苦环境之后,我对于她的思念竟然愈发强烈了。在劳教分子的宿舍里,在寒冷难眠的长夜里,我经常想起她妩媚的面孔,想起她柔软的身体,想起两个春节我回北京探亲,

她住在我家里,她拉琴我唱歌或者我们俩一起唱歌的情景……

终于,我对淑敏的想念发展到了不能遏止的地步:我想逃跑去看她。那时候我什么都不顾了,心想一定要见她一次,然后叫我去死都行……

同1959年的春节一样,1960年的春节到来之前半个月,农场又把右派当中有表演才能的男女抽出来排练节目,准备节日演出。去年我和省京剧团、秦腔剧团的几个演员以及几个票友演了整场的京剧《失·空·斩》,今年我们还是演《失·空·斩》。由于长期饥饿和劳累,演员们都两腿发软,没有了排新戏的创新精神,演戏只不过是为了逃避劳动,混一顿夜间的加餐。我的腿也发软,发飘,但相比而言比别人强些,因为我参加重体力劳动少,体能的消耗比别人少。

离着春节还有一个星期,我逃跑了。那天夜里我们点着汽灯排练节目,到12点钟吃完加餐,就都散伙了,回宿舍睡觉。我也躺下了,装睡,没脱衣裳。睡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我就爬起来了。把一只皮箱塞进被窝里,枕头摆好,枕头上还放了一顶前两天拣来的破棉帽子,用被子遮住一半,造成一种假相:李祥年睡在这里。如果队长或管教干部进来查夜,不拉被子是发现不了的。这样,天亮之前不会有人发现我逃跑了。

那时候夜里院子里有人值班巡逻,防止右派逃跑。右派们初到夹边沟的时候没人逃跑,大都对党很虔诚,都想经过劳动改造摘掉帽子解除教养回家去,争取个好的出路。可是五九年的国庆节开大会的时候,全农场只有三个人摘了帽子,解除劳动教养,却还必须在夹边沟就业,一月挣24元。于是人们明白了,劳动教养改造思想是一片谎言,是欺骗,所有的人实质上判了无期徒刑,劳动改造遥遥无期。人们都绝望了,铤而走险逃跑的人随之多了起来。为了预防逃跑,农场每到夜间就派管教干部和右派中的积极分子值班和巡逻。为了避免遇到值班干部和积极分子,我把棉帽

子、水壶和几个存下的干馍馍藏在贴身的棉袄里边，外边披了一件蓝棉布大衣，装成上厕所的样子进了厕所，然后从院墙上翻过去落在农场大院的外边。我没敢走当年从酒泉来夹边沟的公路。我不清楚，从酒（泉）金（塔）公路通向夹边沟的五公里必经大道上会不会有人巡逻；从这条公路走要经过两条河流上的两道便桥，这条路最便捷。我顺着农业大院外边的通往新添墩分场的大道往西走，经过五八年建的炼钢厂——几间平房，早就改为农场卫生所的太平间了——再往南拐，穿过卯家山口，走到清水河边。由于是三九隆冬，河上结了厚厚的冰，我踩着白冰过了河。穿过一片田野，又走过同样是冰封雪盖的北大河，我的脚就踏上了直通酒泉的酒金公路。

当然我不敢大摇大摆地顺着公路走。我仅仅沿着公路快速地走了几公里，使自己以最快的速度离得夹边沟远一些，然后就下了公路，在长满了芨芨草或碱蓬的荒原上前行，深一脚浅一脚的。我还不能离公路太远，以防迷失道路。我不得不在荒野上赶路：一旦农场发现我逃跑了，管教干部就会骑着马追上来。

我原计划在天亮之前走到酒泉县的，可是八点多了，天已拂晓了却还看不见县城，只有黄沙铺就的公路和残雪映衬下显得黑楚楚的耕地在我面前坦坦荡荡展开。两辆拉麦草的大轱辘车吱吱咕咕地行驶在公路上，还有赶车的农民。

又走了两个小时，我才走进县城。

进了城我立即在一个小旅馆里用偷来的一位兰州炼油厂的右派的工作证登记了一间房子。我估计夹边沟农场已经发现我逃跑了，领导派出的管教干部和拐棍们已经坐着汽车或骑着马往县城和火车站来追捕我了。他们估计我不敢进旅馆，我却偏要住在旅馆里。

在旅馆藏匿了一天一夜，转天清晨，我赶到了酒泉火车站，躲在站台对面的一个土坑里。

大约九点多钟,一列从哈密开来的客车进了站。我没敢去买车票,从车下钻过去之后我立即融进了拥挤着上车的人群里钻进车厢。年关在即,旅客熙熙攘攘,挤得车厢里水泄不通。我坐在车厢中间的过道里垂着头打盹,一次车票都没有查,二十几个小时之后我就到了兰州。不敢出站,怕有人在出站口等着我,——真是疑神疑鬼呀——我往东走了一截,找到支线上闲置着的一截车厢爬了进去。等到下午,我又上了36次从西宁开往北京的快车。我的运气真好,从兰州去北京的客车比从哈密开来的更拥挤,也没人查票,四十多个小时,我蜷缩在一排座椅下边睡到了石家庄。

对于石家庄我已经很熟悉了,我在这儿实习过,五六年和五七年两次回家探亲我都来过这儿,五七年还在淑敏家住过半个月。我很快地就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在离着淑敏家不远的一条街道上下车,找了一家旅馆住下来。翌日,我先去洗了澡理了发,然后去市场买了两只鸡提到旅馆。我的气色难看,一直等到天黑,我才提着鸡住淑敏家走去。

真是太巧了。还没走到淑敏家门口,我就遇到了她和她姐,她俩推着一辆自行车和我走了个迎面。我当时戴着口罩,没戴帽子,她一眼就认了出来,惊讶地叫了一声:呀!这不是祥年吗?

我从她的表情看出来,她看见我很惊讶,但声音里又充满了惊喜。这时我倒有点难为情和尴尬了。自从1957年年底我被划成右派之后,就再也没给她写过信,她几次寄信给我我也没复信。她可能早就以为我变心了,不爱她了,所以这次见到我她才表现出如此的惊诧。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我只觉得我的心揪紧了,身上发冷,脸却发烧。我支吾了一声,算是和她打招呼。接着,为了避免她再问我什么,我采取主动说,你们这是上哪儿去?

她姐回答,我们想到一个老师家去看看。

我说去吧,你们去吧。我去你们家。

淑敏说不去了,不去了,走,咱们一起回家。

淑敏和她姐把我让进她家。

自从1957年的春天在她家住过半个月之后已经近三年了,我没有来过她家,也没有写过信。我担心这次来她家她会冷落我,也害怕她的全家人冷落我,我低眉垂眼畏畏缩缩进了她家。没有,她和她的家人仍然热情地接待了我。她家住的是一座独门小院,我一进去,她家的所有人都集中到她父母住的房子来了。这是里外两间的套房,里间是她父母的卧室,外间是客厅,所有来她家的客人都在这间房接待。她的父亲是医生,除了她的父亲还保持着家长的矜持和尊严,说话有尺度面部表情一如往日平静之外,其他人都对我的到来显得惊喜和热情。她的母亲一见面就问我吃过饭没有,并立即催大女儿去做饭。我说吃过饭了,老人立即责怪我:为什么在外边吃饭!怕我们不给饭吗!接着又问几点钟到石家庄的……说着话,老人突然问了一句:祥年,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又黑又瘦?兰州吃不饱吗?我是比前两年瘦了一些,我也知道自己变黑了。河西走廊的太阳是很毒的,空气干燥,我又长年在露天劳动和工作,能不黑吗?淑敏进了房子立即给我倒洗脸水,倒茶水。她的姐姐弟弟也都站在旁边看我,时不时地插句话。

但是,这种热情很快就冷落下来,他们全家人像是约好的一样突然都不说话了,房间里出现了令人难堪的静默。除了铁皮炉子散发出的温暖宜人的空气依旧之外,我突然感到了异常和尴尬。我明白,最初的惊喜过去之后,她的一家人都在心里想:这个李祥年两三年没音讯了,怎么突然又冒出来了?

这时候我的心突然就刺痛了: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我不再是三年前的我了。淑敏的弟弟以前见了我叫姐夫,成天围着我转,可现在他静静地站在卧室的门口,一句话不说,静静地看着我,似乎在审察我。以往就是在父母面前,淑敏也是待我很随意的:喝水吗?自己倒;或者是这事呀那事呀,想起什么说什么。这天晚上她给我

倒了一杯茶水之后,就退到角落里在一只板凳上坐着,不说一句话。我看见她有时候直着眼睛看我,有时候又很不自然地拘谨地捏着她罩衣的衣角卷呀卷呀。

尤其是看见了她的比从前更成熟更好看的胸脯上别着的北师大的校徽,我的心禁不住一阵阵发冷:她是名牌大学的学生了,而我已经变成阶下囚了,流放夹边沟……我已经不配她了!行了,见这一面就行了,走吧,我不属于这个家庭的一员了。再说,将来的日子我还不知要走什么样的路……

坐了一会儿,在一阵静默中我站了起来,说,伯母,我走了,伯父,再见……

我是九点钟离开淑敏家的。淑敏没拦我,只是她母亲客气地问了我一句:这么晚你上哪儿去?我说我住在旅社里。她母亲就没再说什么。淑敏送我到院门口才说了这天晚上的第一句话:你明天来,早晨八点钟来……

我没回答她。还有必要来吗?我心里这样想。我只是说了句你进去吧,回房去吧,就转身离开了她。但这时她弟弟跑了出来,喊了声姐夫,然后说,你不要走,你就住在我的房子里,我住里屋去。

从前我来淑敏家,就是住他的房子

我理解这个中学生的心情,以往的两年中他已经熟悉我了,把我当成他家的一个成员了。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问我这问我那。他喜欢踢足球,我就给他讲足球,并比划着教他踢球的技术动作。我是他心目中崇拜的人。他不愿意我这样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可能作为一个初中少年他还不理解或者不完全理解我和他姐姐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我为什么这样匆匆离去。

我在他家时说,我是回北京探亲的,顺便在石家庄下车来看看的,此时我不得不又一次撒谎:不行,有一个朋友在旅社里等着我,我一定要回去。我送他上火车,明天早上再来。

离开淑敏家,我在心里想着:不来了,我再也不来了,我与她见一面就行了,我们的缘分尽了。但是回到旅社在床上辗转一夜未眠,早晨起床后鬼使神差地我又往她家去了。

我舍不得和她分手。我想坦白地告诉她我的真实情况,我想问一句,她愿不愿等我,愿不愿和一个囚犯保持恋爱关系。我是为了这件事来的,我一定要把话说出来,并且还要请求她:不要抛弃我,我是真正爱你的……即便她不同意将来成为我的妻子,那就再叫我看她一次,看看她妩媚的脸,看看她成熟的窈窕的身材,看看她的笑容,听听她说话的热烈亲切的声音……

我往她家去。路过集市,我看见了她的母亲,她姐姐,她们在买菜。看来,她母亲今天要款待我。可是我突然想:不,款待我是次要的,她完全没必要亲自来买菜,淑敏的姐姐是天津医学院的学生,二十二岁了,完全可以办好这件事的。她们母女大清早出来买菜,是为了给我和淑敏创造个谈话的环境!淑敏的父亲上班去了。

我走到淑敏家门口了,却又突然踌躇起来,犹豫了:我是个右派,劳动教养的囚犯,逃亡在外,这辈子都没希望了,还有什么脸面、资格去见淑敏?淑敏是大学生了,将来的中学教师或者大学教师,我去找她,她如果真的还爱我,许诺等着我,我不是害了她吗?我会毁掉她的前程的,会毁掉她的一生的……

我在门口站了几分钟,在心里默默地祝愿她幸福,祝愿她找一个好丈夫,然后就转身走开了。

当天下午到了北京。

因为想念淑敏,我逃离了夹边沟。我见到淑敏了,但是由于我的自惭形秽,我又失去了她,逃离了她,现在我该干什么呢?我原先想的是只要她还爱我,只要她说你去接受改造吧,你改造好了,我还是等着你,那我就义无反顾地返回夹边沟继续接受改造。可事到如今,我的前途已经葬送,爱情也已然葬送,整个的生活失去了光彩,我还有必要自投罗网重返囹圄吗?没有,没有这个必要

了。我已经不对心爱的人承担义务了，我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活着了，那就想办法活下去吧：流浪。我认为我有能力在流浪中生存下去。那一年我二十八岁，虽然在夹边沟饿了一年多身体有点虚弱，但我毕竟年轻，我的身手是敏捷的，生命还充满活力。我只要能找到个活干，无论多苦多累，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能不陷囹圄，不进石头城，保持我的自由的身心，我都能忍受，能生存下去。

可能所有逃跑出来的囚犯首先想到的去处是回家看看，得到父母的庇护和接济吧。那天离开了石家庄，我首先想的是回一趟家，见见的我父母，然后再走上流浪的生涯。

我是等到夜色降临之后回家去的。我姐姐和姐夫都在设计院工作。她们的家在北京去通县二十里远处的管庄居住。解放后国家在那儿盖了大片的楼房，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干部家属们都住这。但是，我乘坐的最后一趟公共汽车到了管庄，到了姐姐家门口，我却犹豫再三不敢敲门。

1957年的夏季，兰州市的各级机关大鸣大放和开展反右斗争，到了十一月，我就被定为右派。最初，我并未列入去夹边沟的名单之中，因为我是个一般的右派，不是极右分子。我的家庭出身也仅仅是旧职员，虽不是无产阶级家庭，但也不是地主资本家，所以我未列入去夹边沟的名单。但是，我被定为右派之后，不叫我做教练了，也不叫我当裁判了。我从河北师大毕业后仅仅在兰州体委工作了两年，可是在兰州的体育界，我是出风头的。那时候兰州体校设在市中心的兰园，我给学生们上课。兰园有全市惟一的一片灯光篮球场，每一场兰州市的或者省级的篮球比赛，都是我执法，满场跑，动作漂亮，反应敏捷，判断准确……我走在街上许多年轻人认识我，叫我兰园裁判。我还是《甘肃日报》的特约体育撰稿人，写过介绍五六年赫尔辛基奥运会新规则的文章，写过介绍小足球的文章。我还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体育解说员。重大的比

赛,我坐在球场边上对着麦克风解说,电台现场转播比赛。但是,定为右派之后,我的工作就是比赛前画线,抬保温桶,抬开水,烧开水。往常叫我李指导的学员和运动员,现在在水房遇见我,这样跟我说话:李祥年,把水烧热了,我们要洗衣裳。李祥年,这水没烧热,怎么能洗澡呀!工作是不怎么累,气却不好受。我一生气干脆就不干了,不管领导怎么批评我都不干了,每天跑到兰园北门的茶馆听人说书。于是,到了这年六月的一天,领导在大会上宣布,李祥年因其态度恶劣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我对这一决定极为不满,领导宣布的那天,市公安局来了一个警察,他们原计划一宣布就叫警察把我带走的,但我立即作出了反应。我说,我不去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党对右派的处理是有政策的,右派是敌我矛盾,但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对于开除公职的干部允许其自谋生计自寻生路出路。我要求自谋生计。不等领导说话我又说,这是党的政策,我按党的政策办的,你们如果违背党的政策非要叫我去夹边沟劳动教养,那就是反党,反对党中央。我要告你们去。我要告到省委,告到党中央。

我的一席话说得铿锵有力。领导还没遇到过这样的事,那警察可能也没见过这样的右派,一时间他们愣住了,警察也不敢贸然上前抓我,体委的干部们也都寂静无声哑然失色。大概静了一两分钟,领导才说了一句:会就先开到这里吧,叫李祥年先冷静冷静,回去考虑一下,明天再说。

明天?哪能等到明天!我估计散会之后他们就要请示上级,如果上级回答对不服从组织处理的右派强行扭送夹边沟,明天可就晚了!散会之后我就去了火车站,买了车票。傍晚等到机关下班之后回到宿舍,把被褥卷起来,叫个三轮送到火车站,当夜就上了44次列车,直奔北京。到了北京姐姐家里,我不敢说实话,就说是回家探亲来的。为什么不敢说呢?就因为我妈思想积极。——她是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干部,就是人们常说的街道老大妈。她因

为工作积极还戴过大红花呢。我父亲虽说赋闲在家,但胆子小得很。旧职员嘛,惟恐有什么祸事临头。五七年我被定为右派之后,我曾写过一封信给父亲,说反右斗争激烈得很,我受批判了。我父亲回信中就说过这样的话:只要不定为右派,挨批判没关系。我在家里待着,心情不好,又没事干,就每天跟着父亲出去,会他的那些票友,唱戏,消磨时间。在家里待了一个月,兰州市体委的公函寄到建工部设计院党委了。领导就找我姐夫了。我姐夫是辅仁大学毕业的,家庭出身官僚资本家,这时在设计院当总工程师,胆子也小得很。领导对他说,林总,你思想挺积极的,政治上要求进步,家里怎么养了个不劳而获的右派分子,还是劳教分子。我姐夫说我不知道这事呀。领导叫姐夫把我送走,接受劳动教养去。姐夫一回到家里就说了这事,当时全家大惊失色哑口无言,我父亲连晚饭都没吃。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姐姐跟我谈话,说,你还是要回兰州去,我们给你拿钱买车票。我当时没说不回去,因为我知道,我住在家里对姐姐姐夫不利,全家也要受牵连,他们保护阶级敌人嘛。可是我心里的确不想回兰州去。

我在姐夫家又住了两三天,姐姐和母亲没再逼我,但管庄派出所的警察找我来了。那是中午,我正在睡午觉,母亲喊祥年,警察找你。我一下子惊醒了,吓得惊叫起来,像是魔住了一样呻吟不止。我母亲当时安慰我:祥年,你怎么啦,怎么吓成这个样子啦?别害怕别害怕。那天警察跟我谈话,说,你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逃跑呀!我说党的政策允许自谋生计,我是开除公职了,回家来了,这怎么叫逃跑呀?警察说,劳动教养是经政法机关审批的,一旦批示了,就要强制执行的,你还得回去接受改造呀。警察走后母亲跟我谈,祥年呀,你还得回去呀,政府的决定是不能违抗的。转天,母亲给了我些钱,送我到管庄的汽车站。在车站等车,我跟母亲说,娘,我真不想回去。劳教农场吃不饱,每天喝稀糊糊,劳动比劳改队还要重。母亲说哪能呢。共产党是讲人道主义的,是讲思想改

造的,哪能饿肚子呢。我说兰州五七年底就送右派去夹边沟了,亲人们去探望,都知道吃不饱,不能去呀。母亲说,你不去怎么办呀,不能离开组织呀。我说已经开除了,还有什么组织呀。母亲说,只要你好好改造思想,组织会在你改造好之后安排你的出路的。

车来了,离着还有二百公尺远,我跟母亲说,壮士一去不复还。母亲是读过大学的,她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了,抱着我的腿说,儿子呀,你要听党的话呀……复还是复还了,但却是二十年后。苏武牧羊十五年,薛平贵在西凉招为驸马十八年,杨四郎失落番邦……我离开家后二十年又四个月以后才得以重返,那时候我母亲已经作古了……

我和母亲告别的一幕永远地刻在我的记忆里了。亲妈,独子,我的亲妈把她的独子撵出家去,叫独子去接受非人的生活。

我当然没听我母亲的话。我不能在家里待了,但我决不回夹边沟去。我拿母亲给我的钱买车票到了天津。天津有很多亲戚但我没找。我想,我的母亲和姐姐都不留我,亲戚们能留我吗?我找同学去了。我有个同学张金铸当时在一个中学当老师,我住到了他家。他的表妹介绍我到新华造纸厂干临时工,一天挣一元八角钱。我干了近两个月临时工又出岔子了:一天在街上走,遇到了我的亲伯父,就是李鹤年的父亲。他问我怎么在天津上班?我说了瞎话,说工作调回天津来了。伯父问住在哪儿,我说暂时住同学家。伯父叫我回他家住去,我没去,伯父便寄信给我父亲,说在街上见到我了,为什么不去家住而要住在同学家?我姐姐看了这封信,汇报了设计院党委,党委又通知了天津市公安局。市公安局的警察到造纸厂找到我,说跟我走一趟。我跟他去了,立即就被扣了起来,关到了看守所。过了几天,兰州市体委的办公室主任和射击教练来了,把我接回了兰州。在火车上看得严,没机会跑。到了兰州,回到五泉山市体委的机关大院,借着解手的机会我翻墙跑了,往五泉山的山坡上跑。结果射击队的小伙子们提着小口径步枪追

我，子弹打得身旁的土地冒烟，我吓得腿都软了，被他们抓回去了。转天就把我送到了夹边沟。

……由于有过一次回家的经历了，这天走到了家门口我又不该敲门了。我怕过不了姐姐和姐夫这一关呀。上次我姐夫给了我车票钱，我没听人家的话跑到天津去了；这次回来没有任何手续，姐夫姐姐猜都能猜出我是逃跑回来的，还能留我在家吗？

我在家门口走过来走过去，思想里剧烈地斗争着进不进家。我的确想进家去呀，想看看亲人；我的身心都疲惫了，真想在家里睡一觉，休息休息，吃一顿饱饭。我却又不敢进门。我逃出夹边沟很不容易，可以说冒了很大的风险吃尽了苦，我可不愿意叫我的亲人们打个电话就把警察叫来，把我逮起来送回夹边沟去。这次要是抓回去，可就不像上次了，说不定要“升级”的。

我在姐姐家门口走过来走过去，整整一夜也没敢敲门。到六七点钟天亮了，第一趟从通县到北京市的公共汽车开过来了，我上了车。什么母子情呀同胞情呀，就都结束啦。

汽车到了市里，下了车，我开始琢磨下一步怎么办。我从夹边沟出来的时候身上有七八十元钱，虽然整个路途几乎没买车票，但我身上的钱已经花光了。在石家庄买了两只高价鸡就花去三十多元，其他的钱住旅社吃高价饭用了。我想找个临时工干，北京却没熟人，而北京的户籍管理是很严格的，市民们对外来人警惕性极高，我不敢自己去找工作。

我在街头流浪了三四天，白天在街道上溜达，在商店里站一会儿，暖和暖和身体，夜里就去蹲火车站的候车室。正是春节运输的高峰期，流动人口多，我在候车室坐着睡觉并未引起警察的怀疑和注意，但是身上就剩下两三元钱了，我的内心很恐慌：怎么办，花完这两三元钱后挨饿吗？我想来想去，决定去偷了。我也看见了少数人伸着手向人乞讨。这是不犯法的，我却嫌丢人，张不开口向人

乞讨,再说,警察看见了就抓,抓住就收容,我还真怕被收容和审查。

我用身上的最后一点钱买了个电筒,又买了一把钳子,钳子插在衣裳里边的皮带上。这天夜里我闯进了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白天侦察好的,进修学院放寒假了,门口和院子里冷冷清清的,门房的门锁着,没有人。

我是夜间12点钟走进进修学院的,门大敞着,一个人影也看不见。进了院子我就东看看西走走,看能从哪儿下手。我想好了,如果遇到了人,问我干什么的,我就说找人。我穿着蓝棉布的大衣,长毛绒的领子,里边是一套毛料的中山装,不像个拧门撬锁的。

我走来走去到了一栋平房跟前,看见一间房的门口挂了个牌子:教师进修学院伙食科。好呀,我找的就是这种目标。门上挂着个半大的铁锁,我用钳子钳紧了,用力一拧,锁就开了。我推开门进去,又关上门,从里边上了锁。——这样,就是来人推门,也以为里边有人,就不会起疑心了。房子里有四张桌子,其中的一张是写字台,挂着一个小锁。我没用力就把小锁拧开了。拉开第一个抽屉,里边有七八十斤北京粮票,一百多元钱。这正是我需要的。拉开第二个抽屉一摸,有个公章。我用电棒照了一下,——不敢多照,怕外边人看见电筒的亮光——公章上一行字排列成半圆形: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中间一个五角星,下边横着一排字:伙食科。这东西对我也是不可或缺的,住店要介绍信呀。正好抽屉里还有一本教师进修学院便笺,我撕了点纸把伙食科三个字挡住,铛铛铛盖了五张,撕下来装进口袋,把公章扔在桌子上。——那东西我没用,说不定还会招惹麻烦。然后我拉开门大大方方走了出来。

有了钱有了粮票,转天我美美地吃了一顿馆子,又买了二斤点心提着,随时想吃就吃。唉,人要是吃饱了肚子心情都好,心情一好连烟都不想吸了。我买了一盒红锡包香烟,三天才吸完。只是长期挨饿的肚子享受不了丰盛的炒菜和油水,拉了两天肚子。

虽然有了教师进修学院的介绍信,我仍然不敢住旅店,因为内行的人一看就知道那介绍信上盖的公章是假的:上边有弧形的一行字,下边一半都是空白,空白的面积太大了。但我的生活总归是有了很大的改善:晚上蹲候车室,白天到浴池去洗澡,在澡堂子短暂地睡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这样子过了近一个月,手头的钱和粮票快用完了,我就又作了一次案:有一天夜里我在动物园附近闯进一片灯光通明的楼群里。当时我没记下那是个什么单位,只觉得那是个部队的机关,我在院子里侦察时发现有人在走动。院里有一栋平房,一间房门口挂着个牌子:伙食管理委员会。我拧开门进去,偷了一大摞粮票,一百多元钱,还有十几斤油票。

这一次作案之后我准备离开北京。我怕在北京街头流浪的时间长了,引起公安的注意。谁知就在我离开北京的这天出事了。我偷了七八百斤粮票,在北京猛吃了几天:下馆子,或是花半斤粮票三五元钱买一斤高价糕点。有时为了省钱买平价点心,我也站在副食店里向买食品的北京市民换北京市粮票。但这种时候总是担惊受怕。怕有人追问我哪来的全国粮票……做贼心虚呀!我还把对我来说没有用处的油票寄给了我们家。那次偷了一大摞粮票,但到底有多少斤,我始终没数过,怕叫人看见和引起人的怀疑。这天准备要离开北京了,我想把口袋里的钱和粮票清理一下,就去公厕解手,蹲在茅坑上数粮票。我正数着,突然觉得头顶有什么东西显了一下,抬头看时发觉隔墙那边的茅坑上解手的一个老头解完了手,站起来正伸着脖子往这边看我。我立即把粮票装进口袋,站起来走出厕所。后来我又去浴池洗澡睡觉,醒来之后去火车站买票。在售票处,我刚买完票,两个穿便衣的人走上前来堵住了我的去路,说,同志,我们是公安局的,我们怀疑你,请跟我们走一趟。北京的警察是很文明的,他们还说,我们如果搞错了,我们向您道歉。

原来,我在公厕解手,旁边的那个老头看见了我数粮票,出厕所后盯上了我,在我去澡堂洗澡睡觉的时候报告了警察。那时候的澡堂子不像现在,没有放衣物的柜子。我去洗澡的时候衣物和书包就放在一张床上,警察就检查了我的书包和衣裳,看见了里边盖着公章的空白介绍信和几杏子粮票。

我被初步审讯后关进了看守所。第二天正式审讯时来了个军官,我才知道那天偷的是国防部机关事务管理局。那军官问我:柜子里还有三大摞粮票你怎么没拿?我回答,我不是惯偷,我是走投无路才偷粮票的,偷这一摞够我吃一年的,我要那么多干什么?

过几天兰州市公安局把我押了回去。没有再叫我去夹边沟而是直接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我六年劳改,把我送到了兰州的八里窑,到六一年又转往敦煌县城郊农场劳动改造。

我后悔从夹边沟逃跑吗?不,不后悔。尽管我判了六年刑,但我一点儿也不后悔。如果我要是不逃跑,我会饿死在夹边沟的。夹边沟关了三千名劳改分子,许多人家里寄炒面饼干,到六零年的下半年也饿死了,我家里的人没寄过一斤炒面一元钱,我能活下来吗?就是在看守所和八里窑,我度过了饿死人最多的那几个月。我的运气真好。

1965年我从城郊农场被转到十工农场。一年后劳改期满不准回家也不准回兰州,又转到四工农场就业。从四工农场转到下河青农场,然后又到了高台农场、新华农场。1969年战备,又从新华农场迁往五大坪农场。最后转到北湾农场。连劳改带劳教带就业,我在农场总共干了十八年。

这十八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是这么过来的:除去两年劳教,再除去六年劳改,就业期间一月挣二十四元钱,伙食费十七元,剩下的七元钱买肥皂毛巾牙膏,还要穿衣,还要吸烟。为了节省每一分钱,一条毛巾剪成两截使用,擦脸舍不得用中间擦,而是用边缘和四个角。这样用的时间长。节省了再节省,所有节省下来的钱都

买了旱烟叶。人在忧愁、烦闷和焦虑的时候不停地吸烟，没命地吸烟。烟成了最珍贵的东西，成了生活第一必需品。我经常一顿饭只吃一个二两的馍馍，把另一个拿去换一撮烟叶。我吸过菜叶子，吸过向日葵叶子，吸过晒干的骆驼蓬——一种非常臭的植物。我还吸过锯末。劳动中能偷懒就偷懒，能装病号就装病号在宿舍睡觉。为了偷懒，有时必须撒谎：对管教干部说，报告队长，组长叫我去浇水。管教干部说去吧。到组长那儿又说，报告组长，队长叫我去给北湾大队写毛主席语录去。组长说去吧。好了，这一天哪儿也找不到我，我跑到北湾公社给农民漆棺材去了，能混两顿饭吃。遇到要开大会，我主动要求发言，这样就可以用写发言稿的名义休息一天。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生存办法，主要的还是我能写能画，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结束，我经常画主席像。给农场画，借到外单位画，给农村画。借出去画画能把我当人，能混着吃几顿饱饭，还能搞到点烟叶。人都说我是压不碎夹不扁的李祥年，拴在石头上饿不死的李祥年，就因为我能画能写能演能唱，到哪儿都是多干零活少下大田，我的身体始终没有被摧垮。

身陷囹圄十几年，石头城里十几年，除了想办法吃饱肚子就是盼着大赦，盼着甄别，但从来没有过大赦，也没有过甄别。还想什么？还想的就是这辈子完蛋啦，再也见不着俞淑敏了。俞淑敏现在怎么样了？已经嫁人了吧，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幸福吗？

劳改的六年？那当然比就业更惨了：在公安部队的枪口下劳动，早晨像牲口一样赶出来劳动，晚上收监大铁门一响——咣当一声，吃喝拉撒都在监房里。犯人们编了个顺口溜：关禁闭大休息，斗争会看大戏，强制劳动炼身体，枪毙透透气。

由于从城市来的劳改释放人员必须在劳改农场就业，永远不准回家，就永远得不到自由，而我如此地渴望自由，1972年开始我就下决心要自己想办法了：想办法找个农村女人，到农村去落户。说起找对象，真是悲惨极了。我记得在下河清农场的时候，那里有

五十多名就业的大学生光棍,竟然为了一个瘸子姑娘争风吃醋。下河清公社的女人,瞎子,瘸子,缺胳膊短腿的,都叫农场的就业人员找光了。我是在北湾农场找的,总共说了四个。第一个是天远公社拖拉机站长的遗孀,我画主席像时大队书记看得起我,给我介绍的。这女人有两个孩子,三十多岁,人挺好,我同意,她同意。可是女人来农场了解我的情况,管教干部竟然说人家:你还是共产党员?你怎么能找这些地富反坏右呢……搅散了。在南华大队画主席像,一位公社干部同情我,介绍个女人;我去见面,是个背锅,不到我半截高,擦锅台还要站板凳。第三个是北湾大队的,名叫赵玉兰,年轻,人材好,离场部也近,别人介绍后我自己去找她,她同意了,只是孩子多,才二十八岁,就五个孩子。她之所以同意嫁给我,是为了招夫养子。我咬咬牙也同意了,为了自由,我什么都能忍受。她来农场送过我几次馒头,春节还提过几斤大肉。娘家爹妈我也去拜访过了,说,我们不管她呀,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农场领导也说了好话,说成了,却又出了意外:赵玉兰的弟弟是个油漆匠,给人画柜子漆棺材,而那时我也有时偷着跑出来给人家漆个柜子写个对子,我的水平比他高,他怕我到她姐家落户抢了他的生意,跑到她姐家大吵大闹,又搅散了。

我找的第四个女人,就是我现在的女人,名叫魏万花。她那时三十岁出头,两个女孩一个男孩,丈夫是崖塌了砸死的。我是个光棍,她是个寡妇,我同意,她也同意,她跟人说,劳改释放犯就劳改释放犯吧,瞎好是个大学生。我们在北湾农场结婚,借了一间六平方米的房子,是就业人员腾出来的。领导还叫我休息了一星期,算是度蜜月。婚后我立即就打报告:我现在有家了,在农村,我要求到农村落户。1976年,我终于在平铺乡二队魏万花家落户了,成了一名自由的公民。

说到结婚还有个小插曲:结婚前女方要六尺条绒,我没钱买。我给姐写封信,我要结婚了,为的是离开劳改农场,无论如何请你

帮助我一下。求你了姐姐。我姐寄来了六尺条绒五十元钱。姐姐的信中写道：知道你要结婚了。农村很适合你，可以大有作为。寄去五十元钱六尺布。记住，就这一次呀。信封里还有母亲写的一页纸，说，从你陆续寄来的几封信中看出你确是改造好了，望好自为之。

再说个小插曲：我在酒泉的下河清农场就业的时候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信里对当时刑满不准回家发点牢骚。我姐竟然把我的信转给农场党委，结果造反派——管教人员——毒打了我一顿。

我在平铺乡二队落户，当了公社社员，可又是个二等社员。队里很穷，打的粮食少，队长不叫我参加劳动，不叫我挣工分，怕我分队里的粮食。实际上不叫我劳动更好，我从队里借了十几块钱，买了几个刷子、油漆和颜料，走村串户给农民画柜子画棺材。箱子上画凤凰戏牡丹，画二龙戏珠，棺材上画百寿图。我每天都能挣几斤粮食，全家吃不完，过年还能提几斤肉回来……

1978年底落实政策，平反，就地安置在靖远县体委工作。平反后的第一件事是给淑敏家写封信，然后我就回家探亲了。回到家中，父亲告诉我母亲半年前去世了。我淌了几滴眼泪，但并不想她。我母亲是街道积极分子，是她把我送回夹边沟的，我们的骨肉情早没了。父亲听了我二十年生活的叙述，老泪纵横，说，你早来五十年或者晚来五十年就对了。在家里我问我姐：我是杀人放火了，投敌叛国了，还是奸污妇女了，你和我划清界线？我还说，我挨饿那些年给你写信，要点炒面，钱，可你一分钱、一两粮也没支持我，我几乎饿死。你的心怎么这么狠？这么没情没义？我姐说，我总认为党是讲人道主义的，生活上不会虐待人的……

我在家待了一个月，有一天父亲突然想起了什么，说，你的淑敏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这一提淑敏，立即勾起我的深刻的伤感，我也在心里呼喊：淑敏呀你现在在哪儿！你收到我的信没有？我还能不能见到你？

我没料到的事情发生了：探亲回到靖远，县委我的办公桌上放着淑敏的一封来信。

淑敏在信中说，她元旦回家看望父母见到了我的信。读完信她失声痛哭……我的信里写了些什么呢，写了二十年来对她的思念，也写了我二十年来的生活。我的信是用自问自答的形式写的：①自从1958年春天开始我就不给你写信了，为什么？答，1957年底我就成了右派了，我就知道我配不上你了，我痛苦地退却了，目的是让你找一个能叫你幸福的人；②1960年春节我怎么又出现在你面前了？答，我在劳教中因为想念你而逃跑出来去看你的；③你叫我第二天早晨去你家，我为什么没去？答，我已经走到你家门口了，没进去，站一会儿走了；④为什么没进去见你？答，那天进去我就得说谎话，我不敢说真话，如果说了假话，隐瞒我的劳教身份，那就害了你；⑤离开你家后我去哪儿了？答，到处流浪……我在信的结尾说，淑敏呀，那次石家庄之行，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被抓回去投入监狱劳改六年，然后是没有尽头的就业……只到今日才平反。淑敏读了我的信失声痛哭，哭了一天，才给我写信。她的信说，你不该瞒着我呀，即使你成了右派我们不能做夫妻，但我可以接济你呀，每月寄一二十元钱是能办到的呀，就像我读书的时候你每月寄我二十元一样。她还说，我真不知道你的情况，不知道这些年你经历的苦难，也不知道你一直爱着我。我还以为你爱上那位篮球运动员了，喜新厌旧抛弃我了……为了你所受的苦难，我一定要报答你。

她履行了她的诺言。一个月后放了寒假，——她在天津师范大学当教师——她发给我一封电报：某月某日在白银西站接站。我按照她说的日子去了白银西站，就是狄家台车站，接到了她。

十九年了，从那次在石家庄分手到这次见面整整十九年过去了。这年她四十岁。她一点儿也没有衰老，还像过去一样可爱，一样妩媚，一表人材。她身上惟一变化的就是成熟，略为丰满一些的

身材多了一些高贵的韵致。看到她我就禁不住怦然心跳：19年了，19年辗转于大西北的劳改农场、劳教农场和贫瘠的农村，我已经没见过这么漂亮这么高贵的女人了，难道她真是俞淑敏吗？她真是来看我的吗？说实在的，我那时真有点自惭形秽，猥猥琐琐不好意思和她说话。我当时是一副什么样的尊容呀：虽说平反了，当了县委的干部，但身上穿着一身农民的黑棉衣，外边套了一件的卡布的旧中山装，面带菜色。是她先跟我说话的：你怎么这样看我呀？咱们找个旅馆吧。

我在接她之前已经在白银西站招待所订了房间。回到房间，我那种卑琐的心理才得以克服，原因是我们没说上两句话就抱头痛哭。哭啊哭啊，哭了整整半天。后来她擦干了眼泪说，咱们来到一起难道就是为了流眼泪吗？她要我领她去商店。在商店里，她一下子买了一大堆面包什么的，还有饮料。我说她：你买那么多食物干什么，你也没坐过监狱，难道也得了心理饥饿症吗？怕挨饿吗？她笑着不说话，只是叫我抱上那些食物。回到招待所的房间，她把门一关，往门外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然后才说，不出门了，咱们三天三夜不出门了！

还真是的，三天三夜我们没有出房子。我们就像一对年轻人一样，在那间小小的房子里恩恩爱爱，卿卿我我……把我们二十多年的恋情画了个圆满的句号。三天，那是什么样的三天呀：失去了记忆，忘记了痛苦和苦难，也没有伤感。一切都消亡了，宇宙洪荒，天地玄黄，时空之间只有两颗炽热的心鲜淋淋地跳动……三天后，我们又去了兰州。她拿着几张空白介绍信，她在介绍信上写上我校教师俞淑敏与丈夫李祥年去兰州出差，特此证明。然后用介绍信在宾馆登记了房间……我们继续享受前三天那种不出房门的幸福……十天后才乘坐44次列车北上，我在白银西站下了火车，她返回天津。

这是第一次见面。第二次是转年的夏天，也就是1980年的夏

季,她打电话来,叫我去天津见她。天津有我很多亲戚,但是我去了之后她不叫我住在亲友家,而是安排我住在师大附近的一个宾馆里。她说这样见面方便,在一起的时间长。她几乎每天都要到宾馆来待上半天,有时借口散步在吃过晚饭后走到宾馆来看我。那次我在天津整一个月,前十天她丈夫在家,——她丈夫是市委的什么部长——后二十天她丈夫出差去云南,又正好是她儿子放暑假,丈夫把儿子带走了,她便叫我去她家居住。我们此生未能成为夫妻,但是那二十天里我们就像真正的夫妻一样幸福,她对我献出了比妻子还深刻的柔情蜜意。在短暂的幸福的日子,我几次对她说,淑敏,我满足了,你给我的幸福比我一生的苦难要多得多。

我刚到天津的头两天,她曾把她十八岁的儿子带到宾馆来,叫我辅导一下体育。她个子高,她丈夫个子也高,她儿子便也有了一副好身材,且很喜欢打篮球。她对我说,我曾经跟你说过,咱们有了儿子,一定要把他培养成一名画家或者一名优秀的运动员。现在你看看他吧,能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篮球运动员。我认真地调教和测试了那个孩子几次,然后告诉她:不可能了,你儿子的腰腿已经硬了,搞体育为时已晚。她当时掉了几滴眼泪,十分伤感地说,这是他的造化呀!

这一次去天津我还见到了她的丈夫。那是她丈夫从云南回来的第二天,她借口给丈夫洗尘,和丈夫到我住的旅馆的餐厅里吃饭,她也安排我在他们对面的一张桌上吃饭,叫我看一眼她丈夫。吃着饭,我看见她丈夫对她很好,往她碗里夹菜。我当时心里就想,这是很好的一对夫妻,我不应该再和她来往了,我们的缘分该结束了。

但是,后来她又借口旅游和学术交流来过两次,每次都是发电报叫我在兰州等她……

我对李祥年的采访结束了。李祥年送我到白银路。临别时他握着我的手说:回到天津,请您去师大看看淑敏,您就说我叫您去

看她的。去年她退休了。她是化学系的教授。她 62 岁了,但她还是那么可爱。请您告诉她:快七十岁了,我已是满头白发了,但仍然时时想念着她,没有一天不想她。

下编

野马滩

太阳已经落下去了，但是从地平线——戈壁的边缘射出来的看不见的光线把天空照得明亮耀眼。那种只有大西北的天空才有的像是被扫帚扫乱了的一抹一抹的云彩在无限深远的天空飘着。天空与戈壁交界处是一条浅蓝色的带子，是戈壁滩上的蜃气吧，把天空和戈壁巧妙地连接起来，显得朦胧、神秘、悠远。

贵 妇 人

那一天双福就没好好放牛。站在草滩上,他一个劲儿地往生产队南边的大路上看移民来了没有。早晨去食堂吃饭,食堂里雾气腾腾的,新蒸出来的花卷堆得到处都是,香喷喷的。哎呀,蒸了这么多花馍馍。他说了一句。正在翻动笼屉里的热花卷的管理员媳妇把烫痛了的手指头举在嘴前吹气,说,移民上午就到,这是往车站送的。队里要来上海移民的消息是几天前队长说出来的。来不及盖房子,在草滩上拿椽子围了个圈圈,叫双福把牛赶到那里去,又派人把牛圈的粪清了一下,垫上层新上,说是移民来了住。

晌午过后,生产队南边的大路上腾起一片黄尘,黄尘卷着十几个黑点子。他撂下牛就往回跑。牛圈门口站了一大片人,总有六七十口子。大部分是妇女和孩子,穿着裙子和裤衩,露着白生生的半截腿。她们的衣着花花绿绿的,鲜亮得像一座花园。稀拉拉的几个男人也都穿着很挺括的制服。平常穿蓝制服很神气的队长跟他们一比就跟草鸡一样。

移民们围着队长叽叽喳喳说话,他们说的话他一句也听不懂,像是很气愤的样子。队长从他们当中挤出来,脸涨得通红。

“就这条件,我们的房子不好,你们先住下,你们先住下,等腾出手来就给你们盖房子。这事不能怪我。前两天才通知你们要来,盖房子来不及,也没木料。哪有那么多的木料,场部也没有呀!你们一下子来了五六百人,要盖多少房子。”

离着人群不远站了几个老职工和右派分子。右派分子是前年春天来到生产队的。他听人说这些人是反对共产党的,下放到农

场劳动改造的。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说了句啥话，几个人笑了起来。队长看了他们一眼说：

“你们笑啥哩？干活去！”

他们说是浇夜班水的，队长没词了，把脸朝向双福。

“你不放牛去，站在这里做啥？”

“我回来喝些水。”

“放牛去！”队长毫无道理地吼了一声。

双福转身就走，这个队长爱骂人，他有些害怕。在绕过堆积如山的家具堆时他又站住了。他很惊奇，这些人把家具都拉来了，他们再不走了吗？他们根本就不像种庄稼的人！他们多阔气呀，那么多的箱子，柜子，还有闪着金光的铜管床，还有和镜子连在一起的桌子，镜子很大。更叫他惊讶的是家具堆旁边站着个身材高高的女人，她穿着亮光闪闪的绸衫。这长衫没袖子，又长又白的胳膊光溜溜的；天爷，她的长衫紧绷绷地绷在身上，腰特别细，衫子的边上还开着个口子，白生生的大腿露了出来。她大概有三十岁了，穿这样的长衫怎么不知道羞啊！他想。

那妇女觉到他在看她，扭过脸来了，他便怯怯地看着她走远了。那妇女看他的时候头往上仰着，眯着眼睛，像是瞧不起他的样子，他心里不舒服；但是那妇女的眉毛又细又弯，眼睛又细又长，很好看。那妇女的鼻子直溜溜的，脸很白。那妇女的头发在头上盘成个发髻，像农村的媳妇们，但盘的位置高一些，比农村的媳妇们盘得好看。

好不容易挨到黄昏，太阳还高高的，双福就把牛赶回牛栏去了，他又跑到“牛圈”前头去。双福十四岁，虚十五。他的个子不高，但长得很结实，圆圆的脸蛋红扑扑的。有一双黑得像煤炭的眼睛。他是在离着花海农场四队三十里远的花海乡和花海农场长到十四岁的，他连县城都没去过，看到城市人稀罕。

“牛圈”门口没什么人了。他从门口往里头看，“牛圈”大大地

改变了样子。移民们在地上栽了些椽子,把芨芨草席绑在上头,把“牛圈”分成了一个一个的格子。草席不够用的,很多人用绳子扯起了床单,或者用箱子和柜子做墙,分成一家一户的样子。大部分人忙碌着,少数人坐着和躺着。有的人在哭泣,抹着眼泪。

队长从里边走出来了。他的身后跟着那个穿开口长衫的妇女和一对五十多岁的老夫妻。

双福急忙闪开。队长站住了,队长说:

“实在没处住了,这怎么办哩。”

那妇女眯缝着眼看队长,那男人说:

“依给阿拉想办法呀……”

队长的脸上显着忧愁的样子说:“怎么给你们想办法哩,队里本来房子就紧,我能变出个房子来吗?”他看见双福,像是跟他平等商量一样地说:“双福,你说哪里还有房子,能叫这两家人住下?”

双福往后退了一步,犹犹豫豫地说:

“不是有两间空房子吗,右派们住的房子后头?!”

队长说:“说球子那,那房子能住人吗!又是屎又是尿的!”

双福嘟嘟囔囔地说那也比牛圈好,队长便说:“好,好,那就叫他们到那里去住吧。你领着去,看他们愿住不愿住。”

四队总共就三栋房子,前两栋是办公室、老职工宿舍,还住着几家干部家属和老职工家属;后边一栋住着四十几个右派,房子里都是一溜的大炕,每间住六七个人。在这两栋房子的后边有两间孤零零的房子,是花海农场建队初期的场部。解放初县人委办公室的一个食堂管理员带着个会计到这里来办农场,从花海乡招了二十几个农民做农业工人,在这里盖了三四间房子。这几间房又是办公室又是伙房又是宿舍。过了几年,农场发达了,场部搬走了,这里就成了花海农场四队,又盖了新房子,盖新房子的时候拆了两间旧房,还剩下两间,但是干打垒的墙壁裂了几条裂缝,门窗也没了,懒得上厕所的单身汉们常常跑进去滋尿,墙根里出现了蜂

窝状的小坑。

那妇女和那对老夫妻进房子看了看，捂着鼻子走出来。这时队长跟过来了。

“这房子我还住过哩。你们先凑合着住吧，房子在人收拾哩。你住这一间，他们住这一间。双福，拿个铁锨去，你帮着她收拾一下。”

这天双福可是累坏了。他连饭都没顾上吃，他想这一家人——这妇女还带着两个丫头——还没住处哩，就把全身的力气用上了，把塌陷的炕拆了，把土块清理出去，地上还洒水洒了洒。他还叫队长派了几个人把那妇女的床、皮箱和那个带镜子的桌子抬进房子里。最后，他把菜窑的门卸下扛了过来，他说：

“行了，你们先凑合一夜吧。睡觉的时间把门立上，顶住，你们害怕的话。我该回去了。”

那个妇女一晚上都是默默地干活，没个笑脸，这时候脸上露出感激的笑容。

“不许走，不许走，你就在这儿吃吧。你叫什么名字？”

双福说姓王，叫王双福，那女人就说：

“不许你走，拦住他，晶晶，拦住你双福哥。”

晶晶是那妇女的大女儿，正在门口扫土，听见妈妈说，张开双臂挡住了他，甜甜地说：

“双福哥别走啦。”

小女儿也跑到门口双福哥叫个不停。

那妇女已经去食堂买过饭了，端回来几个花卷在盆里扣着。她不叫双福吃花卷，她从一个竹篮里拿出儿包点心和糖叫他吃。

双福吃了两块点心，他不好意思吃人家的，又不好意思拒绝。

“你是怕你妈说你吗？”那女人催他吃，说。

“我没妈。”

“你妈……”女人惊讶地睁大眼睛。

“我妈死了。我跟舅舅过。我舅舅是炊事员，我给队里放牛。”

“你到哪里野去了，连饭也不来吃？”

他走进食堂旁边的房子的时候舅舅问了一声。舅舅在炕上躺着吸旱烟。罩子灯下，舅舅的头转了一下。

“我给移民拾掇房子去了。队长叫我去的。”他一边吃饭一边说。舅舅在管理员的桌子上给他放了一碗汤面条两个馒头。

舅舅在炕沿上磕烟锅。他又说：

“一个媳妇，领着两个丫头。”

“家里没男人？”

“没。哎！”他突然想起了什么，轻轻地叫了一声，掏着口袋走到舅舅跟前。

“你吃糖。”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糖放在舅舅枕头上。

“哪来的糖？”

“移民给的，这糖不太甜，吃起来可香。”

舅舅吃糖，说：“这是花生糖，王毕杰给过我一块，牛奶味道，里头还有花生。”

王毕杰是右派，前年从兰州下放到农场来的省教育厅的干部。

“移民小气得很。你给他们拾掇了一晚上房子，就给你几块糖。”舅舅又说。

“她叫我多装，我没装，她给我塞上的。她还叫我吃点心，给你也拿些。我没拿。”

“噢。快吃，吃了睡，油熬干了。”

双福吃完饭灯就灭了。双福上床睡下。这间房子有一铺炕和一张木板床。炕是双福和舅舅睡，床是管理员的。管理员是县上下放下来的干部。春上，管理员把农村的媳妇接来了，管理员就不在这间房睡了，双福睡他的床。双福和舅舅特别亲。他父亲死得早，前年母亲又病死了，舅妈不喜欢他，舅舅把他带到农场来给队里放牛，队里管饭吃，不给工钱，穿的都是舅舅给他扯布做。舅舅

是老农工了,想把舅妈接到农场来,舅妈不愿来,说她过不惯农场的生活。

“那媳妇孽障得很。”

“孽障啥?”

“哪里是种地的人啊!连个铁锨都不会拿。腰细得像马蜂,又没男人。”

“睡你的吧。孽障啥?他们在上海享惯福了,现在叫他们尝一下劳动人民的味道。”停一下,舅舅又说,“那媳妇姓啥?”

“不知道。”双福停顿一下说,“看着是个高贵人。”

那媳妇姓况,叫况钟慧。第二天早晨吃饭的时候,双福跟管理员要下了一截铁丝,吃过晚饭后他就跑到那个媳妇家去了,想把门板拧到门框上。门上挂了个门帘子,是蓝条条的床单布改的,门开着,看不见里边。他喊了一声,喂,有人吗?

“谁呀?”是那个妇女的声音,接着门帘子就挑起来了,那个妇女站在了他的面前,像是惊讶地说,“哟,双福来啦,请进请进。”

双福没动弹。那个妇女换了一身衣裳,穿着粉色的连衣裙;连衣裙没领子,白白的胸脯露出一块来。她的头发湿漉漉长拖拖地披在肩膀上,遮住了半边脸。他一下子没认出来,还当成走错门了。

“进来呀。”

妇女又说一声请进,他才腼腆地说:

“我给你收拾门来了。”

“门?门收拾好啦。哎呀,你真是个好心人。”

妇女笑了一下说。双福这才发现门真是修好了,是用合页拧在门框上的。他羞怯地说:

“那我走了。”

“你走什么呀,进来呀。你还不好意思……”妇女抓住了他的手,亲切地微笑着,说,“你是我们的恩人呀,我们要好好谢谢你。”

“什么恩人呀……”这个很高贵的女人拉住他的手，他实在不好意思了，但又跑不掉，便扭扭怩怩进了房子。

“是恩人呀。我去看过了，那边大房子还不如这间房，原来是个牛圈，那么多人挤在一起……”

“是牛圈……”

双福的脸更红了，像是自己做了什么对不住人的事。

这天双福在妇女家待了一个多小时，那妇女不叫他走，妇女的两个女儿也不叫他走。她们把吃的东西都拿出来了，点心呀，糖果呀，桔子呀，像比赛一样举在他面前，叫他吃。他也不想急急忙忙走，他觉得这里的一切都新奇得不得了。房子和昨天不大一样了，窗子上糊了纸，还挂了窗帘，拆了火炕的那面墙也用一长条布圈了起来，带着铜套的紫红色木头床就靠在那里，床上铺了一条红白条的床单，床上摆着闪闪发亮的缎子被。那床单不平，上面有蛤蟆皮一样的小疙瘩，他觉得稀奇，那妇女说是泡泡纱。五六个棕色的皮箱很整齐地码在墙根里，旁边放着带镜子的桌子。妇女看他总往那边看，就告诉他那是梳妆台。最最叫他惊奇的是一大块桔红色的纱布在墙角上围成了个小房子一样的格子，大姑娘晶晶说那是她和妹妹的卧室。墙上挂了两张镶在镜框子里的风景画，晶晶说那是油画。除了黑色的房顶和墙壁，这里的一切都是光彩鲜亮的，他从来没见过。尤其是这房子里的三个人，更叫他惊奇：她们都洗过头了，她们的头发都湿淋淋地披在肩上，她们都穿裙子，她们都说不出来的白净、鲜亮，像是电影里的仙女，高贵的公主、皇后。

房子里有一股什么花的很浓郁的香味，他皱着鼻子嗅了几次，那妇女说她洒了点香水。说着话那妇女拿出个长颈的绿色玻璃瓶打开盖子叫他闻，问他香不香。他说香。

“没办法，不洒点香水太臭啦。”那妇女说。

“你就叫我况阿姨吧，我叫况钟慧。”

临走双福问那妇女姓啥，那妇女回答。那妇女一再叮嘱他以

后常来。小女儿叫莹莹。

后来双福就时常到况钟慧家去,过两三天去一趟。他不好意思天天去,因为实在是非亲非故,怎么好意思天天去呢!再说他一进去,人家就把他当大人一样招待,又是拿糖,又沏茶,热情得他有点不好意思。好在况家作为一个新搬来的家庭,总是需要些钉子啦、铁丝啦、木板啦,而他又能轻而易举地弄到这些东西,他就总以送东西或者帮她们干活的名义去她们家。

他愿意到况家去,他喜欢那个家庭的生活气氛:况钟慧在家里从不对女儿们大喊大叫,说话细声细气的。女儿们也很听话,母亲说什么就听什么,也是小声小气地说话。来队里不久,两个丫头就和另外几个移民子女去六七里外的场部上学,每天走得很早,到家里很晚,吃过晚饭写作业。他们闲下的时候就听音乐或者读书。她们家有个带铜喇叭的留声机,凡是双福去的晚上,她们就放唱片给他听。他特别爱听的是一支叫做“摇一摇”的歌曲。歌唱家的声音和况钟慧说话的声音一样,很亲切,又有点娇气,唱得很美又很舒服。那歌词唱的是“摇一摇,摇一摇,摇到外婆桥……”这支歌况钟慧亲自教给他唱,他记住了,在草滩上唱。有一次,况家的两姐妹听着唱片唱歌,叫他也唱,他唱了两句,两姐妹和况钟慧惊奇地叫起来,说他学得很像,他便羞红了脸。况家的这种家庭生活使得他明白了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生活,一种高雅的他从来没看见过的连想都没想到过的生活……

他喜欢到况家去,还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见过长得像况家母女这样美貌的人:况钟慧在田野上劳动的时候浑身尘土,但是回到家中就洗、就换上裁剪得很卡腰的绸衫或裙子,身上散发出香喷喷花朵一样的香味。她简直就像个高贵的皇后。两个女儿比母亲更白净、更娇嫩,真像两枝花朵。他经常一动不动地坐着,看这母女三人,看她们干这干那。她们的一举一动都是那样优美、舒适和自然,令他惊叹不已。看着她们,他的五脏六腑就像被水洗过了一样

舒坦,像是走在早晨的草原上,空气新鲜,天高地阔,霞光四溢。

他开始注重自己的穿着了。他把掉了的纽扣缝上,把肩膀上的破洞补上。他逼着舅舅给他买了一双新球鞋。这双鞋他舍不得穿,只是去况家之前才把脚上钉着很厚的橡胶底的方口布鞋换下来。去况家之前,他还要洗洗脚。有一次在况家坐着听唱片,他突然发现晶晶拍妈妈的胳膊,叫妈往地下看。他一低头,才明白晶晶是叫妈妈看他的脚。当时他羞得无地自容:况钟慧和他并排坐在床上,况钟慧光脚穿着一双缎面的拖鞋,脚又白又好看,而他的几个月也没洗过的穿着破布鞋的脚长了厚厚一层污垢,黑得看不清皮肤。莹莹笑了。当时况钟慧打了莹莹一下,说,这孩子!莹莹便捂着嘴咯咯地笑。

每次去况家,他要把身上拍打拍打。这方面也是出过丑的:一次他进去后坐在床上,站起来之后自己发现红白条的床单上沾了很多尘土。原来是他坐在食堂外边的地上吃饭,把尘土沾在裤子上。他拍打了好几下才把床单上的土打干净。

况钟慧一家过着封闭的生活。她们不去别人家串门,和她们一起来的上海移民也很少到她家串门。去食堂买饭的路上遇见人,人家不打招呼,她就不打招呼,就像不认识一样。她挺直了腰从看着她的人前走过。和人说话的时候,她总是扬起脸眯缝着眼睛看着对方。有人因什么事去找她,她很少请人家进房子,人都是站在门口说话。只有两名右派上她家去过几次。这是两个中年人,是兰州市的两名中学教师。他们在一起聊聊电影啦、书啦什么的。

时间才过去两个月,便有很多人议论况钟慧。

移民来到生产队的第四天开始下地干活,拔草。第一天拔草,况钟慧戴着一双带喇叭口的白手套。队长看见了,喊着说:你那像个劳动的样子吗?她没说话,仍然戴着手套拔草。这双手套破烂了,她叫人从玉门镇买回帆布手套,她始终带着手套拔草。这一直

是人们议论她的话题，很多人说她看不起劳动人民，剥削阶级的思想严重，没改造好。她在星期天总穿旗袍或者长裙去食堂买饭，从她身边走过的人便闻到香水味儿。有人说她是狐狸精，想勾引人。有人干脆就说她是专靠干下流勾当生活的女人。说这话的人振振有词地说，她一个妇道人家，哪来的钱养活两个丫头，日子还过得那么好！

双福和舅舅住的房子是个流言蜚语的发源地，因为这里没女人，因为它挨着食堂，单身汉们买了饭就端着碗走进来，坐在炕上或者蹲在墙根一边吃饭一边聊天。一天，人们又说起了况钟慧。是赶马车的王有有引起来的，他说况钟慧跟着他的车去一趟玉门镇，买糖，买香皂。况钟慧进到商店要买牛奶糖，商店的人说只有水果糖，一元五一斤的糖块，况钟慧说那糖不好吃，没买。说完，王有有大骂起来：“驴日下的，这个地主婆，她说水果糖不好吃，她想吃啥哩？我看她是欠斗！”“对，就是欠开斗争会。”另一个接上说，“我们庄子上的地主婆，你给她个羊粪蛋蛋，叫她吃下去，她不敢说不甜。”

大人们的谈话，双福是没资格插嘴的，但这天他忍不住了，把手里的碗往桌子上一放说：

“你这个人怎么骂人哩？你的嘴放干净一些！”

吃饭的人们惊了一下，看他。

王有有说：“我骂你了吗？你插的啥嘴！”

“骂谁都不行！”

“骂谁都不行？”王有有更为惊讶，把脸转向双福的舅舅说，“你看，你看，我怎么惹他了，这个娃！”

“你骂人就不行。你骂人家，人家惹你了吗？”双福又说。

“哎呀呀，老王，你看，你看你的外甥——这么歪！我说两句地主婆，他受不住了。她是你们的啥亲戚吗？”

“不是亲戚就应当挨你的骂吗？你是人家的亲戚吗，你就随便

骂人家？”

王有有的脸色难看了，一个小孩子跟他这样犟嘴，实在叫人难堪，他便一眼一眼地看着双福的舅舅：“你看，你看，越来越没个分寸了！”

舅舅平常是不大说双福的，但此刻唬起脸吼道：

“双福！你住嘴不住嘴，你想挨打！”

双福没再吭声，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这天晚上睡觉之前舅舅又说了他两句：“把你还给惯坏了，大人说个话，你还兴师动众问罪哩。我告诉你，以后再不准你到况家去，你知道她是啥人吗？”

“啥人？”

舅舅也不知道况钟慧的情况，舅舅说：“反正不是好人！好人有当移民的吗？”

双福半个月没去况钟慧家。

况钟慧在食堂买饭遇见他两次，叫他去家玩，他说有事，没去。

半个月后的一天，双福又遇见了况钟慧。这天一只牛丢了，他跑到麦场上去找，正遇上况钟慧到麦场来抱草。况钟慧砌了个炉子，想烧火试一试。况钟慧叫住了他，问他这些天为什么不去她家，他涨红了脸，吭哧说：

“况阿姨，你是地主婆吗？”

况钟慧愣了一下，脸色刷地变白了。

“你问这干什么？”

“他们说你是地主婆，不叫我到你家里去。”

况钟慧沉默良久说：

“不是……”

“我就说你不是地主婆嘛……”

双福的脸上露出欢欣的表情，但况钟慧又说话了：

“我不是地主婆，问题比地主婆还严重……”

双福的脸上的欢欣变成了惊讶，睁大了眼睛。

沉吟再三,况钟慧说她的丈夫是历史反革命。

“啥叫历史反革命?”

“就是解放前给国民党做事的人。”

“你的男人在哪达哩?”

“叛了刑劳改,死在劳改队了。”

说完这句话,况钟慧就沉默了,双福也没再问,他们静静地站着。后来,况钟慧用她突然变得沙哑的嗓门说:

“你走吧,我抱草去。以后你愿来就来,不愿来就不来,我不怪你……”

这天晚上况钟慧精神不好。她吃过饭之后就躺在床上,她对女儿们说,她有点累,要早睡。这时门板被人拍得发出啪啪的声音。晶晶去开门,回过头来说:

“妈,双福哥来啦。”

况钟慧慢慢坐起来,她有点不相信女儿的话,但确是双福走进来了,双福畏畏葸葸看着她说:

“况阿姨,我来了……”

这天晚上双福在况家待到很晚。况钟慧没有奶糖给他吃,她打开皮箱,拿出一罐咖啡煮了给他喝,茶杯里加了两块方糖。况钟慧问他好喝吗,他说苦兮兮的,香得很。

现在,双福几乎天天到况钟慧家来了。他白天在草滩上放牛,很枯燥,很单调,晚上就想和别人玩一玩。队里没有几户人家,没有他一般大的孩子,往常他吃过了饭,就是到右派们的房子里去玩,那些人大都是省城来的,能说很多新鲜事,但那些人都不爱说话。从花海乡来的老职工们到一起就是讲谁家的媳妇肚子大了,谁家的媳妇裤裆破了,他不爱听,再说,大人们讲这些事的时候总撵他,不叫他听。如今,他和况钟慧母女建立了良好的友谊,他便把晚上的时间都消磨在那儿。舅舅那天也是随便说一句,实际上他再去况钟慧家也没说过他。对于移民们是不是好人的话他一点

也不在意,他觉得这些人待人和善,说话客气又文雅,他们对他们有了好感。他还从心底里同情他们:他们原来在上海都是高贵的人,现在一下子变成和自己一样的庄稼人,他们的心里肯定很痛苦。

到况家玩去已经成了他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有时候在草滩上放牛,他就想着晚上到况家去的事,就盼着太阳快点落下西边的大草滩去。

把牛赶进牛栏之后,他就慌慌张张地吃饭,然后急急忙忙地跑到况家去。他不寻找任何理由啦——送钉子呀,送木板条呀——他走到门口也不问一声有人吗,一掀门帘子就走进去,对着况家母女大声说:“啥,还没吃饭呀!”或是大喊一声:“嗨,我来啦!”

他每天在况家待好长时间,先是况家姐妹学习,写作业,他在旁边坐着。然后他们一起听音乐,或者况家姐妹给他讲上海的事情。她们说到黄浦江,说到大轮船,说到大世界,他静静地听着,惊讶之极。他也对她们讲花海乡他的老家发生的故事,况家姐妹也都爱听,并且提出很多可笑的问题:戈壁滩上为什么不长草呀,花海怎么不下雨?更多的时间是况家姐妹读书,他和况钟慧听。这些书,他印象最深的是讲一个英国人在大海上遇难,流落到一座荒岛生活了好些年的事。听着这篇故事,他总是在想,自己要是落到那样的境地能不能想办法活下去。还有一本《安徒生童话选》他也是百听不厌,像《拇指姑娘》呀、《皇帝的新衣》呀。他也常常提出问题:“哼,那个皇帝就那么傻呀,明明是光身子着哩,他还不知道吗?”姐俩就咯咯地笑起来,说这是童话故事呀。这时候况钟慧也跟着笑。况钟慧是难得笑一笑的,在外头干活,她的脸总是板得平平的没有表情。她只是在家里才笑。她笑的时候很动人。她三十多岁了,但她笑起来很像二十几岁的人,她穿着宽松的睡衣坐在床上,靠着被子,笑的时候薄薄的衣裳就索索地抖动。她每天在田野上劳动是很累的,女儿们读书,她听着听着就歪倒在被子上睡着了,湿漉漉的头发把床单都润湿了。这时两个女儿就把她摆平叫

她睡觉，双福就回自己的房子去。

有时候，双福进门的时候，况钟慧正在洗头。况钟慧在田野上干活——浇水、收割、平整土地——是很脏的，回家来一定要洗头洗澡。况钟慧一点儿也不回避双福，就在他面前换衣裳、脱袜子、擦洗身子和洗脚，然后坐在梳妆台前梳头。双福呢，从镜子的反光里可以看见她匀称的身体上戴着乳罩的乳房，但是，他一点儿也不害羞，也不觉得难为情，因为他的心里没有一点邪念。父母的过早去世使他的童年缺少了家庭的温暖，在这间房子里他感觉到了这种家庭的气氛和温暖，他对况钟慧产生了一种孩子对母亲的依恋。他有时就想，况钟慧要是自己的妈妈多好。

当然，他也有想入非非的时候。他是个健康的孩子，他也明白男女之间的秘密，有时他就想：自己长大了，也是要像那些成年人一样有个家的，家里有一名女人；他幻想这个女人长得和况钟慧一样高贵和美丽动人。如果是这样，他就拼死拼活地劳动，挣钱，叫自己的女人过好日子，绝不叫她到田野上劳动。

八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双福从草滩上回到生产队。他是回来取水的。这天晶晶和莹莹跟他到草滩上去，她们放暑假闲着没事，跟他去放牛。姐妹俩人把他带着的水喝干了，还是渴得难受，叫他回生产队取水。他骑着一头牛往回走，路过麦场遇见了况钟慧。

“双福，你怎么一个人回来啦？”

双福看不清她的脸，她的脸上蒙着一块淡紫色的纱巾，头上还戴着草帽。她很爱惜自己的皮肤，她就是用这种方法保护自己的脸不被太阳晒黑。双福说我取水来了，那两个人渴坏了。

“到家里拿开水去，不要喝凉水。”

况钟慧扛着扫帚走过来，小麦割倒以后况钟慧就调到麦场上干活了，今天的一场麦子打碾完了，她要回家去。

况钟慧把他的水壶灌满了，还倒了一大茶缸水，放上白糖，叫他喝完再走。开水太烫，双福晾着喝，况钟慧倒水洗澡。

况钟慧脱了上衣擦洗，然后戴上乳罩，坐在梳妆台前梳头。

“双福，你说阿姨漂亮吗？”她从镜子里看见了双福的脸，问。

“阿姨，你的身子真白，真好看。”双福也从镜子里看她。

“是吗？”况钟慧像是有点惊讶，扭过脸来。

“就是，你的腰也细。”

“腰细？哈哈，你说我的腰细？”况钟慧站起来，哈哈地笑着转了一圈，看自己的腰，然后抬起头来说，“比年轻的时候粗多啦，”

“年轻的时候你的腰还要细吗？”

“还要细，还要细。”况钟慧愉快地笑着，但是突然又轻轻地叹息一声，“完了，我这一辈子完了。”

她的眼睛里显出悲哀的神情来。

双福像是不忍心看她这种愁肠百结的样子，便躲开了她的眼光。他过一会儿才扭过脸来。

“阿姨，你怎么不搬走呢？”

“我搬到哪里去？”况钟慧惊讶地睁大眼睛说。

“回上海去呀，从哪里来的回哪里去。你们为啥搬到这里来，这里的庄稼活，你再干上几年，你的腰就变粗了，脸也晒黑了。”他一边说一边看着况钟慧。况钟慧没说话，他又说下去：“况阿姨，你知道不知道，队里的人们怎么说你？他们说你是舞女，还有的说你是妓女，说你表面上正经，背后不知道干啥见不得人的事哩，要不，就凭你二十一块钱的工资怎么养活三个人……”

这些话，是他早就想对况钟慧说的，但总也说不出口，今天说开了，他就像抢着说一样，嘟嘟嘟地说了出来。他想，他说了这些话站起来就走，他已经没勇气再在这间房子里待下去了，况阿姨会生气的，但是，他刚刚走到门口，身后就很响地叫了一声：

“站住！”

他站住了，他想况阿姨一定会扇他嘴巴子或者骂他的，但是他一扭脸正好看见况钟慧软塌塌地坐在梳妆台前的椅子上。

好久，况钟慧抬起手招呼他：

“你过来。”

他慢慢地走过去。

况钟慧抓住了他的双手，看着他的眼睛有气无力地说：

“你哪里懂这些事呀，上海把我们撵出来了，就不叫我们回去了……”

双福把手挣出来。他不习惯这种亲热。

“上海为啥撵你们？”

“不懂，你现在还不懂这些事……”况钟慧软软地说，但她突然咯咯地笑了起来，把手搭在双福的肩膀上，细长的眼睛看着他的眼睛。“双福，你喜欢阿姨吗？”

“嗯。”

“真喜欢？”

“嗯。”

“你为什么喜欢阿姨？”

“我不知道。”

“不知道，你真不知道吗？”

双福不说话，脸变红了。况钟慧美丽的眼睛看了一会儿，把他拉近了，把脸贴在他的被河西风吹得粗糙的红彤彤的脸上。

“阿姨也喜欢你。你长吧，你快长大吧，长大了你就知道为什么……”

况钟慧把他搂在自己的怀里了，用自己很细很光滑的脸蹭他的脸，并且亲他，喃喃地说话。过了一会儿她才叹息地推开他，站起来说：“喝水。”

“喝水去吧。水凉啦。甜吗？”

双福从况钟慧家出来，眼睛里含着亮晶晶的泪水。他的身体激烈地哆嗦着，脸色苍白。刚才喝水的时候，他的手抖得厉害，茶缸子哐哐地磕碰牙齿，把嘴唇碰痛了。他的心也有点痛。

他扳住牛脊背骑上去，打着牛跑出来。他的心痛得很舒服。他在心里说：“快长大吧，快长大吧……”

但是，严峻的年代到来了……

移民是春夏之交来到农场的，八月底麦场上的麦子刚刚打碾干净，队长突然宣布，九月一日起职工每月的口粮标准从三十斤减到二十四斤。到了十月初又一次减口粮，职工每天供应半斤，家属和孩子只供应三两^①。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三年困难时期：它初始于一九五九年的冬季，到了一九六零年冬季最为暴虐……它在花海农场四队的表现是十一月初出现死亡，十二月中旬达到高峰——死亡在右派和移民中蔓延。老职工人熟地熟，这儿偷点那儿拿点，苟延残喘。右派和移民生活没根基，偷不上拿不上，大批倒毙。十二月二十八日，县政府派工作组来到农场发放救命粮，职工口粮增加到十二两，家属的增加半斤，死亡才逐渐遏止。此时四队人口减少六十三名。活下来的人大都浮肿，孩子们因为吃菜吃草根肚子胀得像绵羊。人们疲乏无力，走路时东倒西歪。只有少数职工能下地，但也是蹲在水渠里吸烟晒太阳。

饥饿把人们改变成了不知羞耻的动物。只要男人们肯拿出半斤粮票或者一个馒头，有些女人就在田埂旁或者水渠里躺下来，脱掉裤子。

况钟慧一家免于死亡且无一浮肿。况钟慧只是比前消瘦，脸色蜡黄。她从上海带来的钱花光了，还卖掉几件衣服和手表，买高价粮，买胡萝卜。双福在食堂混吃混喝，时不时偷两个馒头接济她。

况钟慧拒绝进行交换。赶马车的王有有一天夜里背着半麻袋小麦到她家去，被她轰了出来。

但她也没有保持住自己的贞操。

^① 旧秤，一斤为十六两。

春节前,两个炊事员请假回花海老家去了,食堂人手不够,队长叫抽两个妇女帮助食堂做饭。这样的工作妇女们都抢着干,因为可以吃几天饱饭,还能往家里捎点馒头或者别的什么东西——队里杀了几只羊。管理员选中了况钟慧,因为她胆小怕事不偷不拿。

春节前夕双福回花海舅母家去了。队里发了工资,舅舅叫他送一趟去。舅舅弄了一条羊腿也叫他捎回去。双福是初二这天回到生产队的。况钟慧嘱咐过他初二到她家去吃年糕,况钟慧在上海的母亲寄来糯米面了,说是要做年糕做元宵。他回到生产队立即就跑到况钟慧家去了。他像往常一样地推门就进,一进门却吓了一跳。他看见况钟慧躺在床上,脸黄得像烧纸,晶晶和莹莹在旁边哭泣。房子里还有几个移民。

“况阿姨你怎么啦?”

他刚问一句,一个移民女人就打了他一个嘴巴。

“滚出去!”那女人吼着说,“你还有脸到这里来?”

事情是这样的:双福回老家的第二天清晨,况钟慧去食堂上班。已经两天了,她都是早早到食堂去,和双福的舅舅揉面蒸馒头,等单身职工们起来吃饭上班。这天她来早了,食堂的门还锁着,双福的舅舅住的房子也是黑着灯。她在门口站了十几分钟。河西走廊的一月是最寒冷的季节,凛冽的东风几分钟就把她的衣裳刮透了,身体冻僵了。她想回家去暖和一会儿再来,又怕耽误了做饭。她没有手表,但她估计已经到时间了,她走过去敲了敲双福舅舅的房门。

“谁呀?”房子里传来双福舅舅的声音。

“我。快起,该做饭啦。”

“噢……”门缝里透出了灯光,双福的舅舅的声音又说,“咳,早着哩。你起这么早做啥哩?”

“几点了?”

“五点……才刚刚五点钟嘛。”

“那你再睡一会儿吧。我先回去。”

况钟慧想回家暖和暖和。双福的舅舅叫了起来：

“回去做啥哩嘛！进来，进来暖和一会儿，我给你开门。”

“不进啦，不进啦，我等一下再来。”

况钟慧转身要走，她知道双福不在，她不愿进单身汉的宿舍，但这时门吱呀一声开了，双福的舅舅披着棉袄站在门口喊：

“进来吧，你进来暖和暖和。”

况钟慧犹豫一下走进房子。立刻，她觉得一股热气扑在脸上。她搓着冻僵的手说：

“你们的房子真暖和。”

“比住家户的房子暖和一些。”

“国家的煤，你们就烧吧。”

“咳。就沾这些便宜，比住家的方便些。你冷吗？冷了就坐到炕上焐腿。”双福的舅舅系好了棉袄纽扣开始捅炉子，说，“上去，上炕去焐一会儿。炉子灭了，我先把炉子生上，我们再去食堂。”

况钟慧在地上站了一会儿，身上还是冷。她伸手摸了一把火炕，炕很热哩，她偏腿坐在炕沿上。

双福的舅舅一边点炉子，一边看她，说：

“炕热吧？上去，上去焐上，把腿盖上，早着哩，还有半个钟头哩。”

况钟慧看了看炕头上的闹钟才五点五分，就犹犹豫豫上了炕。她实在是冻僵了，腿脚麻木了，禁不住温暖的诱惑用被子盖住了腿。

“老王，你过完年回家吗？”况钟慧在炕上坐着，主动说话。她对双福的舅舅很感激。双福说过，舅舅常常从食堂拿吃的回来，叫他送给她，舅舅可怜她们寡妇母女。

“到时间看吧。有啥办法哩，公家的事，领导说了才行。”双福

的舅舅点着炉子了，站直了身子说，“把他妈的，半年没闻过媳妇的味道了。”

对于男人们粗鲁的语言，况钟慧已经听习惯了，她笑了一下说：

“那你就过完年回家去吧，好好闻一闻。”

双福舅舅哈哈地笑了。笑罢，他突然盯住况钟慧说：“你就不想闻一下男人的味道吗？”

“我……”况钟慧没想到他开这样的玩笑，结结巴巴说，“老王，不要跟我开玩笑。走吧，该做饭啦。”

况钟慧撩开被子要下地，但是双福舅舅伸开双手拦住了她。

“急啥哩，坐一会儿，再热热地坐一会儿。嘻嘻，我还有好东西给你哩。”

他叫况钟慧往里头挪一挪，掀开炕上的毡片片拿出个纸包来，里边是一沓子粮票。他笑着抓住了她的手，把粮票放在她的手心里。

“拿去，这是十斤粮票，拿去过个年。”

“不，不……”

况钟慧急急地抽回手去，像是烫了一下，脸涨得通红。她急忙下了地。可是双福的舅舅拦腰一抱把她撂在炕上。双福的舅舅把她摁在热烘烘的毡片子上说：

“装球子的啥正经嘛，你还当成你是金枝玉叶哩！”

双福的舅舅像摆弄一只小兔子一样三把两把把她的衣裳剥光了。

双福回到生产队的当天夜里况钟慧死了。事情发生后她就躺在床上，不吃不喝，谁劝也不吃。晶晶和莹莹哭着求她，求她吃饭，她痴呆呆不语。眼泪无声无息地流过她的脸颊。她躺了四天四夜啦，她闭上了眼睛。

况钟慧死的第二天人们就埋葬了她，埋在生产队北边的草滩

上。那儿埋着过去了的这个冬天死去的六十三名饿鬼。他们都没有棺材,他们被人拉到这里,用一条破被子裹着,或者什么都没覆盖,就草草地掩埋掉了。因为是冬季,因为掩埋的人无力挖掘,覆盖的土很少,大风刮走了沙土,他们的头发和破衣裳被风刮得索索飘动。况钟慧的坟起了个堆,还插了个木牌。她是穿着一件对襟的新棉袄埋葬掉的,也没有棺材。她的女儿们怕妈妈的衣裳被人剥去换粮食,央求大人们把坑挖深一些,上边填了很多土。

双福也在这一天失踪了。他再也没进过况钟慧的家门,况钟慧埋葬时他也没有出现。况钟慧埋掉的那天傍晚,有人看见他在西边草滩上走着。人们当成他跑回花海的老家去了,但是春节过后他的舅舅回家去一趟,没见着他。

十几年过去了。七十年代中期一个秋日的下午,花海农场四队来了一名中年男子。他的身体很壮实,穿着一身兵团职工的绿衣裳,他说着一口本地方言,说他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职工。他要找两个姓况的姐妹,她们是上海移民的后代,应该是二十七八岁。

时光流逝,沧海桑田。花海农场已经面目全非,花海农场早就改编为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五团三营,这里生活着一群来自天津的知识青年。他们也穿着绿色的兵团服。他们说这里就没有什么上海移民,也没听说过姓况的两姐妹。不过他们把一个放羊的老职工叫来了,老职工提供了一些信息。放羊的老职工说他是—一九六一年从甘肃天水县逃荒来到河西走廊的,在安西县的十工农场放羊。一九六九年战备紧张,上级把十工农场的职工调到花海来,把花海农场的职工调到十工农场去。原因是离着花海农场二十几里的戈壁滩上建起了一座军工企业,花海农场的职工大都是右派和移民,政治上不可靠,威胁军工企业的安全。十工距离花海二百公里。

这个中年人再也打听不出什么来,就走到西边埋死人的草滩

上去了。他借了一把铁锹,把一个长满了杂草的坟堆添了些土,在坟堆旁边的草地上躺了好久,眼睛瞪着蓝幽幽的长天。中年人走后,知识青年们到乱葬岗子去看了看那个坟堆,坟头立着个朽得发黑的木牌,上边的字迹已经风吹日晒辨不清了。

小 赤 佬

那个女的,就是那个端钢精锅的,脸白得像死人的,就是芮琴。

中午在食堂买饭,身旁有人指着右边窗口排队很靠前的一个女人说,于是,我看见了一个头发梳得很整齐剪得很短的白白的后脖颈。我一边排队买饭一边往那边看,想看清她的脸,终于也没看见她的脸什么模样。她始终目不斜视地把脸朝着买饭的窗口,买了饭朝左一拐转身走掉了。排队买饭的人们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只看见她的脸很白。她的身材也好看,端端溜溜的。

我们一列车支边青年七百多名,坐专列从天津到玉门,又被汽车拉到一百公里开外的蘑菇滩农场。蘑菇滩农场的编制是兰州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我和其中的一百多人分到五连做农工。五连是个老连队,兵团组建前老蘑菇滩农场的的一个生产队,有五十多名老职工,四分之一是1958年从上海迁移来的移民。

到五连第二天就听人说有个上海女人很漂亮,出奇的漂亮。好几天了,我却没见过。她的名字叫芮琴。全连共一百七十多人,支边青年分成两个排,男子排女子排,老职工是第三排。我们支边青年都是当年高考的落榜者,有一小部分初中毕业生,都是心气很高志愿来河西的,想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青年人,从心眼里瞧不起被强制来河西的移民。新近从部队转业下来的连队也讲那些人政治成分复杂,叫我们不要接近他们。他们当中有几个四类分子,我们便轻蔑地称老职工排为四类分子排。我们下地劳动也不和四类分子排在一起。

过了半个月,我才真真切切看到芮琴。

十月上旬连队的土地开始灌冬水。灌水第一天我们班浇连队旁边的一块地。这是块新开垦的荒地，新修的渠道和田埂到处漏水，我们又没干过农活，一个班的人手忙脚乱弄得满身泥浆。还是叫水把渠冲垮了。水是很宝贵的，跑了水要罚款的。我们班的一半人跳进决口处，水还是堵不住。

这天连队的菜地里有两个妇女在浇水。她们大概看见了我们的狼狈相，也可能是听见了我们凄惨的大呼小叫声，走了过来。她们中的一个撇撇嘴回去了，剩下一个叫我们到菜地的瓜棚去抱麦草。麦草抱来后她双手一擦一擦地很快拧成几条草绳把草捆来压进缺口，再叫我们往上堆土。缺口堵住了。

这个女人就是芮琴。在整个堵缺口的过程中她很少说话，说一两句也是很简短的几个字：快！甩土！往后站！她说话的腔调冷冰冰的。她的声音很低沉，但叫人觉得很严厉。

她长得真是惊人的美丽。她的身上穿着一件很旧的缀满补丁的列宁式棉袄和棉裤，很臃肿，头上也包着农村妇女的围巾，但她的动作话语给人以很潇洒的感觉和完全不同于农场妇女的韵味，给人以高贵感。她的围巾是折成三角盖在头上的，在下巴那儿系了个结，但就这种样子，头巾也没有掩盖住她的天生的丽质——我们见到的农场妇女都因为风吹日晒而脸庞上的毛细血管很丰富，脸蛋儿红得像要冒出血津来，而她的脸非常白皙；把缺口堵上后她累得直喘粗气，她的脸上才显出淡淡的妃红色。她的前额很突出，眉骨也很突出，这使她的眼睛陷得很深。她的眼很大，一眨一眨的时候显得很有神采。在过了好多年以后的今天，从电影里看到那些有个性的广告模特的眼睛，我就想起她的眼睛。她的鼻子直溜溜的，鼻子还有点尖。嘴唇丰满，唇线很清楚，她的嘴唇虽然因刮大风而沾上了尘土，当她用舌头舔一下之后，它就湿润而且色泽鲜艳，拿今天的话来说很性感。但是她的眼睛她的脸显出冷冰冰的忧郁。

这是堵完了缺口坐下来休息的时候我观察到的,我就坐在对面的渠堤上。

这天还有一个小插曲,就在我们坐着休息的时候连长走过来了,我怕连长说我们坐着不干活,喊了一声,干活!站起来!芮琴却瞅了我一眼,大声说:

坐下!歇一歇再干!

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出了讥讽的神情,似乎对我在连长面前的表现很不满意。她的举动和其他移民真是不一样,其他移民一见领导就满脸堆笑,对我们支边青年也是巴结和客气得很。连长走到跟前了,她看也没看连长一眼。

这天我对她的印象很好,这是个很漂亮的女人。她大约三十岁。她还很有个性。但是这种印象弄得我对她的看法很矛盾,因为我耳朵里听到的和以后进一步了解到的她不是个正经女人。她于1958年移民来河西,1960年困难时期,出卖肉体换粮食吃。男人们给她一个馒头,或者半斤粮票,她就在干活的麦田里或者地边的水渠里躺下来,脱掉裤子。困难时期过去以后她还和别人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有个和我一起来的支边青年说,有一天夜里浇水,他从地里回来,看见姚子成偷偷摸摸进了她的房子。姚子成是什么人?姚子成是解放前上海滩一家妓院的保镖,他现在的老婆就是妓院老鸨赏给他的妓女。姚子成是城市贫民,实际是个毛主席说的流氓无产者。解放后他在上海没有正当职业,1958年上海“支援”大西北移民时积极报名,被街道派出所任命为那一列车移民的大队长。来河西后在一个生产队当副队长。他鱼肉上海老乡,困难时期糟踏了不少妇女。

芮琴是个很孤傲的人。在路上和人相遇,你要是不主动和她打招呼,她就视而不见地和你错肩而过。你和她说话的时候,她的大大的忧郁的眼睛冷冰冰地看着你,脸上平静得无任何表情。她走在路上目不斜视,直溜溜走过去。

连队的青年们给她起个外号冷面桃花，真是恰如其分。

芮琴为什么是这么个冷冰冰的人呢，她怎么不结婚呢？她为什么这样堕落呢？支边青年们都想解开这个谜。因为她太漂亮啦，在连队太引人注目啦，人们为她惋惜。但是没有人说得清楚，就是移民们也说不清楚。他们说从她来到河西的那天她就是冷冰冰的，她不交朋友，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

一个偶然的机，我了解到她的过去。

1965年夏季，我跟着连队的拖拉机往场部送粮食。一天，我们在仓库前等着粮食过磅入库，我喊着问仓库管理员还有多少时间才能轮到五连。一辆小宛农场的卡车来我团拉粮——小宛农场是个新建的农场，生产的粮食不能自给——在仓库门口停着，听见我说话，卡车上跳下一个人来，问我是五连的人吗。我说是，他便向我打听起一些人的情况。他说他在原来的五队当过几年书记，在我们支边青年到来之前调到新建立的小宛农场去了。在粮仓附近的一棵白杨树下，他对我讲了他所了解的芮琴。

芮琴原是上海一所中学的英文老师，1955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当老师不久就遇上大鸣大放反右斗争。反右斗争中和她同一教研室的一位老教师有右派言论，学校党支部组织教职工开批判会批判帮助这位老教师。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党支部书记说，今天的会开得不错，就是没有人发表不同意见。这时芮琴发言了，说我认为老教师说的话没有什么错误，不该批判她。过了几天，党支部书记宣布右派分子的名单，她和那位老教师都定为右派。芮琴听到这个决定一下子晕了过去。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校长又找她传达党支部决定：上海市要往大西北移民，党支部决定她去，只要她服从党支部的决定，就可以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她当时回答：我认为我不该当右派，但是大西北寒冷，这帽子我还是戴着吧，可以暖和一点儿。听说她去大西北，丈夫便和她离了婚，她带着不满周岁的儿子毅然登上了西去的列车。她当时下了决心，这辈子再不

回上海了,她恨透上海啦。

大西北岂只寒冷!1960年的饥饿像狼一样扑了过来,粮食定量降到了每天四两,移民大批死去和逃亡,没死没逃的就偷,或者用衣物和家具换点胡萝卜苟延生命。女人用肉体换粮食吃——那些能从仓库里拿出粮食来的干部,能偷出几个馒头来的炊事员、车把式用他们的职权和手中的馒头逼着女人们就范。有些人甚至以搞上海来的洋太太洋小姐多寡为乐事。1964年搞社教运动时揭发出来,有个队的队长把搞了多少个上海女人,哪个胖哪个瘦,什么日子搞的,写在日历牌上。

芮琴是全队最漂亮的最年轻的单身女人,副队长姚子成和书记吴虎盯上了她,但她不肯就范。当时她的身体已经到了不可逆转的边缘,她的两腿浮肿,脸也肿得像馒头一样,脸皮变薄变青,像是透明的玻璃纸一样,用手指头一捅就要破的样子。她把自己的粮食给孩子吃了,孩子也瘦得皮包着骨头。她还要下地干活。

有一天她没有下地。那是1961年的春天。由于1960年秋季开始的饥饿和移民的逃亡,那年土地没有冬灌,1961年春天搞春灌,那次春灌芮琴没有下地,书记吴虎说她腿肿,照顾她在食堂帮厨,给灌水的人们做夜班饭。半夜时分,灌水的人吃过了饭又下地去了,吴虎不叫她下班。吴虎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煮了一锅羊肉,里边放上香喷喷的土豆,叫她去吃。她去了,她没有禁得住羊肉的诱惑。于是在吃完羊肉之后吴虎把她摁在办公桌上奸污了。事完之后她觉得恶心,把羊肉和土豆都吐了。她觉得糟踏了很好的食物,心里很可惜,哭了,吴虎却骂她:你以为你是皇亲国戚金枝玉叶吗!从此以后她就再也不拒绝来自男人们的“帮助”了。书记吴虎半夜里拿着馒头去她家,她也开门。在地里浇水,吴虎走过来说脱掉裤子,她就在渠道边上脱掉裤子,躺在草棵子上。吴虎是蘑菇滩附近娘子沟公社的人,他勾结老家的人偷窃队里的粮食案发被公安局抓走死在劳改队里;以后姚子成便长期霸占了她。

这个偶尔相遇的人说的话使我对芮琴产生出极大的尊敬来。她在被定为右派以后表现出的气节和人格力量令我的心为之跳动,令人扼腕,但我又为她的堕落而惋惜:她在政治斗争的大风浪里保持了做人的勇气和品格,却又在生活的困苦面前降下了作为一个人的旗帜!不是有句老话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但是我冷静地思考之后便在心里谅解她了。我设身处地想,要是我自己,在饥饿和死亡之前怎么样,会不会挺起骄傲的脊梁?这个农场死去了多少移民呀!我听移民们说过,他们那一车人来的时候八百零五人,现在只剩下了二百多人。那六百人跑走了一部分,但大部分人饿死了!蘑菇滩农场最南头的一个连队在开垦荒地的时候推土机推开一个沙包,发现沙包里有三个死人,两男一女,一个是小孩。男人的身上有三十元钱十斤粮票。有些人去辨认,说这一家人是六队的移民,他们从农场去玉门镇火车站的路上冻死在沙窝子里,沙土自动掩埋了他们!

体谅了芮琴的失节,我便恨吴虎,我便恨姚子成。我认为吴虎和姚子成之流,是逼良为娼的豺狼。

我把听来的故事讲给身边的朋友们,他们和我有同感。我们共同地产生出一种想法,整整姚子成。

我们捕抓了一个机会。过了年的春天,我带着我那个班的人在粮仓拌麦种。这种活儿是很腻歪人的,没有机械,全是用木锨翻麦子,并把六六粉撒进去,拌匀,很呛人。我们干半小时就休息一次。河西的讲究是小麦种在冰凌上,也就是说这时候地表面刚刚解冻,天气还很冷。粮仓离着畜牧排很近,我们休息的时候就跑畜牧排去烤火,打扑克。那天我们正在畜牧排的宿舍打扑克,一个出去解手的知青跑了回来,急急地说:喂,你们说我看见什么啦?

你看见什么啦?我问。

我往厕所去的时候,看见芮琴从地里回来啦,回家去啦。过了一会儿,我从厕所出来,又看见姚子成也从房山墙那儿拐过来进了

她的房子。

你没看错？

怎么能看错呢！姚子成不是在地里播种吗，他负责机务班。我当时心里一激灵，想，他不在地里干活，这时候跑回来干什么，我就躲在墙垛那儿看他，看他是不是往芮琴家去干坏事。还真是的，他从山墙一拐过来就进了芮琴家。

听了他的话，我的心兴奋起来。我说，准是找芮琴干坏事去了，咱们为什么不现在把他抓出来呢，叫他出出丑。

全班人都说对，说这可是好机会。有人还说，芮琴也是在休息的时间回家去的，四类分子排妇女班今天清渠，她还得出活去呢，姚子成去干坏事也得抓紧时间，咱们现在去抓他正好。有人嗤嗤笑着说，哈，太棒啦，俩人脱了衣裳累一块堆儿的时候逮起来！

我们去了。走到芮琴家门口为了预防万一——万一她们不是干坏事呢！——我们先从窗户往里看了看，窗户上挂着布帘，轻轻地推门，门是从里边插着的。事情已经很清楚啦，我们便突然地敲起门来，喊，开门开门！

传出来芮琴的声音：谁？干什么？但没人开门。我们喊着一二三把门撞开了。

他们是在干坏事。随着咔嚓一声门鼻被撞折，我们冲了进去。我们看见姚子成刚刚下炕，正往裤子里蹬腿，上身还光着；芮琴在炕上坐着，慌慌张张穿上衣，光着屁股。她愣了一下，突然躺倒，拉被子盖住了身体。

干……干什么，你们？姚子成结结巴巴地说，一霎间他的脸色变得蜡黄。

干什么？你说干什么？操你妈我们就是来逮你的！我在他赤裸着的胸脯上打了一拳说，走，上连部去！

上连部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大白天的，你们想造反吗？

姚子成不愧是保镖出身，人赃俱全还挺凶。他大概是欺负移

民已经习惯了,对我们也用了“造反”的字眼。立即就有人在他脸上捣了一拳,把他的鼻血打了出来。

妈个屁你还嘴硬!大白天,你大白天奸污妇女,你是人还是牲口!

上去两个人拧住了他的胳膊。

芮琴的脸色变得苍白,白得跟死人一样,身体在被子里瑟瑟抖动。我看她一眼说:起,你也穿衣裳,到连部去!

我们在路上就想好了,要把芮琴一齐拉到连部去。这是有点不合我们的心意,我们的目的是整姚子成,但我们不能投鼠忌器。或许这样更好,叫她出出丑她就再也不和别人胡搞啦。

芮琴起来了,她穿衣服,下炕。我们推着姚子成往外走。我们不叫姚子成穿上衣。我们就是要叫他出丑,但是我们刚刚走出门外,芮琴就从后边冲了上来。她一把推开了拉着姚子成的人,往姚子成身前一站,气势汹汹地瞪着眼睛说:

走开,小赤佬,有你们什么事!

我们愣住了。她真凶呀,她的美丽的大眼睛瞪圆了,脸上升起好看的红晕。她翻动着变得鲜艳的嘴唇说:

小赤佬!多管闲事!

我们还没反应过来,她就拉着姚子成进了房子,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我们面面相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灰溜溜去仓库拌麦种了。过了一年,终因旧病不改影响太坏,领导把芮琴调到七道沟去了。那里新上马个农场,师部从各农场抽人。

不知道他是谁

我是在踏实遇见她的。

计划中的一部小说开了个头,就写不下去了:知青生活过去才十几年,但是那些曾经是耳鬓厮磨的朋友们的音容笑貌却已经淡漠了,亲身经历过的生活也远去了……一句话,找不到感觉啦。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真是这样吧!

为了找回失去的感觉,我又回到河西走廊的小宛农场。在疏勒河边的场部住了几天,继而又去了踏实分场。上山下乡的第五年,我从场部附近的十四连调到踏实;当时农场领导决定从各个连队抽人,在踏实组建一个新的分场,我们连抽了十个人,七男三女。我在踏实生活了十年,直到知青大返城。

现在的踏实分场只有十几户老职工了,耕种着我们当初开垦出来的土地。我住在队长家里,白天到处走走,晚上和农工们聊天。聊天激发起我许许多多的回忆。

一天下午,我在田野上坐着,看远方的草原。我喜欢这片草原。这片草原叫桥踏草原,是一片未曾开垦过的荒原,长满了一墩一墩的芨芨草。这些草不知生长了多少个世纪,它们的根部腐败了,变黑了,像是大火烧过一样,新的芨芨草从腐草上长出来,比人还高。夏季的干热风吹过,草海上就出现一条暗灰色的波纹,碌碌地滚动,久久地在视野中难以消失。这片草原从踏实向东延续,经过桥子乡到娘子沟,七八十公里。从前在田野上劳动的时候,我常常凝视着它浮想联翩,似乎自己回到了远古时期……

突然,队长骑着马跑过来了,说是又来了一位知青,叫我去看

看是否认识。

我问他来人叫做什么名字,他说不知道,是个女的。我连跑带奔,回到队里去。在踏实的几天,我已经觉到了孤独和寂寞:没有了昔日的知青,老职工又都不认识,没有知音。如今来了一位当年的战友,自然是令人兴奋!

生产队办公室门口停着一辆马车,站着一位农民。队长说那知青是坐这辆马车来的。那知青不在办公室,赶车的农民说她往南边的胡杨林去了。

我还不能想出她是谁,但我认定她是当年的踏实知青。当初从小宛来到踏实,荒原上没有房子,我们在南边的胡杨林里挖了几十间地窝子住着;过两年盖了新房,地窝子才扒了。我想她一定是去看从前住过的地窝子了。

走近胡杨林,就见一位穿白衬衫黑色太阳裙的妇女在稀疏的树林中走动。喂,我喊了一声,走近她,她站住了,看我,我却认不出她是谁。这是个中等个头的中年妇女,身体有点发胖。她的眼角上长了细细的鱼尾纹,但是圆圆的脸还显得年轻,漂亮。

“你是……”

我先开口说话,我希望她开口,她只要一说话,我就能判断出她是谁。在城市里有过几次知青的聚会,有些人多年不见,发胖了或者消瘦了,冷不丁地认不出来,但是一听说话的声音就都想起来啦。

“我叫李静惠。”

她说话了,我却仍然想不起她是谁,想不起踏实有过她这个人。我困惑地问她是几班的。她笑了一下,说她不是踏实的,她是小宛六连的兰州知青,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来到农场的。我惊讶地说,你不是踏实的呀,那你来踏实干什么?她说来河西的第二年她调到场部宣传队,演节目来过踏实。她现在兰州大学工作,这次出差去新疆路过安西县,来踏实看看。

听她说话我想起来了,1972年农场宣传队确是来踏实演过节目,还真有她这么个人——她似乎是在京剧《智取威虎山》里演常宝的那个姑娘。印象中她是个高中生,比我们这帮六四、六五年来河西的支边青年小好几岁。她那时就是小圆脸,身材匀称,挺漂亮。

我说:“你是喜欢踏实的自然风光才来这儿的吧?这儿比小宛还荒凉。”

她很得体地笑了一下,说:“荒凉有荒凉的美。比起城市的嘈杂和喧闹来,荒凉能净化人的灵魂。”

共同的审美趣味立即使我喜欢上她了,我高兴地邀她到队里去歇歇。她说:“不。我随便走走,一会儿还要回安西县去。”

我明白她是从安西县坐车到踏实乡,然后雇农民的马车来踏实分场的,便说,安西县的班车一天一趟,你回到踏实乡怎么回安西县去?她说住踏实乡招待所,明天回安西县。我说那何必呢!明天小宛农场的吉普车来接我,咱们一起回去吧,你还可以回六连去看看去。

我确是想和她聊聊天,再三劝她住一天,我说生产队的办公室有一张床,你可以住那儿。她同意了,并要我保证回到小宛场部后找辆车送她去六连看看。

我们回到队里,把赶马车的农民打发走了,喝点水,然后又走到田野上去。我们在田野上蹒跚了两个小时,看闪着银白色草浪的草原,看近在眼前巍峨高耸的祁连山的雪峰,从山顶的云雾里垂挂下来的冰川。蜃气笼罩着戈壁滩覆盖着草原。蜃气颤抖着,奔流着。我指着被蜃气托起来的一片丘岭般的东西说,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她说不知道。我告诉她,那是锁阳城。唐代的时候,太子李治和大将军薛仁贵率军征伐西戎,被哈密国之帅苏宝同率军围困在苦峪城里,唐军挖地下的锁阳压饥止渴,等来了援军,大败苏宝同。此后苦峪城改为锁阳城。唐代以后锁阳城衰败,逐渐

变成一片废墟。我指着奔跑的蜃气问她,你说,这蜃气像什么?她略一沉吟,说,野马也,尘埃也。我大笑起来,说,真不愧是大学老师。

我们聊了很多过去的事情。晚饭是在队长家吃的。我做东,买了两只老职工家的鸡,请队长的爱人杀了,吃烧鸡块。

夏季的河西走廊白昼很长,吃过晚饭太阳还悬在西边的田野上空,无比辉煌。我送她回办公室休息,她却说时间还早,到外边走走。我的意思是她看过南边的戈壁滩和小树林了,再看看北边的截山去,可她还是要去胡杨林。她说,想看一下那次来踏实演出住了一夜的地窝子。

夏季的胡杨林欣欣向荣,郁郁葱葱。胡杨树是一种古老的树种,雌雄异株。此时,雌株上的絮果成熟了,绽裂了,黑色的比小米粒还小的种子被释放出来,白色的绒伞载着它,在空气中飘呀飘,像芦絮,像雪花,落在草尖上,落在我们身上。这情景使我想起了二十年前的情景:黄昏,我们收工回到地窝子,晾在外边的衣裳和被褥上挂满了蒲公英的种子一样的胡杨树种子……但是,我们住过的地窝子已经面目全非了:林间的空地上很整齐地排列着二十几个浅浅的土坑!

我领她走到当年女子排住的地方,问她那次住在几班的宿舍。她只要说出是几班,我就能指出是哪个土坑,并且如数家珍地报出哪几个人当初住在这儿。但是她说不出是几班,她说那天她住的地窝子在西头,一个男知青领她去的,那房子里只有一张木板床。我说一间住一个人的地窝子就两三间,一间是连队的统计员陈克,一间是赶马车的刘志良,还有一间是菜班的齐国瑞,不知你住的是谁那间?她说不知道那人是谁,她没问名字,只记得那人长得黑黑瘦瘦的,大高个子。我回忆一下,那三人还都是瘦长身材,还都长得太白。在河西的田野上生活过的人,哪有长得白的!我进一步问那个人的长相,她又说不清,说夜里进的房子,点个墨水瓶儿做

的煤油灯，看不清模样，也不好意思细看，印象不深。

我把她领到最西边的三个很小的土坑旁边，说，你看吧，就这几个坑，不知是哪一个。

她绕着三个坑走了一圈，说认不出来。

这些坑当初都挖了三公尺深的，上边搭上梁，铺上席，压上土，我们住在里边。现在风沙掩埋得剩下二三尺深了。白刺和骆驼草从坑里密密麻麻长出地面，和林间的杂草连成一片。离得稍远一点儿就看不见它们。白刺棵上的浆果成熟了，红得像血珠一样。

这儿是我生活过十年的地方，那时就住在这样的坑里。看着一个个土坑，我的心突然无端地猛跳了几下，一种似惆怅又似悲壮的情绪从我的心底涌起。我忙忙地转身离去，说了声走吧。

走出几步了，没听见她跟上来，扭转身又喊她走，她才离开土坑跟上来，蓦地，我发现她的眼睛里闪着亮晶晶的泪光。

我感到奇怪，站下来问她怎么啦。她扭回头看着长满了杂草的土坑哽咽着说：

“就在这儿的一间地窝子里发生过一件事情，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件事谁都不知道，我丈夫也不知道。”

她是1969年春天上山下乡来到小宛农场的，她告诉我，在学校的时候，她就喜爱唱歌跳舞。来到农场不久，她和连队的知青们排练了一段《智取威虎山》，参加全场的文艺汇演。演出一炮打响，她被调到场部宣传队当演员。

宣传队经常下连队演出。那次来踏实演出，原计划当天夜里就返回场部的，因为这个连队新组建不久，条件差，没法安排二十多人的住宿。可是那天晚上演出结束，吃过夜饭，人们都上了卡车，车却发动不起来。司机修了好长时间，没修好，说是一个什么零件坏了，明早上才能给场部打电话叫人送来。这就是说宣传队要在踏实过夜了。本来宣传队的人是从各连队抽上来的文艺骨

干,踏实的人也是从各连抽调来的,熟人和熟人见面都恋恋不舍。此刻听说不走了,宣传队的人们和那些站在卡车旁送行的人们都高兴得叫起来,说是不用连队安排住处,他们自己找地方睡觉去。不等队长说话,宣传队呼啦一下散了,被各自的朋友拉走了。

很巧的是就在宣传队决定不回场部的时候李静惠去厕所了,而且去的时间长了些。等她从厕所回来,汽车旁边已经空无一人。

她明白这是宣传队不走了,但宣传队的人去哪儿睡觉过夜,她是不知道的。她扯着嗓门喊了几声宣传队人的名字,也没人应声。她跑到茭茭草席围成的食堂去了一趟,看宣传队是否住食堂的饭棚子,食堂的门却已经上了锁。她又跑到树林子里的地窝子前边去,想问问人,可是敲了两个门,都是男同志宿舍,里边的人回答不知道宣传队住在哪儿。

就在她犹豫是不是敲第三个门的时候,一个人影从她身旁走过,问了一声谁。她听出是一个男子的声音,就立即回答自己是宣传队的,正在找宣传队的人。那人说宣传队的人都去找熟人睡觉了,你自己也去找个熟人睡觉吧。

那人说完就走,她急得叫了起来,忙忙地说你别走。她告诉那人,自己是1969年来河西的新六连的知青,在踏实没有熟人。她央告那人找一下宣传队长,叫队长给她安排一下住处。那人说谁知道你们队长住在哪间房子,这么多间地窝子,我一间间去问吗?我给你找连长去吧。

那人过了五分钟就走回来,说找不到连长,可能连长下地浇水去了,你自己到女子排去吧,随便砸开哪个门说说,你是宣传队的,要找个地方睡觉。

她没应声,站着没动。她不好意思去砸人家的门,很多地窝子已经熄了灯,她不好意思去惊动人,也害怕遇上不叫她进屋的人。那人看她不动弹,也为难了,说,你去叫门呀,你不叫门怎么办,我也不能去敲女子排的门呀,大半夜的,大家都睡觉了。

听那人这么说,她觉得不能再麻烦他了,便说,那你走吧,我自己想办法。这时候她已经想出法子来了,她说我到汽车上睡去。

那人犹豫了一下,说睡驾驶室也行,走,我送你过去吧。

那人陪她到了食堂那儿的汽车跟前,可是汽车驾驶室的门锁着,拉不开。

这样一来李静惠真的发愁了,难道要在卡车上坐一夜吗?来河西两年多了,她还真没有在房子外边过夜的经历,且不说是否安全,单就是蚊子也让人受不了。往日她就听人说过,踏实的三个蚊子能炒一碟菜。来这儿的这个夜晚,她不停地甩手、跺脚,蚊子还是隔着袜子把脚腕咬了三个疙瘩。

她发愁怎么过夜,其实那个人也发愁了,站了一会,不断地问她怎么办,怎么办。后来,那人建议说:

“要不,你实在不愿意去砸女子排的门,那你就到我的房子去住吧。”

“不不。”李静惠说,到男知青的房子去睡觉,她更不好意思了,她想到的是自己去了,一房子的人都得惊动起来,到外边去找住处。

但是那人说:“走吧,就我一个人住,你住我的房子,我找地方睡去。”

她犹豫一下同意了,她还有什么好选择的呢!她跟着那人走。因为天黑,看不清路,也看不见周围的景物,所以她也没认下到底是进了哪间地窝子。她只记得是往西走了一截,下了一个地道,那人叫她站住,推门进去,点着了灯,又喊她进去。

这是一间很小的地窝子,大约六七平方公尺的面积,挨墙一张木板床,是用木头橛子支撑着的。床上挂着蚊帐。床对面的墙根处放着个小木箱。

“你就睡我的床吧。小心蚊子钻进去,这儿的蚊子太毒。”那人把蚊帐整理好了,看看没有什么还要他做的事了,又说:“要喝水的

话,茶缸子里有,凉开水。在箱子上放着。”

“不喝。我不喝。”进房后李静惠就很拘谨,因为打扰人家很不好意思,哪里再好意思要水喝。

“那你就睡吧,我走了。”

那人看了她一眼,也注意到了她的拘谨,便从墙壁上拿下一件破棉袄披在身上,就要出门。这时李静惠忙忙地说了一句:

“喂,你先别……”

“嗯?”那人扭过脸来,问她什么事。

“嗯……”李静惠吭吭吃吃地说,“你急着走什么呀,我问你,你这房子就睡一个人吗?”

李静惠其实也没有什么事,她就是因为打扰人家有点难为情,想说几句客气话。但是那人领会错了,以为她胆小,说:

“就我一个人睡。不过你别害怕,你把门顶上睡。那儿有个锨把,顶上,谁也推不开。”

李静惠说:“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我睡你的床,你上哪儿睡去?”

自从进了地窝子,那人就忙着整理床,加上灯光又暗,她一直就没看清那人长得什么样。此刻她看清楚,黑黑的皮肤,眉毛挺黑,身材很高。和她照面的时候,那人的脸上显出腼腆的神情,似乎不好意思和她说话。

“嘻,这你就别管啦,我哪儿不能睡。”

但是李静惠觉到了蹊跷,因为她看见他披上了破棉袄,河西的夏天,浇夜班水的人才穿棉袄的!她便说:“不行,你得说清楚,你上哪儿去睡。”

那人躲开她的目光,支吾说:“我到麦场上去。”

李静惠怔了一下说:“你到麦场上去睡觉呀,那怎么行!”

“怎么不行?大夏天的,也不冷。”

“蚊子还不把你吃啦!”

“不碍事。我有这个呢。”

那人从棉袄口袋里掏出一团纱布叫她看看，又要走。李静惠明白了，他是要用纱布蒙着头到麦场上去睡觉，便急得叫起来：

“你等一下！”

那人站住看她，她说：

“你就不能到别人的房子里去睡吗？”

那人说：“瞎，找那麻烦干什么？大半夜的，都睡觉啦！再说，俩人挤一个床也太热，还不如麦场上痛快，往草堆里……躺……”

李静惠告诉我，那天晚上，那个人执意要上麦场上去睡觉，把床让给她，这种高尚的行动实在是令她感动，她便头脑发热地说了一句：

“你要是实在不愿意到别人床上去挤，那你就在这儿睡吧。”

那人似乎是怯了一下，又似乎不明白她的意思，困惑地看她。她又说：

“你在这儿睡，我也在这儿睡。”

“那怎么行？”那人叫起来。

“怎么不行？”她说。

“怎么倒也不怎么，就是……不方便。”

那人吭吭吃吃说不方便，李静惠的脸便烧了起来，心也怦怦跳了两下，说：

“有什么不方便的？把毯子铺地下，我睡，你睡床上……”

那人似乎动心了，没说话，踌躇一下，但是立即又果断地说：“你就在床上睡吧！我走，我到麦场上去！”

那人坚决地要往麦场上去睡觉的行动，使得李静惠的心又咚咚猛跳几下，越发激起了她对他的尊敬。她在心里迅速地思忖了一下，这样一个善良、纯洁和正派的人和她睡在一间房子里，是不会有非分之想和无礼举动的，于是，她也很坚决地说：

“你要是非到麦场上去，我也不在这儿睡了，我到卡车上坐着

去！”

她立即就做出了要走的样子，走到门口去。

那人怔住了，看她，过一会儿，迟迟疑疑地说：“别走，你别走。那就这样吧，你睡床上，我睡地下。”

那人同意不走，李静惠也没有坚持自己要睡地下。那人动手把床上的一条棉线毯拿下来铺在小木箱和木板床之间的地方，又从地下的木箱里拿出一条床单放在地铺上。李静惠看出来，那人是要把这条单人床单当被子盖，便说，你盖被子吧，你盖被子，我盖床单。她去拿床上的被子，但那人拦住了，说你盖吧，你盖吧，我嫌热。李静惠知道，河西走廊的夏天的夜晚，也是要盖被子的，后半夜有点凉，但是她想那人决不会自己盖被子而把她冻着，所以也没再坚持，便开始整理拿线毯时弄乱了的床铺，并把蚊帐理好。

她把床整理好的时候，那人已经把棉袄卷起来当枕头放在地铺上了。那人看着她说：

“睡吧。”

一说睡觉，她才感到事情有点难堪。她以前没有在男人的床上睡过觉，可如今不仅仅是要在男人的床上睡觉，而且一个陌生的男人就在身旁，她实在是不好意思在他的注视下爬上床去。她犹豫一下，羞怯地说：

“你先睡吧。”

那人似乎看出她的窘态来了，可能也知道在他睡下之前她是不会上床的，便一句话没说，脱了鞋坐在地铺，拉床单盖住腿，才说：

“你上床吧，我吹灯。”

李静惠说：“你睡吧，你睡好了，我吹灯。”

那人看了她一眼，躺倒，把床单拉到胸口。李静惠说声我吹啦，吹灭了灯。

灯是放在木箱上的。灯一灭，房子里便漆黑一片。为了不碰

着那人，李静惠手扶墙壁摸索着找到了床，急急地撩开蚊帐上了床。幸亏是熄了灯，否则那人一定会看到自己笨手笨脚慌慌张张爬上床的样子的。

她摸索着把蚊帐整理一下。很快地躺下，穿着军垦绿的裤褂，并把被子拉开，盖好，一直盖到胸脯上。

在场部宣传队的宿舍里，夏天的夜晚刚睡下是不盖被子的，要到后半夜才盖被子。

这一天李静惠很累。上午坐了半天卡车，颠簸，尘土飞扬，下午在踏实分场的麦场上打场，天黑以后才开始演出……按着以往的习惯，她立即就能入睡，但是这个夜里她失眠了：躺下之后，原先的羞赧和窘迫逐渐地消失了，心也平静多了，但是一种不自在的感觉却慢慢地袭上心头。自己是睡在一个男人的房子里一张男人的床上，那个男人就睡在这张床的旁边，相隔不足一尺。那个人如果抬起手来，就可以触到她！她在心里想，这是个好入，正派人，大概不会对她构成威胁；但是谁知道呢，他的表现是不是假象，是不是他设好的陷阱？他会不会在她熟睡之际、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侵袭过来……毕竟这是个陌生人呀，她不了解他！想到这里，她的心紧张起来，后悔起来。她后悔自己没在卡车上过夜，后悔到这间房子来，后悔没叫这个人去麦场睡觉……

她整个的神经紧张起来了，心因为紧张而怦怦跳动。她侧过脸看那个人，抬起头往地下看，看那个人是否从地铺上爬起来了，是否正在向她逼近。她什么也没看见，漆黑一片，只有房顶上一块手巴掌大的地方发出微弱的暗幽幽的亮光。她知道那是地窝子的天窗，地窝子是在地下，只能用天窗采光照亮。她希望天窗能透进月光来照亮这间小地窝子，照亮那个人，使她能够看见可能发生的危险，但是这个夜晚又没月亮，天窗透进的光线弱得毫无用处。

她总觉得那人在干什么，似乎是站在床前正在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她，伸出手来要抓住她，但是看了好久她也看不见人影。她屏

住了呼吸，静静地倾听，想听到那人行动和呼吸的声音，但好久也没听到任何声息。

她的心慢慢地平静下来。她觉得自己神经过敏，太可笑了；那人根本就沒动弹。那人可能已经睡着了。

她觉得没有危险，她的心排除了可能出现的危险，神经便松弛下来，想要人睡了，但是这时床边上猛然啪的响了一声。这声音响极了，就像是在她耳边爆炸了一管黄色炸药一样，惊得她的身体挺了一下，心咚咚地跳了好几下。不过瞬息之间她就明白了，这是那个人在打蚊子，手掌拍在胸脯上的声音。房子里有蚊子，确是有蚊子，好长时间了，她听见蚊子在蚊帐外边嗡嗡飞翔的声音。

虚惊一场，她的心又平静下来，她安心地要人睡了，但是又被拍打蚊子的声音惊了一下。此后，每过几分钟拍打声就响一下，并且她还听见了那人翻身的窸窣声。

这样一来，她就不能人睡了。

她有点内疚，不好意思。感到歉意。那人把床让给了她，使自己暴露在蚊子的攻击之下，她实在有点不好意思。后来，随着拍打蚊子的声音不断传来，不绝于耳，她突然想到了这么一个问题：那人是穿着衬衫和长裤睡在地铺上的，但是这响声却是手掌击在赤裸的肉体上才能发出的声音，是拍在大腿和胸脯、胳膊上的声音。这说明他已经脱掉了衬衫和长裤。这是为什么呢？他是因为热才脱了衣衫，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又是一声很响的拍击裸体的声音，她的心便猛然醒悟了：这拍打声是夸张的，是故意给她听的……

想到这里，她的身体也陡然燥热起来。

至于为什么身体就陡然发热，那天李静惠没有向我叙说。她不好意思说，我也不好意思问，但是我能够理解：孔圣人说过，食色，性也。我也是从青春年华过来的人，在年轻的年代对异性的渴望、情欲的冲动多少次地折磨过我呀。她是个二十岁出头、身体健

壮的姑娘，焉能没有情欲？何况，在一间漆黑的房子里，一个健壮的男子就睡在她的身旁，不断地拍打裸体，引诱着她。

地窝子真热。在团部宣传队的宿舍里，晚上是要开窗户的。这间地窝子没窗户，天窗镶着玻璃，没有流动的空气，没有风。她盖不住被子了。她把被子掀到了一边。还是热，闷，她的身上出汗了，手心出汗了，脚掌也出汗了。她脱去了军垦服，解开了衬衫的纽扣。汗水还是不停地流出来，衬衫贴在了身上，她把衬衫也脱了，就穿个背心。后来，她把皮带解开了，她觉得皮带勒紧的裤腰湿透了。

还是热，床板和褥子着了火炙烤着她的身体。她想静下心来，她知道心静自然凉，但是心怎么也静不下来，那个可恨的人每拍打一下身体，她的心就怦怦跳个不停。她的口渴得很厉害，嗓子眼儿也痒痒得难受，想咳嗽又不敢咳嗽。

她估计时间已经是凌晨三四点钟了。她希望天快点亮起来，但透过天窗看见的天空仍然像深井里的水一样暗幽幽的，看不见黎明的曙光。她不断地翻身，痛苦不堪，身体一阵一阵发疟疾一样地颤抖。

终于，她忍受不了啦，在蚊帐里坐起来，朝着黑暗中说：

“是蚊子咬得你睡不着吗？”

房子里静得没有一丝声响，听不见打蚊子的声音，也没有翻身的窸窣声，她望着地下，但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

“要是实在咬得厉害，你就到蚊帐里来睡吧。”

那人还是不说话。

她躺下了。那人不说话说明他听见她的话了，正在思考，在犹豫，是不是睡到蚊帐里来。也可能他胆小，不敢上床来。

她静静地躺着，等待着，她知道他没睡着。刚才他还翻身来着。

大约过了五分钟，不，实际上也就半分钟，这时候的每一秒钟

都像是一小时那么长久，她身体压着的蚊帐的一角索索地动了，蚊帐被一只手擦开了，一个朦胧的人影摸上床来。

这时候她又突然地后悔起来，恐惧像潮水一样泛过身体，泛过心脏，整个身体索索抖动起来。她急忙转过身去，把脸朝着墙壁，身体也尽可能地贴到墙上。她又怕起那个人来了，怕他挨着她，怕自己碰着他。

但是，要想躲开那个人是不可能的。床太窄了，她把身体挺得直直的，那个人的胳膊还是碰到了她的后背；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那人的腿触到了她的腿。可能，那人也是尽可能地不触到她，挺直了身体，但她感觉到那人离她很近，因为她的后背觉到了炙烤的温度。

她希望她和那个人就这样互不侵犯地睡下去，到天亮，但是她知道，这是自欺欺人，因为过了两三分钟，一只很粗糙的手搭在了她的肩膀上，把她烫了一下，她没有动弹，也没反抗。

后来的事，李静惠只用了两句话叙述出来：“又过了半分钟，那手就不老实了，它撩我的背心，摸我，拉我转过身去。我转过身去了，但这时我突然喊了一声：‘我的前途！’”

在她叫那人上床之前，她的灵魂就进行了长时间的痛苦的搏斗。一方面是情欲的折磨，情欲需要宣泄和满足，她禁不住自己的心想偷尝一次禁果，另一方面却又是理智进行阻挠——自己长期以来洁身自好，今日一旦失足，就要一辈子背上不贞不洁的坏名声，就再也没脸见人了。

后来，是情欲占了上风，她叫那人上床了，但是，当那人抚摸她，把她搂在怀里的时候，她的心灵仍然很矛盾，很痛苦。在这心灵和肉体快要烤成灰的时候，她的理智还在运动：她在过去了的两年里数次地思考过自己的前途，自己生活的道路；她曾下过决心不在河西找对象，要等待机会回到城市去，可是现在她就要向这个年轻人投降了，向情欲投降了，这一次的放纵和快活就可能毁掉自

己……

“我的前途!”这是在极端痛苦和矛盾中的一声呻吟,是陷于原始和愚昧的泥淖而不能自拔之际心灵中迸裂出的一线亮光。它不是反抗,是认可之后的一次颤栗,是顺从中的一声叹息。

但是,就在她说出“我的前途”这句话之后,事态骤然变化:那双箍紧了她的身体的胳膊突然地颤抖一下之后松开了,瘫痪一般搭在她的身上。过一会儿,那双手缩了回去;紧贴着她的那个身体也慢慢地离开了她。

她头脑中还没反应过来这是怎么回事,那个人就坐起来了,掀开蚊帐下了地,不见了。

她静静地躺着,听,但是再也没有翻身的窸窣声,也没有打蚊子的拍击声。房子里安静得可怕。她身上泛滥了半夜的情欲的潮水哗哗地退去。空气不再燥热,身体很快凉了下來。

她盖上被子,睡着了。

她醒过来的时候天色已经大亮。地下睡觉的那个人不见了,叠好的绒毯放在箱盖上。一束玫瑰色的光线从天窗的玻璃上照进来,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她赶紧穿好衣裳走出地窝子,匆匆走到卡车跟前。她不愿意叫人看见这个夜晚她是睡在一个男人的宿舍里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离开踏实二十多年以后再来的原因。我是为了看看这间地窝子呀!”李静惠最后说。

听完了她的故事,我久久没说话,我的心理很复杂。

“你再也没见过他吗?”后来我问。

“没见过。那天一直到十点钟,汽车才修好。我站在汽车旁边往这边看,但始终没看见那个人,也认不出我睡了一夜的地窝子了。后来我们就回小宛去了。”

“你想过他吗?”

“你是说现在吗？想，要是不想他，我会来这儿吗？其实，从那个夜晚之后，我常常想起他。当然，我不是说想和他成为夫妇，我是说他是个人，不由我不想他。我是文革后考进大学的，上完学留校当教师，现在有了丈夫，有了一个十一岁的女孩，我的家庭生活很美满，但是我常常想起他，想起这间地窝子，在这间地窝子里度过的那个夜晚。我从心底里感激他。”

她说着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涌出泪水来了。我说：

“你感激他什么？”

她说：“那天夜里我已经失去理智了，他如果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我是不会反抗的，可是那样一来……”

“如果是那样，你的生活的履历表就要重新填写了。”我笑着说。

“可不是吗？”她笑了一下，泪水流了出来，她用手指头抹了一下，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听说过这件事：我们宣传队有个叫艾丽丽的，和宣传队一个叫吴大江的关系好，她怀孕了。可是她又不愿和吴大江结婚，说是结了婚怕再也回不了城市。结果，被下放到石棉矿去挖石棉，有一次塌方，叫石头砸死了。”

“要是那样，我是说如果你像艾丽丽那样，你可能现在就不会想他了，也不会大老远来看这间地窝子了。相反，你会恨他的，恨这间地窝子。”

“那是，那是。”她赞同地说，点着头，但是当她又抹了一下泪水之后说，“但是也难说。”

“嗯？你说什么？”

我怔了一下，看她，她却扭身走开去了。我们走回住处去。太阳已经落下大草原很久了，东边的天空夜幕已经拉开，但是西边的天空宁静如水，从地平线下边射出来的阳光把一小片压得很低的云彩照得明晃晃的，像是一小片薄得透亮的金箔。

妈妈告诉我

解放前我家住在水北门。妈妈告诉我。水北门就是兰州旧城北门楼外边黄河沿一带,妈妈说那里解放前是兰州城水陆运输的集散地,有几家客店和大车店,东来西往的筏客子(水手)和车老板们到了兰州城都住那儿。

我家也开着个大车店。

妈妈说我家的大车店生意最兴隆,因为我家的大车店在水北门最西头,门前有一片很大的空地一直伸延到黄河沿,顺着黄河、大夏河、洮河放下来的粮筏、皮筏、木筏都可以停靠,不管有多少粮食、毛皮、木材都可以堆积在那块空地上,从甘肃九州八十一县来的驮货马帮拉货马车可以直接赶进我家院子里,院子里站不下还可以站在门前的空地上。当然,我爸爸的讲义气我妈妈的忠诚贤惠的名声也起着作用。

兰州城解放前夕,我家的大车店一下子冷落了。这一方面是政局动荡,听说共产党已经打下了西安正在向兰州进军,另一方面是西北军阀、国民党西北区军政长官马步芳加紧扩充军队,师管会的一个新兵连驻扎在我家的大车店里。

我妈说这连新兵全是回族人,刚刚从河州(现临夏回族自治区)抓来的壮丁。他们住在我家的大车店里,白天就在河沿边的空地上操练。本来我家的房子很多,别说一个连,就是两个连也住得下,可是新兵逃跑得不行,连长就把一百六七十人集中在十一间房子睡觉,炕上睡不下就睡在地下,为的是好监督。新兵连长是个河州东乡人,三十几岁,脾气大,性子坏。白天训练他不去校场,蒙着

头睡觉，天一黑他的精神来了，挎着手枪满院子转，查哨巡逻防止当兵的逃跑，一直到天亮。

就这，新兵还跑了十几个。妈妈告诉我，这是她干的。

连里有一个娃娃兵，我妈说这个娃娃兵才十四岁，站着还没步枪高，新发的军装穿在身上像道袍一样，裤子提不起来拖在地上，走路时沙哒沙哒地扫着地。全连的人都欺侮他，一会儿这个叫提水去，一会儿那个叫扫地去，师管会的老兵天天打他，他天天鼻青眼肿的，脸上总挂着泪水。我妈孽障他，跟那个大胡子连长说，那娃那么可怜，你再操练也操练不成个好兵，你把他调到炊事班做饭去吧。连长和我们家熟悉，听了我妈的话就不叫他参加操练了，天天帮着灶上烧火。

谁知道这一下娃娃兵更遭殃了，炊事班大大小小的杂活都成了他的，稍一怠慢，那些炊事兵抡起巴掌就打。

我妈看这个样子娃娃兵非叫他们打死不成，就想了个别的主意。一天，我妈在一间放破烂的仓房里折腾了半天，然后把娃娃兵叫来告诉他：“杂娃，西北角的仓库里我放下了一架梯子，一根绳，门我没锁，今晚上你就偷着从那里爬出天窗去，再从绳上溜下去。跑吧，我的娃，你等着解放军来了送死吗？”

这天半夜里，哨子吱吱地响，大胡子领着几个老兵一个劲儿地追逃兵，天亮的时间才回来。他气呼呼地说我妈：“你怎么不把仓库的门锁上，那里有架梯子，一班人都跑了！”

“一班人跑了？”我妈装出惊讶的样子，“我的门锁着哩呀，你看，将军不下马的锁子，钥匙还在哩。”

“就剩了一个！”

“谁？”

“马十八！”

我妈跑去看。那个班的住房里空荡荡的，炕上地下都是逃兵脱下的军装，全班都逃走了，惟有那个娃娃兵蹲在墙角上呜呜地

哭,抹着眼泪。刚才大胡子连长叫人打了他一顿,嫌他没报告。

“嘿,这个傻子!”我妈和我说,“我是想叫他跑的,那十几个人跑了,他没跑!那个孽障样子,我真是又可怜他又气他。”

过了两天,我妈从大胡子连长的嘴里听到这个连就要调走了,去补充古城岭的守卫部队了,就跟他说:“连长,你在我家里住了这么长时间,这就要走了,我有个事求一下你,不知你答应不答应?”

“啥事?”

“你行个善事积个德,把那个尕娃放了。”

“嗯!”大胡子连长瞪起眼睛。

我妈又说:“那尕娃才捶头(拳头)大的个人,连枪背不动,把他弄到前线打仗去不是送死吗?你就行个善积个德,叫他活一条命去。”

大胡子连长沉默好久,说:“好吧,我看在你是个忠厚人的面上放他一条活路。事情这么办:你给他说好,明天我把队伍带到河沿上操练,找个槎槎枪毙他,听见我的枪响他就趴在地上不要动,我把队伍带走了,他愿往哪达跑就哪达跑去。叫尕娃活个命。”

这天晚上,我妈把娃娃兵叫来,把办法给他详详细细说了,还给了他两块银元叫他回家乡的路上当盘缠。

第二天早晨。开过了早饭,大胡子连长扎上了武装带,带上了盒子枪,全副武装,亲自喊着口令把全连带到黄河沿上,开始操练。

先是齐步走。后是向右转向左转。再来个跑步走。娃娃兵排在队列的末尾,齐步走就没跟上全连的步伐,大胡子连长上去就踢了两脚,向左转的时候娃娃兵又转错了方向,屁股朝着全连的脊背,再来个跑步走他就和全连背道面驰了。跑出去十几步才发现自己错了,站出来胆怯而惊慌失措地看着连长。

“立定!向右转!”大胡子连长连着喊了两声口令,叫全连面向他站好了,才气势汹汹地走到娃娃兵跟前,扬手就打了个嘴巴子。

“娘日的！你是吃粮食长大的还是吃屎长大的，连左手右手都分不开吗？你好好操练哩不，你给我说！你的吃饭的家伙还要不要……”他越骂越着气，后来往连队前头走了几步大声说道，“你们给我记住，下头再操练，谁要是再有胳膊没腿的操练不好，我就叫他吃不成马长官的粮饷！”

他叫娃娃兵入列了。接下来的操练是正步走，全连的新兵老兵都叫他吓住了，一个个抖擞着精神挺直了腰板拔正步往前走，“啪啪”的脚步踏得河边上腾起一片尘土。这一次娃娃兵和别人一样没出啥毛病，腿抬得很高，腰也很直。但是，他的神情太紧张了，大胡子喊了立定，他却比别人多走出两步才停住，喊了向后转他急急忙忙从左边转过身来。由于心慌意乱，还差点摔倒，一只手把旁边的人推了个趔趄。

“马十八出列！”大胡子吼了一声。

娃娃兵往前跨了一步。

“你个瞎熊！看这个样子，你是实话不想吃马长官的粮饷了。好，我看在河州乡亲的情分上给你来个干脆的，省得上了前线叫‘共军’把你打死！开步走！”

娃娃兵往前走。他的脸上木呆呆的，没有任何表情。这时候连队是面向黄河站的，大家看见他一直走到踩着河水的地方才停了步。大胡子拔出盒子枪跟在后头。

“跪下！”

全连都听见大胡子喊了一声，也都看见娃娃兵跪下了，脸朝着黄河的方向。大胡子举起盒子枪。

“叭！”枪响了，德国盒子枪的射击声，又响又脆生，就像是手榴弹爆炸的声响，震得全连的人抖了一下，都这么想，完了，一条命就这样完了！结果了！

可是，枪声响过了好一会，娃娃兵还是那么跪着，一动没动，后脑勺朝着大家。

真枪毙还是吓唬吓唬？队列悄没声息地骚动了一下，大家都在想：站得那么近没打中，是连长的枪法不中还是心软了？

大家都觉得奇怪的是连长好像也有点意外。大家看见连长举着枪的手一直举了好一会子，眼睛瞪着娃娃兵好久也没动弹。

不过，大家终于明白了，连长不是弄着玩的。他们看见连长的手又举起来了，盒子枪朝着娃娃兵的后脑勺瞄准了，扣动了扳机。

又是一声很响的射击声。但是娃娃兵并没有死去，还好好地跪在那里，纹丝不动，木头一般。

“哈，枪法不中……”

有人说了一句，“哄”的一声全连都悄悄地笑了。不过，笑声很短促，全连都看见了，连长扭回头来看了连队一眼；大家也都看清楚了，连长黄胡子丛生的脸涨得红红的，非常难看，也非常尴尬。他可能是觉到了全连的人都在笑他。

他回头看的时间极短，也就是看了那么一眼，接着就扭回头去了，并且又一次举起了枪。这次他没怎么瞄准，枪就响了。枪声响过，大家看见娃娃兵一头栽倒了。连长看都没有再看一眼，提着冒烟的盒子枪走回连队跟前。

“连副，回营房！”他说了这么一句，转身往大车店走。

中午的时候我妈去河边担水。刚出大车店的门她就看见河沿上围着一堆人，她挤着从人缝中看到了夏秋之交的浑黄河水，慢慢流动的河水里拉着一缕缕红丝丝。

洗个不停

这是个听来的故事。

我是1965年支边去西北生产建设兵团的。我们的农场在甘肃省的河西走廊。到兵团三个月就调到卫生队当护士。

当初我还不愿到卫生队来的：刚刚和班里的知青们混熟，又要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去，我舍不得。再说，一个男子汉去当护士，我觉得很丢人。还是连长做思想工作我才去的，他说要服从组织分配；他还说卫生队查过档案了，指名道姓要我，说我父亲是城市一家医院的医生，我搞医有基础。

慢慢的我才知道这是我的造化。在卫生队端了三个月尿盆，卫生队就送我去师中心医院学习了，一年后回来，就成了卫生队的“坐堂郎中”。以后好多年里，我就坐在办公室看病，不晒太阳不淋雨，而我从前的朋友们却一直下大田，一年四季风吹日晒，脸黑得跟煤球一样，谁要是能进炊食班做饭或是当个机务班的农具手，就高兴得要命。有些姑娘为了离开兵团在外边找对象，但结了婚兵团也不许调走。兵团的政策是只许进不许出。原因是兵团职工大都不安心工作，放一个就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

我那个连队只有一个叫张克一的运气比我好。到河西的第四年冬天——那时候是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大批的新知青来到了兵团——部队在我们生产建设兵团征了一次兵，张克一有幸入伍了。当时全连人都羡慕他，说他可是交了好运：在部队好好干，争取提干，就再也不回农场来了。出人意料的是他仅仅当了两年兵就复员回农场了，还回老连队，还是下大田劳动。只是由于当兵

镀了一层金,退伍兵出身的连长认为他应该和其他知青有区别,便向团里打报告提拔他当了排长。连队很多人都为他惋惜,说白当了两年兵,没抓住机会来个鲤鱼跳龙门。有人甚至说他:在部队怎么混的,才干了两年就叫人家开回来了!

大约过了两年,我才知道他为什么当了两年兵就又回农场来了。

1975年夏季,张克一调到团保卫股当干事了。因为刚到团部,熟人不多,他经常到卫生队找我,坐着说说话,消磨时间。

一天,我们正在内科门诊坐着,进来一位病人。这是个很漂亮的姑娘,二十七八岁。真是个姑娘,虽然岁数很大了,但没结婚,连男朋友都没有。我了解她是因为她多次来看病。她长得真是漂亮,高挑身材,白皙的面孔,一双惊人的美丽的大眼睛。她穿一件蓝色的连衣裙,裙裾下边露出非常健美修长的双腿。

你来啦。我招呼她。

这是个很大方的姑娘,她笑了一下,坐下说,就你一个人值班啦。

就我一个,其他人下连队去了。我说:我看她眼睛往张克一身上瞟,又解释说,这是我的朋友,我们一个连的,现在保卫科工作。你是来看病的吗?怎么样,病好点了吗?

还那样……

一点儿不见好吗?

不见好。这一阵像是更……重了……

姑娘一说起病,突然就变得羞涩了,说话简短,声音变得又细又小,眼睛还往张克一身上瞟,像是不愿他听见。我明白她的意思,也没再多问,开了些以前她常用的药,打发她走。

姑娘刚出门,张克一说,这是谁呀?哪个连的?

这不是林梦云吗?

张克一惊叫起来,呀,是她呀!我觉得面熟呢!

我笑着说,想起来啦?

想起来啦,是她,是她!她现在怎么样啦?得的什么病?她原来不是在宣传队吗?

早回连队啦。你还没当兵的时候就回去啦。你不记得啦?

嗯……张克一做思考状,说,像是有这么回事,记不清啦。她得的什么病?

嗯……要说什么病,还真有点难以启口,我沉吟一下说,就是那时候得的病——拉拉尿。你没听说过?

不,不知道。那时候好像是有人说她得病了。原来是那种病呀?怎么,还没好呀?

我说,好什么呀,像是更严重了,门都不敢出。你不看她脸白得没晒过太阳的样子?

林梦云是天津知青,1965年来河西的支边青年,高中生。这姑娘长得异常的漂亮,刚来河西不久,人们就传说一分场三连有个漂亮姑娘,简直比电影明星还漂亮。人们还说,三连的小伙子们给姑娘们打分,看谁长得漂亮。长得一般的,打五六分,丑的打三分四分,漂亮的打七八分,最漂亮的打九分。没有打满分的,人哪有十全十美的。可我们听说,小伙子们给林梦云超标准打分,十二分。原因是这姑娘不光长得漂亮,气质还好,像个大家闺秀,大方又稳重,还很有才华——能写剧本,能跳芭蕾。她在天津上中学时就在文化馆参加演出,跳芭蕾。她的芭蕾有专业水平,只是出身不好,进不了芭蕾舞团,也上不了大学。她在全团出名,是因为她领着连队的一帮姑娘小伙子练芭蕾,在连队排了全本的《白毛女》。《白毛女》在团里一炮打响,演到师部,又惊了师领导。师宣传队要调她,团里不放,说团宣传队还要用她呢。本来,团宣传队是不要她的,团政治处主任说了,她出身反革命家庭——他父亲是国民党少将,还押在监狱里——既然师宣传队敢用她,团里还怕什么!她到了团宣传队,很是光彩了一阵。宣传队到各连演出,看演出的人

特别多,都是去看她的。团长政委也挺喜欢她,有事没事往宣传队跑,围着她转。但是突然间就听人说,她得了一种病,一看见人就拉拉尿,裤子都尿湿了。急急忙忙跑到厕所去,却又没尿。这样一来就没法演出了,就又下放回连队去了。在连队她还是见不得人,连领导就安排她看菜地,或者和菜班的一帮老娘儿们在一起干活——奇怪的是和娘儿们在一起不拉拉尿。

她没出去看过病吗?张克一问。

怎么没出去?省人民医院去过,天津也去过,看过大医院的泌尿科专家,可都说没有器质性病变,找不出什么病来。有的专家说她是精神病,有的说不是精神病而是属于心理障碍……

张克一沉默了一会儿又说,这不是受大罪了吗?她结婚了吗?

跟谁结婚?谁要她呀,一见人裤裆就湿。我接着开玩笑说,怎么,你看上她啦?

在我们农场里,文革前的支边青年大都结婚了,1969年以后来的新知青也有一部分成家了。

瞎说什么呀,我想起一个战友来啦。张克一说。

他的战友叫陈平安,和他同一批入伍的新兵,一个瘦瘦的黑黑脸的农村小伙子,在新兵连他俩就在一个班。

一进新兵连心里就不痛快。张克一说。招兵检查身体的时候,来接兵的人说,他们是兰州部队来接兵的。当时他还挺高兴,心想在兰州当几年兵还是不错的。可谁知兵团的大轿车把他们拉到地区所在地附近的一座兵营就不走了,说这儿是省军区独立团的新兵连,集训结束就分到地区附近的连队去。在兰州市当兵的希望破灭了,又到不了正式的野战部队,不能杀敌立功(那时珍宝岛战斗结束还不久,战争空气很浓,似乎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起来),他的情绪一落万丈,所以在新兵连训练时他就没有劲头。但是他的新战友陈平安高兴得不得了,脸上总挂着笑,学习时拿个笔记本记呀写呀,训练队列认真得满头冒汗。有一次张克一说他,当

个兵就把你高兴成这个样子。他说当然高兴,为了能当兵,他父亲把家里的惟一一头母猪宰了,请大队和公社的干部吃饭。还说他家在甘肃的永靖县,那里是有名的贫困山区,打的粮食吃不饱肚子。他说他当兵就是想离开老家的穷山沟,永远不回去。

三个月的新兵连生活结束,他俩分在一个连队,大卡车拉着他们进了祁连山。拐过几道山梁,山谷突然开阔起来,出现一片建筑物。高高的烟囱冒着黑烟,白灰刷过的墙壁上写着醒目的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胁从不问,首恶必办。墙头上拉着铁丝网,还有高高的岗楼。张克一说他的心一下子凉了,原来是到劳改队当警卫来了,可是陈平安嘻嘻地笑了,说,啊,砖瓦窑呀,我在县砖瓦窑烧过砖哩。

陈平安决不是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他在家乡读过小学,跟着副业队到过兰州。他工作踏实肯干,待人憨厚,是个真正的农村兵,但又挺机灵聪明,有点城市兵的调皮劲儿。一次射击训练,全连趴在山谷里瞄准对面山坡上的胸靶。这时有个战士下哨赶来了,趴在半山腰练瞄准。瞄着瞄着扣了一下扳机,叭,枪响了。站岗时枪里上子弹的,他把这忘了。枪一响吓了连长一跳,扯着嗓门问谁开的枪。那战士还没说话,前边一个战士叫了起来,我的妈呀,打中我啦!那战士尖叫着,手捂着大腿打滚儿。训练中打伤人可是大事故,连长吓出了一身汗,跑过去说我看我看伤着骨头没有。那战士趴在地上笑了,说,连长我要笑哩。全连都笑了,连长气得踢他一脚说,这是耍笑的事吗?这回那战士真的痛得滚起来了,说,连长你踢我老二上啦。

这个战士就是陈平安。

以前新兵入伍出过这样的事:见了劳改犯叫老大爷,叫同志;有的人被犯人耍了还不知道。这次来了新兵,连里有规定,新战士上岗要老战士带几天。

陈平安第一次执勤就独自一人,他既没闹笑话,也没受犯人的

气,还把犯人治得服服帖帖。

他第一次执勤,穿一身老兵的旧衣裳站在岗楼上,犯人没认出他是新兵。过了好几天才认出他是新兵。一个劳改犯发坏,干半截活跑到岗楼跟前说:

报告,班长我拿把铁锹去,我的锹把折了。

他说去吧。犯人见了战士都叫班长,这他知道。但是犯人回来他把他截住了。犯人喊了声:“报告,班长把模子拿来了。”他走下岗楼就打了犯人一个嘴巴,声色俱厉地说:

你怎么报告的?

犯人说我喊的是“报告班长,模子拿来了”。

他又狠狠抽了一个嘴巴,说:

你再说一遍!

犯人吓坏了,忙忙认错,抽自己嘴巴,说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他青着脸说:

把鞋脱了!

犯人光着脚在大雪地站了两个小时。

他虐待犯人的事被管教干部知道了,找连长反映,说他违犯了监狱管理条例。连长把管教人员顶了回去,去你妈个屁,什么条例,这说明我的战士机灵,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

连长挺喜欢陈平安。他完成任务好,既肯干,又机灵,第二年就提拔他当了班长。我是他的副班长。

第二年连队换防,全连调到地区所在地的县城,我们排负责地区看守所的警卫工作。看守所拘押着等待审查判刑的罪犯和已经判处死刑等待枪毙的死囚,还有等待判死刑的重刑犯。那时候没有武警部队,枪毙人也是我们的事。这种工作需要阶级觉悟高、胆大心细、思想素质好的战士来执行。你不要小看枪毙人的事!我枪毙过一个人,看着他趴在土坑里,鲜血咕嘟嘟往外冒,脑浆子溅到坑沿上,我三天没吃一口饭,恶心得要命。好几天没睡好觉,

一闭眼小时候听说过的鬼故事里的神啊鬼啊就一起跑到眼前来……说实在的,枪毙人比在战场上消灭敌人还难。战场上消灭敌人是很自然的事,你不射击他他就要打死你!可这枪毙人,死刑犯是绑起来的,死刑犯的头离着枪口半尺远,连汗毛孔都看得清楚,脖子里还淌着油光光的汗水。有的死刑犯还没进刑场就屙裤了,我们把他的裤腿用绳子扎起来,臭气还熏得人恶心。执行一次枪毙任务就跟自己判一次刑那样难受。有的战士平时表现很好,执行任务很坚决,干什么都行,就是不愿枪毙人,下命令不行,上纲上线不行,给处分也不行。我们换防到看守所,听人说换防前一连的一个副班长,连长叫他执行枪毙任务,他死也不干。领导批评他阶级觉悟不高,他就闹情绪了,觉得组织不信任他了,这下子完了,没前途了。有一天在宿舍擦枪,他把枪口顶在下巴壳上,脚趾头套在枪机上,叭叭叭,一梭子子弹从头顶贯穿而过,把天花板穿了几个窟窿,血淌了一地。换防后陈平安睡他的铺,别人不敢睡。

一年的时间,陈平安执行了四次枪毙任务。他自己主动要求执行任务,干得很漂亮。

第一次枪毙个老头,强奸犯。没错,是强奸犯。张克一对这个老头记得很清楚。他说那老头是他们排换防到看守所以后枪毙的第一个犯人。他说在枪毙前十天——老头的死刑还没判——他们检查过一次牢房的安全工作,看犯人们藏没藏刀子绳子之类的东西。那天连长也和他们一起检查牢房。连长不常和犯人接触,进了牢房之后问了一声什么犯。那老东西没吭声,陈平安严厉地说了一句:

听见了吗,连长问你什么犯?

那老东西不直接回答,说:

不能说,班长,这事不能说。

说!什么犯!陈平安扬手打了个嘴巴子。

报告班长,强奸犯。

强奸谁啦？

报告班长，强奸我姑娘啦。

老牲口！

陈平安狠狠骂了一句，还啐他一脸唾沫。

枪毙这个老东西，陈平安没经验，毙的时候就像打靶一样平端着枪，心情也有点紧张，手有点抖，子弹从老家伙垂得很低的后脑勺上划过去划了一道沟，没死。他又补了一枪。

枪毙第二个他就有经验了，也不紧张了。第二个犯人是个体主，额济纳旗公安局送来的。他在逃往蒙古的路上杀死了一个牧民抢人家的钱，被边防部队抓回来的。枪毙这个体主，陈平安把手反扣着，掌心向下捏着枪，就像拿根打狗棍一样，枪筒杆杵在体主后脑勺上。他的手一点儿也不抖，右手一扣扳机，叭，犯人就栽坑里去啦。

第三个犯人是妇女，因奸杀夫。

第四个也是杀人犯，是个工人。被捕前是县汽车运输公司的修理工，城关镇人。二十八岁，还是个小伙子。小伙子有个女人。女人生个孩子三岁了，作风不好，和人私通。女人和人私通，小伙子脸上无光，小伙子劝过几次，也打过，叫女人改邪归正，好好过日子。女人毛病不改，还是私通，他又打了一顿，女人就跑回娘家不回来。小伙子气极了，拿一包炸药去了岳母家。炸药用手巾包着放在桌子上，岳母问那是什么，他说是给孩子买的奶粉。说着话他把炉钩插进炉子烧上，烧红了举着炉钩和炸药把女人逼到炕沿上，问她还搞破鞋不。女人说搞，就搞。小伙子说，你再说搞，你再说搞我就把你炸死。女人嘴硬，说你炸你炸，你把我炸死你也活不成了。小伙子真把导火索点着了。女人吓得尖叫起来，往外跑，小伙子拉住不放。岳母在门口哄孩子玩，听见叫声抱着孩子跑进来，拉他。拉来拉去炸药包响了，结果孩子死了，岳母死了，小伙子还活着，两条腿炸断了，肚子也炸烂了。女人跑到门口去，什么事也没

有。

小伙子押在看守所四个月，治腿，治肚子，治好就枪毙。枪毙的头天晚上，连长来到看守所，叫上陈平安和我一块去牢房看小伙子情绪怎么样，以决定执刑时的注意事项。进去的时候看见管教人员正给小伙子端饭，除了两碗菜还有半碗酒——就是在文革时期，我们的监狱还遵循了古老的传统，叫犯人临死前吃一顿饱饭，硬做饱死鬼，不当饿死鬼——可那小伙子泪水涟涟坐着，滴水不进。陈平安问他怎么不吃饭。他说：

班长，是你枪毙我吗？

当然陈平安不告诉他是自己执刑。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形成的规矩，不准死囚知道谁执刑。执刑时如果死囚回头看见了执刑者，执刑者就要更换。陈平安说：

你问这干什么？

要是你毙我，求你给我留个囫囵尸首。

陈平安愣了一下，他似乎被这意外的要求感动了，便忘了保密自己，说：

行啊，只要你老老实实配合就行。

我怎么配合？

到时候把头抬高些。

你看这样高行吗？

小伙子的腿治好了，但也是皮肉长好了，骨头没接好，站不起来。他在地下盘腿坐着，把脸往上仰起，叫陈平安看。

行啊，行啊……陈平安说着就急急走出牢房去了。

连长跟出来，看着他说，你怎么啦，神色不对？

连长，换个人吧。陈平安说。

为什么？

我心里不好受。

换就换吧，连长说。我看出来了，连长心里也不好受，他也没

见过死囚要求囫囵尸首的。这天晚上,连长叫我们在班里重找一个执刑的人。我们找好了。但是,第二天早上吃饭的时候,陈平安又对我说,还是他执刑吧。我说怎么又改变主意了?他说过几天就要讨论他人党的事了。

车到刑场,把囚犯从卡车上拉下来,两个战士架着他往前走了几步,摠在挖好的坑沿上跪下。小伙子跪不住,他的腿还痛,一跪下就歪倒了。他自己改成了盘腿坐着的姿势,把头抬了起来。像往常一样,陈平安在后边跟着,端起了枪,枪口杵到小伙子后脑勺上,等着连长下命令。连长发出了射击的命令,他却又忙忙地改变了一下持枪姿势:把扣着手心握枪的手改变成标准的持枪姿势,曲臂,手心向上,半握拳托枪,并把枪托抬高了一下。我在他身后站着——我是第二执刑者,一旦出什么意外或者犯人回头看他,就由我来替他——我明白他的意思,是想把枪口朝下倾斜,这样射击,射出的子弹就可以从后脑勺打进去,从嘴里穿出来,能保全小伙子的头颅。可是不知怎么搞的,枪声一响,就见小伙子脸前扑的喷出一道红光,溅到坑壁上。小伙子的脑门崩开了,天灵盖也碎了,白的脑浆子和殷红色的血从碗大个喇叭状的创口上咕嘟嘟冒出来,像是阳光下洗衣裳洗出来的肥皂沫,五颜六色的非常绚丽。

往常执刑完毕,陈平安在卡车上说有说有笑,可这天他的脸色蜡黄,眼睛直勾勾看着前方,闭着嘴一句话不说。我问他怎么啦?不舒服啦?他说:嗨,我怎么把头打烂了呢?

好几天他都阴沉着脸。直到过了几天,党员大会通过了他人党,他的脸才晴朗了一些。

你可不要小看入党。在部队服役,入了党就有可能提干,提了干回到地方安排工作也容易,农转非也容易。你要是入不了党呀,回到农村就还种你的地去吧。

沉默一会儿,张克一又说,那一阵子,陈平安要是再不枪毙人就好了。他好几天一见人就说,嗨,我怎么把头打烂了呢?他那样

絮叨本来就不是好兆头——他都有点像祥林嫂了：祥林嫂的孩子被狼吃了，一见人就说，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雪天时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可惜谁都没注意这种兆头，我也没注意，过了半个月，他又执行了一次任务。

这是陈平安第五次执行任务。这次枪毙的罪犯作案方式特别残酷。手段恶劣。罪犯也是个年轻人，二十七八岁，是县城关镇的人。罪犯的父亲在旧社会贩卖大烟，文化大革命中被揭发出来，街道办事处对他父亲实行了群众专政。街道治保主任是个很积极的老太婆，好几次组织群众批斗他父亲，把他父亲的腿打瘸了。罪犯对此事怀恨在心，伺机进行报复。

那是1972年冬天的一天，他侦察好了，治保主任的丈夫不在家，就主任和姑娘在家，他半夜里撬开门闯了进去。他摸着老太婆的头了，把一把剪子插在老太婆的脖子上，一顿乱剪，把气管、食道、动脉血管都剪断了，老太婆没气了。老太婆的姑娘和老太婆睡一铺炕，醒了，和他搏斗。黑灯瞎火什么也看不见，剪刀也找不到了，他硬是把那姑娘掐死了。搏斗中他还把那姑娘的一只耳朵咬了下来。后来公安局侦破了案件，在现场又找不到耳朵，审他把耳朵弄那儿去了，他说吃肚里了。

这家伙一进看守所就被砸上脚镣关进小号。他知道自己非死不可，便破罐破摔，在小号里又喊又叫，呼反动口号，骂共产党骂毛主席。早晨放风倒马桶，他学着李玉和的样子走舞步，拖得铁链子哗唧唧响，还唱狱警传似狼嚎。看见看守所长，他把铁链抖得更响，骂，鸠山，你这玩艺儿能把我怎么样！所长打他几个嘴巴子，叫人给他换上又大又沉的脚镣。但他身体壮腿有劲儿，仍然拖着腿镣走，说，太轻了太轻了，再换个大的。所长气极了，想换再大的也没有，就叫人把两个铁砣子锁在他脚腕上。铁砣子一个就三十斤，脚镣的扣子又是方的，那家伙的脚脖子被磨烂了淌着血流着脓，但他还是挺着身子一寸一寸往前挪，拖得铁链哗哗响，唱歌呼口号。

他知道自己活不长,见了执勤的战士就问,哪天枪毙我?战士不回答他就骂,你们这些刽子手,毙吧,你们把我毙了吧,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

枪毙那家伙,连长指导员都来看看守所了,和我们排的排长、班长和副班长开会,研究怎样执行好这次任务。原因是这是一个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恶性案件,地区公安局和法院要在西大街体育场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宣判后游街,然后押赴刑场枪毙。连长把警卫北大桥和搞副业的两排战士都调来保卫大会会场和警戒刑场。我们排的战士除了执勤的都要出动押解犯人——还有几个陪法场的重刑犯——游街,执行枪决。那天的会就是专门研究我们排如何押解犯人和防止犯人在公审大会上呼反动口号造成不良政治影响。有人提议给犯人嘴上勒一根细钢丝,像给牲口戴刺牙子一样,他喊就勒他。有人说在脖子里拴条麻绳,拴成活扣。这两种方法都被否定了:勒刺牙子犯人龇牙咧嘴的样子群众能看见,影响不好;拴麻绳有衣领遮挡看不见,但把罪犯憋死了更麻烦。后来不知谁出的主意,说把下巴颏给他摘下来——弄脱臼,这样群众就什么也看不见,他又喊不出声,还无生命危险。到会者一致同意这种方法好。会议最后研究由谁来执行枪决。会议一直开得很热烈,大家争着发言,但一提出这个问题顿时就冷了下来,寂静无声。

每次枪毙人都出现这种冷场现象,但过一会儿总会有人说他执行,有时候好几个人争着要执行任务。参加会议的都是老战士,连队的骨干,他们要求入党,有的还想提干,这是考验他们的时候。

但是连长等了几分钟,没有一个自告奋勇的。

谁,谁来执行这次任务?连长又问了一声。他有点不高兴了,说,怎么回事,是叫大场面吓住了吗?妈的,平时你们积极得很,关键时刻都熊包了!

连长采取了激将法,还是没人吭声。连长脸上挂不住了,脸色变得难看起来,但他眼睛转了一圈后压制着心头的不快,举重若轻

地说：这样吧，还是由一班长执行任务，一班副做助手。还真是大场面，还真得有经验的老同志执行任务。叫新手干我还不放心。

·班长就是陈平安，一班副是张克一。

可是陈平安没吭声。连长在他的脸上看了一眼，说：

怎么样一班长，执行这次任务没什么困难吧，嗯？

再也不能不表态了，陈平安说：

我执行是没困难，就是……不太合适。

连长瞪了一眼，说：嗯？

我毙过四个人了，还有的人一个都没毙过，这次又叫我毙，别人没意见吗？

连长觉出陈平安是不想执行这次任务，脸色马上难看了，一字一顿地说：

正因为你毙得多，有经验，才叫你执行这次任务。好了，就这么定了。

散会了，班排长们往外走，连长说了一句：一班长留一下。

过了半个小时，陈平安回到宿舍。他脸色不好看。张克一问他连长跟他说什么啦？陈平安说，训了我一顿，说我狗肉上不了席！开公审大会枪毙人，正是立功露脸的机会，为什么打退堂鼓？还想不想在部队干，想不想提干？

张克一没再说话。士兵的服役期是两年，马上就该退役了，陈平安不愿退役，退役回去就要种田，他家乡种一年地打的粮食吃不饱肚子。他几次对张克一说过，他最好的出路是在部队提干。

公审大会九点钟开始，罪犯必须提前半小时押往会场。八点钟就把罪犯从号子里提了出来。卸掉了脚镣手铐，张克一就要捆，陈平安拦住了。

等会儿再捆吧。

张克一说该卸下巴了。陈平安说：

不用卸。我昨天晚上就跟他说好，到会场他不捣乱。

真不捣乱？张克一不信。

真不捣乱？他跟我保证了的。

可别出事呀……

张克一不放心，还怕连长来了批评。连长这就来了。开万人公审大会，是连队换防以来第一次，连长怕出纰漏，提前二十分钟来检查准备工作。他看见陪法场的罪犯都捆起来了，死囚还蹲在墙角吸烟，面前摆着两碟菜，半碗酒。陈平安蹲在他面前吸烟，正在说什么。

陈平安！连长吼了一声，蹬蹬走过去。

陈平安看见连长了，走过来想说什么，但连长不容他张口就破口大骂：

胡球日鬼，谁叫你给他端饭哩！昨天不是定好了不叫吃饭吗？吃了饭有力气，闹起来咋办？好啊，你个陈平安，还给他喝酒，你是故意破坏这次公审大会吧，叫他开会时撒酒疯！快八点半了，你还不摘他的下巴，还给他抽烟……

连长，我跟他说过了，他说开大会不喊不闹……陈平安说。

不喊不闹？

他说老老实实……

鬼话，你听他的鬼话！关小号还要把房盖挑了，开大会不捣乱才碰上鬼了！你是成心要给我惹点事吧？快绑起来，把下巴摘了！快！

连长，那不太……太……陈平安的嘴磕巴了。

太什么？你说太什么？执行不执行，你执行不执行？我现在就撤你的职！你要是磨蹭，耽误了开大会，我先把你捆起来，问你个同情阶级敌人破坏公审大会的罪！连长勃然大怒。

陈平安愣住了，他可能没想到连长会这样大发雷霆。他的脸色变得死灰一样，嘴唇抖了好一阵子没说出话来，扭头朝犯人走去。张克一叫了两个战士跟过去。四个人一句话不说，把犯人放

倒在地，五花大绑捆起来。起先犯人没出声——他也看到连长训陈平安了——但是把他翻过来躺着，陈平安的手捏住他的牙关，他便使劲扭动身体，把头左右摇摆，杀猪般嚎叫，班长，不喊，我不喊，保证不……捣乱……陈平安的手停了一下，抬头看连长，但是他看见了连长铁青的面孔，便又扼住了犯人的下巴颏。他凶狠地吼了一声：别嚎啦！

犯人就再也没出声。

两个战士摁住了犯人的身体和两腿，张克一抱住了犯人的头，陈平安扳住下巴颏使劲儿拧，扳，拉，但犯人的牙关节就是不脱臼。后来换上了张克一，使劲儿拧，还是不行。连长生气了，骂声废物，亲自动手。摆弄了足有五分钟，还是没弄成。这时候连长明白了，要使牙关节脱臼也不是简单的事，并不是陈平安故意不出力气。他的脸上出汗了。他站起来叫一个战士去叫医生。

看守所的医生来了，连长说你把他的下巴给我卸下来。医生睁大了眼睛说，我可没学过这个技术。连长气得睁圆了眼睛瞪医生，骂，你这个大夫咋球当的，连个下巴都卸不下来。

医生气得脸一阵青一阵白，但对这个老兵没法子发火，就出主意说打麻醉药吧。

麻醉药管事吗？连长问。

把他的舌头麻醉了，就说不成话了。

快去拿！

医生背着药箱回来，往针管里抽了五支普鲁卡因，举起来注射，但犯人拼命挣扎，把头摆来摆去不让扎，日你妈日你妹子乱骂。医生的手抖着扎不下去。陈平安又看了一眼连长，说：

连长，算了吧，他不捣乱……

闭上你的臭嘴！连长火气很大，气急败坏地说。扳住，扳住他的下巴！

针头扎进去了。陈平安坐在犯人头顶上，双脚蹬住了肩膀，手

扣住下巴颏往怀里拉。犯人的头再也动不了啦。两个战士压住犯人的身体和腿,身体也动不了啦。捆在背后的双手就压在他自己健壮的身体下边。医生的手抖索着把针头从犯人下巴下边的软组织扎了进去,把满满一针管普鲁卡因注射在舌根上。张克一说,注射普鲁卡因的时候他插不上手,他在一旁站着。那一阵他的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他听见了又粗又长的针头扎进肉里的噗味味的响声,听见了药水射进肉里的滋滋声。犯人的头上脸上脖子里渗出了密密的汗珠,脸湿得像在水里泡过一样。犯人的脸涨得通红,不知是喘不上气所致还是气的。他的眼睛因为恐惧而睁得很大,眼珠子快迸出来了,但很快就被不知是痛苦还是屈辱的泪水淹没了。犯人的嗓子发出粗重的喘息声,像拉风箱一样,还有沉闷的从胸脯发生的吼叫声。他看见陈平安的脸也被汗水洗过了一样的湿,脸白得吓人。他的脸往一边扭着,像是怕医生把针扎在他的脖子上。他的扳着犯人下巴的手和胳膊出汗了,每根汗毛上挑着一滴水珠子。注射完了,他松手站起来。他短促地呼吸着,像是干完了一场力不胜任的重活一样。后来他掏出个手绢,把自己的手擦了好一阵子。

一松手犯人就骂开了,骂陈平安,骂医生,骂连长,骂他们不得好死,可是不到五分钟他就骂不出声了。大剂量的麻醉药发作了,舌头硬了,就连他的嘴也不能动弹了,半张着。他的眼睛滞呆了,大颗的泪珠子哗哗地滚过几乎麻木了的汗淋淋的脏脸。他的嗓子里只能发出低沉的啊啊声,这声音后来也变成了呼呼的喘气声。

后来的事情很顺利:来俩战士把犯人扔上卡车拉到会场;开会时他嘴里虽还发出啊啊声,但台上台下的人都听不见;散会后游街示众,站在卡车上他也发不出声音。到了大沙沟他有点不老实,那里围得人山人海,他不叫战士架,他扭了扭肩膀想挣开战士的手,想自己走到挖好的土坑前去。那还行?!不能叫他嚣张,两个战士死死抓住他,架着他走到土坑前摞倒,跪着。这时陈平安提着半自

动步枪走过去,把枪口抵在他的后脑勺上。为了表现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按着事先安排好的,连长扯着嗓门喊,瞄准阶级敌人,射击!叭,陈平安的枪响了。

枪声响过之后发生了一点儿混乱。关于这次公审大会,宣传得太广泛了,经常枪毙人的大沙沟周围站满了密密匝匝的人群。他们没参加公审大会,他们是早早跑到刑场上来看枪毙的,人群像赶庙会一样拥挤。不知是警卫刑场的战士没经验,枪声响过就放松了警戒,还是围观的群众根本就不怕警卫战士,枪声一响他们就潮水般往前涌来,一个排的战士也拦不住。刑场乱了,那几个陪杀场的犯人刚刚被扔上卡车,人群就涌到了死人跟前。有几个人从口袋里拿出准备好的馒头沾死人的脑浆子。可也怪了,以往毙完了人,陈平安转身就走,可这天他在死人跟前站了一会儿。可能他是对群众的这种热闹的场面感觉惊奇和不解吧,他站着看几个人拿馒头沾脑浆子。这时又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一个戴蓝色大盖帽的人也挤进人群里从怀里掏出一个馒头,也去沾脑浆子。不知因为什么,陈平安跨前一步抓住了大盖帽的肩膀,把他拉得转过身来。

狗日的,你要干什么?

他狠狠地骂了一句,甩手打了个嘴巴子。

大盖帽愣了一下,接着开口大骂:

王八蛋,你怎么打人?我是公安局的!

原来那人是公安局的一名科长,也是执行任务的。他是受亲友之托沾脑浆子的。

公安局的也不行!你掏枪,你掏枪我毙了你!

那个科长气昏了,不自觉地摸了一下腰里的枪,陈平安啪的一声来个持枪动作,把半自动步枪抵在肩膀上,枪筒对准了科长。科长的脸色刷地变了颜色,白得死人一样,身体一动不动,嘴唇索索地抖,说不出话来。沾脑浆子的人们吓坏了,忽地跑散了,一边跑

一边尖着嗓子喊,要出人命啦,要出人命啦……张克一跑过去劝开了。叫两个战士把陈平安拉走。

回到营房,已经过了吃午饭时间。大家洗洗手,张克一就喊,快,快,集合,上餐厅。全班都集合好了,不见陈平安。他往宿舍喊了一声,老陈,快点。宿舍里传来陈平安的声音,你们先走,我洗洗手。

洗手就洗手吧,我没等他就把战士带到了餐厅。张克一说。可是,我们吃完饭了,陈平安还没来。我当时有点奇怪他怎么不来吃饭呢。陈平安可不是那种人,枪毙了人以后恶心,不想吃饭。那是新战士的事。陈平安已经毙过好几个人了,毙人都不当回事了。我就拿了两个馒头端了一碗菜回来。我想,他可能累了。

进了宿舍我就喊,老陈,你干什么啦,不吃饭啦。没人回答。扭头一看,他还在墙角站着呢,手泡在盆里。我当他洗衣裳了,把饭菜放桌子上说,快,吃饭吧,吃完饭再洗。我在床上坐了一会儿,吸烟,但是抽半截烟我觉出有点不对头了。他一直站在盆架前洗,盆里并没有衣裳。我走过去看,他正在搓自己的手指头。他搓得很仔细,一个手指头一个手指头搓,然后打肥皂,冲洗,然后又搓……我拉了他一把,叫他吃饭,我说,你洗这么半天啦,你想干什么,想把手上的皮搓掉吗?你手上沾大粪啦?他回头笑了笑,走向桌子前吃饭。

他吃饭的时候我睡觉了。部队上的习惯是要睡午觉。我很快就睡着了。后来,大概是下午两点钟的时候,一个战士把我摇醒了。什么事?我问。战士不回答,很神秘地指指墙角。我往墙角看,陈平安又洗手啦。那战士悄悄对我说,我睡觉时听见哗啦哗啦的泼水声,坐起来看,班长就一直洗手。这时候我才发现,全班人都起来了,都坐在床上看陈平安洗手,一个个脸上显出困惑和害怕的神情。另一个战士蹑手蹑脚走到我跟前来,小声说,洗一个小时啦,吃过饭就洗,换几盆水啦。

我往门口一看,心里也起毛啦。门口泼了好多水。我没出声,悄悄走到他身后去看。就像头会儿一样,他一个手指一个手指搓,那肥皂就剩个小薄片儿啦。不行,不能叫他再洗啦,我想,难道真是鬼魂附体了吗,叫死鬼缠住了吗?我有点害怕了,把他拉回床上坐下,拿条毛巾叫他擦手。我大声地说,你神经啦!他笑了一下不说话,两只手举在胸前又互相揉搓,做洗手状,干洗。

这种干洗持续了好长时间,我真正害怕了,跑出去找排长。排长来了,坐在铺上和他谈话。说话的时候他又说又笑的,和平常一模一样,但是两只手举在空中,还是做洗手状,洗个不停。排长抓住了他的手,说,你这手不动就不行吗?他笑,说他也不知怎么回事,手就是闲不住。排长一松手他就又洗起来,干洗。

过两个月我就退伍了,张克一结束了陈平安的故事,说,新兵役法规定,服役两年就可以退伍。连队领导说新的兵役法不好,新兵入伍刚刚训练出来,还没怎么服务就要回家,这不利于提高队伍素质。连干部希望老兵延长服役期,多干两年,这样他们做工作省心。我没同意,我说我还是回农场种地去吧,看劳动队枪毙人的兵没什么干头。陈平安没退役。他不愿回家,再说连长挺器重他,早就许愿提拔他当干部。我离开部队的时候他还没提干。他干活执勤时和正常人一样,但是一闲下来就洗手,干洗。他得了这病以后半个月,就被送到团卫生队看病去了,卫生队把他送到师医院去治病,说卫生队还没见过这种病。我离队时他还没回来。不知道他现在提干了没有。

恐怕提不了干吧,我说。我告诉张克一,这种病治好的可能性不大,起码三五年治不好。我举例说明:咱们团二分场有个叫姚玉英的姑娘,是1969年12月份来兵团的兰州知青,她来河西半年就得了和你的战友陈平安一样的病,也是爱洗手——干活的时候不洗,有事做的时候不洗,闲下来就洗,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就洗。别人都不敢和她在一起待着,她一边和你说话一边把两只手互相揉

搓,忙活活地举在你的面前洗个不停。和她坐在一起说话叫你心里不自在,发毛,疹得慌。她谈了几个对象,都是谈几天男的不跟她谈了,说跟她在一起心里发慌。她也是去兰州看过了,连精神病院都去了,但治不好。和那个总想撒尿的林梦云一样,医生们说她没有器质性病变,没什么病,只是一种深刻的洁癖。她爱洗手已经五年啦。

野 马 滩

—

该是吃午饭的时候了。他们二十几个人——男的女的——躺在麦田里，头枕着刚刚修起的田埂，眼睁睁望着南戈壁，望着地平线上几个火柴盒大小的建筑物中间出现的一个黑点。黑点在慢慢地向这里移动。

在巍峨的祁连山脉和连绵的马鬃山脉之间，是倾斜着走向中央的两块戈壁，戈壁之间夹着长长的一条草原——河西走廊上，断断续续的有很多这样的草原。草原尚未返青，但是在那开垦出来的疏勒河农垦局野马滩农场的田野里，却已泛起了一层淡淡的绿色。在这绿色的田野上，他们横七竖八的身躯就像是几块土疙瘩——落满尘土的衣裳和晒黑了的面孔跟大地一个颜色。

“吴建荒！跑一趟，叫她快点走。都他妈快渴死啦！”一个小脑袋瓜从田埂后边伸出来。

静悄悄的。

“听见吗！”他吼了一声，小脑袋瓜从这边拧到那边，小眼睛巡视着，发出凶狠的光；莫合烟的白色烟雾从他的嘴里冲出来。

埂子的另一边，一个瘦小的身軀动了动。

“别动！”陈小泉捏住他的胳膊，小声说。

吴建荒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一下：陈小泉睁大着眼睛，嘴里发出很响的鼾声。他也就使嗓子颤抖着拉出呼噜呼噜的声音。

“装死呀！”小脑瓜吼叫着爬起来。却立即被一个更加凶狠的嗓门儿喝住：“叫唤什么，要死呀！”这个人有着结实的身躯、硕大的头颅——整整比小脑瓜大一倍。小脑瓜哼哼唧唧地又躺下去。

“我领了工资就回家。”陈小泉捏捏吴建荒的胳膊。

“不回来了？”吴建荒支撑起身体。

“不一定。就看园林队还要不要。你呢？也回去吧。你学画，我复习功课，咱们……”

“我……”吴建荒长长地叹了口气。

他们本应该在园林队开始劳动生活：一块儿毕业的同学，除了上大学进中专的，剩下的都分配在局属拖拉机修配厂和园林队了。园林队有什么不好？不就是侍弄侍弄苹果树、玫瑰园，剪枝、采花、种菜……可是，他俩却跑到这野马滩来了。这都得怪那位军垦战士出身的语文教员——他说：“在园林队剪剪树枝、浇浇花，那算什么军垦战士！（这个老军垦，他忘了生产建设兵团早就改为农垦局了。）能看见戈壁滩吗？能看见疏勒河吗？能看见奇形怪状的风城吗？”他鼓励他们到野马滩去。他是这样描绘野马滩的：“野马滩，啧啧……当年我跟着团长勘察疏勒河时，发现了一群没人管教的野马。我们就追呀，追呀，终于来到了一块水草丰美的草原。呀，多么肥沃的草原，芨芨草长得一人多高，黄羊和野鹿游来荡去，白天鹅和仙鹤在河湾的沙滩上昂首阔步，杜鹃在黑夜的胡杨林上唱得如痴似醉……于是我们就在地图册标上——野马滩军垦农场。”

但是，真正的农垦生活与他们的想像差得太远了！这里除了耕种和收割使用机械以外，一切都还得使用中国最古老的工具——铁锨——去干。打埂子，修渠，平地，一天下来，累得骨头架子都散了，躺在铺上就跟死过去一样。

“人们会笑话的，咱们表了决心。”吴建荒看着天空说。

“那也比在这里受气强！”

是呀，苦一点累一点都能忍受，那些讽刺和讥笑真让人有点吃

不消。当人们知道吴建荒的爸爸是农垦局组织科科长的时候,你听那些话呀——什么心血来潮呀,什么游山玩水呀,什么“以身作则”呀……全泼过来了。尤其是班长李金钢和小脑瓜王志成,对他俩很凶,支使他俩干这干那,像对待仆人一样。

“咱们怎么得罪他们了!”吴建荒恨恨地说。他看了看戈壁那边,那个黑点已经变成真真切切的人,向干渠走来。

“还不是为了王文英的事。”

那还是刚来的时候,他俩在食堂帮忙,一天拉水回来,在门口听见小脑瓜和李金钢在叨咕:

“你看见了吗?金钢。那手指头!”

“看见啦。”

“那手指头!就像是水萝卜,又红又嫩……啧啧!”

“还不是没下大田……”

“还有那脸蛋……”

进了食堂,他俩就跟王文英说了。王文英气得脸都发白,跑去骂了一通。

“连长怎么看上他了,叫他当班长?”

“还不是看他凶,能打架,能镇住人。”

“还真是,小脑瓜最近老实多了。”

“老实?!那俩才狼狈为奸呢!”陈小泉撇撇嘴。

“算了算了,管他们呢,金钢不也快走了吗,听说他们家正给他办顶替呢。咱们还是好好干……”吴建荒还想说几句劝慰的话,却被小脑瓜的吼叫声打断了。

“喂,你们看王文英,真漂亮呀,穿上裙子了……”

人们都坐起来。

王文英今天确实漂亮:她脱去了旧军装,穿着浅咖啡色的衬衫,苹果绿色的裙子,容光焕发地担着饭菜走来。微风吹得衬衫和裙子在她的身上滚动,像波浪一样。

“光顾打扮，饭都忘送了！”小脑瓜骂着脏话，回过头来。可李金钢毫无反应，看着王文英。小脑瓜又回过头去打量王文英。他的眼睛很快看遍了她的全身——从头顶到两条美丽的腿，乐了：

“远看头，近看脚，不远不近……”

“流氓！”李金钢瞪他一眼。

“流氓？”小脑瓜惊奇得闭不拢口，“你才是流氓……”

李金钢一呲牙：“你再说！”

小脑瓜哑了。

“快，快来吃饭呀！”王文英来到大伙儿当中，亲热地招呼着。她把饭挑子放在田埂上，用手指抹了抹面颊上晶莹的汗珠，又将一绺头发抿到耳朵后边，红一红脸，浅浅地笑了：“怎么啦，你们今天怎么啦，韭菜合子鸡蛋汤都不愿意吃？”

“过夏天啦！”姑娘们一拥而上围住了她，嘻嘻哈哈地笑着。小伙子们也围了上来，饭勺在桶里搅得叮当响。

“可不是吗，你们也不怕捂出蛆来！”王文英笑着，从姑娘群里钻出来，眼睛却向四面寻着什么。

“干什么啦，这时才来！”小脑瓜端着蛋汤走过她身旁。

“干什么还向你报告呀，你是多大的官呀！”王文英扭过身去。

“可别冻着呀……”

“你管着吗！”王文英红着脸走开，来到吴建荒和陈小泉跟前。“快去盛饭呀，小家伙！”

两个小家伙从土坑里爬起来，拿着饭盒跑了。

“喝点水吧，王文英姐姐。”不一会儿，吴建荒走回来。

“你不喝汤？”

“没啦。”吴建荒把饭盒放在田埂上，甩甩手上的水。

“建荒，咱俩喝。”陈小泉机灵，盛了半饭盒蛋汤。

“别！”王文英夺过吴建荒的饭盒，把水泼了，噤噤地在一个个席地而坐的农工中走过，最后在李金钢和小脑瓜面前站住。“自觉

一点!”她说,端起小脑瓜的饭盒把蛋汤倒进手中拿的饭盒里。

“你怎的!”小脑瓜跳起来。

“行了行了,咱俩吃。”李金钢拉住他,客气地招呼王文英:“来,坐这儿,咱们一起吃……”他挪出一块地方。

王文英脖子没回地又走回吴建荒跟前,“给!以后吃饭积极点,你不知道咱这儿狼多……嗯!手怎么啦?”她蹲下,抓住吴建荒的手看了看,给他挤出血泡里的血水,掏出折叠得很好看的白手帕给包上。“疼吗?”她问。

“不,不疼。”吴建荒老老实实伸着手让她摆弄。

王文英非常喜欢这两个学生。他俩初来时,连长将他们领到食堂,“王班长,这俩学生先放在炊事班,你们看有什么活儿,就叫他们干。”当时笼屉刚下锅,房子雾气弥漫,谁也看不清谁。王文英一边拨动屉布上的馒头一边问:“几岁了?”

“十六啦!王阿姨。”吴建荒说。

“哈哈……”食堂里爆发出一阵快活的笑声。

“王文英有侄子啦!”有人笑得弯下了腰。

王文英也笑了。她才二十六岁。

“叫我姐姐,叫我姐姐好啦。”她笑着和他俩说。

从此,他们之间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她像姐姐一样爱护他们,他俩像对待亲姐姐一样尊敬她。他俩受了委屈,就向她诉说;听见有人诽谤和诋毁她,就勇敢地站出来保护她。尤其是碰到那些放肆的青年人跟王文英调情时,他俩就更加不能容忍……他俩爱她,崇拜她。因为她的纯洁,她的热情,她的美,她的对戈壁和草原的爱……

“你们慢点干呀!”包扎完了,王文英说。

“就这,还嫌我们干得慢呢!金钢说了,一上午打不出两条埂子来不准吃饭!”陈小泉的鼻尖上冒着汗珠。

“你没来的时候小脑瓜还骂你,说你……”吴建荒说。

“别理他，那赖货……”王文英用手指抹去陈小泉鼻尖上的汗珠，站起身来，说，“我该回去啦！”

“你是不是看上她了？”那边，小脑瓜望着走去的王文英说。

“去你妈的！你才……”李金钢瓮声瓮气地说。

“哎呀哎呀，眼睛都直了……”小脑瓜笑了。笑着笑着，又一本正经地说：“你还别说，长得真够意思。要是……”

“你那德行！”李金钢轻蔑地瞥他一眼，又回过头去。不远处，王文英担着挑子正一扭一扭地走上大干渠的斜坡。

“比你原来那位咋样？”

李金钢不回答。他以前有过女朋友，一回城就吹了。

小脑瓜眨巴着眼睛看着金钢：他躺在打埂子挖土挖出的沟里，身体折得像大虾，头枕在田埂上，眼睛望着南戈壁。小脑瓜狡黠地笑了：“金钢，两盒罐头！”

李金钢不吭声。

“四盒，四盒怎么样！一公斤一盒的。只要你能把她‘挂’上。我决不赖账。”

还是不吭声。

“嫌少？还是尿裤啦？四盒，金钢，都半月工资啦！”

李金钢慢慢转过头来，脸色黄黄的：“您忘啦？王成民刚摸她一下，就挨了两嘴巴，还是排长呢！……”

二

黄昏。戈壁滩上。陈小泉连蹦带跳地跑过来，把虚捏的拳头举在画画的吴建荒面前：“建荒，画只蝮蝎吧。”

“去去，别捣乱。”吴建荒正在画戈壁黄昏，但是颜色总也调不准。

“画一个吧，画一个吧……”陈小泉把拳头又往前伸了伸，碰着

了他手里的画笔。

“你——”吴建荒爱画画，想发火又忍住了。黄昏时候的戈壁，色彩变化太快，稍一耽搁，捕捉到的印象就会逝去。

“不行不行，今天就不让你画戈壁。”陈小泉又碰一下他的胳膊，说，“臭戈壁，你总也画不完……”

“好，好，不画了，不画了。”吴建荒知道画不成了，把调色板、油画笔放在画箱上，“小泉，咱们谈判谈判好吗？”

“谈判什么？”陈小泉睁大眼睛。

“以后，咱俩每天傍晚到这儿来，你带本书来看书，我画戈壁……”

“戈壁戈壁，你就知道戈壁！”陈小泉愤愤地叫起来，“人家都是学习画山画水画美人，好挣钱出名当画家，你总是在这儿画戈壁，也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我想画出戈壁滩的灵魂来。”

“灵魂？哈哈，灵魂？”吴建荒一本正经的样子把小泉逗笑了，“人有灵魂，戈壁滩也有灵魂？你给我画一个出来，我看看。”

“我……”吴建荒脸色红了。

“不行吧，就你那两刷子，哼……”陈小泉讥讽地说，“你就是画不出来，说出来也行。”

“我也……说不出来。”吴建荒的脸更红了，“可是，我不断地画，总是画，总能画出来的。古代的诗歌里，我觉得就有这种味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葡萄美酒夜光杯……’”

“行啦，行啦！少咬文嚼字啦！我知道，夜光杯是酒泉的一种石头做的，盛上酒泉的水，就是葡萄美酒了。”

“哈哈！你还知道的不少呢！我问你，酒泉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不……知道。”现在陈小泉的脸红了，“你知道？”

“我当然知道！”轮到吴建荒得意了：“汉朝有个大将军名叫霍

去病，在班师回朝的路上遇见了皇帝派来的使臣，给他带来五瓶御酒，说是慰劳他的。他就把酒倒进路边的一眼泉水里，叫士兵们舀着喝。于是，这眼泉就成了酒泉，这块地方也被人们叫做酒泉……”

“喂喂……”陈小泉突然打断他的话，“我问你，你说这泉成了酒泉，那么，这泉水里现在还有酒味吗？”

“有……肯定有……”吴建荒肯定地回答，“有一次我到酒泉去，喝了一捧酒泉的水，回来的路上，就有点醉了，躺在戈壁上想歇一会儿。结果，我就听见了古战场上战马的奔跑声，还有钢刀的撞击声……”说到这里，他真像是醉了，躺在戈壁上，把耳朵贴着戈壁的沙石，“你听，你悄悄地听，你准能……”

“哈哈！你少骗人……你听谁说的，编得这么像！”陈小泉笑得歪倒在戈壁上。

突然，吴建荒的脸色变了，声音也发抖了，“你听，真的，马蹄的踏踏声……”

陈小泉把耳朵贴在戈壁上听了听，脸色也变了。一种嗒嗒嗒的声音，清晰可辨！

“哈哈，你们干什么呢？和戈壁滩亲嘴吗？”

他俩一跃而起。

一辆毛驴车驶到跟前，跳下一群姑娘媳妇。花花绿绿的夏装像是戈壁上盛开的骆驼刺儿花。

“哈哈，画画呢！”

“你画的这是什么呀，戈壁、太阳、云彩，云彩是这样的吗？云彩是轻飘飘的东西，像棉花，像纱巾……”

“这哪儿是云彩，这是破布条！”

她们一窝蜂地挤在画架前，尖刻地评论着。三个妇女一台戏，这里足有一个班的女人！——真不知她们是怎么挤在这一辆毛驴车上的。她们大都是天津、山东来的知青，有的已经结了婚，平常

难得有这样笑的时候。

“还没画好呢！”吴建荒面红耳赤，真恨不得把画撕了，钻进戈壁深处。

“干嘛干嘛！”王文英故意用纯正的天津腔说话，往前边一站堵住她们，“我们小兄弟还没画完，你们笑话嘛！总比你们家门口挂的尿布好看多了。”

“哎哟哎哟，看把你狂的。我就不信你不晒尿布……”不知是谁，说出这么尖刻的话。

“不晒不晒不晒，我就不晒尿布片！”王文英嘴犟着，蹲在吴建荒身旁，“来，我来看看画得好不好。”

“哎哟哎哟哎哟……你看她来劲了。说是不晒尿布片，一个劲往人家身上扎。小吴快画，把你王阿姨画上，给你当媳妇。”这是个有孩子的妇女，她连说带操，把王文英推倒在吴建荒身上。

王文英扶着吴建荒的肩膀站起来，有点脸红：“怎么的，当媳妇就当媳妇，我还真想找一个小伙子呢！”

吴建荒臊得面孔通红。年轻人笑着叫着，推着操着。直到有人说：“李金钢来了！”她们才爬上毛驴车。李金钢是个凶狠的家伙，女同志都有些怕他。听说他在畜牧队赶马车的时候打死过一匹马。那是匹很犟的马，不好好拉车，耍性子，他一气之下狠狠抽了几鞭子，马塌着腰跪下了，后来就不吃草，过几天就死了。

毛驴车走了，像是一只大花篮。小毛驴脖子上的铃铛发出的当啷当啷的声音和姑娘们快活的歌声在戈壁滩上传出好远：

疏勒河流过咱家乡

沙枣花开在水渠旁

……

“哎呀呀，这帮疯婆娘！”陈小泉吐着舌头，看了一眼站在夕阳

下的王文英。她没走，在让吴建荒画像。

“画上晚霞，画上夕阳。”王文英理着头发说。

“不行不行。你得站到这边来。那边逆光，脸黑。”

“好吧好吧。”王文英又跑到那边，迎着太阳站好。阳光照得她眯着眼，她不时把脸侧向一边。

“别动别动，哎，对……”吴建荒画着。但是，他突然地不自在起来，停住了手。

“哟，画像呢！”李金钢站在他的身后。

没人答话。

“天气还真好呀！”李金钢又说。

还是没人答话。

“王班长，你应该换一件浅上衣、深裙子……”李金钢呵呵地干笑着。他今天也穿得很漂亮：白衬衫，下摆塞在浅灰色的直筒裤里。笔挺，干净。

“你管得着吗？快走吧。”王文英扭过头去，讨厌！李金钢在看她。

“看看总行吧！”李金钢显然不想走。他看看画又瞟瞟王文英，瞟瞟王文英又看看画，又说：“画家，你画的什么呀，人家是双眼皮，你画成单眼皮啦！”

吴建荒可有了说话的理由了，把炭笔一扔：“我画得不好，你画呀！”王文英在场，他胆子大些。

“嗨——”李金钢压着火，“我不过说说……”

“用着你说吗？走，你走！”王文英被看得不自在，吼起来。

“好好，我走……呵呵，这么厉害！”李金钢难堪地笑着走去。刚过一个沙丘，小脑瓜就迎了上来，“怎么样？”他问。

“搭不上话……”

三

太阳快压着地平线了。

吴建荒刚涂完底色。他一会儿看看画面，一会儿看看王文英，他想尽自己的本领画出王文英的美，但每一次抹上去的油彩又都被他用小刀刮下来。迎着夕阳站立的王文英周身罩着一种透明的桔红色的光线，显露出一种强烈而和谐的色彩，一种神秘的青春的美。他的笔无法表达，油彩也无法表现。他不得不细细地观察，结果竟有那么一次入迷了，忘记了动笔。

“你怎么不画啦？”王文英问。

“我……”他回答不上，脸红了，手忙脚乱地抹上去很多颜料，后来，他不慌了，再看王文英的时候，竟又发现她思想开小差了。她虽仍在原地站立，但她的眼睛却直愣愣地望着落日，一眨不眨，像是十分激动，脸上有一种异常的光彩，嘴半张着像是要呼唤什么。过了一会儿，这表情又变了，像是十分沮丧，脸色暗淡，嘴闭着，嘴角不停地抽动，眼睛里有一层亮晶晶的东西。

“怎么啦，王文英姐姐？”他问。

像是突然惊醒过来一样，她说：“没，没怎么。”她想笑一下没笑出来，嘴角往下撇了撇，嗓门哽咽地说，“休息一会儿，建荒，休息……”接着她就席地而坐，用手指头去抹眼睛里亮晶晶的东西。

“姐姐，姐姐！你怎么啦！”

建荒害怕了，一迭声地问，跑过去站在她面前。正在撵蜥蜴的陈小泉也跑了回来。

“没……什么，真的。”王文英看着西边说，“你们看，太阳、地平线、戈壁……”

“太阳，不就是太阳吗？”陈小泉看了看夕阳说。

“仔细看，你们仔细看，多……美……”

太阳压在地平线上。那大大的圆圆的轮廓像是一个大轱辘车的车轮。地平线——弧形的地平线像是又一个巨大的轱辘，和它相切。瑰丽的光线把天上的云彩染红了，把空气染红了，把戈壁照得色彩斑斓。接近太阳的那边，戈壁是红色的，黄色的，像是太阳熔化了，流出来那么一摊，金光闪亮。

“美吗？”

“美，是美。”陈小泉回答，“可是，你……哭什么呀！”

“哭，小泉，我就是想哭。看着戈壁，我也不知怎么的，总有一种叫人说不出的感觉，有一股什么东西，是力量吗？不是，是气体吗？也不是，总之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从心底升起。这时候，我就想喊，想叫；有时候呢，又想哭，想悄悄地哭，无声地哭……哭完了就觉得舒服，不哭就觉得委屈。”说着说着，她的嗓子又哽咽了，对小泉说：“你看——那地平线，那圆得像车轮子一样的太阳……你就没感觉到点什么吗？”

陈小泉说：“没有，我没感觉到什么。我也不想哭，就是想喊两声。”

“你没想到什么吗？”王文英盯着他。

“没有。我就想着这里太荒凉、偏僻。你呢？”

“我呀！我想到了好多，想到了我们的国家多么大，多么辽阔，想到了历史，想到了我们几千年的历史。你看这戈壁荒凉，是吧？可是这里就是当年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是连接欧亚大陆的通道。当然，看见这戈壁、地平线，我有时也觉得悲哀；看到这么宽大的草原、河流，还这么落后，我心里就不好受，就想着要在这里待一辈子，种地，开荒……”

“你不想回天津啦？”

“想回，有时候也想回，这里太苦了。可是，再看看这里的农民，看看他们一代一代地在这里生活，我就不想回了。他们能世代在这里生活，我就不能吗？你说是不是，建荒？”

王文英嗓子里哽咽的声音没有了，她把面孔转向吴建荒，明亮的眼睛看着他。吴建荒激动起来了，这不是一时激动，他似乎发现了多少天来一直在寻找的戈壁的灵魂。

“是，是，你说的是……”他说不下去了。

王文英又问：“你说说呀，你有什么感受，有什么想法，看着落日和戈壁的时候……”

“我，我……想起了我妈，想起我小的时候妈妈领我走路。那时候，我还不懂事呢，我就想跑快些，快些长大……快些把什么都知道……”

“是吗，是吗？你是想起了你妈妈？”王文英十分激动，一下子拉他坐下，“你现在对什么都知道了吗？”

“没有，没有。我还是个傻瓜……王文英姐姐。”

“嗯？你说下去……”王文英眼睛闪闪的。

“我还想起了蒙娜丽莎。”

“谁？蒙娜丽莎是谁？”王文英觉得新奇。

“是一个女的——达·芬奇，一个意大利画家画的女的。”

“你怎么想起她？”

“她漂亮，好看，尤其是那微笑……不，我不是说想起她的美，她的微笑。我是说她的前额。看见戈壁滩上的云霞和天空，我就想起了她的前额。”

“啊呀，她的前额那么美？”

“美，美得我都无法形容。有点，有点像你的前额……”

“坏蛋，你说我，你说我！我可饶不了你……”

王文英做出要打的样子，高高地举起手。可是，落下来的时候却在他脸蛋上拧了一下：“唉，你这个坏蛋……”

太阳不见了，不知什么时候它已经到地平线下边去了，惟有西边的天空还有几块长条的云发出耀眼的红光。草滩、田野和戈壁黑沉沉的，像是深沉的海洋。

“咱们回去吧！”陈小泉说。

“急什么，咱们躺一会儿吧！”王文英说。

“对，听听大自然的声音，夜的声音。”吴建荒说。

“谁也不许说话，谁说话就刮他的鼻子。开始！”王文英先躺下了。

陈小泉和吴建荒也跟着躺下。他们三个靠得很近，中间是王文英，左边是陈小泉，右边是吴建荒。

没有月亮，繁星满天。每个人都睁着眼睛在看，每个人都竖着耳朵在听。

吴建荒似乎听到了什么窸窣的声音。他的心猛地一跳！一只手在他的胳膊上摸着，滑到了手上。这是一只温暖的，但却是因为劳动而磨得很粗的手。他的手动了一下，想拿开，那只手却把他的手捏住，在黑暗中举起，在空中摇了两下，又放下来。吴建荒手抖了一下，想抽回来，却又抽不回来，他感觉到了那手上的跳动的脉息，他的心也咚咚地跳起来。

“你看见什么啦？小泉。”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王文英打破了寂静……

“哈，你说话啦！刮鼻子！”陈小泉忽地坐起。

“好，刮鼻子，刮鼻子！”王文英老实地躺着。陈小泉刮了她一下，“该你刮啦，”他对吴建荒说。吴建荒没动。“我替你！”他又在王文英的鼻子上刮了一下。

“好，刮完了，就说吧，你看见什么啦？”

陈小泉又躺下来：“看见星星啦！”

“听见什么啦？”

“听见，我好像听见远处有蝈蝈叫。”

“你呐，建荒？”

没有回答。

“说呀，你看见了什么？”王文英催他。

“我……”他讷讷地，“什么也没看见……”

“星星也没看见？”

“嗯……”

“听见什么啦？”

“听见一颗心在跳动……”

“谁的心？”王文英坐起。

“戈壁，戈壁的心……”吴建荒说，他的嗓音有点异常，像是在哭……

四

发生了料想不到的事情。第二天早晨，他俩提前出工，使劲儿干活。过两天大干渠里水就下来了，田埂还没修完呢！他俩想用延长工作时间的办法来完成成年农工应该完成的工作量。可是李金钢一来就训上了：“你们打的什么埂子，歪歪扭扭的！”

他俩急忙把埂子修直、拍平。

李金钢又嚷开了，“这是画画吗？慢腾腾的……”

陈小泉忍不住了：“那也没比你少于……”

李金钢一怔，挥舞着胳膊骂起来：“嗨！你小子敢跟我顶嘴。看我不打烂你的嘴……”

“你打你打你打！”陈小泉一扔铁锹，站在他面前。

吴建荒拉他：“算了，小泉，咱们……”

“叫他打，叫他打！”陈小泉脾气上来是很犟的。他把头探过去，脖子伸得长长的，“你打你打……”

李金钢还真打了一掌。陈小泉一个跟头栽倒在地。但是，他一骨碌爬起来，又冲了过去：“你打你打，你今天不打死老子就不是好汉！”吴建荒根本就拉不住。还是农工们跑过来拉开了。

“干什么，欺负孩子！”

“这孩子够可以了，汗流的……”

大家数落着李金钢。李金钢骂骂咧咧地走开：“流汗？谁不流汗……”

“算了，算了。咱们不理他还不行吗？”吴建荒劝慰小泉。陈小泉却放声大哭：“呜呜呜……你个混蛋。我妈都没打过我，你……呜呜呜。我跟你没完，李金钢！”谁劝都不行，他总是哭。哭着哭着，他狠狠擦了擦眼泪，对建荒说：“建荒，帮个忙！”

吴建荒不明白：“帮什么忙？”

“你说吧，帮忙不帮忙。哼哼哼。”

“帮……”吴建荒回答。

“那好。我告诉你……”他凑近吴建荒的耳朵哭着说。

“不行……不行！”吴建荒惊恐地睁大眼睛，“他还要打你的。连长也……”

“不怕，你别管！”陈小泉坚决地说。他不哭了，也不干活，把铁锹一放，坐在田埂上，眼睛盯着去连队的方向。

“干活吧，小泉。不能那样。”

陈小泉一句话不说，盯着远处。当他看见有个人骑着马远远向这边移动的时候，就猛地跳起来：

“金钢，你过来！”

“干什么？”李金钢大大咧咧地走过来。

“小泉！”吴建荒紧张了，喊他。

可是陈小泉根本就不听他的，冲着李金钢骂了一句：“我……”这是句十分难听的话。

“你说什么？”李金钢可能没想到，也可能没反应过来。

“我……”陈小泉又骂了一句，还是那么难听，那么恶毒。声音又不很大，附近干活的人听不见。

“……你是活腻歪了……”李金钢这下听清了，恶狠狠地打来。陈小泉早有准备。他以极快的速度抓来铁锹，抡起来朝李金

钢砸下去,李金钢一闪,正好打在屁股上,扑倒在地。陈小泉紧跟着又拍了两锨,这才转身逃跑,一边跑一边喊,像挨刀一般:“打人啦,班长打人啦!连长……”

李金钢爬起来就追,追了几步又停住。他也看见骑马过来的那个连长了。连长最见不得舞杖弄棒的人!

然而,陈小泉又回过头骂:“李金钢,你再着急,公安局明天就来抓你!你打死畜牧队的马,公安局正在调查呢。这次非把你抓起来不可,判十年刑。……你敢打老子!你来,你来打呀……”

李金钢暴跳如雷,又追。两人很快到了骑马人跟前。陈小泉大哭大叫:“连长,班长打人……”

“你要干什么!”连长勒住马,用马头挡住李金钢。

李金钢急红了眼,一句话不说,绕着马追打陈小泉。

“住手!你给我住手……”连长急了,驱动坐骑一下子撞翻李金钢,这才跳下马来:“怎么回事?嗯,怎么回事!”连长是个老转业军人,生性秉直,一说话就瞪眼。

“他骂我……说我……”李金钢说不出完整的话。

“你骂了吗?”连长只看见了李金钢追陈小泉。

“没骂,我没骂!”

“你——”李金钢说不出话。

“没骂,就是没骂!不信你问吴建荒。”陈小泉一口咬定。连长判断不清,三个人争吵着来到吴建荒跟前。“吴建荒,你说,陈小泉骂人没有。”连长问。

“不行,不能听他的。他们穿一条裤子……”李金钢说。他叫农工们作证,大伙都说没听见。李金钢急了:“你们都聋啦!”

“住嘴!”连长火了,喝住他,又问吴建荒:“你说……”

人们都看着吴建荒。陈小泉也说:“你说呀,建荒,我骂了没有。是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有连长,你放心……”

“对,是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你说。”连长说。

“说呀！”人们鼓励他，“你怕什么……”

吴建荒嘴唇抖动着，讷讷地说：“骂……了。”

“骂了？”

“骂了。”吴建荒看陈小泉一眼，低下头去。

“那你怎么说没骂！”连长朝着陈小泉瞪眼，“小小年纪，就知道撒谎……”

陈小泉瞪着吴建荒，脸色刷白，半天，嘴里才挤出两个字：“叛徒！”

中午，王文英把饭送到地里。她看见吴建荒躺在地中央，身下是一片压倒了的麦苗。他眼睛看着天空，不吃不喝。陈小泉的影子也看不见。

“小泉呢？”她在吴建荒身旁蹲下来。

“王文英姐姐，小泉……”泪水从吴建荒眼里涌出。

王文英站起，看了看伸向远处的田间小路，青着脸向李金钢走去。

“哟，王班长……”李金钢正低着头吃饭，见自己的饭盒旁出现一双穿白塑料凉鞋的脚，就抬起头，笑着说。

王文英不说话，瞄准饭盒踢了一脚。饭盒飞起来，扣在小脑瓜的前胸上。

“怎么——”小脑瓜跳起来，刷地举起拳头。

“你——”李金钢威胁地瞪他一眼，看他胳膊放下了，才笑吟吟地对王文英说：“怎么回事呀，王班长？”

“为什么欺负人！”王文英愤怒地说。

“嗨，我当是啥事呢……”李金钢恍然大悟的样子，“坐下，坐下说嘛……”

“说什么！”王文英睁大眼睛，气呼呼地吸口气，“你给我把陈小泉找回来——他跑场部去啦！你今天要是找不回来，我告诉你——李金钢，我跟你没完！”

“我呀……”李金钢脸上露出不情愿的神色。但是，立即他就啪地一个立正：“是！好，好，我去，我去……”不知怎么的，他有点激动了，眼睛亮了起来，“王班长，你放心，我一定按你说的……”

真的黄昏的时候，他把陈小泉找回来了。小驴车一直赶到王文英住的地窝子的门口。

“王班长，我可是把他接回来了，你让我办的我都办了。真不容易呢，我是好说歹说，几乎都给他跪下了……我可从来没干过这么折面儿的事……”他站在王文英面前说着，这时，吴建荒端着一碗面条来了。

王文英叫他们进来，说：“来，你们俩给小泉赔礼道歉。”

李金钢先走到陈小泉面前——小泉面向墙壁拧着身子坐在王文英床上——说：“小陈，我向你赔不是。今后绝不……”小泉不吭声。吴建荒又端着面条走过去：“小泉，你吃点饭吧……”他的嗓门哽咽了。

小泉一直不说话。但是，眼泪叭嗒叭嗒掉了下来。王文英长长地出了口气，朝着吴建荒和李金钢说：“滚，你这个‘叛徒’！……我要跟小逃兵谈谈。”

五

“哎！哎……来人呀……”

麦田里灌水的人们刚刚放下饭碗，就听见传来暗哑的呼叫声。他们看见，陈小泉在大干渠上奔跑，摇着手臂。

“淹死人啦！”王文英猛地站起。还在大家吃饭的时候，她就看见陈小泉和吴建荒往大干渠那边去了。

“快，快跑！”人们喊叫着跑过去。

是的，淹死人了。当人们跑上高高的渠堤的时候，发现吴建荒已被大渠里的水流冲出好远了。但是谁也救不了他。这条干渠，

十几米宽，水有两米多深，水流很急。落水的吴建荒一次又一次地接近渠壁，想抠着渠壁上的水泥预制块爬上来，却总也抠不住。渠壁很陡，岸上的人想手拉手像猴子捞月亮一样，接近水面把吴建荒拉上来，可他们伸出的手还没碰到吴建荒，水流就把他冲跑了。他们看见，吴建荒的手指在水泥块上磨破了，流出血来。他已经没力气了，连靠近渠壁的力气都没有了，水流很快地将他冲向下游。

“快点，快点！大家快……”陈小泉哭了，嗓音都变调了。他俩是在水泥桥上下水游泳的，他在桥下的水泥台阶上爬了上来，吴建荒却没上来。他吓坏了。

“叫什么，你叫唤什么！”李金钢几次被人拽着下到渠壁上都没抓住吴建荒，也急了。

“有条绳子就好了！”王文英跑得脸灰白，喘着气。

“小泉，去把扁担拿来。”

“不行不行！来不及了……”李金钢跑着，解开衣扣。

“金钢，不行，不行呀！”小脑瓜拉他的胳膊，前边有跌水！”

“松手！你他妈松手！”李金钢挣了两下挣不开，扬起拳头打在小脑瓜脸上。

“人都快死了……”他嚷着骂着，把脱下的衣服一甩，跳进大千渠。

吴建荒上来了。李金钢推着他，用肩膀顶着，一次次靠近渠壁。上边的人拽住了他。李金钢跌进跌水。

草原是平平坦坦的，但也是倾斜的。为了减缓水流的速度，每隔一二十里就有一个跌水。这是个大坑，里边有水泥桩。水进了跌水，经过水泥桩的阻拦，流速就减慢了。

有人拿来铁锨，有人拿来扁担，拽着拉着把李金钢拖出了跌水。两个小家伙哭了。王文英骂他们，又对着伤痕斑斑的李金钢说：“哼，你小子今天算干了件人事！”

六

七月。灌第五遍水，青绿色的麦田里传来粗犷而沙哑的吼叫声：“喂！金钢，金钢！水没啦！”

“回去啦，他回去啦！头疼——”陈小泉扯着小公鸡一般的嗓门回答。他正在为吴建荒剥后背上被太阳晒暴了的黑皮。

“舒服吗？”他问。

“舒服什么呀。起来起来，水干啦。”吴建荒说。

“好，你在这儿看着毛渠，我去巡渠。”他在吴建荒的后背上拍了拍，说。

但是，他刚刚走了一会儿，就又跑回来了。

“建荒建荒，你来！”他急急地但又轻声地喊：

“咋啦！”吴建荒光着脚片跑过去。

“王文英，他们在说王文英……”陈小泉悄悄地说，他的脸色十分难看和慌张。

“说什么……”吴建荒紧张起来。

“说……我亲耳……”

“你——”吴建荒睁大眼睛。

“不信，不信你跟我去看。”陈小泉痛苦地说，“我也不相信。可是事实上……”陈小泉拉了吴建荒就走，“快走快走，说不定你还能……”“不，不……”吴建荒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味道，犹犹豫豫，但还是跟着去了。他的心嘣嘣直跳。“轻点！”走完一段引水渠，下到一片草滩上之后，陈小泉把他摁倒在一个大沙包的后边：“你听。”

吴建荒听见了说话的声音，像是小脑瓜在说。他跟着陈小泉，爬到一簇红柳的后边窥视。他惊奇地发现：小脑瓜和李金钢——他不是说头疼回去了吗——仰面八叉地躺在草滩上，脚跟前有吃空了的罐头盒、烧酒瓶。

“金钢，我还真有点不信。别看我买了罐头。”小脑瓜说。他吸了口烟，吐出一个大大的烟圈。

“德行！这还能骗人吗？”烟雾乱糟糟地从李金钢的嘴里喷出来。“昨天晚上吃完饭我就去了。说呀，聊呀，一直到十二点。她撵我走，我不走，硬……”接下来，是一阵放荡的笑声。

呛的一下，吴建荒的心像掉进万丈深渊，头轰地大了，浑身软绵绵的。陈小泉躺在他的脚下，脸白白的。像是灵魂出壳了，两人久久没有动弹。闷热，死一样的闷热。周围死了般的沉寂……

“建荒，我没骗你吧！”过了许久，陈小泉说。

“滚！滚你妈的！”不知怎么的，吴建荒嘴里突然吐出这么肮脏的话。“你叫我来干什么？就是叫我听这个吗？你妈的！”吴建荒突然坐起，瞪着陈小泉，他的眼睛都瞪圆了。瞪着瞪着，又突然栽倒，把头埋在草窝里哭了。“小泉，咱们让人给骗啦！呜呜呜……王文英把咱们骗啦！看着，她就像多纯洁、多高傲，实际上……”

“对，对对。”陈小泉挨了骂，却没发火。

但是，呜呜地哭了一会之后，建荒抬起头：“小泉……”

“嗯！”

“我看不一定。王文英能让……那德行，那下流东西，我见了都恶心！”

“可是，这些天，我总见李金钢往她那儿跑……”

“那是他缠王文英，王文英对他可没那意思！王文英能看上他吗？”

“对，对对！我也是觉得不可能。准是李金钢吹牛，赚小脑瓜。”

于是，两人又议论起王文英的好处。

“呸！李金钢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吴建荒狠狠地往天空吐了一口唾沫，唾沫溅开来落在他自己和陈小泉的脸上，两人都没擦。

“喂！吃饭啦……”远处传来熟悉的喊叫声。

“回去吧！”陈小泉坐起来。但是吴建荒躺着不动。

“小泉，王文英真要是……怎么办？”

“不会的，不会的。”

“可是我觉得……”

“嗨，她要是真那么坏，咱们就不理她了！”陈小泉站起来。“走吧走吧，再说，她不一定有那事！……走，回去，回去咱们问她。”

“你问？”吴建荒抬起泪眼。

“你问。”

“我……不问。多难为情……”

“好，我问，我问。这有什么？又不是我胡搞……”

两人就往回走。这时候，田野里又一次传来王文英的呼唤声：“吴建荒！陈小泉！吃饭啦……”

吴建荒停住脚步：“小泉，你不要问，我问。”

“你问？”

“嗯，我问。你那嘴……”

“跑哪儿去啦？喊你们半天！”他俩刚刚走进麦田，王文英迎了上来，嗔怪地嚷道。她手里捏着两张油饼，黄黄的。

“……”吴建荒张了张嘴没说话，眼睛直愣愣盯住她。王文英还是那么健康，那么美丽，只是……衬衫变成了苹果绿的，浅浅的，裙子变成了咖啡色，眼睛还那么明亮，眸子里洋溢着快活和幸福的光。头上还戴了一条发亮光的黄色缎带……

“你怎么啦！”王文英看出吴建荒神色不对。

“你……怎么啦？”吴建荒脸色变了，黄黄的。

“什么……我吗？”王文英脸上显出惊讶的神色，脸色也开始变了。她转过脸去看看陈小泉，然后又转过来。

“嗯，你……没什么！”吴建荒突然觉得不好意思，扭过头去，就像是自己做了什么错事，躲开她的目光。

“那……快吃饭吧。专门……给你俩做的……油饼。”王文英

脸红得像要出血，嘴也磕巴了。但是吴建荒没接，却把手藏到背后。王文英又给陈小泉，陈小泉竟转过身去，朝着不远处吃饭的人说：

“你给他吃去吧！”

王文英愣了一愣。她的脸色变得惨白，刚才还显得快活和幸福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胸脯急剧起伏，嘴唇边在颤抖：“你……”她猛地拉过吴建荒的手，把油饼一塞，转身走了。当她走上大干渠堤坡的时候，吴建荒清楚地看见，她晃了一下，像是踩着石头，差点摔倒……

太阳偏西了。在它的下方，散乱地堆放着许多馒头状的云。草原和戈壁的上空，蠕动着一条蓝灰的带子，把草原、戈壁和麦田整个地罩住了。

“吃吧，建荒。”陈小泉吃完了油饼，趴在渠上喝了一通凉水，对着愣怔地坐在毛渠上的吴建荒说。好像是被提醒了一下，吴建荒把手里已被攥得像破抹布一样的油饼撕成碎块，扔进汨汨呻吟着的流水里，然后就趴在渠堤上哭了。

“你怎么啦！哪儿不舒服？李金钢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过来，蹲在他旁边。

他拧过头去。哭出声了，眼泪鼻涕滴在地上。

“病得厉害吗，哪儿疼？”李金钢拉着他，“回去吧，王文英那儿有药……”

“滚开！你给我滚开！”从李金钢的嘴里迸出王文英的名字，激怒了他。他使劲掰开他的手，使劲儿一甩。啪地一声，李金钢被推进水渠里，他从渠里爬起来，有点恼了：

“嗨，小王八蛋今天怎么啦！”

“你小王八蛋怎么啦！”

“你敢骂人？”李金钢压着火说。

“骂了，就骂了！”吴建荒腾地跳起，骂出更难听的一句话：“我

……”以前陈小泉就是这样骂的。

“你再骂一句！”李金钢脸色发青，举起胳膊。

他又骂了一句，声音又尖又细，嗓门都变调了。

“啪！”一巴掌扇在建荒脖子上，他一头栽进水渠。

“不扇你，你皮子痒痒！”李金钢吐着唾沫说。

“你才皮子痒痒！”吴建荒爬起的时候手碰着了斜放在渠里的铁锨把，他高高举起，“我今天砍死你！”

“你砍，你砍！”李金钢真正火了，往前逼去。但是，他还没到跟前，后腿弯上就重重挨了一击，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这是陈小泉打的。建荒在那里举着铁锨说：“你动，你动我今天就打死你，你个臭流氓！小泉，打他，打！”

李金钢没动。他懵了，也吓住了：“放下，小王八蛋你们给我放下，你们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发这么大脾气。我怎么惹你们啦？哪儿对不起你们啦？”

“哇……”吴建荒大哭起来，扔了铁锨，往大干渠方向走去。在他走过的地方，留下一串湿漉漉的脚印。陈小泉拖着铁锨不断地回着头，也跟了上去。

七

起风了。还是那耀眼的太阳，还是冷嗖嗖的天空，馒头状的白云却改变了形状，风把它撕成一条条的碎片，甩向天边。戈壁滩上黄蒙蒙的，沙粒和枯草像蛇一般流窜……

吴建荒和陈小泉赶着毛驴车飞跑，像是和狂风赛跑。吴建荒用半截锨把使劲儿敲打驴的脊梁骨和屁股，陈小泉扶着他们简单的行李卷。

“她喊咱们啦！”陈小泉不断地回头。他们的后边，从他们住了三个多月的地窝子那边，传来熟悉的呼喊声：

“吴建荒……陈小泉……”

“不理她！……”吴建荒也回头看了看，把两滴苦涩的泪水咽下喉咙，又狠狠敲打毛驴。滚蛋吧，南戈壁！滚蛋吧，野马滩！半年来，他所崇拜的，他所尊敬和仿效的都落了空。他像是被人骗了、蹂躏了一样，心里针刺一样地疼。呀，心灵上最美好、最珍贵的东西破碎了；理想和追求、真和美，如同戈壁滩上的海市蜃楼一样飘逝了……

“回……来……呀……”

风把王文英的声音送进他们的耳朵。但是他们很快就听不见了。毛驴车很快过了大干渠上灰色的水泥桥，蹄声嗒嗒地驶下倾斜的路面，奔上去场部的田间大道。明天一早，有一辆从县城来的班车将把他们捎到疏勒河农垦局。

“停住！停住！”斜刺里冲出一个人。

“李金钢！”陈小泉说，心里一紧。

“不怕他！”吴建荒使劲儿打驴，想冲过去。

但是李金钢站在道心，宽宽地张开了两臂喊：“下来……”

毛驴车慢下来。吴建荒跳下，牵着驴往前走。

“把车给我！”

“干什么？”他警惕地望着李金钢，右手捏紧锨把，眼角的余光看见陈小泉的手里也捏着一股粗绳。

“连长来了，叫你。”李金钢说，一点也没动武的样子，出奇的和蔼，话音中还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喜悦。他把手插进屁股后边的兜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抖出一张白纸，笑嘻嘻地递给吴建荒：“你看看。”

吴建荒迟迟疑疑地接过来扫了一眼。这是一张天津市劳动局的职工调动证明，他冷冷地又递回去，惊奇地瞟了一眼李金钢：“你让我看这个干什么？”

“顶替，顶替我爸爸。呵呵……”吴建荒还没明白过来，李金钢

已经坐在车辕上,从他手里拽过缰绳,说,“画家,有工夫到天津去,我请你吃狗不理。嗬儿……驾……”

但是陈小泉拉住了毛驴:“不行不行,我们的车……”

“怎么,你们也走?”李金钢发现了他们的行李卷。“来,上来吧,今晚到场部,办了手续,明天咱们一块儿……”

“不,不……我们……”吴建荒脸红了。陈小泉立即说:“我们到连里去。”

“噢……”李金钢惋惜地说,“那就对不起了。我可就不奉陪了。”他把行李卷儿推下来,抖起了缰绳。

“你把车给了他,咱们怎么办?”陈小泉埋怨吴建荒。但是吴建荒一句话也不说,看着毛驴车驶去。眼看着毛驴车就要往另一个方向拐了,他突然喊叫起来:“李金钢……”

“什么事呀!”李金钢回头看着,勒住了毛驴。吴建荒追了上去。

“你就这么……走啦?”吴建荒喘着气。

“啊,咋啦?”

“你不说……一声……”

“说什么?”李金钢惊奇地睁大眼睛。

“你不跟王……文英……”他磕巴了,脸红了。

李金钢一怔,脸腾地红了,回过头去久久地望着戈壁,然后用一种异常的声调说:“不用啦,小兄弟。我想过啦,我想叫她也……但她不会听我的。我又不能不走,我们还是……早点分手……好。你是好心,我知道……但是每人都有自己的路。”说到这里,他把手放在吴建荒的肩上,“再见啦小兄弟,祝你成为画家。嗬儿……驾!”毛驴车跑出好远,他又回过头挥着手喊:“我的东西……送给你啦!做个纪……念……”

“走啦!”吴建荒轻轻地叫了一声,朝着身后的陈小泉。

“咱们也走吧,天快黑了。”陈小泉说。他俩走过去扛起行李。

然而，他们朝去往场部的方向走了不远，脚步就慢了下来。他们听见后面传来奔跑的脚步声。

“建荒！小泉……”王文英的声音。他俩站住了。

“你们怎么也不说一声，就这么走啦？”王文英跑着绕到他们前头，站住了，胸脯一耸一耸地起伏。

没有回答。

“你们生我的气啦？”她难过地说。

行李卷从吴建荒肩头掉下来。陈小泉拧过身去。

“你就要走了吗？你不是说你要画戈壁，画草原，你画好了吗？”

吴建荒抬起头来。眼前是一双痛苦的眼睛……他猛地掉过头去，呜咽着说：“李金钢走啦……”

王文英睁大眼睛。

“往场部去了。明天……上火车……”陈小泉转过身来，行李卷也掉了下来。

“什么？他……说什么来着？”王文英脸白得像一张纸，声音都变了。

“我叫他跟你说一声。他说各人有各人的路。”

王文英慢慢地坐到地上，双手捂住脸，伤心地哭了。

陈小泉讷讷地说：“他也许不走……”

“不会的……”王文英耸动着肩膀，呜呜咽咽地说：“要是不走，他会跟我说的。二流子，这个二流子！我以为他变好了，真的变好了……昨天……晚上……他还说不走的。他说，他不走，一辈子不走，一辈子在这里。他这么说的，我……信了……可是他——回城，回城就可以不干活儿吗？就有山珍海味，就有酒席等着他去吃吗？河西的粮食就不养人吗？走吧！叫他走吧，这个流氓！”

“王文英……”吴建荒说。可是王文英打断了他：

“滚，你们都滚！少叫我，我不愿看见你……们，你们都不是好

东西,没一个好人!滚,快滚!”她瞪着他们俩。

他俩吓坏了,急忙向后退去,他们从没见过王文英这么厉害,远远地看着她。他俩看见王文英先是抽泣,后来就不哭了,躺下来,望着天空,过了一会儿又侧过头去望着南戈壁。

风还刮着,被尘土染黄了的天空不太明亮。但是,没有了七彩光线的戈壁显得更加深沉,像是深深的海洋,那么广阔……那流动的阵阵沙尘,就像是海洋里奔腾的浪涛。

王文英躺着。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吹乱了她的衣裙。她静静地长久地躺着,像是雕像一样,她的面孔,她的腿,她的胳膊……

后来她起来了,拍打拍打裙子上的尘土,匆匆走去。吴建荒看见她走得很快,一会儿就走上了大干渠的高高的渠堤。她在那儿站了一下,抿了抿头发,就突然不见了。

吴建荒的心猛地一沉,喊了一声:“小泉!”陈小泉不答,两人一起向前跑去。当他们脸色难看地爬上渠堤的时候,发现王文英正在洗脸呢!——她蹲在陡峭的水泥块上,把手伸进无声的湍急的水流中,捧起满满的一捧水洒在脸上……后来,她撩起裙裾,揩揩脸上了渠堤……

“姐姐!王文英姐姐……”吴建荒的心抖动起来。

“滚!你滚吧!你们都滚……愿滚哪去就滚哪去,越远越好!”王文英头都不回地走了。

“建荒,咱们?”

“回去!”

……

第二天清晨。

王文英去担水。在大干渠高高的堤坝上看见了他俩。吴建荒正在作画,陈小泉在读书。看见她,吴建荒放下画笔捧着画跑过来。

王文英看他一眼,走下大渠的台阶。

“还生我的气吗？姐姐！”吴建荒跟着走下。

王文英摇摇头，打上一桶水，又打上一桶水。

“你的画。”

王文英直起腰。这不就是那张画吗？吴建荒画好之后一直没给她。只是，现在画上那昏暗的黄昏已经变成了早晨玫瑰般的云霞。画的下方还新加了一行字：献给亲爱的姐姐。

王文英捧着画的手哆嗦了。

“你等我长大……长到二十二岁的时候。我不离开野马滩……”吴建荒仰起赭红的脸盘，看着她的眼睛。

“扑通！”水桶掉进大渠，沉没了。王文英慢慢地捧起他的头，在他的前额上轻轻亲了一下，喃喃地说：“你哪懂得这个呀……”

渠水湍湍地流……

黑 戈 壁

来吧！姑娘
让我的篝火为你驱散寒冷
请坐在我身边，
把你的手给我
可你长长的睫毛为什么垂下呢
你的眼泪为什么流个不停呢

——摘自林染《哦！我的戈壁》

今年的全国美展按画种不同分别在几个城市展出。我是搞油画的，我和几位老师带着我们西北艺术学院油画专业的学生来到渤海之滨的天津市，参观油画作品展览。

一下车，我们就被人流裹向天桥。踏上天桥的台阶，就根本由不得自己了，前边是脊背，后边是胸脯，左右肩膀挤肩膀，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快不得，也慢不得。

“有人叫我！”上到一半台阶，我前头的刘老师猛地转过身来，胳膊几乎碰落我的眼镜。

“走吧走吧，出去再说！”我推他。

“不是咱的人。像是……”他往后看着。

“听错了吧。喊别人的。”我说。

但是走了两步，他又转过身来，神情很激动：“就是有人叫我！”

“刘志成……”

是有人叫他。我听见了,是个女人的嗓门。我也回过头看女人,是个女人。天桥人口处——攒动的人头后边——有个人仰着脸,挺白。

“一眉!”刘老师叫了一声,声音短促高亢。他的提着水果兜的手举在头顶,摇晃着。

“志成!”那女人的嘴张了一下,声音尖尖的,也举起一只胳膊摇晃着。

“你们先走……”刘老师说了一声就从我身边挤下去。我后边隔着几个是张振川老师,还有学生。张老师被他撞得后退,问他干什么去,他说有个熟人,就急急地贴栏杆往下跑。

走到天桥中间,我扭头看了一下,刘老师穿着浅咖啡色衬衫的身影立在人口处的站台上。他对面离得很近有一个女人,面孔看不清,像是个铁路工作人员,帽子上有个红点儿。

出站等了几分钟,不见他出来,我们就先走了。住处他知道,天津美院,他进修过。

我们到美院招待所住下——我和刘老师分在一间屋里,吃过饭,洗了澡,天黑透了,他还没回来。张老师来串门,说:“别是遇见相好的啦。”

“你胡说什么!”我说。

但张老师不服气,说:“我胡说!你知不知道,他在兵团时连里有好多天津知青,你能保证他没女朋友?”

我未置可否。刘志成是叫人猜不透:在事业上他是成功的。他是老三届,在河西走廊的兵团农场待过八九年,打倒“四人帮”后的第一年考入西北艺术学院,毕业后连续三年他的作品入选全国美展。他专攻风景画,画河西走廊风光。前年,他的一幅油画《西北的荒漠》在全国获奖,去年《疏勒河上的胡杨林》又一次获奖。他的对于大西北的荒漠和草原的独特的观察力、特殊的表现方法、作品中表现出的大自然的深厚、质朴的美和深刻的哲理轰动了美坛。

有影响的《美术》杂志连续发表了包括著名美学家洪毅宣教授在内的几位美术界前辈的评论,说是我国油画风景画的创作,面临着一次新的崛起,一个具有严峻、深沉和原始的自然美风格的大西北画派正在形成,而这个画派的代表人物是一位三十几岁的青年教师刘志成。今年刘志成入选美展的一幅画叫《黑戈壁》。这幅画,据我院两位美学教授讲,显示着刘志成艺术风格的更加成熟和精到,必将更加引人注目。但是在生活上,刘志成毫无成就可言。兵团知青回城,大都携儿带女,他却孤身一人;上学期间全部精力用在绘画上了,没女朋友;毕业了,成名了,作品印在年历上行销全国,好几个女学生不无爱慕,他像是不明白那意思。

他十点半钟才回来。我还没睡着,问他怎么回来这么晚, he 说是去朋友家吃饭了。

“什么朋友?”

“兵团的。”

说着,他就上床睡了。

第二天看画展。我们是一块儿进展览馆的。学生们拉拉扯扯拽着他,说是先要看他的画,我也跟在后边。画找着了,就挂在第二展厅正对着门的一块隔板上。这真是本展厅最引人注目的一幅画。画不很大,只是比全张白纸宽一点儿。可是画前挤了几十个人,有的看着,有的在小本本上记着什么,还有人在拍照。在那些人的脸上我看见了肃穆、钦佩、欣赏和思索诸种神情。我早就看过他的《黑戈壁》了,但此刻,那种嫉妒、羡慕的情绪还是油然而生。

他真是胆大。戈壁、草原,人们都是画成横幅的,以便显示广阔。他的画面却竖着。他画的是黄昏的戈壁。画面分两大块,五分之二画着戈壁,其余部分是天空。他用蓝、绿、褐色画戈壁,颜料堆得很厚,近看一堆一堆杂乱无章,远看却是黑压压、乌沉沉、庄严、浑厚。他给戈壁上堆积了大块大块的红色,这又使戈壁显出了骚动与不安,像是有一种巨大的力——大概是岩浆吧——拱着戈

壁,戈壁变得像集聚的乌云,像沸腾的大海。天空着色特别薄,只用些淡淡的蓝色、红色、黄色和白色,布纹都显出来了,天空显得恬静、明洁。太阳已经落下去了,但是从地平线——戈壁的边缘射出来的看不见的光线把天空照得明亮耀眼。那种只有大西北的天空才有的像是被扫帚扫乱了的一抹一抹的云彩在无限深远的天空飘着。天空与戈壁交界处是一条浅蓝色的带子,是戈壁滩上的蜃气吧,把天空和戈壁巧妙地连接起来,显得朦胧、神秘、悠远。我真是佩服极了,他的大胆,他的把明与暗、冷与暖、动与静、现实与理想、有限与无限、有形与无形诸种对立矛盾的事物有机地统一起来的本事,整幅画给人以庄严、悠远的感觉,使人久久地注视,陷于深深的思索。我真想和他谈谈我此时的感觉……

但是,我没找着他,到中午也没看见他,问张老师也说不知道,倒是一个学生说了,进展览馆不久,一个女人把他叫走了。学生说那女人个子挺高,脸白白的,黄头发。

“火车站那个!”张老师判断说。

刘老师七点钟回来的。今天他像是很兴奋:一进屋就喝水,喝完了水又朝我要烟抽。哎,他这是怎么啦?他是不吸烟的。点着烟之后就站在窗前长时间一动不动,像是在看什么又像是在想什么。

“好好盯着,看他今天往哪儿去。”第二天进展览馆的时候张老师说。但是,一整天刘老师都和我们在一起看画。他认真地看着,还不时地掏出小本本记着。以后几天也是这样,白天看展览,晚上聊天,他没有单独出去过,也没人找过他。

只是最后一天……这天自由活动,谁愿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几位老师去了水上公园。路程远,玩得又尽兴,回到招待所已是吃晚饭时间。一个女学生进来说,有个女人找过刘老师。刘老师一听嗵地从床上跳下来:

“几点钟?”

“上午,你们刚出去。”

“说什么?”

“她等了一会儿,走的时候说,叫你回来上她家去。”

刘老师脸色变了:“没说别的?”

“问咱们什么时候走,我说明天。”

刘老师不说话了,坐在床上。这个学生真饶舌,还说了这女人的模样:“高个子,不胖,挺苗条的,皮肤挺白……嘿嘿!”说完抿嘴一笑,看刘老师一眼。

又是那个女人。学生走了,我去洗脸,回来看见刘老师还坐着发愣。我说:“还没走呀?”

刘老师脸红了。

“走吧走吧,人家都找上门来啦,你也太薄情啦。”我笑着说的。可是刘老师当真了,脸红红的:

“老吴,没有的事,没有的事……”

我弄得挺不好意思。我说,我也不认为有什么事,我只是说应该去看看,告别一下。他脸上的红色才褪了,过一会儿就出去了。

可是他很快就回来了,不到半个小时。这速度可太神了。我说:“你真够快呀!”

“我没去,太晚啦。”他说。

这天晚上我们又聊天啦,张老师,还有两位中年教师。我们说起画展,说起这几年美坛的新收获,新人,后来还谈起了各自的经历,经历中的某个事件,某一个感受最深的印象和瞬间,这些后来怎么变成了创作中的灵感。

“刘老师,”一位中年老师对刘老师说,“说说你的《黑戈壁》吧。”

“对对,你的灵感是从哪儿得来的。”张老师也说,“你今天怎么啦,一句话不说?”

是的,刘老师的神情有点异常。聊天,他一句话没说,也没听

别人的；我看见他几次走出房去，进来后又坐在床上发呆。听见老师们叫他名字，他怔了一下，说：“你们说你们说……”

他这是怎么啦？后来老师们走了，我收拾行装，他就那样坐着。我躺下了，听见他长长地叹息一声：“唉……”

“怎么啦？”我问他。他的叹息这么沉重，充满了怅惘。

“是该去说一声，告别一下。”他说。

我一怔。哟，他还惦记着那女人的事呢。我说：“去呀，你去说一下呀，早就该去。”

“晚了……”

“晚什么呀，才十点多。”

“不，不……”

他不去。但是又不睡。他下了床站在窗前，长时间看着外边的街道。看来他是犹豫不定。

“要不，我陪你去。”我禁不住说了句。

“你？”他回过头来看我。

“啊。去不去？去，咱们就走，别磨蹭。”

他回过头去，停了一会儿，像是在决定去不去，然后才说：“好，走，走一趟！”

好像有人陪着，胆子就壮一些，唉，这个人呀！我穿了衣服，跟他出了门。

但是，到了汽车站等车的时候，他在房子里拿定的主意又动摇了。他说：“汽车怎么还不来，别是收车了？”

“早呢。”我说。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晚了，是晚了，你看街上没车啦。”

最后看见汽车来了，他说：“回吧，不去啦！”

“怎么啦，一会儿去，一会儿又不去？”我拉住他，不叫回，“你看，车来啦！”

但是，当车驶到跟前停住的时候，他硬是挣脱我的手往回走。

对于这种行动我很生气,我又抓住他:“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

“哎呀,你别拉我好不好?”他有点发急,“我不去啦,太晚啦!”

“晚怕什么?”

“人家都睡觉啦!”

“睡觉,谁这么早睡觉?就是睡了又怎么的?咱们去了,敲门,就告诉一声:明天走啦。不就行了……”

“不,不,还是不去吧!人家一个女的,爱人又不在……”

噢,是这么回事,我也犹豫了:“那就回去。”

我们又走回来。不过,我觉得事情蹊跷。我想起了那天火车站的事,看展览他走了的事,还有他今天不正常的举动。我问他:“老刘,你们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过去有过那么一会儿……”

他看我一眼,没出声,紧着走。

不过,我看得出来啦,今晚他是真激动了,也可能是刚才的事折腾的,他的心很不平静。回到招待所,他久久地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后来又和我要烟抽。吸了半截烟,他突然问我:“你还不睡?”

我开玩笑说:“我怕你跳楼。”

他笑了一下,又吸烟。看起来,他是在思考什么。果然,他把烟头捏碎之后说:“你不睡啦?”

“没法睡,叫你折腾的。”我说。

“那就别睡了。我给你说说我的经历……今晚上,我是太激动了!”他还没说呢,自己就先激动起来,脸色变了,嘴唇也发灰了,眼睛闪闪发亮,身体筛糠般地哆嗦起来。

你们不是很多次问我《黑戈壁》的创作灵感怎么来的,它的最初的触发点是什么?我今天就告诉你:它来自一个女孩子,就是今天找我的那个女人。《西北的荒漠》,《疏勒河上的胡杨林》,我所有作品的创作都和她分不开。

我是在兵团认识她的。

你知道,我是六六届的高中毕业生。我从小就喜欢美术。我

们院里有个搞美术的,是五十年代的中央美院学生,是他影响了我。上小学的时候,大跃进那年,他给街道墙壁上画宣传画,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那叫宣传画呢,我看他画的大炼钢铁的画上,钢水奔流,农民种的玉米比山还高,就觉得他真能,天天跟着他跑,给他端水端颜料。上小学中学,他一直教我学画,把他学了的那点东西都教给我了。上高中的时候他和我说:“你去考美院吧,我教不了你啦。”但是文化大革命来了,当了两年红卫兵,就到西北生产建设兵团接受再教育去啦。我们那个农场在河西走廊的西端,叫桥湾农场,编制是兵团一师二团。那是夹在两块戈壁滩中间的一长条草原,疏勒河从那儿流过,沿着疏勒河是一片接一片的原始胡杨林。我们连队紧靠着疏勒河,在一片胡杨林里。

头两年我们干得特别卖力,开荒,平地,修水渠,汗水都流干了。到了第三年就不行啦,原因我说不清,主要是人们觉得接受再教育没个期限,要成为终身“流放”了,“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那儿自古以来就是流放犯人的地方。另外,那些文革前的老知青都二十好几三十岁的人了,还住着地窝子,一月挣二十五元钱。看看他们,想想自己,心就凉了,当然连队就涣散了。涣散起来可不得了,早晨起床号吹了,没人起床出操,连排长挨头挨尾喊。有的人坏,把洗脚盆架在门框上,一推门浇一脑袋水。上班也不排队了,三三两两往地里走,挟着铁锨,活像残兵游勇。到地里也不好干活,扶锨把站着,给铁锨号脉。再有就是知青们开始谈对象了。谈对象就现在的小青年说是正常事,还没工作呢,俩人就蹓马路了。对当年的兵团知青,这可不是正常的,也不是好事。这说明大家对前途有了幻灭感,想着赶快找个对象结婚凑合着过日子,或者是因为精神上的苦闷寻找刺激和安慰;也说明了知青们对于兵团的纪律不当回事了——当时有不成文的规定,知青不许谈对象。谈了?谈了就要挨批评,说他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不能人团入党,重的出了事的要受处分,记大过,开除团籍。

在爱情问题上,我一开始是冷静的。那时好多人有了女朋友——当然大部分是偷偷谈的。我没有。我是这样想的:在那地方能谈对象吗,能安家吗?每月二十五元钱除了吃饭,连裤子都买不起!再说我还要求进步,我是团员,还想入党。我下了决心:不考虑。

但是我的决心受到了考验。

这是因为我有了一间地窝子。是这么回事:兵团农场那时生产搞得不咋样,政治上和部队却一个样。连里每周一次,团里一月一次,搞内务卫生大检查,哪个连队好,就发流动红旗。我呢,有那么一次积极性上来了,挨个儿为每个班的地窝子设计了美化环境加强政治气氛的方案,把全连的政治环境变了个样子,一下子把团里的流动红旗夺来了。连长一高兴就在全连宣布给我一间地窝子,叫我当工作间,并且说我如果能保证我们连的政治环境总拿第一,我就可以需要多少时间就给多少时间,在家画画写字,不用下地干活。当时我高兴极了!这是破天荒的待遇呀,只有连级干部才能这样。到兵团两年多,我一直住集体宿舍大通铺,别说画画,就是那股气味早就叫人腻歪了。

我把这间地窝子布置得简直成了一间很讲究的画室。天窗原先只有洗脸盆大,我一下子就扩大了好几倍,拿石头压上一块塑料薄膜。地窝子里一下子就亮堂了。我找保管要来两块铺板,用木头橛子支起来一块当工作台,另一块睡觉。我还在四壁贴了几幅油画——我自己画的风景。

就是这间地窝子给我招惹了麻烦,我的不交女朋友的决定动摇了。原先在集体宿舍,女孩子们找我画画,都是说完了就走了,第二天再来取。有了这个单间,她们一来就不走了,等着我画,等着我写。等着的时候又不老实,有的说这说那,有的嘻嘻哈哈……时间一长,熟悉了,就把我的心搅乱了。我明显感觉到有两个女孩子对我有那意思;她们那些日子总往我这儿跑,今天说是画张画,

明天叫我写几个字，一来就不走。但是把我的心搅乱了的是另外一个。

这是个瘦长条身材的女孩子。——我身高就可以了，一米七五，她都到我眼睛这儿高，至少也有一米六五。她长得和别人不一样，皮肤白极了，白得跟搽了粉一样，还渗出粉红的颜色来。她的皮肤还特别细，就像是透明一样，一碰就会破的。连里有人说她是菜人。菜人你见过没有，就是一种病态的人，白皮肤，白头发，连眉毛都是白的。其实她不是菜人，菜人的眼睛是蓝色的，蓝得像是镀了一层镍一样发亮：这样的眼睛害怕阳光，在阳光下睁不开，眯着眼睛看东西。她不怕阳光，她的眼睛是黄色的，在太阳下我没见她眯过眼睛。她，黄头发，黄眉毛，就是皮肤像菜人样那么白。

她叫王一眉，天津知青，那年十九岁。

她原先是团卫生队的卫生员。刚到河西那年，我去卫生队看病时见过她，还是个黄毛丫头呢。看见她，我还觉得奇怪：哟，外国人也上山下乡！第二年她就下放到我们连了。下放的原因说是她总和卫生队的医生顶撞。那是一个文革前分配到兵团的大学生，我们去的时候已是代理卫生队长。听说他为了找对象，特地从连队里挑了几个长得漂亮的女知青去卫生队工作，王一眉就是他选去的。她为什么恨他，我就知道了，她只是和我说过：“他特别流氓。”

刚到连队，她的处境是很凄凉的，人们都看不起她。这一方面是她“名声”不好——人们都知道她是叫人家选美人选到卫生队去的，有的人就公开说：谁知她和卫生队长怎么回事……另一方面还因为她是高干子弟。她父亲原先是天津市委副书记，文革一开始就打倒了，进了监狱——真正的监狱，而不是“牛棚”。她的这个家庭背景在当时可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我们连一百七八十号人都是当过红卫兵的。有的人当面就叫她“崽子”。客气的叫她黄毛。最主要看不起她的原因是嫌她废物。你想想，像她那样的家庭，本来

她就是个娇小姐，一身娇气样儿，来到河西，干的又是清闲的卫生员工作，一到连队就要下大田，什么都干，她受得了吗？当时，我们连的女孩子已经干了一年多苦活，练出来了。开荒平地的时候两大筐土掬一起，抬了就走，还跑呢。她呀，抬一筐还龇牙咧嘴，腿软得站不起来。浇水的时候田埂渗水了，她吓得尖叫。浇夜水的时候总是跟在别人后边，一步也不敢离开，说是怕狼。

一年以后，人们对她的看法开始变了。她的肩膀抬得起两筐土了，而且专拣硬活干。

她也学会了像老农工一样使用铁锨。挖大渠的时候，她可以把土甩得又高又远，锨上还不沾土，在任何位置，任何窄小别扭的地方和空间里她能够自如地挥动铁锨挖土、铲土——她使的是左右锨。

她也能一个人浇夜水了，不要伙伴。

那时，农场兴这么一句口号：“晒黑皮肤炼红心，”这是场里针对女孩子们怕丑爱美的资产阶级思想提出来的。好多女孩子刚到河西的时候长得白白净净的，挺秀气，可是过了一年，个个都被河西的太阳晒黑了，脸蛋上有红红的两大块，皮肤也变粗了。为了保护皮肤，她们抹上护肤霜，出工时戴草帽、包上纱巾，就这也不管用，脸还是变黑了。王一眉不是这样，她不抹雪花膏，也不戴草帽，大太阳地里故意晒脸蛋，想改变自己娇气的模样。但是她那皮肤就是怪，夏收——太阳最毒的——日子里，她的脸蛋晒皱了，裂口了，皮肤感染流白水，可是夏收一结束，不几天功夫，脱层皮，脸还是那么白那么细。在那年的夏收总结会上她做自我检查说：“我没有晒黑皮肤炼红心，我还要继续改造世界观……”

就是这个女孩子把我的心搅乱了。

说实在话，原先我是没那意思的。这一方面是我不打算交女朋友，另一方面没和她有多的接触，我没过多地注意过她。如果说比对别的女孩子多看过几眼，或者同别人议论过她，那仅仅是出于

同情,或者是从绘画的角度出发对一个美的形象的观察。后来,虽然我有了一间地窝子,她当了副班长。(她已经在领导眼里改变了自己的形象,连领导也不说她是反革命分子的女儿了,树她为全连“可以教育好子女”的典型,团支部把她列为培养对象了。)副班长是管内务卫生的,我们的接触多了,但也是公事公办,没有个人之间的交往。她还是个性格内向的人,沉静,腼腆,不善交际。她找我画画写字,都是和班长或者其他的女孩子一起来的,来了也不多说话,不咋咋呼呼,不乱翻乱动。她总是安静地站在旁边看我画画、写字,我画好写完了,就拿着走了。有时她帮我扫扫地,看见别人把书画弄乱了,就整理一下,归置整齐,或者对有些爱吵吵的女孩子说:“声音小点,把房顶吵翻啦!”这,我都认为是她的喜安静、爱清洁的性格使然,我从没多想过什么。

但是那年五一前夕,团里又要搞卫生大检查了,我仔细观察了她们班的宿舍,决定写一条“扎根河西,开发河西,建设河西”的大标语贴在她们大通铺后边的土壁上。那次写的字很大,我是用直尺、铅笔写在纸的背面上,四开纸一个字。看见我那么快速地在纸背上写字,她惊奇地叫了一声:

“啊呀,你是反着写呀!”

“啊。怎么啦?”我看她一眼。这是她第一次在我的房子里大声说话。

“你真行呀!”她还是那么大声地赞叹。

“这有什么?”我听了很高兴,“这样写,你们剪下来正面就没有铅笔印儿,干净,好看。”

“我哥哥写字,都是写在正面,写在报纸上,再用大头针别在纸上剪下来。”

“你哥哥是干什么的?”

“出版社,搞美术的。”

“那不太笨了吗?”我笑着说。

“是太笨了……”她不好意思地笑了，脸红红的，并且用手掩了一下嘴。

就是她的不好意思、她的红脸、她当时的神情模样，那种窘态，那一掩嘴的动作，那羞赧的笑，一下子震动了我的心：太美了，美得惊人……

紧接着——过了不几天，又有一次，那是个星期天，她又到我房间来了。我记不清了，她是为什么来的，只记得是她一个人。在她进来之前，我因为正在画一幅油画，把书呀资料呀都翻出来了，摆得桌子、床上都是。她一进来，看我正在作画，就什么也没说，站在旁边看，过了一会，又收拾起我床上的东西。

“还用吗，这些？”她把床上的书画收起来，准备放进我的箱子里，问我。

“不用啦。”我说。在她收拾东西的时候，我坐在油画箱后边的马扎上看着她。美，是真美！她已经不是两年前的黄毛丫头了，长高了。她的腰腿也是年轻人的了，腰细，腿壮，胸脯也鼓起来了……

“你看什么呀！”

突然她问了一声。我这才发现她已经收拾完床上的东西，站在床前看我呢，脸上显出惊异的表情。我的脸腾地红了。

“没，没什么……”我不知说什么好，忙着遮掩窘相，“你看我……这儿，是……太脏啦，弄得这么乱，总叫你来收拾……”

“没关系，这没关系。”她脸上的神情变得正常了，声音也平静了，“你画你的画吧，弄乱了，我替你收拾。”

“真不好……意思。”

“这有什么。我哥哥也是这样，一画画，就把房间弄得又脏又乱，把衣服、床单都弄上颜色。我给你洗洗床单吧。”

“不，不不。我自己……”我急忙说，脸更红了。我哪能叫她洗床单呢！我们连队刚来的时候是提倡学雷锋做好事，女孩子帮男

孩子洗衣裳、被褥，男孩子帮女孩子修房子、上房泥，可是到了这一年，已经不兴这个了；有洗衣裳的，也是那些确定了恋爱关系而又胆大包天的男女，她们不顾忌别人的议论，也不管连里的批评，厚着脸皮在河边洗衣服，女的洗，男的淘。

但是，她很快撤下了床单，和几件堆在床上的脏衣裳卷在一起。我站起来拦她，她却一闪身跑出去了。出了地窝子，当她噤噤噤地踩着台阶跑上地面的时候回过头来笑了一下，声音又清脆又响亮：

“你就画你的画吧……”

接着，我就听见了她绕着地窝子跑过时踩出的咚咚的脚步声。

我的心乱了，真正的乱了。是的，我下过决心，不交女朋友，不谈情说爱。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不想交女朋友，不愿意有个女朋友。你没在兵团待过，你不知道，——你在农村插队，一个村子里就那么几个知青，住得又分散，有那么一两个女孩子，也可能不动心。在兵团里，一连一百几十人，一半是女孩子，十八九、二十岁，一个个正是青春焕发，含苞欲放的模样，不由你不动心呀。夏季里在河边上，树林里看到一对一对的男女散步幽会，我也是很羡慕的，我也曾幻想过：将来我也要有一位漂亮的女朋友……

那天，那个上午，当那个黄头发的女孩子把我的床单抱走之后，我心中的堤坝一下子就崩溃了！

不过，我不敢轻举妄动。我不太清楚，这个黄头发的女孩子为我收拾房子洗床单，到底是出于同志式的关心和帮助呢，还是真正对我有意思了？

我不敢贸然从事还有另一个原因：有一个老兵看上过她，差一点弄得把党票给丢了。说是老兵，实际上比我就大两岁——二十五岁，是六七年的复员兵。我们到河西的时候他刚复员来到兵团一年，是个党员，我们的排长。上一眉下放我们连之后，他不知怎么就看上了。起先，连里谁都不知道这事，他曾经给王一眉写过

信,把信装在封中药丸子的小蜡丸里,假装是给王一眉送药,把信给了王一眉。王一眉没搭理他,他以为王一眉同意了,就三番五次地找王一眉,说是要培养王一眉入党。后来,王一眉被他缠得没办法,就报告了连长。连长一气之下把他的排长给撤了,并且在全连点名批评了他,一下子把他给弄臭了。我们连长是甘肃人,也是个复员兵,真正的老兵,讲一口甘肃话。他是这样讲的:“人家还是个女娃子嘛,你骚球情个啥哩!什么入党不入党,党是你们家的?你们家开的店?你小心一些,看在你是个老兵的脸上,这一次先记下,下次再要是拿党蒙骗人,小心我把你的党员抹了。”

说实在的,我怕她把我汇报到连里,把我的团员抹了。

但是,我已经动心了,被她迷住了,心里的那股火就怎么也压不住了。那天她抱着床单跑了以后,我想来想去,决定先试一试。

试一试的办法也被我想出来了:请她吃东西。想起来好笑,我当时怎么想出那么个主意来,简直是小孩子的勾当!我是从那些恋人们那儿受启发想出来的。兵团当时的生活很艰苦,本来打的粮食就不多,一下子从城市来了几万知青,粮食更不够吃了,每年有几个月粮食是兵团、师部的领导凭着老关系、老面子从新疆兵团要来的人家的仓库底子:玉米面、高粱米,还有青棵。有时候,我们一连三个月吃玉米面:玉米面窝头、玉米面糊糊。我们叫“二黄”。有时候又连着吃两个月高粱米:高粱米干饭,高粱米粥。我们叫“一对红”。吃菜就更别提了。都是知青,谁会种菜呀!长了两年的韭菜比芨芨草叶子细得多,炒着吃不够,只能喝汤。有人编了几句词配上《步步高》的曲谱这样唱:“青棵面窝窝头芨芨草汤,一天呀两顿饿得发慌;坎土曼和铁锨天天开荒,干着活脊背上冷汗直淌。”我们连有几对大胆的恋人为了改善伙食,常常从小卖部买来挂面,下班回来就在地窝子门口用石头支起饭盒,点着芨芨草煮挂面汤吃。我当时想,我也请她吃东西,看她吃不吃,吃了,就说明她是有那意思的。

当然,我不敢在门口大鸣大放地弄饭吃,也不愿意煮挂面汤给她喝——那太寒碜了!我跑了一趟小卖部,买了两瓶大肉罐头、两斤点心,还有几包香烟——这是我抽的。买回来之后我就把它们摆在“桌子”上,等她来送床单。

她来啦。快到吃晚饭的时候,我听见咚咚的脚步声从头顶响过,响下台阶来了。

“有人吗?”门口传来她的声音。

“进,请进!”我急急地说。

“床单洗好了。”她进门后朝我笑了笑,往床前走去,“铺上吧。”

“我自己铺。谢谢,谢谢!”

我赶紧走过去。可能是我说话的声调和往常不一样吧,她看我一眼,笑了一下:

“谢什么呀!”

我没说话,脸发烧,笨手笨脚和她一起铺床单。铺完了,我说:“请坐,请坐。”

她又看我一眼:“不啦。该去吃饭啦。”

我急忙说:“坐,坐……会儿……”

“你有事吗?”她脸上显出惊讶的神情。

“没,没事……”我自觉脸红了,说话很吃力,“就在这儿……吃……”

这时她看见桌子上的食品啦,急急地说:“不,不。我走啦。”

说着,她就往门口走。我呢,觉得计划就要破产了,一着急,就跑门口堵住了她:

“吃点,吃点嘛……”

“不吃不吃,我不饿……”她有点脸红。

“吃点,吃点……”看她脸红,我更不知怎么办好,一着急就把心里话说出来了,“这……我就是给你买的。”

她的脸刷地红透了：“为我……”

“啊，就是……”

“我不吃，不吃，不饿呀……”

她真是不吃，就是要走。我也是没法子可想，就做出生气的样子说：

“好，你走，你走……以后再也别来，也别为我洗东西啦！”

她一怔。

“就许你帮我干活，我请你吃点东西都不行！这东西是有毒怎么的，怕把你毒死啦！”

“我……”她犹豫着犹豫着，后来就走到“桌子”跟前，“好，我吃……”

她拿起一块点心。

“对，吃，吃……”我高兴了，也走过来，看着她吃，并且把罐头推到她跟前，“吃……罐头……”

但是，她突然转身跑了。我追到门口，她已经跑上台阶去了；我追上台阶，她已经绕过地窝子去了。我想喊她，但操场上有人。我眼睁睁地看着她跑过操场，跑到他们班地窝子前边，跑下台阶去了。

完了，折腾了大半天，精心设计的试验结束了，我根本就无法判断她是什么心思，而且我还怕自己的举动失当，会引起她的什么想法，再也不来我这儿了，或者把这事传出去。

没传出去。好几天，没人谈论过此事，连里很平静。又过了几天，她和几个女孩子又到我的房子来了，叫我给她们班的大批判专栏画报头。画报头的时候，她还是像以前那样认真地看着，像是什么事也没有过。

行，有意思，有意思！我的心受到了鼓舞，我迫不及待了，我瞅准时机……那是有一天中午，和她一起来的女伴都走出去了，只剩下她在看我画画。从天窗射进来的阳光把地窝子照得很亮，我捏

着画笔说了一声，像是很随便：

“小王，有件事和你说一下……”

“什么事呀？”她看着画没抬头。

“咱交个朋友吧。”

“咱们不早就是朋友啦？”

她抬起头来看我，像是很惊奇。我可是没想到她会这样回答，再也装不出随便的样子了，磕磕巴巴地说：

“嗯，是是……朋友了……可是，我是说不是……这样的朋友，我是说……那样的……朋友，更深……一层的……”

我的心停止跳动了。我就盯着画笔，等着，等着她的回答。可是她久久也没说话。后来，我实在沉不住气了，抬起头来。就在我抬起头的一瞬间，我看见了她的眼睛里含着泪水，脸涨得红红的，哇地一声哭了：

“你才是这么个……人呀！”

又是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我傻了，一句话说不出来。

“我没想过那事嘛，我没想过那事嘛……”她讷讷地说，接着就跑出去了。

天一下子暗了许多，像是黄昏了。我长那么大，向女孩子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第一次，结局就是这样。太惨啦！惨得叫我心痛！——我说的不是她不同意，我说的是她拒绝的方式。不行就不行呗，说什么“你才是这么个人？”这不啻是侮辱我，说我是个卑鄙下流的人。那天，她走了之后，我坐在板凳上，好久没动静。我动不了呀，她的话太难听，就像一个有力气的人一拳头捣在我的心窝上。我一连三天没出门。我羞于出门，我怕见着她，也怕见到别人，我觉得自己太狼狈了，那事像是被全连的人知道了，全世界都知道了，人人都在议论我，骂我：“才是这么个人！”……于是，我又一次下决定，再也不交女朋友了。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我躲着她……就像是做了贼一样。去食堂买饭，如果看见她从迎面过来，我

就赶紧拐进树丛里去,或者钻进哪个地窝子。如果她在我前边走,我就停一下,等她走远了再走。如果我走着路听见身后传来她的声音,我就猛走快走,直到听不见她的说话的声音……

不过,爱情这东西够折磨人的。最初的失败的痛苦过去之后,却是更加强烈的思念。我说不想她了,心却越是想她;越是怕看见她,就越是想看见她。我在房子里待着的时候,或者在劳动之余休息一会儿,眼前就总是出现她的影子,她的黄黄的齐到下巴颏上的头发,剪得齐齐的,又亮又光滑。苦闷中跑到草滩上去散散心,想解脱解脱,却总是看见满头黄发的女孩子从草丛里、树林里向我走来,但总也走不到跟前。

那些日子我真是痛苦极了。她不来我的地窝子啦。我就觉得生活没意思了。我不出去写生了;地窝子又脏又乱,我也不收拾;头发长得可以扎小辫了,我也不理。就是连长交给我的工作我也没心思下了,谁来找我画画写字,我说先放那儿吧,要是催得紧了,我就把他撵出去……当然,时间一长就出问题了。由于我不画不写了,不管各班的内务布置、政治环境了,过了两个月,我们连的流动红旗就被另一个连队夺走了。竞争可厉害啦,别的连队也是想着法子变着花样地搞政治环境呀!为此,连长大发雷霆,批评我,训我,我呢又蛮不讲理,和他顶,和他吵。一气之下,连长就把我撵回班里去了,天天下地干活,画室也没了。

回班是件坏事,我再也不能待在家里画画了,又得睡十几个人的通铺了。可是,在爱情上却是时来运转吉星高照喽……

那是国庆节的一天,全连放假,我们班的人都跑到场部去玩了,我因为有点不舒服——头两天感冒——吃了饭又躺铺上睡觉。中午的时候,有人敲门。起先,我没理会。我们那个门关不严实,我用锨把顶住了,要是答应,就得去开一次门。我懒得动。

但是敲门人很顽固,非进来不可的样子,使劲儿敲门,没法了,我问了一声:“谁呀?”

那人却不说话，还推。我火了，喊一声：“你他妈不会使劲推?!”

门板吱吱响了一下，顶着的锨把倒下了，接着就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为什么不开门?”

是她！我的心猛地一跳，用被子蒙住头。

“听说你病啦!”

我还是没说话，屏住呼吸想：她来干什么?

“哟，还生我的气呀……”

我听见像是笑了一下，她走近了，把什么东西放在头顶上，接着又是纸张的窸窣窸窣声。我还没明白过来她是来干什么的，她在干什么，被头就被拉开了。我先看见的是她的手，手的后边是罐头、点心包，还有几盒烟卷。我的心一震。

“好点了吗?”

我把头扭了一下。我看见她的另一只手拿起了一块点心。

“吃块点心吧……”她的拿着点心的手伸在我脸前，“昨天买的，人多，不好来看你。”

我抬头看了看她的脸，红红的。我再也绷不住劲儿啦，心里一阵酸楚，一股热乎乎的东西涌上喉咙，泪水就出来了。我掀开被子坐起，看着她。

她看见我的眼泪啦，拿着点心的手抖了起来，脸红得要裂开的样子：“吃吧，吃吧，吃完了洗床单去。看你这床单脏得像什么……”

“你是说……”我磕巴着说。

“咱一块儿去……”她侧过脸去。

打从到了河西，我没有像那天那样快乐过。吃过点心，我们就抱着床单、衣裳和洗脸盆去河边了——当然，我们没往大家洗衣服的地方去，我们选了一处很隐蔽的、长满了胡杨树的河湾，谁也看不见我们。

十月的河西走廊,草原已经快要干枯啦,胡杨树叶子黄了,很多都脱落了。但是,我的心上是一片春天的百花盛开的原野。我先跑进河里去,叫冰凉的河水冲净了头发,然后就和她一起洗床单,洗衣裳——她洗我淘。她洗衣裳的动作又好看又协调,漂亮极了。她的脸红扑扑地仰着,看着我,她的白白的、长长的胳膊伸出去,粉红色的手指头在床单上一搓一搓的,床单上就生出许多泡沫来。泡沫越来越大,在阳光下闪着五颜六色的光。泡沫越来越多,多得盆里装不下了,溢出来了,溢进疏勒河里了,顺着河边漂呀漂呀漂远了……呀,晴朗的河西走廊上的太阳照耀着疏勒河,照耀着胡杨林,照耀着她和我。

以后的日子,那是没说的啦,我们沉浸在热恋中。

我们每周约会两次。说实在的,就我们本意来说恨不得天天出去幽会,但是不行,我们得保密,我们怕天天约会被人发现,要是发现了,人们还不知要怎么议论,领导还不定怎么批评我们,我们会抬不起头来。我们约会的地点选在北戈壁上,我们更愿意在河边上幽会,或者在附近的胡杨林里,那更富有诗情画意,但是也容易被人发现。而戈壁滩的方向正好和去河边的方向相反,要经过麦场,走过一片麦田,还要穿过一片又大又多的黄土堆,那里很少有人去玩。

星期六下午收工早,晚上不学习,吃了晚饭太阳还挺高的,我就背了油画箱装成是出去写生,先到戈壁滩去。她呢,等到天黑下来,借着夜色的掩护,躲开女友们的眼睛,再去。

我们的爱情是纯洁高尚的。我们天天盼望着星期六的到来,盼着幽会的时刻,但是到了一起的时候我们又都非常规矩。我们总是面对面地坐着或者并排坐着,或者在戈壁滩上不停地走着。不管是坐着还是走着,我们没拉过手,更没有拥抱过,说实在的,我们鄙视那些谈了两天半就搂啊抱啊的男女,太庸俗了! 我们就是

说话,说连里发生的事,说班里发生的事,没有话说的时候就静静地坐着或站着,互相看着。到了深夜就回连去。星期天也是这样。星期天和星期六不一样的就是星期天白天约会,约会时不能光说话,还要画画。要是光说话不画画她不干,她催我画。你们不是说我的戈壁滩画得好,有深度厚度,有哲理感。那深度,那哲理感,就是那时孕育的。平心而论,就是她在我心里激发起来的。上中学的时候我有过这样的想法:将来要成为一名风景画家——我特别喜欢风景画。但是到河西画了几天风景之后就泄气了。你知道的,那时候美术界尽是什么呀:《妇女擎起半边天》、《不爱红装爱武装》……说实在的,这些我真不感兴趣。姑娘们是长得像黑铁塔吗?是那么好打仗吗?要真是那样,还有美感吗,还值得人们去爱吗?是她重新激发起了我对大自然的兴趣。有一天,我画一幅戈壁滩的写生,我画半截就停了,想和她说说说话,她呢,却不和我说话,催我把画画完。她问我看过一部叫《贝加尔湖风光》的电影没有。

“看过。”我说那是一部苏联风光片。

“还记得电影里有一个画家画贝加尔湖风光吗?”她又问。

我说记得,那是苏联的著名风景画大师。

“你就不能跟他那样?”她问我。

“跟他那样?”我告诉他,那个画家是专画贝加尔湖风光的:贝加尔湖风平浪静的湖面,风起云涌的景况;贝加尔湖的天空——晴朗的天空,乌云密布的天空;贝加尔湖的森林——春天的、夏天的森林,秋天的树叶黄了的森林,冬季的白雪皑皑的森林……他就是画贝加尔湖成了风景画大师的,可是让我像他那样,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她说:“你就不能画出早晨、中午、黄昏的戈壁滩吗?不能画四季的戈壁吗?还有草原、胡杨林、疏勒河……”

她的话震动了我的心。是呀,我就不能专画戈壁滩吗?!不能成为一名专画戈壁滩的画家吗?! 她的话多有理呀。但那是苏联

呀,当时的中国要的是阶级斗争呀。

看我有些气馁,她又说:“你就不能想得远点吗?! 风景画现在不时兴,以后呢? 偷着画总比不画强吧。你知道我为什么和你好吗?”

“为什么?”

“我是看你不和别人一样,有追求!”

我的心就像是被祁连山的雪水重新洗过了,又放在火上烧过了……从那天起我认真地画戈壁滩了。她是不懂美术的,也不会画,可是她对于生活和大自然的感受却令人吃惊,对于作品的最初的直感叫我钦佩。在那些日子里我画了好多戈壁的写生,早晨的戈壁,正午的戈壁,黄昏的戈壁,但她总是挑剔、批评我,说我画出的只是表面的光线和色彩,干干巴巴没味道,不美。我不服气,问她:“你说戈壁滩有什么美?”她当然说不上来,但是她凭着感受跟我说:“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体会,当你最痛苦最苦恼的时候,为一件什么事发愁的时候,来到戈壁滩上,看着面前的空旷和辽阔,就会把一切都忘了?——什么痛苦呀忧愁呀都忘了! 觉得一种恬静、伟大、崇高的东西从心上升起……而当你因为一件什么称心如意、兴高采烈的事站在戈壁滩上,你又会觉得自己十分渺小、可怜,心里惆怅,想哭一场……”

“是的。”我冷静地说,其实心里很激动,“我有过这样的時候,你那次拒绝我……”

“对呀!”她高兴地说,脸有点红,“你说说,这是什么道理? 是不是戈壁滩有一种什么内在的东西——一种力量,一种神奇的因素……”

我同意她说的,完全同意。她又问:“从你的画上怎么感觉不到这些?”

我羞愧极了! 看着她的直视着我的黄黄的眼睛,她的白皙的面孔,好半天我也说不出话来。是的,戈壁滩是深远、博大、富有内

涵,而我的画仅仅是一片颜料的堆积,一些残破的碎片……那一天,我毁掉了自己所有的画稿,把它们撕成碎片,再重新画起。我暗暗地发誓:画一辈子戈壁,一定要画好戈壁,画出她的自然的伟大的美,内在的美。而且当我重新拿起画笔的时候我的手一阵阵地颤抖,心一阵阵地哆嗦,我觉得我一定能画出这些来,能成为一名戈壁滩的歌手,大自然的歌手。因为我的心扉突然打开了,心机开窍了:心里充满了一阵阵浪涌般的狂喜,一种复杂而美妙的骚动。这骚动似乎在告诉我,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绘画的道路和将要形成的风格,成功的道路,独特的风格。

也真是奇怪,我们幽会的那块戈壁,以前我就只看见它的大——从我们脚下伸展开去,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北方的马鬃山脉,它黑沉沉的,单调、冷漠、沉闷,顷刻之间竟然变得亲切、美丽和生机勃勃,展现出一个无比丰富、复杂和变化多端的大千世界。戈壁滩上那到处都有的稀稀落落的被太阳晒黑了的石子,越远越密,越远越深沉,到了看不透的地方成了黑色的一片,显示着严峻;但是某一片地方,红色的石子多,显出赤红、血红,又使人觉得壮丽;还有那白色的石子组成的戈壁便是纯洁和高尚。戈壁滩上长着一墩一墩的碱蓬,灰蒙蒙的,干枯稀落,但是到了明年,一场春雨,它们便会把戈壁染上绿色。远处,太阳要落下去的地方蹿出了几苗细细矮矮的东西,它们旋转着移动着,越来越近,越来越高,那是戈壁滩上的旋风柱,生长着,又毁灭着。天空无限深远,蓝幽幽冷嗖嗖的,但是飘过几朵白云又是那样洁白和柔软。早晨的戈壁是玫瑰色的,玫瑰色的阳光织出了玫瑰色的梦;中午的戈壁是蓝色的,那像波浪一样闪烁奔流的蜃气像宽阔的海洋,像姑娘们飘飞的头发,像蓝色的裙裾;傍晚的戈壁是橘红色的、金黄色的,紫色的,如同男子汉的庄严、宏伟、刚强的胸膛和理想……你看见过戈壁和草原交界处峻峭的土堆群吗?那不是泰坦神们战斗中抛下来的石块,那是风的杰作。风把松软的沙土刮跑了,便留下坚硬如铁的土

台子,它又刻呀刻呀,把土台子雕成千奇百怪的艺术品:大的是城堡、塔楼,小的是房屋、巨兽。上台子之间是深深的壕沟,像是干枯了的河道纵横交错,刚来河西的时候,我到了这里就感到恐怖,认为是到了一个死亡的星球。但是现在,我另有一番感受:大自然的永恒和变化、原始和美活生生地展现在这里。

我画呀画呀,一天一天,一幅画又一幅画,我的绘画技巧一天天成熟,艺术风格日趋形成。我的胸中时不时地涌起无以言状的喜悦浪潮。这喜悦不光来自我对于大自然的感受,那原始的、自然的、质朴的和永恒的美,还来自我身旁那个黄头发白皮肤的姑娘。我作画的时候她就一直坐在那里,静静地看着画,看着我。她说我一定能成为一个风景画大师。戈壁的美,她的美,都使我的心战栗不止。

快两个月的某一天,我摸了她的手。你能记得什么时候第一次摸了摸女朋友的手吗?我记得。因为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开端,一个里程碑,刻在我的记忆里。

那是个星期六的夜晚,是冬天啦,我记得十一月中旬的冬灌已经结束了,麦田里光秃秃的,结着一层白冰。那天晚上我们又幽会了。不记得什么原因,我那天没穿棉袄,到了戈壁滩就冷得不行,等到夜幕降临她也来到的时候,我已经快冻僵了。我说:“咱们走吧。”

“怎么啦?”她走得气喘喘的。

“坐着冷。”

“你没穿棉袄呀!给,穿我的。”

“不穿。”

“怎么啦?我不冷,我身上暖和……”

说着她就要脱棉袄,我坚决说不要。那成什么话,我一个男子汉穿棉袄,让女朋友冻着。

“那就走吧。”她看我往一边躲,就说。

我们在戈壁滩上走着,说话。可是那天晚上总也说不起来,总是她说话,我听着。我是冷得不行说话才少的。她感觉到了,站住说:“我给你焐焐。”

“怎么焐?”我站住,吃惊地看着她。你说我想起什么啦?我想起电影和文学作品里描写的一个把另一个搂在怀里取暖的事啦。她是不是要这样给我焐焐?要是这样,她可真够大方的了,也太妙了。说实在的,我们相好也快两个月了,幽会过几十次了,我们在一起坐着和走走的时候挨挨胳膊蹭蹭袖子的次数都极少;我也正希望能亲密一些。

她说:“把你的手给我。”

我以为她要把我的手放进怀里焐焐,这也不错呀。我把手伸出来。

可是她仅仅捏住我的手,缩了缩,将我的手拖进她的大棉袄的袖筒里。

“暖和吗?”她捏了一会儿,问。

“暖和。”我说的是真话。尽管她给我焐手的方式不如我想的好,我还是很高兴。毕竟我是摸着她的手啦,比以前只是互相看着进一大步了。再说,她的手还真热——不知是因为手握着手紧张呢还是真暖和,她的手心有汗,湿湿的。我感觉到一股热乎乎的东西从她的手传到我的身上,心里热乎乎的。

“还冷吗?”

“不冷。你手心有汗。”我说。

“是吗?”

“嗯。潮潮的。。”

“我说我暖和,你还不信,给你棉袄吧。”

“不要不要。”

“给你给你!”不管我怎么说,她还是把棉袄脱下来了,硬是披在我身上。我要再还给她,她捏住了我的手。

我不动了。我怕再折腾她就不握我的手了。我真希望多捏一会儿,希望就这样捏着站着,让时间无限延长,就停在这个时刻。

但是我自己破坏了这美好的时刻。

我们第一次站得这样靠近,她的眼睛看着我,我的眼睛看着她,我感觉到她嘴里喷出的气息轻轻地吹到我的脖子里。我怕她冷,我把手伸开来捏住了她的手,她的细细的手指在我的手心里颤抖了一下,又慢慢地抽出去,捏住了我的手。这亲切的气息,这缠绵的情景鼓动了我的心,我竟然有一种坏念头从心里生出:想吻一下她。

我又不好意思。还怕她生气,怕她说我“才是这么个人”。

我的心禁不住哆嗦了。

“你怎么啦,冷吗?”她捏了一下我的手。

我不知怎么回答好,只是含混地嗯了一声。

“那就回吧。”她又捏一下。

“不不。不冷……”我急忙说。

“都哆嗦了。”

“那不是……不是冷……”

“那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又捏住她的手了,捏得紧紧的,我怕她抽回手去。我想吻她的念头是那么强烈,我真想多捏一会儿她的手,鼓起勇气来……

但是我始终没鼓起勇气来。又站了一会儿,我的身体哆嗦得更厉害了,简直是嗦嗦发抖了。我还怕她看出我的坏心来,也不敢看她了。

“回去吧!”她突然说,猛地抽回手去。

她是觉出我心怀叵测了吗?我不敢再坚持站着了。唉,那天晚上回到宿舍,我久久不能入睡,既为握了她的手而激动,又为自己的胆小羞赧而丧气。想了好久,我决定:明天一定要吻她——就

光明正大地跟她说，我要吻一下。

事情都是想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第二天在戈壁滩写生，我好多次停了笔看她，就是说不出那话来。说不出当然就吻不成，吻不成呢又越是想吻，结果就心慌意乱，一张写生没画出来，和她说话也糊里八涂，答非所问。

“怎么啦？你今天是怎么啦？”她问。

“怎么啦？我怎么啦？”

“你总看我。”

“我哪儿看你啦？”

“不对。你是有什么事吧？”

“我……没，没。”我矢口否认，脸腾地红了。她呢，看着我慌乱的样子笑了一下，脸也红了。这时候太阳斜得很厉害了。她静默一会儿说：

“回吧，该吃饭了。”

我跟在她后边走。我的情绪低落极了，已经不能拿“丧气”二字来形容了，我背着油画箱，落后好大一截，简直是半死不活的样子。我心里暗暗地骂着自己：还是个男子汉吗，简直是个窝囊废！我也特别惋惜：宝贵的一天过去了，要到下星期六……想到要过一个星期才能再幽会，我的心里真不是滋味。后来，不知怎的我就叫了一声：

“一眉！”

“啊。”她回头看我一眼。

“你等等。”

“什么事？”她站住了。

我没说话。这时候已经走到一条大灌渠跟前了，过了灌渠是一片麦场。每次幽会完了我们都是在这里分手再绕道回连的。我快速追上她，站在她跟前。

“干什么呀？”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我。

“有……点事……”

“你说呀！”

“我……我想……”我想跟她说，我要吻一下，但是我说不出来，嗓子干得厉害。我稍停了一下，就突然地往前倾一下身子，把嘴在她的前额上挨了一下。

她先是怔了一下，身体一动不动。接着就短促地叫了一声：“你！”转身快走。

我也怔了一下，没想到她会这样。然后就带着犯了罪的心理追上去。我把事情弄糟了！

“一眉，等等，你等等……我有话跟你说……”我追上她了，我看见她脸涨得红红的，我想缠住她，叫她停下。如果她停下，一切都好说，我将向她道歉，解释，请她原谅……

但是她一刻也没停，连看也没看我一眼，加快速度奔跑一般往前走去。我想说什么也晚了：她已经走上大灌渠的渠堤上了，当我追上渠堤的时候，她已经下了麦场。麦场的那一头有个人——像是放牧员——正驱赶牲口归栏。

我眼睁睁看着她跑过麦场去了，当她的身体要被几棵胡杨树淹没的时候，她像是停了一下，朝这边看了一眼，然后她就消失在树丛里。

我在大渠上坐了好久，才郁郁地回到连队。这天的晚饭吃完了，我还不知道吃的什么；吃完了饭我就一个人在房顶上——只比地面高出半人——坐着，直到深夜。懊悔、不安和忧虑咬噬着我的心。我这是干的什么事呀，挨那么一下有什么意思呀！——说实话，我的嘴唇什么也没感觉到，就是冰凉。我为什么不先说一声征得她同意呢？要是同意，她就不会恼了。我进而又想：她是真正生气了呢，还是出于少女的羞赧而恼我？她是嫌我太粗鲁呢，还是认为我是个坏蛋呢？她是一时的恼怒呢还是今后再也不理我了？我猜呀想呀，但总也得不出结论，惟一清楚的一点就是：我把事情弄

糟了！她是个很正派的女孩子，她可能不知道谈对象是可以接吻的，她可能认为只有坏蛋、流氓才接吻……这样一想，我觉得事情严重了，必须尽快地向她做出解释，求得谅解，并保证今后不再重犯。事不宜迟，明天，明天就办。——等到下星期六，六天，时间太长，我受不了这熬煎；再说，时间一长，她对我的坏印象会不会加深，会不会真的做出什么断然决定……

星期一没找到机会。这些天我们干活是在离连队很远的一块条田挖排碱渠。河西的土地因气候干燥，降雨量小，蒸发量大，地面的土壤含有大量盐碱。我们开垦荒地必须挖出又深又宽的排碱渠，从灌渠流进地里的水溶化了盐碱渗到排碱渠，再流到远处的碱洼去，这地才能种粮食。这天干活的时候，我借着喝水的功夫两次走过她们班的地段，想找机会告诉她：今晚到戈壁滩去。但是她看也不看我，脸板得平平的，一点表情也没有。中间休息，我守在刚送来的开水桶旁，也没等着她。我远远看见她喝别人端回去的水，她们一伙女孩子挤在挖了半截的土坑里说呀笑呀，像是很热闹。下班回到连里，我在去食堂的路上等着，她过来了，却是和几个女孩子说着话，我又没敢搭话，她也没停一下。

星期二也是这样。星期三差不多有机会了……早晨，我在门口看着她端了饭食去食堂，我就追。到食堂门口我追上她了，叫了一声，她听见了，扭头看我一眼，急急地进了食堂。打饭的时候，我看了她几眼，她一眼也没看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打了饭就和女孩子们说着话走了。不安和忧虑日渐增大，我的心像是掉进万丈深渊，一个劲地下跌，但总也到不了底部。星期四早晨扛着铁锨下地的时候我暗暗下定了决心：今天一定要想法子和她说话。如果她再不理我，我就从干活的地方叫她出来。我也不怕人们知道我们的秘密了，不怕人们议论了，行就行，不行就拉倒，这样的熬煎我受不了啦！

上工的路上我就注意她，寻找她，但是没看见她的身影。上工

的队伍弯弯曲曲地穿过草滩上的小路,走过一道道的渠堤,我也没见着她。她没来上班吗?为了证实这一点,我跑到她们班去一趟,我说是自己没有带铁锹,跟她们借一把使使。女孩子们嘻嘻哈哈地取笑我,说我“年三十借笼屉”,有一个还大声问我:“没拿铁锹你跑工地干什么?游山玩水吗?”取笑就取笑吧,反正我清楚了:她没来上班,全班就差她一个。

弄清楚这些,我的心禁不住突突地跳起来。剩下的事情就是想个法子回连去,而这又是再好办不过的事了:我们班头一天挖渠的地方还留下一段没完成,那儿经过一个寒冷的夜晚已经冻得邦硬,我要求去挖那儿;挖的时候我故意使劲撬土,撬折了锹把,还撬断了两个镐把;然后我就说修理工具跑回连去。

我真是太心急了。没回班里的宿舍,我就直接跑到她们班去了;把锹头、镐头往地上一扔,我就跑下台阶,敲响了门板。听见了她的声音我就迫不及待地推开了门。

一进去我就傻了!

房里是两个人。她倚着被子半躺在铺上,旁边是连队的卫生员,正举着针管,像是在排净针管里的空气。

“干什么,你……”卫生员瞪着眼睛吼我。

“我……敲门了……”我真不知怎么说好,真是活见鬼啦!

“出去出去!”

卫生员又吼。其实我已经跳出门外去了。真是狼狈极了。我再也不敢瞎闯了,回到宿舍,我等了半个小时,又跑到卫生室去侦察一下卫生员回来没有——我装成看病在卫生室待了五分钟,在试体温的时间里巧妙地向她解释,说我是找她要药才闯进去的。我认为卫生员已经相信我的鬼话了,这才奔她们班的宿舍去。这次我非常谨慎,敲了门,并且问了声“有人吗?”

立即就传来她的声音:“进来。”

这次房子里没别人,就她坐在大通铺沿上。我一进去,她蹭地

站了起来。看起来她是准备了一番的,被子叠起来了,地下还洒了点水,湿润润的。只是她的脸色太严肃,口气也硬:

“你来干什么?”她瞪着我。

“来看看,你……病了?”我嗫嗫嚅嚅说。上次的过失加上今天的莽撞,我惟恐大难临头。

“你知道我病了?”

“听说,在工地……”

“你问她们啦?”

“没……没……”我急忙解释,是我在工地没看见她,不放心,回来看看。

“你真是!也不问一声就闯……”

她的口气还是那样严厉,眼睛瞪着我。可是我的心一阵轻松,听得出来,她主要是生气刚才的事。我问她:“病得厉害吗?”

“没事。有点发烧。你坐下呀……”她说。

“今天才发烧的?”

“好几天啦。”

“那天冻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的,那天回来,就……”她的脸色有点发红。

“是冻着了……我去买点吃的……”

“别!”

“怎么啦?”

“买了……我也不吃!”她扭过头去。

“为什么?”

她不吭声。

“你是生我的气?”

还是不吭声。

“是吧,你还生我的气吗?”我一边说一边看她的脸色。她的侧着的脸红红的。我又说:“那天……是我不好,惹你生气啦。”

“你为什么那样？”她没看我。

我没法回答。

“你说一声呀！不说，就那样……”

“我怕你……不……愿意……”

“不说就……我才不愿意！”她看我一眼，又扭过头去。

我的心整个儿放松啦，原来如此。我说：“还生我的气吗？”

“我哪儿生气啦？”

“不理我就跑了，叫都叫不应。”

“叫你吓的。”

“我怎么吓你啦？”

“我哪儿经过……那样的……事？”

“总得有个……开头。”我大着胆子说。

“叫人看见呢？都到麦场啦。”

“看见就看见。”我胆子更大了。

“那不叫人说？”

“说什么？”

“说……”她又看我一眼，“不好呗。”

“有什么不好的？谁不那样？”

“都……那样？你知道那样？”

“王副排长和李秀英就在小树林亲嘴！”

“那人们不说他流氓？”她的脸又红啦。

“亲嘴就是流氓啦？”

“还不是呀？好人哪有那样的？”

“好人也亲嘴。电影上有，书上也有。”

“书上还写这个？”

“嗯，好多书都写……”哎呀，这个初中生，看来还得我开导开导她，来个再教育。我想了想，就和她说，有本叫《柯楚别依》的书里就有好人和女人亲嘴的事。她瞪着眼睛问我是真的吗，我说真

的。我一边看着她的表情变化，一边和她讲了柯楚别依的故事：柯楚别依是苏联著名的战斗英雄，是个旅长，他爱上了自己部队里的一个女护士，想和这个女护士好，女护士却不吐口，连理他都不理。只是到后来部队要打仗了，这是一次恶仗，一次决定部队命运的恶仗，肯定要死好多人，那个女护士半夜里来找柯楚别依了。护士告诉他，她是爱他的，一直都爱他的，至于以前没理他，是因为战争的时候，怕他为了她分散了心思。她又告诉柯楚别依，今晚上来看他，是因为明天的战斗中柯楚别依可能牺牲，而牺牲了还不知道她是爱他的，那她心里会难受的。临分手的时候——集合号响了——护士解开了衣裳的扣子，叫柯楚别依吻了一下脖子下边的那块地方。

“哪块地方？”她睁大眼睛看着我。

“脖子下边。就是……这儿呀！”我指了指自己的胸脯，没敢指她的。“你能说他不是好人吗？他是苏联有名的战斗英雄，塑了铜像的。”

她侧过脸去久久没说话。我也没再说什么。谁知她想什么吗？是对柯楚别依不以为然？还是对我有什么想法？她只是把两只手放在胸前，交替地捏着自己的手指头。过了好长时间她站起来了，先是往门口去站了一会儿，回来就坐在我跟前，挨着我。她的眼睛看着门，一只手伸过来抓住了我的一只手，拿到她的胸前，捏着我的手指头。那一阵我的心咚咚地跳起来了。我没说话，也不想说话，我明白，我从来没体验过的那种幸福降临了：她理解我的心情了，她对我更亲昵了！我小心翼翼地坐着，一动不动，我怕这种幸福会突然消失。我只是看着她的细细的白白的手指头怎么捏我的手。她用一只手抓着我的手，另一只手就捏我的指头——从大拇指的根处捏起，一捏一松，一捏一松，捏着挪着，捏到了指尖；然后又换食指，中指，一直捏完了小指，再又轮流地捏着倒回到大拇指。后来她的眼睛不看着门的方向了，就垂着头盯着我的手。

她像是一个艺术家，在塑造着一只手……她这种亲昵的举动使我陶醉了，我静静坐着任她捏，我的眼睛从她的手挪到她的头上，她的脖子上。因为她垂着头，我便整个地看见了她的后脖颈。她的脖子真是美极了，惊人的美：白，那皮肤真是白，细腻，还有点透明，就像是玉石雕成的一样。大概是因为羞赧的原因吧，脖子上还透出粉红色，使人想起玛瑙的颜色。这玛瑙红一直扩大到我看见的半边脸上。

“志成。”后来，她轻轻地叫了一声。

“嗯。”

我也轻轻地应了一声。我以为她要说什么，她却没说，又叫了一声：

“志成……”

这声音更轻了。叫完之后她就抬起头来看着我。这一来我就看清她的整个脸啦——脸的颜色是玛瑙红，看见她的细长的眼睛啦，还有眼睑边缘那排列得均匀整齐的金丝一样闪亮的睫毛。她的眼睛原先是很亮的，这时候不知怎么却不那么亮了，竟发出一种迷离恍惚的光，朦朦胧胧地看着我。

我的心荡起来了。我叫了一声：

“一眉！”

“嗯。”

“现在吻吻……行吗？”

“就吻嘴。”

“嗯。”

她点了点头，闭上眼睛。

从那以后我就总吻她了。

那时候严冬已经真正地来到了。河西的冬季你是知道的：东风西风拉锯一般刮过来刮过去，呜呜地叫着，把沙土扬到天上去，

天空黄蒙蒙的。这时候跑到戈壁滩上去幽会是很危险的，尤其晚上，回来的时候会迷路的。我们约会的地点就改啦，改到麦场上，约会的次数也减少了，就星期六晚上。如果第二天天气好，没风，那我们就接着约会，就到戈壁滩去。——白天可不能在麦场上，离连队太近，会被人发现的。这时候的约会也和过去不一样了：一见面就接吻，分手的时候也接吻，有时坐在麦场的麦草堆里我们连话都不说，就是接吻。

当然，像这样无休无止的接吻是很危险的……那是春天啦，不，实际上是夏天了，都六月的天气啦。河西的春天来得晚，叫你都不知道春天什么时候来的，当你看到树叶草呀都绿了的时候，已经是夏天啦。那是个星期天，我们往河那边的南戈壁去，想离得很近地画一画祁连山。我们涉过了浅浅的疏勒河，走过长满艾蒿的河滩，穿过一片新生的胡杨林。这片胡杨林里有一条古道。真是古道，整个陷人地下，有的地方一丈来深，这是马踏车辗造成的。人们说是丝绸之路在河西保留得最完整的一段。在丝绸之路上走了一截，胡杨林不见了，道路往西拐了，我们离开古道走到一片芨芨草滩上。芨芨草滩地形很高，我们停了一下，回头看了看连队的方向和我们农场的田野：我们的近前是那片年轻的稀稀落落的自然胡杨林，胡杨林的叶子长得像柳叶一样，嫩嫩的绿绿的，一簇一簇延续到河滩上；河滩上的疏勒河蓝蓝的，自然地弯曲，像是随便扔在草原上的一条绸子；河那边是拥抱着我们连队的浓密的胡杨林，那一棵棵的胡杨树已经不知道生长了多少年了，但是它们的叶子还是那么绿，油光光绿生生，生机勃勃地涌向疏勒河流去的方向。我们连队的麦田和其他连队的麦田连在一起，绿油油的，一块一块的，又整齐又好看，叫人想起藏族姑娘们的彩裙。“彩裙”那边是我们常去的那片黑戈壁。戈壁蓝茵茵的，那是笼罩着戈壁的蜃气。蜃气颤动着奔流着，像宽宽的大河，像蓝色的绸缎，像草原

.....

“哎呀真美呀！咱歇会儿吧。”她看着眼前的景色叫了起来。

“好，歇会。”我说。她走得热了，脱去黄色的军垦服搭在臂弯里，抹着眉梢上的汗水珠子的时候，我看见她胸前的衬衫湿了一小块，贴在身上。

我们在芨芨丛里坐下。那片芨芨草长得真是茂盛，去年的干枯了的茎秆白花花地挺立着，新的绿茎又长高了，几乎一样高了，芨芨草的新叶绿绿地披散着。当时正是中午一点钟的时候，河西走廊上的阳光从正南的天空直射下来，照得我们暖洋洋的。比人还高的芨芨把我们和世界分开了，我们的身旁只有茂密的蓬蓬勃勃的芨芨，还有头顶上无限深远、蓝得迷人的天空……我们又接吻了。

那天也怪，可能是她脱去了冬装的原因吧，我搂着她的肩膀接吻的时候比往日都激动，我的胸脯感觉到了她的心脏的剧烈跳动，也闻见了她身上的汗水散发出的异样的气息。吻完了抬起头来，我又看见了她的红扑扑的脸庞，蒙蒙眈眈的眼睛，微微张开的嘴唇，光滑白净的脖颈。我的心咚咚地跳起来，身体里的血液像大海涨潮一样涌起一排一排的浪头。

“一眉！”我轻轻地叫她。

“嗯。”

“今天……天气真……好……”

“嗯……”

我相信，再有一分钟可能就真要出事了。当时，她的身体倚在我的臂弯里，手软软地勾着我的脖子，眼睛眯眯着，身体软软的，而我的手搂得更紧。但是，她的身体猛地一阵哆嗦……

“我的前途！”她叫了一声。

我已经发昏了，真的，那时候我已经有点发昏，没明白她的意思。我问：“你说什么？”

“我的……前途……”

她又叫了一声,声音是断断续续的,接着就猛地抱紧了我的脖子呜呜地哭了。

我怔住了,我搂着她的手慢慢地松开,好久没说话,一句话也没说,我真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也不知说什么好。我直感到身上泛出一层汗水,冷嗖嗖的,心都打颤了。

她的喊叫声——“我的前途”——不啻是沉雷在我头顶炸响,震颤了我的心,每一根神经。我清醒了,冷静了,血管里奔涌而来的排浪如同落潮般疾速退去。前途,是啊,前途!我怎么把前途的事忘了,几乎干出毁灭前途的事来……我们不是无数次地讨论过并一致同意:我们就这样相爱,在田野上散步,在戈壁滩幽会,在夜幕下接吻,互相以自己的心温暖对方的心,但不急于结婚建立家庭。我们这样想,主要是我们还年轻,应该把精力放在工作上和要求进步上。我们都是要求进步的人,我们都想政治上不断进步。那时候我是团支部委员,我想争取入党,她呢,再好好努力努力,改造世界观,是能够入团的。就在我们相好的第一天,我们就商量过,决不把我们的事说出去,要保密,这也是为了政治上的进步:要是团支部、连领导知道了我们的事,她就可能入不了团,也当不成“可以教育好子女”的典型,我的团支部委员就当不成了,入党就更别想了。

不光是政治前途,还有做人的前途。两年来她在连里的表现使得人们改变了最初的认为她和卫生队长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看法,尤其是她拒绝我们那个排长的追求的现实使得全连知青都佩服她,认为她是个好姑娘,是个纯洁正派的女孩子;大家一直知道我是个不和女孩子们打闹调情的人,作风正派,知青们都尊重我相信我。如果我那天干出坏事来了,我们的关系就得急转直下、就得结婚,那人们还会尊重和看得起我和她吗?不会的。人们都会斜着眼睛看我们的。“他俩才是这样的人呀!”人们会这样说我们。

“原来是个伪君子呀！”人们会这样说我。“本来就不是好东西！”人们会这样说她。我和她的脸还往哪儿放呀？人们的唾沫就会淹死我们！想到这里，我的头上直冒虚汗。我为自己的发昏而后怕，也为过去的那些行为内疚和惭愧：我不是看不惯那些十八九岁就谈恋爱的小青年吗？不是认为他们作风不好吗？不是说他们不学好吗？我自己也变得和他们一样了！谈恋爱，亲嘴，拥抱……变了，我已经变坏了，变成个卑鄙、下流、不知羞耻的人了，一个十足的坏蛋、流氓……氓。我看到了自己的丑恶，觉到了自己正顺着一个小斜坡滑下去，滑进一个黑洞洞的坑里去……

不行，不能滑下去，滑下去就要粉身碎骨，我和她一起！那天，我在那里怔怔地坐了好久，我在想着如何才能制止相爱下去——不可能，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我喜欢她，爱她，我们已经那样地爱了——但又不损害我们的前途。我认为只有一种办法：保密，绝对保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的事情。为此，我们要减少约会的次数，而且不能一见面就拥抱接吻，也不能发昏激动；就像刚刚交朋友的时候那样吧，规规矩矩地坐着，说话。

好。这一声“我的前途”好！它挽救了我和她的前途，挽救了我的灵魂——理智和崇高战胜了激情和丑恶。我十分感动地对她说：

“是我不对……请原谅……”

“不，不。不怪你。是我不好……脆弱……”她还在哭泣。

“怪我，怪我！我保证再也不……”力量回到身上来了，我拉她起来，往前走，我说，“走吧，咱们写生去，画祁连山。”

但是我们没走到祁连山跟前，我们走出了芨芨草滩，在南戈壁上走了一会儿，我就累了，腿软得厉害。我说就画戈壁滩吧。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有什么坏念头产生过，拥抱和接吻的时候也少了，我们一周就约会一次，就是星期天，下午。

但是，我们的秘密还是被人发现了。

过了一个月,一个星期天,吃完早饭——星期天两顿饭——我来到戈壁滩上,一边画画,一边等她。我们说好的是中午相会,我画完一张写生了,太阳斜得很厉害了——大约是三点钟,她还没来。我不画了,眼睛瞪着连队的方向,一直到吃晚饭的时候,还是不见她的影子。怎么回事?是连里突然召开班长会?还是女孩子们有什么事缠住了她?我没回去吃饭,还等着——我们约定过的、法定的约会日子不见不散。

后来月亮升起来了,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钟了,她没来。她是病了?还是……我预感不妙!

果然。回到连队,我们班长还没睡,他拉我到外边说:“你干得够漂亮的!”

我心里一沉,立即装傻:“什么事呀?”

“行啦行啦,别来这个!”他接着就告诉我,是女子排排长发现的,报告了指导员,指导员和军代表找她,她哭了一天。

像是掉进冰窖一样,我全身都凉透了。该倒霉啦!我暗暗叫苦。我想:事情一定会像我猜的那样——议论、恶言恶语会潮水般涌来,连里要公开批评,使我们示众……我,倒霉就倒霉吧,最多把团支委抹了,今后入不了党,可是一想到她将要因此而倒霉,我的心难受极了,觉得对不起她。本来嘛,是我“勾引”她的!

就是这样。从第二天起,全连的议论像脏水一样泼来了,路上,工地上,食堂里,我到处看见那样的眼光,说什么话的都有,而且一天比一天高涨……不过,奇怪的是连领导并没有公开在全连讲过此事,团支部也没找我的麻烦;只有连长找我谈过一次,叫我写个检查,保证以后不再谈恋爱,要好好工作,并且他告诉我王一眉已经写了。

我当时真猜不透,为什么连领导发善心没整我们——团干部和“可以教育好子女”的典型带头谈恋爱,他们肯定很恼火,尤其是在全团大会上以做好“可以教育好子女”的思想工作为题介绍过经

验的军代表。而且因为连里没公开批评我们,连里的议论也少了,有的人甚至跑来问我:“你们到底有这事没有?”

一个多月了,终于很少有人再谈论这事了。这是该庆幸的事情,但是我的心却疼痛得不行:我们的事就这么完了?她就这样不言不语地和我散伙吗?这也太薄情啦!不行,我不甘心,我宁愿叫连里批评,叫人们说我落后,说我思想意识不好,也不愿意没有她的爱情,她已经把我的心摘走啦。待人们的议论少些以后,我又寻找各种机会接近她,想续上断了的情丝。但是,我一次也没成功。她根本就不搭理我!当我们在路上相遇的时候,她就像是没看见我一样侧着脸走过去;当我看见周围没人,急着追上去叫她的时候她反而加快脚步走掉;如果远远地看见我迎着她走过去,她就一拐弯躲开。我曾经托我们班长捎个纸条给她,她原封不动退了回来。

两个月过去啦,看来她真是不搭理我了。我呢也已经开始不那么痛苦啦,已经从痛苦中更生了,我想通了:这是个不成熟的女孩子,她不知爱情为何物,不知道爱是要付出代价的,要克服阻碍的,我本就不该去爱她。甚至我还有点庆幸:就这样结束也好,这么一点小小的波澜就变心的人,将来真要在了一起生活还有个好吗?

但是,我真没想到,就在两个多月过去,快三个月的时候……那是国庆节——又是国庆节!——的前一天,九月二十九日夜晚,连里开联欢晚会,散会了,我们拥挤着走出“大礼堂”。我说的大礼堂也是间地窝子,就是大,盛得下两个连队的人搞联欢。这个“大礼堂”为了防止冬季的寒风灌进来,修建的时候挖了个带拐弯的入口,很长,并且封了篷顶,里边特别暗。我正跟着前边的人摸黑走着,有只手抓住了我的手。“谁!”我想这样问一声的,因为我感觉到这不是男人的手,可是还没喊出来,有个什么东西就塞进我的手心里,接着有个人喊着“玉露,等等我。”挤过我身旁去了。

是她。

她塞给我一个小纸团。回到宿舍一看,上边写着六个字:

“明天。芨芨草滩。”

第二天,我早早来到芨芨草滩——就是六月里芨芨草长得很高的那片草滩,等她。我一直伸着脖子看着连队的方向:那片新生的胡杨林中的古道,那长满了艾蒿的河滩,那绸子般的疏勒河。后来快到中午了,我的脖子都疼了,她还没来。她可能不会来了,我准备往回走了,突然听见身后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声。回头,我看见她已经走到跟前了。

她站住,离我就几步远,看着我。

“一眉……”我叫了一声,拘拘束束地叫的,因为我不知道,这一次约会,她是要郑重地跟我谈一谈散伙的事呢,还是……

她没动。她走热了,脸红扑扑的,前额、鼻尖上挂着汗水,脖子湿漉漉的,贴在脸上的几绺头发滴着水。她的胸脯急促地起伏。一块淡蓝色的纱巾在轻风的吹动下,在她松松下垂的手里飘动着。

她也没说话。她只是睁大眼睛看我,长长的睫毛一眨不眨。脸上是我从没见过的神情:恨?爱?冷漠?热情?痛苦?兴奋?我说不清。

她就那样站着,看着,一句话没有。我想再叫一声,却又叫不出来,我确实不明白她什么意思。我只是后来憋不住了,那浅色的眼睛看得我好难受,我又叫了一声:

“一眉……”

“……”就在我叫她的一刹,她的嘴也张开了,无声地叫着,向我扑来。

我吓了一跳,急忙去扶她,她不是跑着扑过来的;就像一棵小树倒下了一样,她直直地栽过来。她的张得开开的胳膊在空中划过,纱巾飞走了。

扑在我的怀里,她才哇地哭出声来。

我心中的一切疑虑在-一瞬间消失了。我明白:只有深深爱着我的人才会这样哇哇地哭。一直到哇哇的哭声变成呜呜声,我才

扶着她坐下。接着就是长时间的抽泣。一边抽泣她一边告诉我：指导员、军代表原打算要狠狠整我，叫我在团员大会上做检查，在全连做检查，是她把一切揽过去了，她说是她先找我的。她自己写了三次检讨，保证不再和我谈了，军代表才把事情压下来不公开批评我和她。她说军代表怕自己丢面子，因为是他把她树为“可以教育好子女”典型的。“连长是好人，连长是好人。”她说是连长点拨她写检查的，连长说：“写，写诚恳些，啥事好说。”“为了过关，我就写了。”她说。接着她又说了两个多月来对我的思念，她本想再过一段时间再和我见面，可是又怕我太痛苦了，把身体弄垮了，就冒险来和我约会。今天她是和别人先到了团部，然后说有事往回返，绕到茭茭草滩来的。

那天我哭了，是我来河西后第一次流眼泪。为了和我见面她竟绕了二十多里路，我感动极了。我还为以前对她的抱怨而内疚。所以后来她提出半个月约会一次的时候我就说一个月一次就行了。

“不。半个月一次！”她坚决地说。

“不怕叫他们逮住？”我说。

“逮住就逮住。再逮住我就豁出去了。志成，我真的想了，再逮住我就不写检查了，看他们怎么办。”

她的真挚和大胆的爱激动了我的灵魂，后来当我们商量完今后怎么见面的办法——半月约会一次，每次都改变日期和地点——之后，我就提出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请她考虑。

“什么问题？”她问我。

“就是我们的事……”

“怎么啦？”

“我是说你慎重考虑考虑：如果你要是……那个的话，现在停止还……不晚。”

“你说的什么话呀！”她惊讶得睁大了眼睛瞪着我，“怎么啦，这

是怎么啦,你是嫌我……”

“不,不不。”我躲开她的眼睛看着一墩芨芨草,“这问题,我想了好长时间。我是说……现在当然没……事,就是见见面,说说话……但是……我是说将来,不管你想不想到,将来——三年,五年,就是十年吧,总是要……有家……对不对?”

她没说话。我又说:“有了家……这有了家以后的情况会是什么样的,你想过没有?”

她还是不说话。接着我就和她说了,那时候就不是像现在这样,谈恋爱,幽会,散步,那时候就要面对现实过日子了。而现实是什么,现实是这里严酷的自然环境,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社会的穷乡僻壤,一块戈壁滩包围着的草滩;草滩上可没有楼房、剧场、沥青马路,有的是芨芨草、骆驼刺、芦苇。春天来得晚,冬季来得早,棉袄从九月穿到第二年六月……还有一年四季的劳动——那样的劳动你受得了吗:种地、浇水、收割、冬灌,秋季里还要打草,冬季里平田整地挖排碱渠……还有那样的生活:我们都是挣二十五元钱,加一起五十元,靠五十元钱过日子,吃,喝,穿,还可能要抚养后代,够花吗?不够。不够怎么办,那就要养鸡,养兔子,下了班像那些老职工、复转军人一样挖苦苦菜——喂鸡喂兔子呀。为了节省每一分钱,星期天就不能去画画了,不能去玩了,要去打柴禾,拣牛粪。这样一来,就像老职工说的,就要苦得头上长草、耳朵里种庄稼了。“你想想吧,这,你受得了吗?”

她一直不说话,一直看着我。我就加重语气说:“你想想,你好好想想。这样的日子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可能是十年二十年,可能是一辈子,一辈子呀!一辈子要受苦受累,一辈子要住地窝子,一辈子回不了天津,见不了父母。你受得了吗?行吗?”

说完了我就看着她。她也盯着我。她说:“还有吗,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吗?”

“没,没没……”我发现她的眼光异样,嘴角带着一丝冷笑的神

情,我补充说:“过日子可不同于谈恋爱浪漫,那是现实,是严峻的。”

“你什么时候想这些的?”

“就这俩月。”我说的是实话,在这俩月里我才冷静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以前对她的追求是出于一种激情,出于对一个漂亮美好的女孩子的倾心,还没有顾上考虑长远的问题。

“你后悔啦!”她的声音提高。

“没、没没……”我急着解释,“我是为了你好。”

“真没后悔?”

“真没后悔。”

“那就画你的画去吧。走,画祁连山,你该好好画画祁连山啦!”她像是在下命令,站起想走。“我告诉你,从到河西的那一天,我就想过这事了!”

我背起油画箱跟着她。走了没几步她又站住,回头看着我:“真没想到你才是这么个人!”

“怎么啦?”我最不爱听“你才是这么个人”。

“你真甘心种一辈子地,待在这儿?”

“我……”我瞅着她,讷讷地说,“画画,搞艺术,这条路是……很难的。”

“你怕苦啦!”她瞪着我。

“不,我不怕苦。我是怕搞了一辈子,一生……也成不了气候,那就太……对不起你……啦!”

“是吗,你是这么想的?”她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喜悦,但接着又变得十分严峻,口气很重地说,“没关系,志成,这没关系。只要你尽了力,奋斗了,我就是吃一辈子苦,头上长草,耳朵里种庄稼,我情愿。”

那天,我们走了好远的路,一直走到祁连山脚下。

巍峨严峻的祁连山脉矗立在我们面前。它的峰峰峦峦脉络清

晰,紫色的岩石、褐色的山谷凸凹分明,积雪的冰峰高高地耸入云天。

当我在山脚下支起了油画箱开始作画的时候,我的手颤抖得不能自制。我的心里充满着像祁连山那样庄严、伟大、崇高的责任感和力量。我暗暗地发誓:一定要当一名画家,为了她,为了我,为了我们的未来。

我再讲一件我们分手的事情吧。为什么分手,你就不用问了吧,我也不说了,反正你也明白。我不是第一个遇到这种事情的人,我也不是最后一个遇到这种事情的人。原先在危难中产生了友谊和爱情,后来由于生活的转折和变迁而成为终生遗憾,这样的事多得很。我说这话你不要误会,认为她不爱我了。不,她不是那种人,我讲的这件事可以证明。

那是我们相好的第三年,我得了湿疹。我们住的地窝子很潮,没有床板,床铺就是把地窝子中间砌上一道二尺高的土墙,一边当过道,另一边填上麦草当铺。地是湿的,麦草也是湿的,时间长了我就得了这病。这病挺顽固的,一开始小腿上长了一小片小红疙瘩,我没当回事,痒了就抠抠;后来不知怎么感染了,越来越严重,扩大到大腿,流黄水、血水,团卫生队也治不好了,叫我到师部医院去治。师部在玉门镇,我一去就住院,住了半年。住院期间她来看过我两次。那第二次,我总也忘不了。我原也不知道那就是最后一次见面(我要是知道就好了),我只知道她快要走了,所以她来的时候我心里不好受,在一起没多少话可说。她呢,大概是觉得快要调回天津去了,对不起我,也没多少话好说。她是早晨到的。头天晚上她说是到团部朋友处去玩请的假,然后跑到火车站,半夜里上车到的玉门镇。她不敢明着来看我,那几天连里正准备讨论她的入团问题。她只能待两个多小时,然后就要去赶火车,当天赶回连队去。那两个多小时,我们没说几句话,她一个劲儿催我吃水果。

她是在玉门镇买了好多水果、罐头、点心来看我的，还有麦乳精。后来快到吃午饭时间了，我要去买饭给她吃，她说来不及了，要赶火车，问我还有事吗，没事她就走了。原先我们说话是面对面坐在两张床上的，一说要走了，她就挪过来挨我坐着：摸我的头发，还吻了我一下。我说没什么事。她又问还有什么话说吗？我想了想说：

“还来吗？”

“干什么？”

“再来，给我带儿包烟卷。”

她当时像是愣了一下，说：“你没烟卷啦？”

“没……没啦。钱花光啦。”我的脸红了一下。我是在说瞎话，前几天她寄给我二十元钱，还有十元钱在口袋里。我是因为想叫她再来一趟，再说说话，见她一面，那天我对她太冷淡啦。

她像是犹豫了一下，说：“来来，来。我带烟卷给你。”

其实，她再也没来。回连不几天，她家里来电报，说她父亲有病——她父亲已经出来了，官复原职了。她急急地走了。不过烟卷她还是叫人捎给我了，她知道我是个烟鬼——到河西的第一年我就学会抽烟啦，一开始学着抽了几支，后来就越抽越凶。每月一发工资就往小卖部跑，买烟，不几天钱花光了，就钻床底下找烟头。说实在的我什么赖烟都吸过，双鱼——八分钱一盒，熊猫——内蒙出的，一毛四，还有一元五角钱一斤的烟叶我也卷着吸，吸得直吐黄水，还吸。后来和她好了，她不让我吸那些赖烟，买好的给我吸，限制数量，但我总也戒不掉。

烟卷，我还是说她给我捎烟卷的事吧。第二天上午我就收到了她捎来的烟卷。那是一位我们团的女同学捎来的，她是来看病的，说是在火车站遇见了王一眉，王一眉叫她捎烟给我。那女同志放下烟就去看病了。

总共捎来了五盒烟，四盒带嘴的兰州，一盒燎原，另外还有一

个纸包。纸包里是什么东西呢！我先点着了一支兰州，吸着，再打开纸包。

纸包一打开我就愣住了：一包烟卷头。

她这是什么意思？我想了想，跑去找那位女同志，问她：“你在哪儿看见王一眉的？”

“火车站。”

“在桥湾？”桥湾车站离连队三十里路。

“不。在玉门镇车站。”

“昨天晚上？”我又问。

“今天早上。”

我愣住了。看我发愣，那女同志又说，她是早上一下火车，看见王一眉在站台转悠，看见她，就把那些东西交给她，叫她捎给我。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泪水哗哗地流下来。我明白了，她是没钱了：除了火车票钱，她把钱都买了水果、罐头带给我了；而火车票钱她又买了烟卷捎给我，她自己困在玉门镇车站了。我算了算，五包烟的钱正好是玉门镇到桥湾的火车票钱。

我跑到火车站去。但是候车室没她的影子，站台上也没有。她可能是扒车走了，不知扒的客车还是货车……

她是扒车走的。两个月后我回到连队，一个和她要好的女孩子告诉我：她扒的是货车，运水泥的，车到疏勒河车站停了半天，她又换别的车，结果半夜里才到桥湾车站，她赶到连队的时候正是吃早饭的时候。

从那以后我就戒烟了。想起她扒车的事，我就觉得有罪。

十年啦！从那次分手我就再也没见过她。她写过信给我，我也没回信。那年来天津美院进修，我也没去找她。不要误会，不是我恨她，生她的气，绝对不是。我是十分感激她的，感激她以一个女孩子的真挚的心爱过我，使我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度过了一生中

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感激她鼓励我坚持绘画并使我画出了《黑戈壁》、《西北的荒漠》那些我自己满意的作品。我总是不愿意意见她，是因为她要求我成为名画家，而我还画得不好，不成熟。

这次来天津，我还是不想去见她。

谁知一下火车就遇上了她。我不是说叫你们先走吗？我想和她说几句话，也就是随便问问情况，就去追你们。可是……一说起来就走不了啦！我原以为十几年啦，她已经有家庭了，可能早把我忘了，不忘，也就那么回事了。谁知她还是那样……热情！她不叫我走，非要等我八点钟下班，上她家去。我说改日吧，外边还有人等我，她不干，那么多人看着，她就拉着我的手不叫走。我说去给你们说一声她都不让。没办法，我只好答应去她家。她把我看得可严了，接车送车的时候就叫我站在她旁边。我哪好意思那样呀，跟着个女人在站台上转悠，叫她们一块儿的人看着像什么样子。我不愿意跟着她走，她以为我累了，叫我到她们工作人员休息室去——就是天桥下边的小房子——休息。怕我跑了还是怎么的，她跟工作人员休息室里的一个女同志说：“你给我看着他。”她去接车。没车进站出站的空隙里就跑来和我说话。当时我觉得太难为情了；我坐在椅子上，她就站在我身旁，手扶着椅子背，当着好几个女同志面和我说话，眼睛直勾勾看着我，问我干什么来啦，住哪儿，在天津待几天。

八点钟下班，我们乘公共汽车去她家。

我原想在路上仔细看看她的，问问她的情况，谁知上了车倒没法看了，也没法说话。车上人不算多，座位满了，过道空着，只有我和她站着。本来，我们可以自然随便说话，可是她站在我面前，那么近地看着我，呼出的气息喷到我的脸上，弄得我挺别扭。我往后退了一步，为的是有点距离，她却又靠近一步，依然那样近地看我。我不得不扭过头去看街道，也不好意思说话了——我怕人们看我们。

“没想到又见面了吧？”她说，又一股气喷到我脸上。

“没……”我总觉得全车的人都在看我们，就公事公办的口气说，“你爱人在家吗？”

“在家。他上正常班。”

“干什么工作。”

“搞技术的，工厂。”

“怎么样，关系还可以吧？”我刚说完就觉得这话问得不得体，就好像人家夫妻关系不怎么样似的，我急忙说，“你们生活挺好吧？”

“好，还好。”她说，接着又突然问我，“你怎么不把她带来？”

“谁？”

“就是那一位呗。”

“我……哪有呀！”我的脸有点发烧。

“怎么？”

我听得出来，她的声音是惊讶的。扭头一看，可不是吗，她睁大了眼睛看着我。我急忙躲开她的眼睛：

“没有……就是没……有呗。”

不知为什么她不说话了。

看来他们夫妻关系不错。一进门，她就告诉她爱人，我是兵团时的朋友，叫什么名字。她爱人一听说：“噢，知道，知道。你不是说过吗，画家。”接着她爱人就一边倒水一边说：“谢谢你啦，谢谢。听一眉说你那时总帮助她。”她爱人思维敏捷，谈吐文雅，长得也挺魁梧潇洒，不像我在河西听说的那样——她调回天津以后我们连队的人们说：她找了个对象也是高干子弟，长得特矮。我们进门的时候，她爱人已经做好饭了，没吃，等着她呢。见我去了，就立即又去忙活，加了两个菜端上来，还有酒。吃饭的时候，她爱人为我夹菜，也为她夹菜，她在给我斟酒的同时也斟满她爱人的酒杯。

就是在吃饭的时候，我才仔细一些地看了她。饭桌是圆的，我

们坐三角，举起酒杯和放下筷子，我都能看着她。她像是没多大变化：皮肤还是那么白，她的脸、脖子、眼睛还是那么好看。一到家她就把工作服脱了，帽子摘了，她的黄黄的头发垂下来，蓬蓬松松，还是那么光滑发亮，身材像是和从前一样苗条。

说实在的，那天去她家，我挺高兴的。又看见从前的女朋友啦，还是那么漂亮，动人，她和她爱人又都对我那样热情。

后来，我就觉得不那么对劲了。在火车站，在汽车上她一直那样直勾勾地看我，叫我都不好意思，说了那么多话，叫我都难以回答。可是吃着饭吃着饭，我发现她的神情变了。首先是她不再为我斟酒了，也不给我碗里夹菜了，说话也少了。和她爱人说话，她依然是那样随便，说着，笑着，对我却不是那样。她不主动地说话了，我和她说话，她的眼睛也不看着我了，总是盯着碟子；偶尔看一眼也是匆匆地瞥一眼就滑过去了，那目光也是淡淡的，冷冷的，没什么表情。她也很少对我笑了，笑一下也就是咧咧嘴，像是做出来的。

她爱人依然热情地劝我，喝酒，吃菜，并一再地和我谈起绘画，但是我的情绪低落了。我想，这是怎么啦，我哪儿做错了，有失检点？没有啊，哪儿也没做错，说话也是很注意的。想来想去，我认为她在车站、汽车上的热情只是一种一时的冲动，或者是故意做出来的，是一种应酬，实际上呢她心里对我也就是那么回事，淡了。

吃过饭我就告辞了。

告辞的时候她也很冷淡，不挽留，也不说请我再来的话。倒是她爱人挺真诚，一定要我第二天再去，说是今天没准备，明天要正式请我吃饭，还要和我一起去看美展。他说他可以调休。

我拒绝了，我说明天有别的事，也不能去看美展。

那天晚上我很不愉快。你可能看出来，一回来，我连话也懒得和你说，就睡了。实际上我半夜也没睡着。我的自尊心被刺伤了。我想，我是没伤害过她的，分手的这十年当中我也是总惦记着她

的好处，没忘记过她，并十分尊敬她的，她何以这样？我觉得那天去她家真是多余。我想好了，永远再也不去她家了。

第二天的事你知道的，咱们不是一块儿进的展览馆吗？不是一块儿找《黑戈壁》吗？可是我溜了。你知道怎么回事吗？我看见她了。当然，你们没看出来，在往画跟前走的时候，我看见她了，她换衣裳了，换了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正站在那儿看《黑戈壁》呢。我从后边看见她的身条，看见她的黄头发，就认出她来了。我当时一愣：她来干什么？是来看画展的？我赶紧躲了起来，从远处看她。是的，她是在看画——《黑戈壁》。她在那儿站多久了，我不知道，我去以后看见她站了足有二十分钟。这二十分钟里，她就那样站着，看着画，而且不时地抹眼睛。她哭了；当时我的心里格登了一下：她动感情啦！不过后来我发现，她并不是来看画展的；她不抹眼泪了，转过身朝门口看着，朝展厅里看着，并且很快地把所有的展厅都走遍了，而后又站到《黑戈壁》跟前看着门口。她在找人！她是找谁呢？她爱人，还是……我又观察了一会儿，判断出：她是在找我。

我走了过去。我想知道：她要干什么？

“志成！”

我刚刚从人群后边走出来，她就看见了，喊着跑过来。我装出惊讶的样子说：

“哟，是你呀！你来干什么？”

她的表情变啦，变得像头天火车站那样啦，笑着说：“你才来呀，我等你半天啦！”

“等我？等我干什么？”我装出冷漠的样子，其实心里很激动。

“你……”她一下子睁大眼睛，“怎么啦？”

“我怎么啦？”

“你……”她瞪着我愣着，脸有点儿红了。停了一会儿才说，“走吧，上我家去……”

“上你家干什么？”我声音挺高。

“我……有话……和你说。”

“说吧，你说吧。”

她看着我，一时没说什么，原先就有点红的眼睛更红了，涌上泪水来了。我转身往外走。我想，不能再伤她了，到门口说去吧，这里人多。

谁知一出门口站下，她竟抹起眼睛来了。

“哎，你这是怎么啦？”我倒有点慌了。

“你说去不去吧？”她又瞪我。

“我……”我犹豫啦。

“你倒怪起我来啦！”

“我怪你什么啦！”

“昨天我淡着你啦。”

“没，没……”

“没？你那点小心眼我还看不出来？你说说，你那么直愣愣看我，我能不……”

“我怎么看你啦？”

“眼睛都直啦！”

“没的事。”我脸红了。

“你也不害臊。”

“他看出来啦？”

“那还看不出来？”

“你害怕啦？”

“害怕就不来找你啦。喂，你说吧，去不去？”

“他在家吗？”

“你不是不愿意来吃饭吗？”

我跟她去了。说实在的，我是想单独和她待会儿，说说话，叙叙旧事，聊聊现在。

这天,她确实不和昨天一样啦。进了屋我刚刚坐下想喝点水,她就在厨房里叫了,叫我择菜,洗菜,切菜,淘米,支使得我团团转,她自己呢,就站在一旁说,眼睛总跟着我转。

“你看什么呀?”我都有点不自然啦。

“不能看吗?”她说。

很快,我们就整出满满一桌子饭菜,弄得我都有点儿发愁了。

“吃得完吗?”我说。

“吃不完你就带去。”

“这……怎么带呀?”

“那还剩下?剩下他回来看见怎么办?”她瞪着我。

我的脸涨红了。

这时候她竟哈哈地笑了:“吃吧,吃吧,剩下他回来吃。我就说你来了,趁着他不回家跑来的。”

“好,好,你就这么说,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我走了,你们两口子打架吧……”我也哈哈大笑。真是的,我这是干什么啦,做贼吗,怕他知道。于是,我就大大方方吃起来,一边吃,一边和她说话。我说:“说说你的情况吧。我看他这个人挺不错的。对你挺好的。”

我发现,一听这话,她的神情一下子就变了,眼睛也变得暗淡了。也就在这一刻,我清楚地看见:她毕竟不年轻了。她的脸虽然还是那么白净,但时间和岁月在前额、眼角上刻下了皱纹,嘴角上也有。当她垂下眼睛的时候,那眼皮上也显出细细的褶皱。她的眼睛也不如从前亮了,原先黄黄的,现在像是蒙上了一层灰,暗淡了。脸色不光是白,还有点青,有点黄;脸上的玛瑙红消去很多了,只有嘴唇还显出比较深的玫瑰色。嘴唇是干燥的。脖子、裸露的手臂也不如从前透明和有光泽。肩膀不如过去那样圆了;身材不是苗条,是显出了削瘦和单薄。她说话的嗓门也略带沙哑……她告诉我:她爱人还是个不错的人,对她很体贴,家里的活都是俩人

一起干，她爱人干的还要多些：他们感情也不错，爱人很爱她，没有过大的口角，小有争执，爱人总是让着她。不过她又说：“我总是也没有过像河西那时候的热情，没有过，今后也好像不会再有了……”

她这么一说，我心里也不是滋味，不知说什么好。我们沉默好久，她才说：“说说你的事吧，为什么还没……结婚？”

“没找。”我说。

“没合适的吗？”

“……”

“大学里那么多姑娘，又年轻又漂亮，你一个都看不上？”

“……”

“说呀，对我还保密？”

“不……是，都……不是……”

“那是……？”

“你说过的……早结婚……不好，画画，当画家……前途……要紧。”我的舌头干巴巴的。

“就这？”

“……”我点头。

她好久没有说话，后来长长叹息了一声：“你呀……”

我看着她的眼睛。

“你已经是画家啦！”

“不，不不……”

我脸红了，我算什么画家呀，可是她继续说下去：

“别骗我啦，我早就知道啦。那一年你的画《西北的荒漠》得奖了，我看见了，报纸上登啦。去年，你也得奖了，叫什么来的？《疏勒河上的胡杨林》。还有人写文章夸奖你，说你是画坛新人。”

“差得远，差得远……你说过的，要当名画家，风景画大师……”

“不远，不远啦。《黑戈壁》我看了，就像风景画大师们画的。你的画，看的人真多，还有人照相。我真是没想到你画得那么好。我看得出来啦，你画的就是那一块戈壁，咱们连队北边的那片。一看画，不知道怎么的，我就想哭。你猜，我想起什么来啦？我想起十几年前的事啦！那片黑黑的戈壁滩，我看着，就觉得心疼。真疼，疼得我都有点儿站不住了。还想起了胡杨树，还有风，雪，沙子。一刮风，沙子就从窗里洒进来……那条自然沟你还记得吗？”

“记得。”我说。我看着她的眼睛有点红了。我的心使劲跳起来。

“还记得那股水吗？”

“记得。”

“那沟里的草地呢？”

“记得。”

她说的自然沟是指那片黑戈壁和草原相接处一条自然形成的长长的深沟，那是千百年前暴雨成灾的日子里，戈壁滩上汇聚的洪水冲成的。也真是怪得很，沟外面干旱得只生长一些臭蒿子，芦草，看着很是干枯荒凉；可是沟里，一到春天就长出密密的细细的一沟青草来，夏季膝盖那么高，软软的，不扎人。原因是沟里渗出一股指头粗细的泉水，终年不断，是甜水。冬季里这股水流出去很长一截才结冰。夏季我们在戈壁滩画画，热了渴了就跑到那里去，泡泡脚，洗洗脸，或者在缓缓的长满了青草的沟坡上躺着，望着深蓝的天空，又凉快又美。

“我真想再去看看。你呢？”她说。

“去年就去过啦。”我告诉她，我去年去的那儿，回来才画的《黑戈壁》。

“你真去啦？”

“啊。”

“那股水还淌吗？”

“淌。”

“还那么大?”

“还那么大。”

“草还那么绿?”

“还那么绿。”

“那么软?”

“那么软。”

“真的那么软?”

“真的那么软。”

她不再说话了,猛地我发现她的眼睛涌起了一层亮晶晶的东西。我问:

“你怎么啦?”

“想,想。我看见你的《黑戈壁》就想起了自然沟。这些年,我总想起自然沟,那水,那草,还有……你……”

“你想啦?”

“嗯,想啦。想着再去看看……那儿,想着要是你也能一块儿去……”

“是吗?”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啦,一股热热的东西涌上喉咙,又辣又咸,我说,“我也想……你!”

“你?”她睁大了泪水汪汪的眼睛,“真的?”

“嗯。那画,那《黑戈壁》,那《疏勒河上的……》,我都是为你画的呀!现在画画,不兴题字,要是兴,我就要写上,谨把此画献给我的……”

“你敢写?”

“敢。我敢。你是不知道呀,这几年,我总是去河西,每年都去,画戈壁滩,画疏勒河,画草滩……我就是想着你……你……你说过的话,画出那种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能感觉的东西出来。我不画别的,就画戈壁,就画草滩,……然后,等我成了画家,真正的

画家,就来看你。”

“看我?”

“就是。”

“嗯哼哼……”她眼睛里的泪水终于流下来,“看我干什么呀,你是想刺疼我的心吗!”

“不是,不是……”我的眼睛湿了,我强忍着不叫泪水流出来。“我是要感谢你。这么些年啦,画画,真难呀,我坚持下来了,全都是因为你呀!要不是你,要不是你那时候和我好,要不是你那样说过,我真没有决心坚持下来;可能我会像其他人一样,随便找个姑娘,结婚,生孩子,过日子,砍柴禾和拣牛粪。那样,我还会画画吗?有今天吗?连将来都没有……只是,我没想到咱们这么快就见面啦。”

“这还……快吗? 嗯哼哼……”

“快。我曾经想:我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有出息,一辈子也成不了画家。”

“那就一辈子也见不着了? 嗯哼……”

“这不见着了吗?”我笑了一下。

“这是意外的。”

“嗯,是意外……”

“没想到吗?”

“没……不,不不,也想到了。”

“不是我叫你,你……”

“我会来找你的,就是……可能要晚些。”

“知道我在哪吗?”

“知道。你写过信嘛。”

“怎么不回信?”

“我把地址弄……丢啦……”

我突然发现,她的话把我绕进去了。我的脸发烧了。

“唉，你呀……”她长长地叹息一声，抹着眼泪。我听出来了，她是在责备我。沉默一会儿，她才说：“别不好意思啦，不想来就说不想来吧，别遮护啦……”

“不，不不……”我红着脸说。

但是她不理睬我，继续说下去：“其实，我也没想到还能见着你，你还会来看我。那天在车站上看见你，我也有点不相信，我问自己：‘这是你吗？’你走去的时候我没敢认，怕认错了。等你走过去了，上天桥了，我又不甘心，我想要是你呢，就喊了一声。”

“你喊第一声我就听出来了，是你。”

“那你还走。”

“没看见你嘛，我当是听错了。十年啦！”

“可不是吗，整整十年了，我都老啦。”

“不老，你不老。”

“老啦，都成了老太太啦。”

“不老，真不老嘛。就是脸上有了几条褶子……哈哈！”

“嘿嘿……”她也乐了，抹着眼角的泪水，“老啦，我知道我老啦，时间过得真快。喂，我问你：以后还来吗，我成了老太太，你还来看我吗？”

“来。”

“真的？”

“真的。死，就是到死，还能忘了你吗？”

这真是十年来最最美好的一天——说实在的，作品获奖的时候我都没有过这么美好的感受。后来，她不抹眼泪了，我也不难受了，我们又谈起别的。一会儿谈起疏勒河：我们想起这时候正是疏勒河发大水的季节，河面宽宽的，水有点浑，河面上漂着树叶儿，草棍儿，羊粪蛋儿。一会儿谈起戈壁滩：今年雨水多，我们就想像那里戈壁一定比往年绿，碱蓬和蒿草长得比往年茂盛。一会儿谈起胡杨林：胡杨树长得真是怪，幼树的叶子是柳叶形的，长条；大了就

变成梧桐树叶子样的，多角；而到了老年呢，又成了杏树叶形的，圆形的，心形。我们还谈起了那陷入地下的古道，烽火台，草滩，芨芨草，脉络清晰的祁连山，还谈起了吃窝窝头，刮大风，连里的人，连长呀，指导员呀，留在河西的知青，回到城市的朋友……我们一会儿说这个，一会儿又想起那个，一会儿说得很热烈，笑，争，一会儿又都什么也不说，沉默或叹息。说话或者沉默，有时她看我一眼，有时我看她一眼，俩人的眼睛相遇了，就互相看着，然后就同时垂下头去，看着脚尖，或者扭头看着墙壁。我们沉浸在一种美好的、珍贵的、从来没有过的回忆之中。痛苦和欢乐，甜蜜和酸楚，爱和恨，各种各样的滋味从我的心头流过……我真希望这美好的时光永驻，这一天无限延长，就让我和自己从前的女友这样坐着，说话；笑，或者哭。

但是时间太无情了。后来，当我从一次沉默中抬起头来的时候发现，房子里的光线暗了一下。扭头一看，太阳西斜得厉害了，那从中午就射进窗户的光线被马路对面的楼房挡住了。

“该走啦。”我说。

“再……再待会儿……”她也发现时间晚了，往窗子看着，回过头来又看见了几乎还没动过的饭菜，说，“吃，你再吃点儿……”

“不吃啦，该……走啦，都五点啦。”我看看表，站起来。

“吃点，吃点儿。还早……呢。”她像是有点慌乱，“再……待会儿吧。”

“他几点下班？”

“六点。没关系，没关系……干脆，你就在这儿吃晚饭吧，吃完了饭，再……”

“不，不。得走。”我不是不想待，我是怕见着她爱人，——我说过今天不来的。

她好像猜到了我的心思：“那就再待半小时。我……不留你……啦……”

行,半小时也行,五点半走。我就又坐下来。这半小时真别扭。她不说话,低着头,偶尔看我一眼就又赶紧垂下头去。我呢,也觉得就要分手了,心里也别扭,不知说什么好,就那么坐着,看着她,又看着窗口。

只是半小时的时间就要过去了,我又要站起来的时候她才说:
“明天还来吗?”

“明天? 明天我……”我很犹豫,我想明天还来,但又觉得总来不好。

“怎么啦?”她的眼睛直直地看着我。

“明天……还要看展览。”我讷讷地说,“你有事吗?”

“我……”她看着我,脸色突然有点变,垂下头去,过了一会儿才说,“你知道不知道,我……恨你……”

“恨我?”我看着她。

“那次在医院里,就是玉门镇,你怎么不……拦我,叫我别走?”

“……”我张着嘴说不出话。

“你要是说了,我就……不回来……”

“我……能那样……吗?”

“怎么不能?”她抬起头直愣愣看着我,“还有那一次,就是……芨芨草滩……上,你怎么不……那样?”

“……”

“我没说……不行……”

我没说话。我扭过头去。麻木了,像是电击一样,我的神经麻木了;像是棍子打在后脑勺上,大脑蒙了,思维一片空白。心停止了跳动。我的眼睛看着墙壁,但是墙壁迅速向远处退去,消失了。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从一片空白朦胧之中升起一片草原,疏勒河在太阳下闪着亮光,还有阳光灿烂的胡杨林,芨芨草滩……

“你过来。”

好久好久,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她的声音。我扭头一看,里

屋的门开着，椅子上不见她。

“干什么？”我的心猛地咚咚地跳起来，我站起，深一脚浅一脚走过去。

里屋的光线很暗。窗帘已经拉上，从蓝色的纱帘上透过来的淡淡的蓝色光线落在她的身上。她背朝我站在床前。

“志成！”她呻吟一般叫我。

“干什么呀……”我的嗓子干得厉害，舌头也发硬，说不出话来，也听不见自己说了什么。我只是讷讷地说着，慢慢地搂住了她的腰。

她的身体哆嗦了一下，僵住了一下，就倒在我的怀里，“志成，志成……”她轻轻地叫着，慢慢转过身来，胳膊勾住了我的脖子，像是那年在河西的草滩上一样，她仰着脸，半张着嘴唇，迷离恍惚的眼睛半睁半闭。

“一眉，一眉！”我短促地热烈地叫着，把嘴贴在她的嘴唇上。

说实在的，我从来没这样吻过她，就是在河西我也没这样吻过她。血液在我的身体里燃烧了，心几乎炸碎了，我没有使劲儿抱她，但是她的身体已经离开了地板，是我身上的骨节还是她身上的骨节，咯叭咯叭地响个不停……一直吻得喘不过气了，我才抬起头来。这时候她像是窒息了，她的胳膊虽说还搂着我的脖子，但一点力气也没有，散散的，身体往下沉，像瘫了一样。只是因为我搂着她，她才没滑下去。她的头还是往后仰着，脸色白白的，惨白惨白的，半张着的嘴唇白得没有血色。

正是这惨白的脸、无血的嘴唇使我清醒了。

“不行，一眉，这样不行……”我很困难地说。

“怎么？”我只是从心里感觉到她这样问，她的嘴唇轻轻动了一下。

“他快回来啦……”

“你害怕啦？”她的眼睛闭着，仍然仰着脸，身体还软软的。

“不，不不……”我的心慌得说不上话：“这样……不好啊……”

“嗯？”

“他对你不错，我不能……”

“那你说……”

“咱们说说话吧……”

当我抱着她在床上坐下的时候，力量才回到她的身上。她搂着我的脖子，脸贴在我的脸上，摩擦着，摩擦着。她断断续续地说：

“志成，我的志成，我的心……难受……”

“我也是，我也是……一眉，我的一眉……”我说。

“那你……”

“不能，我不能那样……”

“咱们是没那样的命呀。嗯哼……”她又哭了，泪水流到我的脸上。

“嗯，嗯嗯……是没那样的……命……”咸咸的几滴泪水滚过我的嘴角。

“那……这样吧，”她突然抓住了我的一只手摁在她的胸脯上，命令一般地说，“解开，解开扣子！”

“一眉！”

“我吓了一跳，抽回手。但是，她又一次抓住，紧紧地拉着抱在胸前，说：

“你说过的，柯楚别依……”

哦，是的，我讲过的，柯楚别依！我的心又猛地跳动起来，身体筛糠一般哆嗦，手指颤颤地解开了她胸前的连衣裙的钮扣，然后，我就把挂着泪水的脸埋在她的略略松弛下垂的两个乳房的中间。

讲到这儿，刘老师就猛地停住。他看也没看我就从我放在桌子上的烟盒里摸出一支烟，点着。点烟的时候，拿着火柴的手轻轻地颤抖，他的嘴唇也颤抖着，烟晃个不停，总也对不准火苗；他用一

只手扶住，才点着了。他吐出了一口烟——不，那烟不是吐出来的；他只是张开了口，叫烟自己冒出来，那烟雾乱糟糟的。我明白，他是闭住了呼吸，在抑制自己的情绪。我也有过这样的时候。然后，他慢慢地站起，走到窗户跟前去，久久地望着外边的街道，并不时地用夹着烟的手的无名指和小指抹一抹眼睛。他以为自己做得很自然——好像是吸烟后的一个什么习惯动作，但是我看见了，他的手指头是湿的。

“这烟熏眼睛。”

后来，当他转过身来看见我看着他，就说。他还笑了一下——也就是咧一咧嘴。我急忙掉过头去。看一个男子汉抹眼泪是叫人难堪的。

“天快亮啦！”他说。

“嗯，是快亮啦。”我觉得口干舌燥，说话吃力，“她今天送你吗？”

“不会吧。她不知道咱乘哪趟车。”

“可惜。”

“怎么啦？”

“想见见她。”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有了这样的念头。

“她今天夜班，不在车站。”

早晨八点钟，我们就离开了天津。八点钟发车，我们七点半到站，在候车室门前的广场上找到候车的队列，喇叭里就叫了，准备检票。

旅客队伍站起来了，人们开始准备行装，这时张老师插了我一下，叫我往边上看。

我一扭头，发现一个车站服务员站在离我们两三步的地方，看着站在我前头的刘老师。她穿着蓝裤、短袖白衬衫，白色的无檐帽上缀着红色的路徽，帽子下边是往上往里挽起的头发。她的头发黄黄的，脖颈挺白。我的心一震，推推刘老师。

“什么事？”刘老师说。但是当他一转身功夫就猛地一怔。“你！你……怎么来啦？”

他的脸一下子红了，看看那女人，又看看我和张老师。

“换了个班。”那女人说，“我猜你就是坐这趟车。”

“啊啊……”刘老师红着脸，手忙脚乱地说，“这是……我们学校的张老师和……”

我和张老师向她点头。她也向我们点头，并且微微笑了一下。这一笑，我是永远记在心里了。是的，正像刘老师说的，她的笑是短暂的，淡淡的，甚至说是冷冰冰的，刚刚一笑，笑意就从嘴角上消失了。她的皮肤真像是透明的。不过，没有我想像的那么白，有点发灰，发青，就像是冰块的颜色。她的嘴唇上有一抹淡淡的红色。眼睛是黄褐色的，就像黄土的颜色，看不出深浅。

我以为她要和刘老师说点什么，就拉着张老师走开几步去，但是我一直没看见她说话，一句话也没说。她高高的瘦瘦的身材就那么站着，在两三步远处看着刘老师。她的脸就像是冰雕成的，朝着刘老师，没有任何表情，就是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刘老师也没说话，面对面看着她，或者偏过头去看着远处，看远处的时间长，看她的时间短。

检票了，整个队伍动起来了。我们走过检票口，走上站台，找到了车厢；她一直跟着我们，但没说一句话。当我们在车厢里找到座位往外看的时候发现，她就站在窗外两步远的地方。

她一直站着，看着车上，看着坐在窗口的刘老师。车开动了，刘老师摇着手说了声“再见”，她还是默默地站着，黄土一样的眼睛看着他。只是在她的身影快要被站台上的人群遮住的时候，我才看见她举起一只手抹着眼睛。

我敢说，这个女人的模样是我见过的最动人的女人的形象之一。

写作手记(代跋)

杨显惠

1965年至1981年,我在地处河西走廊的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上山下乡。农建十一师在其建设发展的历史上接收过省、地、县的许多劳改和劳教农场,而我自己又在兵团内部调动过多次工作单位,所以结识了许多农场移交过来的右派和劳教人员。从他们嘴里我知道酒泉县有过一个夹边沟农场,从1957年10月开始,那里羁押了三千名右派。1960年12月,中央派出的工作组和西北局共同解决甘肃省委的左倾错误,决定释放右派回家时,夹边沟农场仅有数百人生还。右派们的叙述在我的心中造成的震撼历久不息,事隔多年后的1997年,我着手调查夹边沟事件。我想真正搞清楚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调查进行了三年,每年用二到三个月的时间访问当年的幸存者和管理人员,查阅资料和两次实地考察夹边沟。现在我大致搞明白了:夹边沟农场位于酒泉县东北方向,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从酒泉县乘汽车沿酒(泉)金(塔)公路往东北方向行驶,在第二十八个里程碑处左拐涉北大河,再北上数公里,可见一片连绵的沙丘,即夹边沟农场。农场西北八公里处有一片草滩叫新

添屯,是夹边沟农场的—个作业站(分场)。

夹边沟农场成立于1954年3月,科级单位,原为犯人劳改农场。它的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1957年的下半年,劳改犯被转移,夹边沟农场改变为劳教农场,专事“收容”甘肃省的机关、企业和学校在反右派斗争中揪出来的极右分子、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或者曾有过其它错误的右派分子,还有一部分大鸣大放期间有右派言论的历史反革命和工人当中因右派言论而获罪的坏分子。共计二千四百余人(官方数字)在此劳动教养。1960年9月,夹边沟的劳教分子除了瘦弱不堪者之外,全部迁移到高台县明水乡开荒。三个月后——1960年12月,中央解决甘肃省委的左倾错误,抢救人命,遣返劳教人员。此时夹边沟农场尚存苟延残喘者一千一百人。

臭名昭著的夹边沟农场遂于1961年10月撤销。

夹边沟事件是当时甘肃省委极左路线的产物,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是甘肃省历史上惨痛的一页;是二千四百多名右派的苦难史。但是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经不多了,当年的事件制造者有意把它封存起来,当年的生还者大都谢世,少数幸存者又都三缄其口。作者将调查来的故事讲述出来,意在翻开这一页尘封了四十年的历史,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并告慰那些长眠在荒漠和戈壁滩上的灵魂:历史不会忘记夹边沟。

我们关注前人的历史就是关注我们自己。